

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

第三辑

*Information und Forschung über
deutschsprachige Länder*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编辑部 编

顾 问 梅兆荣 顾俊礼
主 编 殷桐生 刘立群
副 主 编 姚晓舟 姚 燕 吴 江
执行编辑 包葛耿 周海霞
德语编辑 李 克 (Patrick Kühne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目 录

采访精撷

- 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李进军副部长的访谈·····本刊编辑部 3
对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博士的访谈·····张凯 李珍 桂榕璟 8

新闻鸟瞰

- 外交新闻····· 吴江 23
经济新闻····· 徐丽莉 29
媒体新闻····· 周海霞 33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37

热词诠释

- Two-Pack和Bankenunion ····· 关海霞 43
Migrantenökonomie和EU-Fortschrittsanzeiger, Score Board ····· 徐四季 46

政治舞台

- 黑红联盟的形成····· 童天齐 51
逆时代潮流而思的现实政治家俾斯麦
——解读俾斯麦的政治与外交智慧····· 包向飞 刘靓 56

外交观察

习近平主席访德成果研析·····	梅兆荣	67
多元和谐——评习近平访德·····	殷桐生	70
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背景出发，总结一战教训和魏玛悲剧·····	吴兴唐	76
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新姿态·····	刘立群 李微	81
乌克兰危机和全欧安全·····	Michael Staack	91
德国如何看待战争手段·····	于芳	102
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联合执政协议》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部分（译文）·····		
·····陈思、桂榕璟、李珍、徐曼语、鲁肖、徐帜、赵梦同、梅霖、李冰溪		109

经济视野

德国的企业兼并与中企兼并德企·····	殷桐生	129
对奥地利经济特色的看法·····	卢永华	139
瑞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借鉴·····	任丁秋	144
从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史看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	姚燕	152
元交际型冲突风格之特点与文化解读——中德员工交往中之冲突研究（下）·····	赵倩	161
欧洲经济复苏·····	张凯	169
德国社会福利国家代际公平性研究·····	徐四季	174
德国新政府最低工资政策评析·····	李微	183
德国2013年经济发展分析与2014年经济走势展望·····	李晓海	190

文教论坛

新生代大学生交际行为新趋势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刘悦	197
德国国家级才俊资助机构系统及其特点探析·····	彭彧	207
针对外国入学申请者的德国高校入学语言考试及其启示·····	胡春春	214

科研环视

科研新动态·····	李晓海	225
------------	-----	-----

Inhaltsverzeichnis

Interviews

Interview mit Li Jinjun, Vizeminister in der Internationalen Abteilung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KP Chinas	die Herausgeber	3
Interview mit Herrn Dr. Jean-Jacques de Dardel, Schweizerischer Botschafter in China	ZHANG Kai, LI Zhen, GUI Rongjing	8

News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

Außenpolitik	WU Jiang	23
Wirtschaft	XU Lili	29
Pressemeldungen	ZHOU Haixia	33
Politik, Gesellschaft, Kultur und Bildung	SHI Xiaoyan	37

Modewörter und was sie bedeuten

Two-Pack und Bankenunion	GUAN Haixia	43
Migrantenökonomie und EU-Fortschrittsanzeiger, Score Board	XU Siji	46

Innenpolitisches

Die Bildung der Großen Koalition	TONG Tianqi	51
Denken gegen Zeitgeist – Bismarcks Klugheit als pragmatischer Politiker und Diplomat	BAO Xiangfei, LIU Liang	56

Außenpolitik im Fokus

Analyse des Deutschlandbesuchs von Xi Jinping	MEI Zhaorong	67
---	--------------	----

Harmonie in Vielfalt — Ein Kommentar zu Xi Jinpings Deutschlandbesuch·····	YIN Tongsheng	70
Gegründet inmitten von Krieg und Revolutionen – Die Lehren aus dem 1. Weltkrieg und die Tragödie der Weimarer Republik·····	WU Xingtang	76
Di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angesichts der Ukraine-Krise·····	LIU Liquan, LI Wei	81
Die Ukraine-Krise und di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Michael Staack	91
Die deutsche Haltung zum Krieg als politischem Instrument·····	YU Fang	102
Außenbeziehungen und Sicherheit im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CDU/CSU und SPD (Übersetzung)·····	CHEN Si, GUI Rongjing, LI Zhen, XU Manyu, LU Xiao, XU Zhi, ZHAO Mengtong, MEI Lin, LI Bingxi	109

Wirtschaftliche Horizonte

Deutsche und Chinesisch-Deutsche Unternehmensübernahmen·····	YIN Tongsheng	129
Zu den Besonderheit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Wirtschaft·····	LU Yonghua	139
Die schweizerische Nachhaltigkeitstrategie und die Lehren daraus·····	REN Dingqiu	144
Ethische Prinzipien bei interkulturellen Wirtschaftskontakten ——deutsch-chinesische Erfahrungen·····	YAO Yan	152
Kulturelle Dekodierung metakommunikativer Konfliktstile im chinesisch-deutschen Arbeitskontext (2. Teil)·····	ZHAO Qian	161
Die Erholung der europäischen Wirtschaft·····	ZHANG Kai	169
Untersuchungen zur Generationengerechtigkeit im deutschen Sozialsystem·····	XU Siji	174
Die Mindestlohnpolitik der Bundesregierung auf dem Prüfstand·····	LI Wei	183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2013/14 – Analysen und Ausblicke·····	LI Xiaohai	190

Kultur- und Bildungsforum

Neue Trends im studentischen Kommunikationsverhalten und ihr Einfluss auf die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LIU Yue	197
Deutsche Begabtenförderprogramme auf Bundesebene·····	PENG Yu	207
Sprachtests für ausländische Studienbewerber in Deutschland·····	HU Chunchun	214

Forschungsrundschau

Neue Forschungstrends·····	LI Xiaohai	225
----------------------------	------------	-----

• 采访精撷

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李进军副部长的访谈

本刊编辑部

一、政党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由中联部负责。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政党外交更加注重发挥优势、体现特色、突出重点、讲求实效，突出高层次交往、预防性外交、前瞻性调研、基础性工作的特点，充分发挥做社会主义国家、做人的工作的优势，进一步深化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友好交流和合作，结交了一批“知华”、“友华”的政党政要，实现了与美、日、俄、德、印、澳等一些大国大党交往的机制化，拓展了与政党国际组织的联系和交往。目前，我们党已同世界上185个国家和地区的601个政党与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友好交往及联系，一个以各国主流政党和政党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为对象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基本形成。可以说，政党外交已成为国家总体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促进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

1. 着力发挥政党外交全方位交往优势，富有成效地参与和配合国家重大外交部署和外

交议程。进一步加强同越南、朝鲜、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机制化交流，不断强化同周边国家主要政党的交往，努力拓展同各类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务实合作，着力深化同发达国家主流政党的交流，及时跟进同新兴大国政党的合作，积极扩大同政党国际组织和地区性组织的交往。配合国家总体外交，不断推进与大国大党的机制化交流。如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定期交流、中日和中俄执政党交流机制、中美政党高层对话、亚洲政党专题会议、中欧政党高层论坛、中英青年政治家论坛、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等先后展开，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及双边合作展开深入交流，有效增进了战略互信，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平稳发展。

2. 着力发挥政党外交，深入做各国政党工作的优势，推动国家关系中“难点”、“盲点”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敏感问题的妥善解决。通过党际关系，主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着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积极处置与有关国家存在的现实和潜在矛盾，坚决维护我国的核心和重大利益。在联合国改革、朝鲜半岛维稳、海上

争端、朝核伊核问题、南北苏丹纷争，以及涉台、涉藏、涉疆等各种热点敏感问题上，充分发挥政党外交优势，积极跟进，最大限度争取国际社会理解与支持，为推动相关问题的化解发挥积极作用。

3. 着力发挥政党外交做人的工作的优势，为国家关系当前和长远发展“储备”资源。许多国家的政党政要在上台执政前曾应我党邀请访华，通过交流，深化了对我了解、信任和情谊，为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党的对外工作的大框架下，积极开拓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增进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外国民众对我们党的了解和认同，夯实了中外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
4. 着力开展对外传播，使政党外交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党的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近年来，党的对外工作依托立体式对外交往渠道，更加积极、主动、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传播我们党的真实信息，进一步深化了国际社会对我们党的认知，树立了我们党良好的国际形象。一些一度存有偏见的外国政要、媒体人士，通过同我们党的交流对话，有的“颠覆了原有成见”，有的变成我们党的朋友，在外国媒体或党的会议上积极为我宣传、发声。

二、中德政党交往现状如何？

在与中国共产党交往上，德国一直走在欧洲国家前列。我本人曾作为德语工作者长期从事对德政党工作，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德政党交往在过去几十年里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现在，我作为中联部主管德语国家的副部长，仍继续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与德国各主要政党的友好关系而努力工作。今年

3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德，两国领导人宣布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当前，我党与德国五大政党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党际关系，可以说已初步形成全方位对德政党交往格局。

我们与德国联邦议院的所有政党都有交往。其中，社民党是最早与我党建立党际关系的西欧社会党。1984年，时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两党正式建立党际关系，确立“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交往方针，是我们与西方政党建立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突破。因此两党“建交”，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我本人有幸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亲自参与了那次“历史性访问”的筹备和接待过程，并担任双方领导人的翻译。此后，两党关系不断深化，逐步建立了多层次、宽领域的交往格局。今年是两党正式建立党际关系30周年，除保持高层交往外，两党还建立了外交与安全政策对话、可持续发展对话、青年与地方政治家交流等重要机制化交往内容。与社民党的关系是我与德国政党交往中最成熟的。我与德国中右翼政党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也保持着密切交往，2002年以来，双方举办过多次政党对话，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主席考德尔，基民盟联邦理事会成员、德国青年联盟主席、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米斯菲尔德等重要政治家曾应中联部邀请多次访华。联盟党是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对德国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与联盟党增进相互了解和认识并开展务实合作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还与左翼党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左翼党是由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演变过来的，因此，两党交流的重点主要是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我们与绿党也建立了党际关系，绿党主席约茨德米尔曾应我党邀请访华。两党交往在过去

几年得到不断发展。绿党在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先进的政策理念，值得我们借鉴。因此，两党在交往过程中着重就这一领域积极开展对话。我们与自民党也建立了交往，现任党主席林德纳曾应我部邀请多次访华，非常重视与中国共产党的交流与合作。虽然自民党没有进入本届联邦议院，但依然是德国政坛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着眼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我们一直积极保持与自民党的交往。

除政党交往外，我们还借力其他有效渠道开展对德工作，如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阿登纳基金会、科尔伯基金会、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等影响力大的政治基金会和民间组织。这些组织除了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外，还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我们借助其平台成功扩大与德国政党政要以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对话和交流，大大丰富了对德政党工作的形式和内容，有时还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2013年10月，中联部邀请德国社民党前主席、艾伯特基金会会长库尔特·贝克一行访华。我们为贝克先生精心安排访华日程，除了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拜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赴外地参观考察之外，我本人还专程陪同贝克先生来到北外。在阿语楼国际会议厅，贝克先生发表了题为“德国战后反省及努力改善与欧洲邻国关系的一些做法”的演讲，并同北外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活动结束后，贝克先生向我表示，通过问答交流，以北外学子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一代的知识广博、思维活跃和眼界开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中德政党交往对推动中德关系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中德政党交往在中德关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是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

关系的重要支柱。

首先，中德政党交往促使德国主要政党成为推动中德关系发展的“正能量”。在交往初期，德国大多数政党对华都抱有不同程度的误解与偏见，有的指责中国不重视人权保护，有的认为中国是独裁专制，也有人深信“中国威胁论”。但随着交流与对话的不断深入，各党对华误解与偏见逐渐减少，认知趋于全面、客观，与我党开展合作的积极性不断上升，进而热心于发展对华关系。举个很有趣的例子，2012年德国联盟党拟制订“新亚洲政策文件”，当时正值我率团访德，在同德国青年联盟主席、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米斯菲尔德会面时，他把一摞“新亚洲政策文件”的初稿递给我，对我说：“‘新亚洲政策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对华政策，基于联盟党与中国共产党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我们请中国共产党先帮我们提提建议。”一个政党的外交政策文件，在正式发布前向外国政党征求意见，这在政党交往史上似乎也并不多见。后来，我们认真研读了文件内容，并将意见建议坦诚相告。最后，该党公布的“新亚洲政策文件”中将中德关系的定位由“竞争对手”调整为“战略伙伴”，将发展对华关系的指导思想由“遏制”调整为“合作”，与2007年出台的“亚洲战略”相比，该党对华政策发生重大积极变化。

其次，中德政党交往为中德关系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脉基础。近年来，通过政党交往，中联部接待了一大批德国政治家访华。通过实地考察和对话交流，一方面加深其对华认知，另一方面也增进其对华友好。目前，在德国各主要政党，中联部广交朋友，厚植人脉，尤其是重点结交一批有实力有前途的青年政党领袖和政治家。这批青年精英积极参与中德政党交往，热衷推动两党两国关系发展。他们中的不少人在政党或政府担任要职后，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

要力量。德国社民党主席、联邦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加布里尔曾长期担任我党与社民党青年政治家交往的德方牵头人，在地方工作时就曾多次应中联部邀请访华，与中联部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都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前不久，加布里尔以德国联邦副总理兼经济部长身份访华，期间专门到中联部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等老朋友。加表示，为纪念两党正式建立党际关系 30 周年，今年下半年他将以前任社民党主席的身份专程率团访华，并与中方共同举办专题研讨会，通过回顾总结两党过去 30 年的交往历史，更好地展望和规划两党交往的下一个 30 年！

再次，中德政党交往为中德两国的务实合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中德作为全球两大贸易国和两大经济体，无论从产业发展水平、市场规模，还是从需求格局来看，两国经济互补性十分突出，合作空间极其广阔。在此背景下，我们近年来充分发挥对德政党工作的独特优势，通过德政经各界广泛的人脉资源，成功推动了一批中德务实合作项目，如广东省揭阳市的“中德金属生态城”项目。位于粤东地区的揭阳市是我国重要的金属材料加工和金属生产基地，金属产业规模大，但技术水平和产品附加值很低，而且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为此，揭阳提出建设金属生态城的规划。德国是世界上金属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一大批全球领先的企业，可以说是揭阳最理想的合作伙伴。2013 年初，中联部通过组织多批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的政党政要及其影响下的经济组织和企业协会赴揭阳考察访问，积极促成揭阳与德国合作，全力打造“中德金属生态城”项目。该项目采用了全新的办园模式和招商引资理念，规划用地 3.7 万亩，计划总投资 1500 亿元，设计打造原材料及制品营销、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城市矿山、人力资源、

产业金融六大平台，建设中德“合创小镇”、“动力小镇”、“智造小镇”三期单位。截至目前，签署正式入园合同的德国企业已有 8 家，签署入园意向书的已有 20 多家，在谈的已有 40 多家，其中包括欧洲技术最先进的法兰克福智能管网公司，德国 KCL 科技有限公司、德国费迪南鸣乐控股有限公司和德国艾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等实力雄厚的知名企业。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 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时，还亲自见证了揭阳市中德金属集团与德国欧绿保集团合作建设的“中德资源再生基地”项目的签署仪式。

四、中国共产党与奥地利和瑞士政党交往情况如何？

中国共产党与奥地利主要政党，尤其是两大执政党——社民党和人民党一直保持着交往。党际关系为增进中奥双方加强相互了解和认知以及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奥地利社民党重视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与我党开始交往，是较早与我建立联系的西欧社会党之一。此后，两党交往不断深化，主要形式包括代表团互访、举办研讨会等。在同社民党的交往中，我们结识了一批奥地利知华友华的政治家，如奥地利国民议会社民党党团主席席德尔、社民党前副主席、国民议会奥中议员友好小组主席屈吉茨等，无论在党内任职还是在政府部门，他们都积极致力于推动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与奥地利人民党的交往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交流与合作。除了通过代表团互访外，该党还积极派代表出席中联部举办的中欧政党高层论坛。该党政治家、奥地利前国防部长法斯拉本德以及国民议会人民党党团资深议员阿蒙都曾参加过这一高端对话平台。此外，我们还同该党下属的政治学

院开展经常性交流，就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看法。除两大执政党外，我们还与奥地利其他政党有接触，但总的说来，交往还相对较少。

瑞士政党政治与德国和奥地利有着较大区别，其政党小而多，且更侧重与本国和欧洲地区交往。因此，我与瑞士政党开展交往

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特点，重点通过多边政党活动与瑞士政党进行接触。此外，我还通过瑞士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民间组织建立与该国政党和重要政治家的联系，做其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瑞士的“未来之星”基金会、瑞中协会都是实力很强的友好组织，是我们在瑞士的重要合作对象。

对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博士的访谈

张 凯 李 珍 桂榕璟



2014年6月3日，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博士在大使馆办公室接受了本刊的采访，以下是这次采访内容的中文摘要：

大使讲到在华从事外交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时提到，自己除了在诸多发达国家工作过以外，也曾有过在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历，所以对第三世界国家并不陌生。但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却各有特点，语言也不尽相同，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对外交官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况且中国还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戴尚贤大使说，自己与中国有

很深的渊源。他的家人都曾到中国学习或工作过，所以他履新之前便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然而他还谦虚地表示，自己对中国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在谈到瑞士的中立原则时，大使认为这对于开展外交工作比较有利。基于中立原则，瑞士致力于同所有国家发展良好的关系，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协调作用，以化解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瑞士没有自己的利益。其中提到，中瑞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关系赋予了其在华外交

工作一个良好的氛围，但是两国的世界观，包括对人权问题在内的其他利益理解却不太相同。从这方面来说，在中国开展外交工作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处于中立国的地位，瑞士在解决危机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它几乎在每一场危机中都不遗余力进行协调，包括此次在乌克兰危机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作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瑞士在普京、奥巴马等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当中进行斡旋，同时也派出了专家参与有关释放欧安组织军事观察员的谈判等。但是由于保密以及低调的原则，这些努力只有政府层面的决策者和官员知道，并不会被大肆宣扬。就像拉迪亚德·吉卜林的诗《白人的重担》中提到的一样，帮助别人是一种义务，这是瑞士的责任和光荣。

谈到履任驻华大使一职之后的工作时说道，大使其实就是一个团队领导者。能够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有效方法就是带领好每个工作人员，为他们提供支持。大使的工作并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在集体的努力下才能完成。至于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促进双边的理解和关系发展，就是要向中方不断地、清楚地表达瑞士政府的立场。如若中瑞政府层面发生任何问题，都要在第一时间通过大使馆解决。此外，使馆工作还包括公关工作，例如介绍瑞士、舆论工作、媒体工作以及各种沟通工作等等。瑞士作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对公众意见的有效性极为重视，很多事情都要进行全民公投。在这方面的理解上，中瑞还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但是在占有世界1/5人口的中国，瑞士模式不可能复制，只能尽量多地向中国官员传达一些观点和信息，这也是瑞士驻华使馆工作的重点之一。中瑞之间的经济和金融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是这

还远远不够，双边还应在文化领域进行更多的交流。人们一直所熟知的瑞士是一个富裕国家，但是并不是一个文化之国。而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现今也开始显示出了对文化以及自身历史的浓厚兴趣。所以，中瑞之间建立一种文化关系也十分重要。

前段时间进行的有关外来迁入者的全民公投结果在瑞士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戴尚贤大使认为这是瑞士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国家所面临的难题。在驻法国大使馆工作期间，大使发现法国也受到外来移民问题的困扰。然而，法国的移民比例只有11%，而瑞士则为25%。瑞士与欧盟之间签订的各项条约以及自由人员流动政策使得瑞士迁入人口激增，这大大地超出了瑞士的预期，也带来了很多负面挑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大使对此保持乐观态度。

在谈到瑞士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时，大使指出瑞士近年来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无论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来看，还是从失业率状况来看，瑞士的经济发展得比较健康。但是由于之前提到的全民公投结果，瑞士与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略有争议，这可能会部分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谈到有关中瑞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时，大使介绍了中瑞双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走完法律程序，并于7月1日正式生效。签订这一协定之后，两国经贸关系迈入新阶段。瑞士虽然人口不多，但是也跻身于世界20强经济体之列，且位于欧洲中部，可以为中国公司在欧洲生根落户提供多种帮助。除了两国的自贸协定之外，瑞士还在江苏镇江建立了中瑞生态产业园，并于7月2日开园。中瑞还将开展金融对话，中国也将在苏黎世设立中瑞合作中心，这些发展动向都释放出了中

瑞关系发展的积极信号。

对于如何进一步加深中瑞关系的问题，大使谈到了自己的梦想，大使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协同发展，希望在中国建立一座“瑞士大厦”，集中处理涉及中瑞双方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利益的问题，为进一步促进中瑞合作提供便利。此外，大使再次强调了对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高校互访交流的高度重视。

最后，大使还给渴望成为未来外交官的青年学子提了一些建议，大使殷切希望有志于成为外交官的学子不要拘泥于自己的学科专业，要广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开阔眼界，保持自己的好奇心，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最重要的是，要培养自己的长远思维和战略思想。

Interview mit Herrn Dr. Jean-Jacques de Dardel, Schweizerischer Botschafter in China

Zhang: *Als erfahrener Botschafter sind Sie schon in mehreren Ländern gewesen, in den USA, Australien, Belgien und Frankreich, die ein ähnliches wirtschaftliches Entwicklungsniveau wie die Schweiz besitzen und alle zu den westlich geprägten Ländern gehören. China unterscheidet sich von diesen Ländern wahrscheinlich in vielerlei Hinsicht. Mit welchen beruflichen Herausforderungen und Schwierigkeiten rechneten Sie vor Ihrer Anreise in China?*

Dardel: Sie haben bereits die Länder, in denen ich dienstlich gewesen bin, erwähnt. Außerdem war ich auch einmal in Österreich tätig. Das war mein erster Posten im Ausland. Es stimmt, die meisten meiner Dienstorte befanden sich in solchen entwickelten Ländern. In meinen früheren Jahren habe ich jedoch auch Zeit in Brasilien und Vietnam verbracht. Durch sie habe ich die Dritte Welt kennengelernt. Meine Antwort auf Ihre Frage würde ich daher etwas anders formulieren: Jedes Mal, wenn ich als Diplomat ein neues Land entdecke, jedes Mal wenn ich auf etwas Neues stoße,

ist es eine Herausforderung. Und die Art der Herausforderung ist natürlich ebenfalls jedes Mal eine andere, aber letztlich geht es immer um die eigene Anpassungsfähigkeit. Meine eigentliche persönliche Herausforderung in China ist die Tatsache, dass ich das erste Mal in meinem beruflichen Leben in einem Land bin, dessen Sprache ich nicht nur nicht beherrsche, sondern die mir sogar völlig fremd ist. Abgesehen davon ist die Situation für mich nicht so ungewohnt. Auf der einen Seite ist China nämlich ein ganz normales Land, ein Entwicklungsland wie andere fortgeschrittene Entwicklungsländer. Auf der anderen Seite ist China jedoch absolut eigenartig. Und alles ist hier interessant. Überall gibt es Herausforderungen, aber in einer positiven Bedeutung.

Meine Frau ist Schweizerin, aber sie spricht Chinesisch. Sie hat sich in ihren eigenen früheren Jahren sehr für China interessiert und chinesische Kunstgeschichte und chinesische Sprache studiert. Sie war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in Beijing an der Universität für Ausländer.

1986 sind wir dann einmal gemeinsam hierher gekommen. Das war mein erster Kontakt mit China.

Hierzu möchte ich noch ergänzen, dass mein Vater auch Diplomat war und meine Eltern vor meiner Geburt 3 Jahre in Hongkong gelebt hatten. Von ihnen habe ich daher viel über Hongkong, über China und die chinesische Kultur gehört. Ich selbst sammle chinesische Kunst. Interessan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ist vielleicht auch, dass unsere Tochter schon vor meiner Nominierung ein Jahr in Shanghai verbrachte um Chinesisch zu lernen. Kurz gesagt, ich habe schon einige Kontakte und persönliche Erfahrungen mit China. Aber ich bin natürlich überhaupt kein Kenner und habe viel zu lernen.

Zhang: In China spricht man in so einem Fall von schicksalshaften Beziehungen zwischen Ihnen und China. Dank des Neutralitätsprinzips hat die Schweiz ja keine direkten politischen Konflikte mit anderen Ländern. Kann man sagen, dass die Arbeit des Botschafters eines neutralen Landes in gewissem Sinne einfacher ist als die anderen Botschafter? Oder, pessimistischer ausgedrückt, hat der schweizerische Botschafter aufgrund der Verpflichtung zur Neutralität geringere Gestaltungsmöglichkeiten?

Dardel: Ich würde nicht sagen, dass meine Arbeit dadurch erleichtert wird. Allerdings gebe ich Ihnen darin Recht, dass die Arbeit angenehmer wird, wenn man sich gut mit den anderen versteht, wenn die Länder in einer guten Beziehung zueinander stehen. Aber das heißt nicht unbedingt, dass die Arbeit leichter wird. Freunde zu sein, bedeutet ja nicht, dass wir immer

einer Meinung sind. Und es heißt auch nicht, dass nicht jeder seine eigenen legitimen Interessen verfolgen darf. Die Arbeit in China empfinde ich deswegen als sehr angenehmen, weil wir über sehr gute Beziehungen verfügen und einander mit Respekt und Interesse begegnen. Aber oft unterscheiden sich unsere Weltanschauungen voneinander und auch unsere Interessen können unterschiedlich ausgerichtet sein, zum Beispiel im Bereich der Menschenrechte. Mitunter kann es auch schwierig sein, unsere Sichtweise der Dinge, verständlich zu machen und klar herauszustreichen.

Aber aus einem anderen Blickwinkel betrachtet hat das natürlich auch seine Nachteile. Ich würde auf Ihre Frage nach der Leichtigkeit der Arbeit nicht mal mit „Ja“, sondern mit einem klaren „Nein“ antworten. Vielleicht darf ich hier noch etwas ergänzen. Jedes Land hat seine eigene Position, das gilt für Nicaragua oder Thailand genauso wie für die Schweiz oder Brasilien. Für uns Schweizer stimmt es sicher, dass wir uns als neutrales Land um gute Kontakte zu allen bemühen. Wir werden auch so wahrgenommen und anerkannt. Aber gerade deswegen versuchen wir, vielen Ländern als echte Vermittler nützlich zu sein, besonders in Krisensituationen. Das ist für andere, unparteiische Länder etwas schwieriger, weil sie nicht immer den Ruf als neutrales Land genießen. Es gibt mehrere Krisen, bei denen die Schweiz als Schlichter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 oder gespielt hat. Kaum jemand weiß das und zwar mit gutem Grund. Um nämlich aktiv, effektiv und nützlich zu sein, müssen wir sehr viel Wert auf Diskretion legen. Das heißt, dass die Entscheidungsträger, wie zum Beispiel Regierungsleute mit Anliegen zu uns kommen.

Diese Leute wissen genau, wie präsent und aktiv die Schweiz ist. Auf Englisch heißt es, „it would defeat the purpose“ – es schade dem Zweck der Sache, wenn wir unsere Erfolge herausposaunten. Das könnte uns heute vielleicht einen kleinen Vorteil bringen, aber morgen würde keiner mehr zu uns kommen und unsere Vermittlerrolle würde an Glaubwürdigkeit verlieren. Wir mischen uns ein in fremde Angelegenheiten, und zwar in dem Sinne, dass wir versuchen, nützlich zu sein bei der Lösung von Krisen. Das ist selbstverständlich in Europa der Fall, etwa auch aktuell bei der Ukraine-Krise, früher war es der Balkan. Auch in Asien haben wir eine gewisse Rolle bei der Beruhigung von Konflikten gespielt. Und das können wir deswegen tun, weil wir ein neutrales Land sind. Denken Sie an Rudyard Kipling, der in seinem Buch *The White Man's Burden* geschrieben hat, dass es für den weißen Mann auch eine Last ist, den anderen zu helfen. Für uns ist das „the neutral man's burden“. Es ist zwar unsere Last, aber auch unsere Ehre, uns in diesen Krisensituationen nützlich zu machen.

Zhang: Ich glaube, bei dieser Frage gab es wirklich ein Missverständnis auf unserer Seite, weil wir dachten, dass Neutralität immer friedliche und entspannte Büroarbeit bedeutet. Ihre Darstellung hat uns jedoch einen anderen Eindruck vermittelt: Tatsächlich ist die Arbeit aus einer neutralen Haltung wohl mit viel Anspannung und Stress verbunden.

Dardel: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sind wir als Vermittler aktiv, in Afrika auch. Gerade wegen unserer diskreten Haltung können wir hier etwas bewirken und aufgrund unserer Werte wollen wir auch etwas bewirken, wir fühlen uns

dazu verpflichtet. Das ist unsere Diplomatie. Hierfür ist die Abteilung für menschliche Sicherheit zuständig, vielleicht die größte Abteilung in unserem Ministerium. Doch auch die politische Abteilung, in der ich früher beschäftigt war ist hierin involviert. Ich habe hier auch persönlich verhandelt in Krisenherden und bei schwierigen Situationen zwische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Allerdings bedeutet das natürlich nicht, dass wir die einzigen sind, die hier aktiv sein können. Um Ihnen aber ein Beispiel zu geben: Als es zum Krieg zwischen Georgien und Russland kam, einem echten Krieg, konnten wir beide Seiten nützlich sein. Beide haben damals bei uns angefragt und bis heute vertreten wir sowohl russische Interessen in Georgien als auch georgische Interessen in Russland. Unsere Rolle wird dadurch noch an Einfluss gewinnen, dass die Schweiz derzeit die Präsidentschaft der OSZE, der Organisation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übernommen hat. Hier ist es zurzeit die Ukraine, die uns beschäftigt. Der Präsident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schaft, der gleichzeitig auch unser Außenminister ist, engagiert sich hier sehr stark und steht in Kontakt mit Putin, Obama und anderen, die in der Ukraine eine dauerhafte Rolle spielen. Doch ist hier nicht ein einzelner Mann, sondern unsere Diplomatie als ganze gefragt. Wir haben sehr viele Leute vor Ort, unter anderem auch Experten, die sich zum Beispiel mit den Verhandlungen und der Befreiung der OSZE-Beobachter, die von den Rebellen gefangen genommen wurden, beschäftigen.

Zhang: Danke für Ihre ausführliche Antwort. Der Botschafter ist der Vertreter im Ausland. Welche Tätigkeit des Botschafters

kann aus Ihrer eigenen Erfahrung als das effektivste Mittel zur Förderung des beidseitigen Verständnisses und der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gelten? Auf welche Arbeitsbereiche legen Sie nach Ihrem Amtsantritt in China den Schwerpunkt?

Dardel: Die Wahrheit ist, dass ich nur ein Teamleiter bin. Die Arbeit des Botschafters ist eine Gemeinschaftsarbeit und in einer großen Botschaft gibt es viele Leute. Das wirksamste Mittel, diese Arbeit reibungslos zu betreiben, ist ein gutes Management, also die interne Arbeit, die darin besteht, all diese Leute zu führen und zu unterstützen. Auch dies ist jedoch kein Alleingang des Botschafters. Auf Ihre Frage, was als das effektivste Mittel zur Förderung des beidseitigen Verständnisses gilt, gibt es eine einfache Standardantwort innerhalb der diplomatischen Tradition. Diese lautet, dass meine Arbeit darin besteht, die Stimme meines Landes gegenüber den Behörden, z.B., den chinesischen Behörden, zu äußern. Was ich zu tun habe, ist beständig unsere Position in verschiedenen Sprachen zu wiederholen und so gut wie möglich zu erklären und dann zur Verfügung zu stehen, wenn Fragen auftauchen. Es gilt, reibungslose Kontakte zwischen den Behörden und uns zu gewährleisten. Ich bin als Botschafter von meiner ganzen Regierung ausgewählt worden, ich vertrete also die ganze Regierung. Wenn irgendetwas zwischen China und der Schweiz auf Regierungsebene zu klären ist, dann erfolgt dies durch die Botschaft. Eine andere Art und Weise der Erklärung, eine zusätzliche Arbeit, für die ich selbst persönlich sehr viel Energie aufwende, ist eine allgemeinere Öffentlichkeitsarbeit – Profilierung der Schweiz, Meinungsbildung, Medienarbeit, Aufbau von

Netzwerken, Kommunikation im allgemeinen. In gewisser Beziehung ist dies ein Teil der modernen Diplomatie, besonders für Länder wie die Schweiz, die demokratisch sind, wo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eine enorm große Rolle spielt. Das gilt, wie Sie selbstverständlich wissen, für Verhandlungen und Initiativen, bei denen immer abgestimmt wird. Wir haben eine große Achtung vor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im Sinne einer wirkenden Meinung. Und in dieser Beziehung finde ich, dass wir sehr viel zum beidseitigen Verständnis beitragen können.

Die Frage, auf welche Arbeitsbereiche wir in China den Schwerpunkt legen, erfordert eine eingehendere Antwort. Einer der Hauptkerne unserer Beziehung ist wirtschaftlich. Wir unterhalten umfangreiche Handels- und Finanzbeziehungen, die noch weiter ausgebaut werden und deren zentrale Bedeutung von beiden Seiten als solche anerkannt wird. Daher ist alles, was mit Wirtschaft und Handel oder mit Finanzfragen zu tun hat, sehr wichtig für uns. Aber in meinen Augen reicht das allein nicht aus. Ich weiß, dass die Schweiz hierzulande als ein entwickeltes, reiches Land bekannt ist. Genauso gut weiß ich aber auch, dass wir nicht als Kulturland wahrgenommen werden. Dennoch haben wir auf der kulturellen Ebene einiges anzubieten. In den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spielt dieser Aspekt auch eine immer wichtigere Rolle, besonders in einem Land wie China, wo man sich wieder sehr für Kultur interessiert, nachdem dies in der Vergangenheit, wie zum Beispiel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immer der Fall war. Aber jetzt ist China dabei, sich wieder an seine eigene Geschichte anzunähern. Ich finde daher, dass es für uns wichtig ist, zu zeigen, dass

wir miteinander auch eine kulturelle Beziehung pflegen. Aber es gibt auch noch eine politische Arbeit. China und die Schweiz sind ein Teil der internationalen Wirtschaftsgemeinschaft und gehören gemeinsamen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en an. Wir haben unsere jeweils eigenen Interessen und versuchen manchmal, uns miteinander abzustimmen, oder bestimmte Dinge zu klären. Das ist Politik. Im Bereich der Menschenrechte haben wir auch eine Zusammenarbeit aufgebaut. Wir sprechen miteinander darüber und wenn es auf der Welt zur Krise kommt, sind wir oft zusammen aktiv, liefern einander Informationen oder fertige gemeinsame Analysen an.

Zhang: *Eben haben Sie die Referenden der Schweiz erwähnt. Vor kurzem habe ich in der Zeitung gelesen, dass es in der Schweiz ein Referendum über die Ausländerzuwanderung gab. Das Ergebnis wurde zum Teil als Widerstand gegen die EU-Regelung interpretiert. Können Sie kurz über diese Frage sprechen?*

Dardel: Sie wissen natürlich, wie viele Leute es in China gibt, etwa 1,4 Milliarden. In der Schweiz leben jedoch nur etwas über 8 Millionen Menschen. Aber wissen Sie, wie viele Ausländer hier in China es gibt?

Zhang: *Nicht über 2% vielleicht.*

Dardel: Ja, vielleicht auch nicht ganz so viel. Aber in jedem Fall doch erheblich weniger als in der Schweiz. Über 23% unserer Bevölkerung besitzen nur einen ausländischen, nicht schweizerischen Pass. Von den übrigen Bürgern gibt es sehr viele Leute, die Doppelbürger sind.

Das heißt, dass wir einer täglichen Realität der Einwanderung und der Präsenz von Ausländern gegenüberstehen, die weit über das hinausgeht, was in anderen Ländern wohl der Fall ist. Ich war früher Botschafter in Frankreich. Dort gibt es ein großes Problem mit der Immigration und mit der ausländischen Gemeinschaft in Frankreich. Aber dort liegt der Anteil bei 11%, nicht wie bei uns bei über 20%. Dazu ist zu sagen, dass unsere Verträge mit der EU zum freien Waren-, Handels- und auch Personenverkehr einen Zuwachs der europäischen Bevölkerung in der Schweiz zur Folge hatte. Dieser Zuwachs liegt jedoch weit über unserer Prognose. Dies führte zu vielen negativen Reaktionen.

Interessanterweise kann diese derzeitige negative Reaktion der Schweizer Bevölkerung nicht, wie zum Beispiel bei der Einwanderungswelle zur Zeit der Balkankriege, auf die kulturellen Differenzen zurückführen. Es geht heute nicht um die Religion. Es geht nicht um die Kultur. Es geht nicht mal um die Sprache. Aber trotzdem ist es die Rate des Zuwachses, die viele Leute beängstigt hat.

Persönlich fand ich, dass der Tag des Referendums ein schwarzer Tag war. Ich war gar nicht zufrieden mit dem Ergebnis der Abstimmung, ebenso wenig die Behörden. Aber es ist nun einmal so gekommen. Bei einem Stimmanteil von über 50% für die Initiative wird diese nicht nur anerkannt, sondern angenommen. Jetzt müssen wir damit leben. Das Ergebnis bedeutet nicht, dass wir Ausländer hinauswerfen wollen, überhaupt nicht. Es geht lediglich um Zuwachsraten, diese sollen in Zukunft begrenzt werden. Ein Beispiel: Es wurde damals von

der Regierung prognostiziert, dass wir ca. 8000 mehr Einwohner im Jahr durch die Öffnung der Grenze gegenüber der EU zu erwarten hätten – 8000. In China würde diese Zahl überhaupt nicht ins Gewicht fallen. Aber wie gesagt, wir sind 8 Millionen, da sind 8000 gar nicht so wenig. Aber nun sind 80000 gekommen, also zehnmal so viele. Und deswegen kam es zu einem Unbehagen. Analysen zeigen, dass dieses Unbehagen hauptsächlich in den Gegenden auftritt, wo es tatsächlich weniger Ausländer gibt. Zwar kam es auch in den Grenzgebieten und in den Großstädten, wo viele Ausländer leben, zu negativen Reaktionen, aber diese waren in der Minderheit und alle Großstädte haben gegen diese Initiative gestimmt. Doch nun geht es bereits um die Kontingentierung.

Zhang: Aber diese Kontingentierung ist gerade gegen das Freizügigkeitsabkommen mit der EU gerichtet. Wie löst man diesen Konflikt?

Dardel: Ja, das ist eine große Frage, denn es handelt sich um ein prinzipielles Problem. Wie können wir offen bleiben, gleichzeitig aber Kontingente einführen? Wenn die EU die Freizügigkeit wirklich als einen zentralen Wert Europas, ein Kernelement des europäischen Projektes betrachtet, dann haben wir hier ein Problem. Wir wissen noch nicht, wie wir das lösen werden. Es wird sehr viel Pragmatismus auf beiden Seiten brauchen. Vielleicht sind wir schlussendlich der Verlierer der Sache. Aber unsere Demokratie ist nun mal so. Man darf ständig wieder abstimmen. Ständig. Kein Votum ist für die Ewigkeit.

Zhang: Könnten Sie uns einen Kurzüberblick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schweizerischen Wirtschaft im letzten Jahr verschaffen? Welche Erfolge hatte sie zu verzeichnen und welche Probleme und Schwierigkeiten hat sie noch zu überwinden?

Dardel: Es geht der schweizerischen Wirtschaft ziemlich gut. Aber Sie müssen verstehen, dass wir ein europäisches Land sind. Wir vergleichen uns mit den europäischen und den westlichen entwickelten Ländern. Wenn wir eine Zuwachsrate von über 2% im Jahr haben, ist es für diese Länder viel, für Sie nichts. China liegt jetzt bei 7,5%, früher bei 10%, 12% oder 15%. Für uns deutet eine Zuwachsrate des BIP von 2% auf eine sehr gesunde Wirtschaft hin. Das ist zudem im Kontext einer europäischen Rezession zu sehen, während der es Europa insgesamt nicht sehr gut ging. Die schweizerische Zuwachsrate lag im letzten Jahr bei 2%, sie liegt in diesem Jahr bei 2,2% und wird 2015 vielleicht sogar bei 2,7% liegen, also bei knapp 3%. Das ist bemerkenswert, weil es in unseren Nachbarländern, wie zum Beispiel in Frankreich nicht so gut aussieht.

Es gibt noch andere Zahlen, die zeigen, dass die schweizerische Wirtschaft recht gut dasteht, nämlich die Arbeitslosenzahlen. Sie sind immer ein wichtiger Indikator. Die Arbeitslosigkeit hat in diesen letzten Jahren aufgrund der allgemein schwächeren Konjunktur besonders in bestimmten Branchen zwar etwas zugenommen – normalerweise haben wir eine Arbeitslosenquote von unter 3%, aber da die Rezession überall zu spüren war, hatten wir etwas mehr, letztes Jahr 3,2% – aber die Prognosen deuten darauf hin, dass wir in den kommenden zwei Jahren wieder

unter die 3%-Marke kommen.

Zhang: *3% ist für uns eigentlich Vollbeschäftigung.*

Dardel: Genau, einverstanden. Aber für uns nicht. In den siebziger Jahren waren die Zahlen sehr gut,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sogar noch besser.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wohnte ich in Kanada, weil mein Vater Diplomat in Kanada war. Man sprach nie von der Schweiz, schon gar nicht in den Nachrichten. Nur einmal gab es eine Meldung über die Schweiz. Am Ende der Nachrichten wurde gesagt: „Ja, die Arbeitslosenzahl in der Schweiz ist gestiegen.“ Ah, mein Gott! Was? „Ja, von 264 auf jetzt 266.“ Man nannte keinen Prozentsatz, sondern die absolute Zahl der Leute ohne Arbeit. Wir hatten über zehn Jahre eine Arbeitslosenquote von 0,0%. So ist die Vollbeschäftigung für uns eine echte Tatsache im strengen mathematischen Sinn. Dies hatte, ehrlich gesagt, viel damit zu tun, dass wir sehr viele Leute ins Land holten, wenn wir sie brauchten und sie dann sofort zurück in ihre Heimat gingen, wenn es keine Arbeit mehr für sie gab. Wir konnten unsere Arbeitslosen exportieren. Dann erlebten wir nach der Ölkrise Anfang und Mitte der siebziger Jahre das erste Mal eine strukturelle Arbeitslosigkeit. Und wenn sich so eine Struktur erst einmal etabliert hat, dann ist es schwer, sie wieder wegzubekommen. Daher haben wir jetzt eine strukturelle Arbeitslosenquote von – die genaue Zahl kenne ich im Augenblick leider nicht – 1,5% oder 2%. Eine Arbeitslosenquote von 3% ist also durchaus noch verbesserungsbedürftig. Allerdings glaube ich nicht, dass wir jemals wieder unter 2% kommen. Aber so ist das nun mal. Es ist in

Ordnung und zeigt doch, dass wir eine gesunde Wirtschaft haben.

Zhang: *Aber 2% ist für viele Länder schon ein Traum.*

Dardel: Ja, natürlich. Im Allgemeinen geht es unserer Wirtschaft gut. Im Maschinenbausektor hat sich die Lage verbessert. In verschiedenen Branchen hat der Export einen wesentlichen Anteil an der Wirtschaft und dieser hat sich allmählich wieder erholt. Asien hat stark zugelegt und besonders die USA erholen sich wieder. Das ist für uns sehr gut.

Die immer noch etwas getrübe Stimmung, die wir haben, hängt mit dem zusammen, was wir eben erwähnt haben, nämlich der Unsicherheit durch die Abstimmung des 9. Februar. Investoren sind sich nicht schlüssig darüber, ob man investieren darf, solange nicht klar ist, wie genau sich der Konflikt mit der EU lösen lässt. Das ist die schlechte Seite. Aber im Großen und Ganzen geht es unserer Wirtschaft sehr gut.

Zhang: *Im Januar besuchte ich die schweizerische Botschaft schon einmal. Damals hat Herr David Braun uns die Stärken und die Attraktivität der schweizerischen Wirtschaft vorgestellt. Wir diskutierten auch über das im letzten Jahr unterzeichnete Freihandelsabkommen. Gibt es inzwischen neue Fortschritte oder Probleme bei der Durchsetzung dieses Abkommens?*

Dardel: Die Neuigkeit ist jetzt, dass der Ratifikationsprozess abgeschlossen werden konnte – zuerst in der Schweiz, danach in China.

Das Freihandelsabkommen ist am 1. Juli in Kraft getreten. Das ist eine positive Entwicklung. Für die Inkraftsetzung bzw. während der Inkraftsetzung kam unsere Staatssekretärin für Wirtschaftsfragen Frau Ineichen-Fleisch hierher nach Peking. Aber das sind nur die Feierlichkeiten, die eigentlich neue Phase beginnt natürlich danach. Wie wir uns dann konkret annähern werden, ist dann eine Sache des zukünftigen Managements. Trotz unserer lediglich 8 Millionen Einwohner sind wir immerhin eine der 20 größten Volkswirtschaften der Welt. Noch dazu liegt die Schweiz in der Mitte Europas und besitzt damit eine günstige Lage für chinesische Interessen in Europa.

Zhang: Heißt das, dass die Schweiz nicht nur bei politischen Konflikten als Vermittler auftritt, sondern auch als wirtschaftlicher Vermittler für die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n Europa fungieren kann?

Dardel: Vermittler würde ich nicht sagen. Es geht nicht um Vermittlung in wirtschaftlichen Fragen. Wir könnten jedoch einfach chinesischen Firmen Möglichkeiten anbieten, sich zu positionieren oder etwas mehr über europäische Märkte zu lernen. Die Produktion könnte in der Schweiz stattfinden, sollte aber regelkonform ablaufen; das heißt, der Reininhalt des Produktes muss dem entsprechen, was mit der EU verhandelt wurde und darf erst dann wieder exportiert werden. Es besteht schließlich ein Frei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der Schweiz und der EU.

Zhang: Meinen Sie damit den Stammländergehalt des Produktes?

Dardel: Ich meine, wenn Sie ein chinesisches Produkt exportieren wollen, müssen Sie Zolltarife bezahlen. Wenn Sie dieses Produkt teilweise in der Schweiz herstellen, darf es weiter exportiert werden, aber nur wenn darin wirklich ein schweizerischer Anteil enthalten ist und nur im Einklang mit den Regeln, die wir mit den EU-Ländern ausgehandelt haben. Das hat nichts direkt mit dem neuen Freihandelsabkommen zu tun. Dieser neue Fokus auf die Schweiz kann für China nur positiv sein. Auch für uns ist es natürlich günstig, diesen Markt besser bedienen zu können, wenn auf unsere Produkte weniger Tarife, Zoll und Gebühren zu bezahlen sind.

Am 1. Juli haben wir ein Wirtschaftsforum hier in Beijing durchgeführt, mit Experten aus China, aus der Schweiz und aus vielen anderen Regionen, mit Akademikern, Entscheidungsträgern und natürlich Regierungs- und Wirtschaftsleuten. Es konnten dort so viele Beziehungen wie möglich aktiviert werden.

Zhang: Gibt es andere Neuigkeiten in Bezug auf die schweizer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Dardel: Am 2. Juli haben wir auch einen Sino-Swiss Eco Park in Zhenjiang eröffnet. Dieser Industriepark ist eine gemeinsame Leistung der Behörden beider Seiten. Das ist ein Park, der auf chinesische Interessen ausgerichtet ist, in dem aber natürlich auch schweizerische Betriebe präsent sein werden.

Eine andere Neuigkeit: Im Juni haben wir eine weitere Runde des bilateralen Finanzdialoges in der Schweiz veranstaltet und wir werden sehen, wie sich die Sache auf der Finanzebene

weiterentwickelt. Außerdem darf ich darauf hinweisen, dass in Zürich ein Swiss-China-Center für Zusammenarbeit aufgebaut wird. Das ist besonders an chinesische Betriebe und chinesische Firmen gerichtet, die in der Schweiz geschäftlich aktiv werden wollen, unseren Markt bearbeiten möchten, oder die Schweiz als Basis für eine Arbeit in Europa betrachten.

Zhang: *So ähnlich wie das Zentrum in Zhenjiang?*

Dardel: Ja, aber der Unterschied besteht darin, dass es in Zürich nur Büros gibt, während das Zentrum in Zhenjiang größer ist und dort auch produziert werden kann.

Gui: *In China gibt es die Redewendung, „Blumen auf dem Seidenbrokat hinzufügen“, die dem sprichwörtlichen deutschen „Sahnehäubchen auf dem Kuchen“ entspricht. Welche Sahnehäubchen möchten Sie noch auf den duftenden Kuchen der jetzigen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legen?*

Dardel: Ich möchte etwas mehr Kulturarbeit betreiben, etwas mehr im Bereich des Kulturaustausches machen. Darunter verstehe ich universitären Austausch im weitesten Sinne. Es wurde hier schon viel in Bewegung gebracht, aber ich meine, dass für die akademischen Beziehungen noch viel mehr getan werden kann.

Mein Traum wäre außerdem, eine bessere Synergie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schweizerischen Interessen in China herzustellen. Mein Vorschlag für die Intensivierung der Beziehungen wäre der Bau eines „House of

Switzerland“ in Beijing, wo wir verschiedene wirtschaftliche und kulturelle Interessen der Schweiz unter einem Dach bündeln könnten. Nicht eine Botschaft, nicht ein Institut, sondern ein Haus, wo man Betriebe und Firmen, hauptsächlich schweizerische in China, aber auch chinesische Firmen, die sich für die Schweiz interessieren, zusammenbringen könnte, wo Konferenzen und Arbeit unter einem Dach vereinigt wären. Das wäre sehr schön.

Li: *Diplomat gilt als Traumberuf vieler Studentinnen und Studenten meiner Universität. Aber Politik ist Bohren dicker Bretter. Welche Schlüsselqualifikationen sollte Ihrer Meinung nach ein Spitzendiplomat besitzen?*

Dardel: Die Antwort darauf ist nicht einfach, denn meiner Erfahrung nach gibt es keine einzelne Tugend, die das, was erwartet wird, und das, was nützlich sein kann alleine abdeckt. Das Wichtige ist gerade eine Mischung von vielen Tugenden. Man muss so breit wie möglich denken und so viel wie möglich können. Beziehungen sind sehr komplex, daher ist es wichtig, all diese relevanten Qualifikationen oder Qualitäten organisch verbinden zu können. Ein Diplomat, eine Diplomatin muss über eine abgerundete Persönlichkeit verfügen und über Kultur, Politik, Wirtschaft, juristische Fragen, Menschenrechtsfragen und Fragen aus Forschung und Wissenschaft und so weiter Bescheid wissen und sich in allen Bereichen engagieren. Ich meine, die Frage sollte eigentlich lauten, wie man Diplomat wird oder wie man ein besserer Diplomat wird. Man sollte sich für alles interessieren. Diese Offenheit ist absolut zentral und einfach unentbehrlich. Ein offener

Geist und die Fähigkeit, andere Leute, andere Interessen, andere Länder so gut wie möglich zu verstehen, sich so zu positionieren, als ob man der andere wäre, sind auch ganz essentiell. Das heißt natürlich nicht, dass man sich selbst dabei vergisst, dass man seine eigene Seele verkauft. Ganz im Gegenteil: Um besser zu verhandeln, muss man sein Gegenüber gut verstehen und das geht nur durch diese Weltoffenheit und die Fähigkeit zur Neugier, die Bereitschaft, die Welt an jedem Tag wieder neu zu denken. In diesem Sinne komplett zu sein, das ist sehr

wichtig. Was ich gerade gesagt habe gilt für alle Diplomaten. Was speziell Spitzendiplomaten oder solche, die höhere Ränge anstreben, betrifft, so müssen diese ständig strategisch denken. Aber das trifft nicht nur auf Diplomaten zu, sondern auch auf Führungskräfte in einem Betrieb oder in einer Regierung. Man muss immer vorausdenken, in langfristigen und strategischen Zusammenhängen. Dieses Vorausdenken ist etwas, was man durch Übung verbessern kann. Ohne diese Fähigkeit wird man jedoch niemals eine Spitzenposition gut führen können.

采访者简介：张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李珍、桂榕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新闻鸟瞰

外交新闻

吴 江

一、德国举办第 5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

2014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第 5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慕尼黑召开。400 余名参会人员来自世界各国，其中有 20 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50 多位国防部长及外交部长以及 90 多个各国政府代表团^①。

此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恰逢该会议成立 50 周年，可是周年庆典的气氛似乎并不浓重。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伊申格尔在会前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指出：世界的局势不仅不太平，而是可怕。^②正是因为面临安全领域的多种挑战，如乌克兰危机、美国国安局监听事件、欧洲防务一体化、跨大西洋合作、叙利亚冲突、伊朗核问题、东亚局势、网络安全等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话题。

德国总统高克首次亲临大会致辞宣布会议开幕，在题为“德国在世界的作用”的演讲中首先进行今昔对比，称赞现今的德国是最佳的德国，同时高克认为不能低估世界所面临的改变，这些改变对德国外交提出了重大挑战。高克提醒德国只有参与冲突的解决，才能共同地塑造未来。此外，高克肯定了德国外交部加强外交界与学术界以及与公民社会对话的做法，强调外交不能仅仅成为专家和精英的事情，而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演讲的最后高克呼吁德国人应给予现今的德国充分的信心，因为只有信任自己才能赢得面向世界的力量。^③

除德国总统高克外，德国多位内阁成员参加了会议：国防部长冯德莱恩首次亮相慕尼黑安全会议，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和

① Jungholt, Thorsten, Gauck fordert aktivere deutsche Außenpolitik, <http://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24421538/Gauck-fordert-aktivere-deutsche-Aussenpolitik.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4月19日。

② Verenkotte, Clemens, Ändert Deutschland den Kurs?,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100.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4月19日。

③ Gauck, Joachim, „Deutschlands Rolle in der Welt: Anmerkungen zu Verantwortung, Normen und Bündnissen“, <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DE/Joachim-Gauck/Reden/2014/01/140131-Muenchner-Sicherheitskonferenz.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4月19日。

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也出席了会议。

评述：经过 50 年的发展，慕尼黑安全会议成为世界范围内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一个高规格会议，享有“防务领域达沃斯论坛”的美誉。德国总统高克的此番开幕式演讲在德国掀起了有关德国外交新动向的讨论。德国如何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实践的检验。

二、德国总统高克赴印度和缅甸进行国事访问

2014 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9 日，德国总统高克率团访问印度，随后高克总统于 2014 年 2 月 9 日至 2 月 14 日率团到访缅甸。^④ 印度和缅甸之行是高克就任德国总统以来首次赴亚洲进行国事访问。

印度之行高克特别强调德国和印度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同时称赞印度在解决阿富汗问题和对联合国发展付出的努力。在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演讲时，高克指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应反映当今世界的现状，而非 1945 年时的世界。^⑤ 德国期待力促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的立场再次呼之欲出。在赞扬印度民主进程取得成绩的同时，高克并不避讳印度社会在妇女地位以及同性恋婚姻等问题上存在的不足。高克的直率也导致一些外交官的指责，认为高克干涉印度

内政，不谙熟亚洲含蓄的外交艺术。^⑥

高克的缅甸之行是德国总统自缅甸实行改革以来首次对缅甸进行的国事访问。缅甸总统吴登胜称赞德国是缅甸“真正的朋友”^⑦，高克表示将支持缅甸的转轨进程，同时出席了德国驻缅甸仰光的经济办事处开张仪式，1962 年因军事政变而关闭的歌德学院也得以重新开张。此外，高克和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的会晤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评述：印度和缅甸之行是高克总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演讲后的一次外交实践，无论是在印度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行改革，还是在缅甸对其转轨进程的支持，德国外交正在广阔的舞台大展身手，这也为“德国在世界的作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无论是印度之行对民主进程的重视，还是缅甸之行高克与昂山素季的惺惺相惜，价值观在德国外交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不过，高克此行应该还有另一个收获：民主绝非万能药。

三、德国政府多位高官先后应邀访华

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于 2014 年 4 月 12 至 14 日访华，并与王毅外长举行第四轮中德外长级战略对话。这是施泰因迈尔去年年底出任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外长之后首度访华。

④ (Verfasser unbekannt), Besuch des Bundespräsidenten in Indien und Myanmar im Februar 2014, http://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Pressemitteilungen/DE/2014/01/140120-Reise_Indien-Myanmar.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9 日。

⑤ (Verfasser unbekannt), Gauck wirbt für Reform des UN-Sicherheitsrats,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4-02/gauck-indien-sicherheitsrat>,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9 日。

⑥ Rao, Padma, Das mangelnde Fingerspitzengefühl Gaucks, <http://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24591989/Das-mangelnde-Fingerspitzengefuehl-Gaucks.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19 日。

⑦ Fähnders, Till, Staatsbesuch bei einer Ikone,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gauck-in-burma-staatsbesuch-bei-einer-ikone-12794654.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0 日。

在正式会谈前，施泰因迈尔一行于4月13日乘坐高铁访问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在与地方政府领导会晤中，中德双方肯定了中国河北省和德国勃兰登堡州的合作，双方均表示将进一步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会晤结束后施泰因迈尔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德国能源署与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联合开发的中德被动式低能耗建筑示范房项目，并在返京途中参观了位于河北省正定县的佛教建筑群。

在4月14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会谈中，施泰因迈尔感谢中国在伊朗核危机问题上给予的支持，王毅外长称赞德国是中国与欧盟关系的“带头人”。^⑧双方就乌克兰的最新局势以及国际社会就缓和乌克兰局势所做出的努力交换了意见，呼吁必须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此外两位外长还就东亚局势交换了看法。施泰因迈尔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会谈主要围绕今年7月份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以及今年10月份将于德国柏林召开的两国政府磋商的准备工作展开。除此之外，施泰因迈尔还与国务委员杨洁篪就外交热点话题展开了会谈。^⑨

时隔一周，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

长加布里尔于4月21日至24日访华。陪同加布里尔来华访问的有一个50多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和5位联邦议员，其中包括联邦议院经济委员会主席彼得·拉姆绍尔。^⑩此次访华是加布里尔去年年底当选为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长后首次大型出国访问。^⑪

在北京访问期间，加布里尔先后与中国总理李克强、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等就中国的改革进程以及可持续型经济发展展开了会谈。4月22日，加布里尔和徐绍史共同为中德能效论坛揭幕，在致辞中双方均表示将加强两国在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合作。4月23日，加布里尔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的陪同下出席2014北京车展并参观了大众、奔驰、宝马等德系车企的电动汽车产品。^⑫此外，加布里尔访问正值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立党际关系30周年，身为德国社民党主席的加布里尔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举行了会谈。^⑬上海是加布里尔此次访华行程的第二站。加布里尔与上海市长杨雄会晤的中心议题是中国改革政策框架内的上海自贸区试点项目。此外，加布里尔在上海出席了福伊

⑧ (Verfasser unbekannt), China sieht Deutschland als europäischen „Schrittmacher“, <http://www.neuepresse.de/Nachrichten/Politik/Deutschland-Welt/China-sieht-Deutschland-als-europaeischen-Schrittmacher>,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4月20日。

⑨ (Verfasser unbekannt),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in China,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Amt/BM-Reisen/2014/04-Asien/140413_BM_Asien_China.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4月20日。

⑩ (Verfasser unbekannt), Sigmar Gabriel, Bundesminister für Wirtschaft und Energie, in China – Reformprozess und nachhaltig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m Mittelpunkt, <http://www.china.diplo.de/Vertretung/china/de/02-pol/bilateral/besuche/140422-BM-Gabriel-s.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1日。

⑪ Greive, Martin, Gabriel startet seine große China-Mission, <http://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27177787/Gabriel-startet-seine-grosse-China-Mission.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1日。

⑫ 张冬梅:《德经济部长访华为德国电动汽车代言》http://www.cnautonews.com/xnyqc/EN_sc/201404/t20140430_304258.htm,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1日。

⑬ (作者不详):《王家瑞会见德国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 <http://www.idcpc.org.cn/dongtai/140423.htm>,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1日。

特集团的中国培训中心启用仪式。

评述: 2014年称得上是中德关系不平凡的一年,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访问德国后,德国政府数位高官相继在短时间内密集访华。施泰因迈尔访华正值《京津冀蓝皮书》发布之际,选择访问河北省可谓用心良苦。身兼数职的加布里尔更是将中国作为首次大型出国访问的目的地。看来进入不惑之年的中德关系的确共同行驶在快车道上,2014年也注定会在中德关系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德法两国外长首度共同出访

2014年2月,德法两国在巴黎召开了部长理事会,会上两国表示将加强在外交、安全和防务决策方面的协调。^⑭作为此次会议的实质性成果,2014年4月23—25日,德法两国外长首次共同前往欧盟东部和南部邻国访问。^⑮

访问的第一站是格鲁吉亚。德法两国外长与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格韦拉什维利以及外长潘吉基泽分别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德法两国外长肯定了格鲁吉亚改革的成绩,在共同面对记者时德国外长肯定了格鲁吉亚在法制国家改革以及反腐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并表示欧盟即将与格鲁吉亚签订的联系国条约将会成为格鲁吉亚和欧盟关系的重要里程碑。此外,德法两国外长还与格鲁吉亚议会发言人乌苏帕什维利以及反对党领袖巴克拉泽举行了会谈。

访问的第二站是位于东南欧北部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法两国外长与摩尔多瓦总理莱安克举行了会谈,在会晤结束后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德国外长强调摩尔多瓦可以信赖与欧盟的伙伴关系,并表示坚信欧盟和摩尔多瓦会扫清最后障碍,确保今年6月份摩尔多瓦与欧盟的联系国条约顺利签署。德法和摩尔多瓦均表示将加强三个国家青年人的交流。

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也成为此次德法两国外长共同访问期间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国外长均表示理解乌克兰邻国对局势恶化的担忧,并强调欧盟的东部伙伴计划不针对任何国家,也不针对俄罗斯。德国外长强调欧安组织在乌克兰事件上发挥的作用,并表示德国会加大人力和财力的投入。目前所有冲突参与方需力促局势的缓和,只有外交和对话才是唯一的解决危机的途径。

在结束对摩尔多瓦的访问后,德法两国外长访问了突尼斯。首度共同出访的最后一站是巴黎,德法两国外长出席了一场由德国和法国共同举办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会。

评述: 德国和法国被称为欧盟的“双发动机”,然而,无论是在欧盟扩大还是欧盟深化方面德法之间似乎龃龉不断。此次德法两国外长的首度共同外交秀恰逢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之时。从这一点看,乌克兰危机既给欧盟提出了挑战,又蕴含着进一步深化的机会。只有用一个声音说话,欧盟才能逐步提高其

^⑭ (Verfasser unbekannt), Deutsch-französischer Ministerrat stärkt Zusammenarbeit: Beratungen zu Ukraine und Mali,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Europa/DeutschlandInEuropa/BilateraleBeziehungen/Frankreich/Aktuelles/140219-DFMR.html?nn=385808>,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1日。

^⑮ (Verfasser unbekannt), Solidarität und Unterstützung unter dem Eindruck der Ukraine-Krise,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Amt/BM-Reisen/2014/04-MLD_GEO_TUN_FRA/140423-MLD-GEO-TUN-FRA.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4月30日。

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这次德法外长的首度共同出访可以称为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五、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乌克兰局势成焦点议题

2014年5月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进行了工作访问。为期一天的访问行程非常紧凑，核心议程有三：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的会晤；在美国商会的演讲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会晤。此外，默克尔还同美国议员、政界和大型智库代表进行了会谈。

默克尔与奥巴马的会晤虽然仅仅只有四个小时，但并不缺少具有冲突潜力的话题。^{①⑥}乌克兰东部的骚乱、欧安组织观察员遭扣押以及俄罗斯在与乌克兰边境部署兵力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乌克兰局势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会谈的焦点议题。就在默克尔与奥巴马会晤前夕，美国共和党议员麦凯恩对德国政府的乌克兰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柏林表现出来的领导不力让他觉得“难堪”。^{①⑦}尽管德美两国领导人表示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将采取一致步调，然而两国观点上的区别也非常明显：美国希望能够

迅速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目前已进入制裁的第三阶段并已开始对企业实施制裁。而德国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则谨慎得多。德国强调需与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展开磋商，一些欧盟成员国担心对俄罗斯制裁会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并拒绝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此外，欧盟制裁法比美国制裁法更为复杂，实施起来也会更为费时。^{①⑧}难怪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驻华盛顿分部主任霍伊泽尔认为，默克尔此行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促使美国更好地理解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①⑨}如何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乌克兰也是默克尔同拉加德会晤的主要议题。

此次默克尔访美是去年美国国安局监听丑闻爆发后默克尔的首度访美。本来亟待解决的监听丑闻事件也因乌克兰危机的爆发而不再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不过在与奥巴马会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默克尔直言不讳地指出德美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奥巴马也表示德美的意见并非一致，但承诺会加强保护措施。^{②⑩}

默克尔在美国商会进行演讲的主题是推动欧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该演讲是默克尔此次访美行程中唯一的一次正式亮相。由于美国商会代表了近三百万美国企业的利益，在多诺霍的领导下经常攻击奥巴马政府的核

^{①⑥} (Verfasser unbekannt), Vier Stunden und viel Konfliktpotenzial,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4-04/merkel-obama-treffen-washington>,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2日。

^{①⑦} (Verfasser unbekannt), Ukraine-Politik: Senator McCain findet Merkels Führungsstil „peinlich“,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merkel-auf-usa-reise-senator-john-mccain-kritisiert-die-kanzerlin-a-967171.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5日。

^{①⑧} (Verfasser unbekannt), Vier Stunden und viel Konfliktpotenzial,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4-04/merkel-obama-treffen-washington>,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5日。

^{①⑨} Merkel und Obama knüpfen weitere Sanktionen an Ukraine-Wahl, <http://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4-05/merkel-obama-weisses-haus-treffen>,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5日。

^{②⑩} (Verfasser unbekannt), Deutschland und USA in NSA-Affäre weiter uneinig, <http://www.handelsblatt.com/politik/international/merkel-besuch-bei-obama-deutschland-und-usa-in-nsa-affaere-weiter-uneinig/9839000.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5日。

心政策，所以经常被媒体视为奥巴马政府的对手。默克尔此次演讲地点的选择可谓令美国政府颇为尴尬。^{②①}在演讲中默克尔强调欧美合作的核心任务是使得两者的经济区域能够更加紧密，并表示希望能在2015年年底完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欧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于2013年7月开始正式启动，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双方经济的发展注入增长动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一旦签署需要美国国会、欧洲议会以及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批准。批评者指责谈判缺乏透明度，并担心

雇主权力、消费者权益以及环保标准等受到削弱。^{②②}

评述：奥巴马专门抽出四个小时与默克尔进行会谈对于一次行程仅一天的工作访问而言实属少见，这足以看出美国在解决乌克兰问题上对德国的看重。美国国安局监听丑闻后的德美关系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给欧美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修复机会。如果说欧洲债务危机是检验德国经济领导力的试金石，那么乌克兰危机就是检验德国政治领导力的敲门砖。

作者简介：吴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②① Sina, Ralph, Auftritt bei Obamas Gegenspielern, <http://www.tagesschau.de/ausland/merkel-usa100.html>,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5日。

②② (Verfasser unbekannt), Plädoyer Merkels für Freihandelsabkommen zwischen EU und USA, http://www.deutschlandfunk.de/plaedoyer-merkels-fuer-freihandelsabkommen-zwischen-eu-und.353.de.html?drn:news_id=353547,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5月5日。

经济新闻

徐丽莉

一、德国经济总体情况

1. 经济增长趋势与预测

德国经济在2014年第一季度增长强劲，比2013年第四季度增长了0.7%。按照德国经济研究所（DIW）的分析，增长动力来自于建筑投资和私人消费。由于2013年是暖冬，因此建筑投资在第四季度没有停滞。年内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增长1.9%。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将来自内需。2014年消费者价格回落1.3%。就业人数在2014年亦将再次大幅增加。但是经济的景气状况也会受到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例如：新退休政策和引入最低工资都会在2015年阻碍就业人数的增加。

2013年第四季度世界经济增长步伐加大，并且这一增长越来越多地由发达国家来贡献。经济复苏的源泉在于私人消费的复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以及较低的通货膨胀率。2014年、2015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将达到近4%。2013年秋世界经济进一步增长和欧元区国家经济危机的不安全性降低，促进德国出口的增长，并逐步提高人们投资的积极性，因此德国经济情况也开始好转，并且在第四季度继续复苏。2013年德国经济的增长率为0.4%。德国经济研究所在2013年底预计2014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将达到1.6%。而德国联邦银行也预计德国经济将强劲增长，2013年12月，联邦银行给出的2014年德国经济增长预期为1.7%，而2015年将达到2.0%。

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出口、投资、内需。世界范围的景气提升促进德国出口的明显增长，而同时进口也将更加强有力地增加。只要乌克兰危机不再继续升级，德国出口的进一步增加也会刺激投资活动，使其一改在过去几个季度中一直呈下降的颓势。据柏林景气研究人员预测，乌克兰危机将降低投资人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德国对外贸易环境向好和欧元区未来的不安全性降低，使得设备投资在经历了6个季度的连续下降后，于2013年底终于有所复苏，但由于投资者的设备会继续保持低负荷运转状态，所以其投资将主要集中于替代投资，而设备投资的增长有限。在就业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私人消费将进一步增加，进而推动国内市场的继续繁荣，促进德国经济的增长。

2. 消费与物价水平

德国始终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2013年为1.3%），这提高了私人居民户的购买力。由于私人消费需求的增长导致通货膨胀率小

幅增加，2014年预计达到1.6%，2015年进一步增加到1.7%。

以2010年为基数100，则2013年第四季度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分别为：2013年10月105.9，11月106.1，12月106.5，1月105.9，2月106.4，3月106.7。2014年3月德国消费者价格同比增长了1%，这一低点只有在2010年8月曾经出现过。3月份的消费者价格环比仅增长了0.3%，而2月和1月的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为计算指标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2%和1.3%，这就说明德国物价提高的速度进一步放缓。

3. 劳动与就业市场

2013年德国失业人数略有增加，其原因在于主要由移民导致的就业潜在人群进一步增多。但由于经济景气的持续使得失业增长的速度降低。预计2014年德国失业率将达到7%，2015年略高于7%。

根据联邦就业局的统计，德国2月份的失业率为7.3%，失业人数为313.8万，环比增加2000人。排除季节因素（建筑业冬季停工等）德国失业人数实际为291.4万，环比下降1.4万人。而3月份失业人数为305.5万，较之2月减少了8.3万，失业率将为7.1%，环比下降0.2个百分点。

随着就业的增加，工资开始有所增长，但由于移民人数增加导致劳动力供给充足，使工资增长的幅度极其有限。根据德国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的最新统计：2012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过在德国出生的第二代移民数量（环比增加了38.1万），2013年移民人数比2012年又增加了约40万，增幅超过10%。

4. 外经外贸

2013年秋世界经济进一步增长和欧元区国家经济危机的不安全性降低，促进德国出口的增长。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

2014年1月，德国出口额达到907亿欧元，进口额757亿欧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2.9%和1.5%。2014年2月德国出口额达到924亿欧元，进口额761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了4.6%和6.5%，对外贸易出超163亿欧元，而2013年同期的贸易出超为168亿欧元。

按照德国联邦银行的计算，德国2014年2月经常项目收支产生139亿欧元的盈余，其中包括服务收入17亿欧元，企业与财产收入62亿欧元，经常性转移支付-74亿欧元，对外贸易的补充-29亿欧元，同比有所降低（2013年2月德国经常项目收支盈余为157亿欧元）。

2014年2月德国向欧盟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额为547亿欧元，同比增长6.7%，从其进口商品总额为502亿欧元，同比增长9%。其中德国向欧元区国家的商品出口额为349亿欧元，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将近60%，同比增长3.7%，从欧元区国家进口商品总额为346亿欧元，同比增长8.4%；向欧元区以外的欧盟国家的商品出口额与进口额达到199亿欧元和157亿欧元，分别增长12.4%和10.4%。同期，德国向欧盟外国家出口商品总值为377亿欧元，进口总值为259亿欧元，同比分别增长1.8%和2.0%。

5. 公共财政

2013年德国公共财政已经接近平衡，赤字额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1%。联邦、州、市县和社会保险的支出超过其收入17亿欧元，远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条约》）规定的3%。预计2014年将实现财政平衡，2015年盈余将达到0.7%。

联邦新政府调整后，面对大联合政府的巨额预算，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仍坚持“2015年德国将不再新增一欧元的新债务”。朔伊布勒很乐

观，他认为已执行四年的“谨慎的”财政政策已见成效：“如果经济发展没有大的起伏，我坚信今年的支出将低于预算。”

二、2014年工业将成为德国经济最大的动力

工业是德国经济的支柱，创造了近1/4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德国对外经济与贸易的核心载体。德国工业的订单在2013年底至2014年初保持连续4个月的增长。

《南德意志报》2014年3月4日在报道德国工商总会（DIHK）“2014年度德国工业报告”时称，德国工业界今年将创造40 000个工作岗位，而不断攀升的能源价格或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该报告综合了7800家参加问卷调查企业的意见，绝大多数企业相信今年德国经济将好于去年。1/3的受访企业相信企业今年的经营状况将好于去年，仅有约1/10的企业持相反观点。

德国工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在欧洲。由于欧债危机目前并未出现进一步恶化的征兆，所以欧元区不会成为阻碍德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因素，而欧元区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经济的复苏也为德国的工业描绘了美好的前景。只是作为德国在东欧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俄罗斯的经济还存在政治与制裁导致的不确定因素，但这并不影响工业作为德国经济最大动力的地位。

德国工业的支柱产业：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电子等产业都有乐观预期。德意志银行预计汽车与电子工业是2014年最强大的行业。2014年由于西欧对德国汽车的需求增加，德国国内汽车的实际产量将增长6%。而已经建立起来的对汽车配件的需求将是不可忽视的增长点。由于目前能源转向、宽带建设和云技术（Cloud）的发展趋势，使得电子工业的增长率也将达到6%。

德国机械制造业行业协会宣布在2014年3月的订单有所减少，但确定该行业2014年的生产增长率为3%。行业协会的主席克莱门斯（Richard Clemens）认为“我们坚信，行业的活力将在2014年继续增强”，但不能忽视的是“由于国内需求低迷而大的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下降，这一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

三、乌克兰危机对德国经济的影响

1. 对德国天然气供给的影响

德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当贫乏。目前，德国75%的能源依赖进口。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进口天然气，到80年代天然气消费量迅速提高，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份额从1965年的0.1%增加到1991年的17.0%，2003年的23.4%，2011年的21.6%。

2013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达到1250亿立方，占其总需求的27%。俄罗斯向欧洲和土耳其出口的天然气中约一半需要途经乌克兰。而乌克兰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欠款达到16亿美元。如果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而切断经由乌克兰对欧洲的天然气运输，导致欧盟天然气供应突然中断，欧盟短期内无法调集足够的资源来替代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各国仅能依靠自己的天然气储备，然而德国的储备量可满足数月的需求，可其他国家的储备量可能仅够维持几天。

对于德国而言，欧盟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肯定会对德国能源转向带来挑战。因为俄罗斯是除挪威外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之一，而德国目前正处于能源转向的过程中，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水能等还远无法满足德国对能源的需求，现代化天然气发电厂是能源整体供应的重要保障。而德国也有必要寻找俄罗斯以外的天然气来源。

2. 对德国企业的影响

俄罗斯是德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从事出口经济的企业对出口贸易有较强的依赖性，其中，近 10% 的德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将其产品出口至俄罗斯，在这些企业中，约有 73% 的企业对俄出口的比例占其总出口的近 1/4。德国从俄罗斯的进口是以能源为主，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从事进口的企业（1%）。它们对俄罗斯的依赖性很强：德国从俄罗斯进口总额的 49% 由这 1% 的进口企业完成。这些企业所有进口额的至少 3/4 来自俄罗斯。

2014 年初，企业咨询公司 EAC 的一项调

查显示：2012 年，德国上市公司在俄罗斯的销售总额至少有 215 亿欧元。对俄贸易占企业销售总额总量的比例达到 7.5%，而非上市公司对俄罗斯市场的依赖度更高，如可耐福集团^① 50 亿欧元的销售总额中约有 20% 来自俄罗斯市场。

政治动荡与制裁不仅影响到德国企业在俄的销售，还将影响德企未来的投资与经营活动。根据德国联邦银行的统计，德国企业目前在俄罗斯的投资额达到 200 亿欧元，它们目前正从俄罗斯大量撤资。

作者简介：徐丽莉，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① Knauf Gruppe Deutschland 可耐福是世界领先的建筑系统与绿色建材的制造商。

媒体新闻

周海霞

德国大联合政府执政已经数月，德国媒体一直高度关注新政府动向。那么德国媒体对黑红政府的评价如何呢？本文基于对近来德国媒体关于新政府的相关报道的分析，得出结论：德国媒体聚焦大联合政府内部的信任构建与合作关系。新政府在德国媒体中呈现的形象总体倾向负面，从执政第一个月时的政府启动出师不利，联合执政党之间争吵不断，到执政第二个月埃达蒂（Edathy）涉丑闻案导致政府陷入政治危机，到执政 100 多天，新政府和执政党不顾民意自夸工作成绩优异。

一、新政府执政第一个月：大联合政府启动出师不利

在新政府诞生之后的开头几周里，德国媒体的报道基调在于“大联合政府的启动出师不利”（Fehlstart der Großen Koalition）^①。报道称，新政府启动四周，社民党、基民盟和基社盟虽然联合执政，但三个党派却并没

有显示出多少一致性。^② 社民党和联盟党之间纷争不断，无论是移民政策、最低工资，还是养老金改革和预留数据储存法案等都成为他们争吵的话题。民意调查机构 Emnid 的调研显示，46% 的受访者认为大联合政府的启动出师不利。超过 2/3 的受访者表示，不相信新政府内部的争吵会终结，也没有人期待这种政治气氛近期将会有所改善。^③

此时，德国媒体对大联合政府的评价与民意调查结果是相应的。有报道表示，受访民众对新政府的意见应该是颇有道理的。媒体之所以如此判断，其论据是这段时间陆续出现社民党的部长提出的草案在政府层面引发争吵的现象。相应的相关事件一再成为德国媒体的报道重点。

引起激烈争论的提案之一，是德国联邦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安德烈娅·纳勒斯（Andrea Nahles）提出关于养老金改革的草案。报道称，纳勒斯的提案在大联合政府内部引燃怒火，因为纳勒斯称，从 2018 年起将动用财政税收支付计划提高的养老金部分，

① (Verfasser unbekannt): Bürger rügen Fehlstart der Großen Koalition, Handelsblatt, 12.01.2014.

② syd/AFP/dpa: Bürger sind unzufrieden mit GroKo-Start, Spiegel Online, 12.01.2014.

③ 同①。

并称各执政党已经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就此达成一致。而基民盟总干事彼得·陶伯（Peter Tauber）的说法则完全相反。陶伯表示，在组阁谈判中多方一致同意不提高税收，如果哪位内阁成员提出新的建议，那么要求其必须在自己既有预算的框架中予以实施。^④

出现在德国媒体议程上的另一争论事件的主角是联邦司法与消费者保护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马斯提出欲推迟实行《数据储存法》，引发大联合政府内部的激烈争吵。马斯对《明镜周刊》表示，只要欧盟法院尚未做出最终裁决，德国法律将不会采纳欧盟有关电子通讯数据存储的方法，而联盟党则坚持应该按照原计划尽快再次引入数据储存法。双方唇枪舌剑，多名联盟党成员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批评马斯的行为违反《联合执政协议》。^⑤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福尔克·考德尔（Volker Kauder）表示：“只有事先和议会党团主席们沟通，各位部长们所提出的建议最终能够得以贯彻的机会才最大。不过，这种沟通应该是直接进行的，而不是通过媒体传达的方式。”^⑥基民盟总干事陶伯也提出类似指责，他认为马斯应该首先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这个议案，而不是通过媒体渠道去与内阁交流沟通。^⑦

联邦家庭、老人、妇女、青少年部部长曼努埃拉·施韦西希（Manuela Schwesig）提出的关于缩短幼儿父母工作时长的草案，同样在大联合政府内引发争吵与不满。施韦西

希建议对3岁以下婴幼儿的父母实行每周工作32小时制，薪资不变。她表示，将动用财政税收来平衡部分薪资差额。但是，该提议超出了《联合执政协议》的规定，总理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提出异议。于是，在施韦西希提出草案的几个小时之后，德国总理府发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就发表声明称，施韦西希部长的提案仅代表单方面意见。^⑧

除了关注大联合政府的民意调查结果之外，此时德国媒体表示，甚至新政府内部也存在认为新政府启动出师不利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主要来自于联盟党内。比如报道称，基民盟议会党团主席考德尔不满意黑红联合政府开头几周的表现。他认为，新政府还有待证明自己是服务于国家利益的。^⑨基民盟总干事陶伯也向媒体表达了类似观点，陶伯提请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注意加强沟通。他说，社民党应该做的是和联盟党进行交流，而不是将联盟党作为话题来谈论。^⑩

德国媒体表示，虽然多数德国民众认为新政府启动出师不利，但是此时选民对于黑红联合政府的期望值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家庭政策、保障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业绩等方面，选民表现出对大联合政府的高度信任。同时，媒体指出新政府启动受益最大的要属社民党。需要指出的是，相较于大联合政府，受访者对于总理默克尔的评价就高多了，62%的受访者认为，默克尔的工作比副总理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更为出色。^⑪

④ syd/AFP/dpa: Bürger sind unzufrieden mit GroKo-Start, Spiegel Online, 12.01.2014.

⑤ als/dpa: Vorratsdatenspeicherung: Maas sorgt für Zoff bei Schwarz-Rot, Spiegel Online, 05.01.2014.

⑥ syd/dpa: CDU-Fraktionschef: Kauder hadert mit GroKo-Start, Spiegel Online, 08.01.2014.

⑦ heb/dpa: CDU-Generalsekretär mahnt SPD zu Disziplin, Spiegel Online, 10.01.2014.

⑧ syd/AFP/dpa: Bürger sind unzufrieden mit GroKo-Start, Spiegel Online, 12.01.2014.

⑨ 同⑤。

⑩ 同⑦。

⑪ (Verfasser unbekannt): Bürger rügen Fehlstart der Großen Koalition, Handelsblatt, 12.01.2014.

二、新政府执政第二个月：丑闻导致黑红政府陷入政治危机

大联合政府执政的第一个月，提上德国媒体议程的是争议性提案事件；新政府执政的第二个月，媒体报道聚焦的则是埃达蒂丑闻事件。德国议员埃达蒂涉嫌儿童色情丑闻，下萨克森州检察官怀疑政府高层泄密致使该案件调查失败，联邦食品与农业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Hans-Peter Friedrich）受此事牵连被迫辞职，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托马斯·奥珀曼（Thomas Oppermann）也因此事成为联盟党和反对党批评攻击的靶子。该事件在这个阶段成为德国媒体报道大联合政府时的重要联系事件。德国媒体表示，此事导致黑红联合政府陷入政治危机。报道称，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的主席在没有议会党团高层出席的情况下召开危机会议，这足以表明大联合政府面临怎样的压力。德国媒体认为，大联合政府执政两个月之后，亟须自上而下拯救政府联盟的工作根基。^⑫

此时，德国媒体关注大联合政府的关注点依然聚焦于联合政府内部的党派间信任建构。报道表示，默克尔和加布里尔自组阁谈判以来一直对外展示彼此的高度信任，而他们之间的信任基础是否真的牢固，接受真相考验的时候到了。^⑬除了信任问题之外，德媒还指出，在德国公众眼中，此时大联合政府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透明度。^⑭

媒体表示，“埃达蒂事件”导致社民党

的支持率受损。根据民调结果，社民党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至2013年大选以来的最低值；而前农业部长弗里德里希辞职则没有给联盟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负面影响，联盟党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1个百分点。^⑮在3月初时，有后续报道称，社民党的支持率与2月份相比继续下滑。尽管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Steinmeier）是最受选民欢迎的政治家，其受欢迎程度高过默克尔，但是依然无法改变社民党此时成为大联合政府中最大输家的事实。^⑯

三、新政府执政第三个至第四个月：大联合政府不顾民意自视成绩傲人

德国新政府执政以来，德国电视一台（ARD）“德国趋势”（Deutschlandtrend）民调显示，55%的受访者表示对默克尔总理领导下的大联合政府的工作不满。媒体认为，这样的民调结果说明，在德国公众眼中，大联合政府工作中的差池和疏漏显然更重于其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绩和进步。与三月初的民调结果相比，3月25日至26日社民党的支持率有些许上升，达到25%，而联盟党的支持率则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跌至41%。^⑰同时，德国媒体也提出，虽然此时社民党的支持率有轻微上升，但是总体而言，社民党的民调结果一直不是很理想。^⑱

媒体表示，尽管德国民众不满意大联合政府的表现，但是新政府的自我评价却是很

⑫ Detjen, Stephan: Stunde der Wahrheit für die Große Koalition, Deutschlandradio Kultur, 17.02.2014.

⑬ 同上。

⑭ (Verfasser unbekannt): SPD stürzt wegen Edathy in der Wählergunst ab, Die Welt, 26.02.2014.

⑮ 同上。

⑯ HA/afp: SPD trotz Steinmeier deutlicher GroKo-Verlierer, Hamburger Abendblatt, 07.03.2014.

⑰ Detjen, Stephan: Umfrage: Mehrheit unzufrieden mit der Großen Koalition, Spiegel Online, 28.04.2014.

⑱ Bewarder, Manuel: Die SPD feiert sich trotz mieser Umfragen, Die Welt, 06.04.2014.

高的。报道称，默克尔在其发言中，对大联合政府迄今工作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赞美。她说，大联合政府在养老金改革、能源转向和最低工资等方面都做得特别好。她的这番赞美之词在黑红政府内部引发不小的震惊。媒体援引联邦卫生部长赫尔曼·格罗厄（Hermann Gröhe）的话作为论据：“我还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好！”^{①⑨}

对于社民党，媒体也有类似的评价：尽管民调结果很糟糕，社民党依然开会庆功。报道称，自大联合政府执政以来，社民党似乎就一直停不下来。他们一直在赶着联盟党往前走。执政刚几个月，社民党就快速推出最低工资、养老金改革、能源转向、限制房租过快上涨、承认双重国籍等议案。社民党似乎总是先联盟党一步，每次当联盟党如梦初醒，想要对草案提出抗议的时候，社民党马上回馈说迟了，早已付诸实施了。媒体表示，社民党因此自诩为大联合政府的发动机，

并且在党内举办庆功活动。^{②⑩}对于这次庆功行为，德国媒体持批评态度。

需指出的是，媒体表示，相比于民众对大联合政府的态度而言，选民对于各执政党的满意度则高了很多。根据民调结果，43%的联盟党选民表示满意，44%的社民党选民表示满意。^{②⑪}

总结：大联合政府在德国媒体中呈现的形象总体倾向负面，从执政第一个月时的政府启动出师不利，联合执政党之间争吵不断，到执政第二个月埃达蒂涉丑闻案导致政府陷入政治危机。此后，新政府和执政党又不顾民意自夸工作成绩优异。总之，在德国媒体眼中，黑红政府内部不统一，执政党之间信任不足，工作节奏的步调也不一致；另一方面，新政府的工作业绩并不尽如人意，却自视成绩骄人。德国民众对新政府的满意度较低，但总理默克尔的支持率依然居高。

作者简介：周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①⑨} Zippert, Hans: Kanzlerin watet knöcheltief in Tränen der Rührung, Die Welt, 10.04.2014.

^{②⑩} 同^{①⑨}。

^{②⑪} AFP: Umfrage: Mehrheit unzufrieden mit der Großen Koalition, Spiegel Online, 28.03.2014.

政治、社会与文教新闻

史笑艳

一、德国内政

2013年围绕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雇员斯诺登爆发的棱镜门事件，在德国一直是一个政府和各党派之间博弈的重要问题。从斯诺登提供给媒体的资料显示，德国政府、公司和民众曾被NSA大范围监听，其中也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通话内容。^①

德国联邦议院于2014年3月通过了设立NSA调查委员会的决议，要求该委员会对NSA事件做进一步的调查取证，包括德国政府成员对NSA的行为是否存在知情瞒报的情况。^②但NSA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六名执政党和两名在野党的代表以

及联邦议院各党派成员就委员会的任务和具体工作安排存在较大分歧。^③特别在是否于2014年尽快计划邀请在俄罗斯避难的斯诺登到德国接受询问一事上双方争执不休。来自基民盟的赫宁格在刚刚就任委员会主任几天后就宣布自愿辞职，扔掉了这个烫手的山芋。^④争论的焦点似乎不只在于是否或以何种方式邀请斯诺登接受询问，而在于是否在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正式出访美国，并会见美国盟友奥巴马之前在联邦议会进行表决。执政党显然担忧表决的结果可能会激怒美国，进而影响默克尔访美的行程。而绿党等在野党则极力要求尽快表决，并计划上诉德国联邦宪法法庭，通过法律的途径促成表决的实施。^⑤

①（Verfasser unbekannt）：„Bundestag setzt NSA-Ausschuss ein“,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nsa-untersuchungsausschuss104.html>, Stand: 20.03.2014 16.38 Uhr.

②（Verfasser unbekannt）：„Koalition blockiert Snowden-Vorladung vor Merkels USA-Reise“,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nsa-untersuchungsausschuss-koalition-blockiert-snowden-vorladung-vor-merkels-usa-reise-1.1934177>, Stand: 10.04.2014 15.53Uhr.

③（Verfasser unbekannt）：„Bundestag setzt NSA-Ausschuss ein“,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nsa-untersuchungsausschuss104.html>, Stand: 20.03.2014 16.38 Uhr.

④（Verfasser unbekannt）：„Ärger um Snowden-Befragung: NSA-Ausschuss-Vorsitzender tritt zurück“,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nsa-ausschuss-vorsitzender-tritt-wegen-snowden-zurueck-a-963405.html>, Stand: 09.04.2014 11.15 Uhr.

⑤（Verfasser unbekannt）：„Koalition blockiert Snowden-Vorladung vor Merkels USA-Reise“,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nsa-untersuchungsausschuss-koalition-blockiert-snowden-vorladung-vor-merkels-usa-reise-1.1934177>, Stand: 10.04.2014 15.53Uhr.

二、社会新闻

迈克尔·舒马赫是至今 F1 历史上最优秀的运动员。他总共获得了 307 次大奖赛冠军，并保持着诸多 F1 比赛的最佳成绩。在第七次获得 F1 世界冠军后，舒马赫于 2012 年巴西大赛后正式退出了他的职业赛车手生涯。2013 年 12 月 29 日，44 岁的舒马赫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梅里贝勒滑雪场滑雪时不慎发生意外。根据梅里贝勒滑雪场发布的消息，该事故大约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 11 点刚过的时候，当时舒马赫正在深雪区滑行，头部撞到了一块岩石上。随后，他首先被直升机送往 Moûtiers 医院，之后转到 Grenoble 医院治疗，并接受了两次头部手术。^⑥

为了稳定舒马赫的病情，法国 Grenoble 医院的医生对他采取了人工医疗昏迷措施。在持续昏迷了 100 多天之后，舒马赫的情况在 4 月初有了起色。2014 年 4 月 14 日，在德国电视一台的脱口秀节目中，舒马赫的发言人萨宾娜·凯姆第一次向大家介绍了这位 F1 世界冠军目前的健康状况。她在节目中讲到：“现在有了小的进展，为此我们都很高兴。迈克尔已经有短暂的恢复意识并且苏醒的瞬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不想谈更多的细节，这毕竟是私人的事情，只与迈克尔的家人有关系。”对于舒马赫未来健康状况的发展情况，萨宾娜·凯姆认为“目前仍然不可能对迈克尔的健康状况做出进一步的预测，医生也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⑦

三、文化和教育^⑧

自 2000 年开始，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开始举办一年一度、不同主题的科学年活动。科学年的目的是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增进科学界和社会各界的了解和沟通，唤起更多人对科学教育研究的兴趣。科学年的活动包括科学展览、竞赛和其他各种互动项目。德国社会各界都被邀请参与科学年的组织和活动，包括学术界、政治经济界，文化界等群体。

2014 年的科学年活动被命名为信息社会年。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我们都生活在信息社会中。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互联网等信息设备的技术发展迅猛，它们陪伴着人们每天的生活。它们是人们生活中有效的工具，但同时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因此，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决定在 2014 年通过科学年活动促进公众对信息社会的关注，推动全社会对此话题的全面分析和讨论，更深入地了解信息社会在德国的发展及其会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

2014 年信息社会科学年活动于 2 月 19 日正式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媒体博物馆开幕。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部长约翰娜·万卡（Johanna Wanka）教授在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希望人们在信息社会中能够自主并且安全地生活。科技的进步会带来更好的生

⑥（Verfasser unbekannt）：„Schumacher bei Skiunfall verletzt“,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schumacher154.html>, Stand: 29.12.2013 14.35 Uhr.

⑦ Seeger, Stephan: „Schumacher-Managerin zu Gast bei Günther Jauch“, <http://www.rp-online.de/sport/formel1/michael-schumacher-managerin-sabine-kehr-spricht-von-fortschritten-aid-1.4175245>, Stand: 14.04.2014 13.13 Uhr.

⑧ 信息社会科学年的宣传信息和活动详情均可以在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官网（<http://www.bmbf.de>）以及特地为科学年设立的网站（www.digital-ist.de）搜索到。

活，但也会有风险存在。我们重视人们的担忧，并希望通过介绍和对话，把科技发展的机遇和局限更好地全面展示出来。”

2014年信息科学年将通过展会、竞赛和学术讨论向公众介绍尖端信息技术的科研现状和研究方法，同时探讨信息革命对社会意味着什么。2014年信息科学年活动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领域进行：

信息关系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沟通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很多人而言，手机、短信、网络视频会议、云端存储和社交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何安全有效地使用这些平台是需要关注的话题，例如我们在网络环境中怎样和别人相处？我们选择何种方式保护自我的隐私和数据？此外，政治共决也是2014年科学年活动的重要话题。

信息经济

经济体制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已经经历了几轮变革。互联网2.0，工业4.0都是引人关注的话题。虚拟和现实生活在经济领域越

来越多地融为一体，并相互影响。没有人能够预言，虚拟的经济活动将会在多大程度上以多快的速度代替实体经济。全天候视频会议系统、SOHO办公模式和全球化企业虚拟团队管理能否良性推动经济体制的发展，还有待各界的分析和讨论。

信息知识

青少年的教育早已离不开信息世界了，便携设备似乎已经像学生的书本一样，成了学习的必备品。学校的授课方式也从过去的现场教师教学发展并增加了远程授课和网络课程。授课和学习的内容已经不受时间、学历资格、家庭背景等传统因素的局限。未来的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习惯去谷歌搜索，将来我们会因此越来越笨吗？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除了信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新机遇之外，科学年也很关注研究领域的信息化对知识的影响和改变。面对如何应对诸多新的信息学习渠道和学习资源的问题，人们应该加强对学习方式的研究。对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要能够有效应对谷歌和各种搜索引擎等短平快的学习方式所带来挑战。

作者简介：史笑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 热词诠释

Two-Pack 和 Bankenunion

关海霞

1. Two-Pack : 两包立法

为了加强欧元区成员国的预算协调与监管, 2011年11月23日, 欧盟委员会又提出两部条例草案, 特别针对那些已经存在过度赤字并且正在经历财政困难或存在严重财政风险的欧元区成员国, 或者在金融援助下的欧元区成员国。这两部草案分别为《加强欧元区遭受严重困难的成员国经济与预算监管条例》和《监管和评估欧元区成员国预算计划并确保其纠正过度赤字的条例》。具体细节如下:

(1) 条例1:《监管和评估欧元区成员国预算计划并确保其纠正过度赤字的条例》^①

在欧元区那些没有被纳入“过度赤字程序”和“过度失衡程序”的成员国中, 仅对那些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下一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成员国, 进行额外的监督, 提交预算草案的时间不能晚于每年的10月15日。草案提交后, 一直要等到收到欧盟委员会的意见

后, 各国才予以提交各国议会进行讨论和投票。对于各国议会可能会投票通过的财政预算, 欧盟委员会没有否决权。但是, 如果发现提交的预算草案违背了《稳定与增长公约》或《财政契约》中有关债务和赤字的相关条款, 欧盟委员会可以提前进行预警。

(2) 条例2:《关于维护财政稳定而加强欧元区遭受或面临严重困难的成员国经济与预算监管条例》^②

根据条例, 对于正在执行“过度赤字程序”或“过度失衡程序”的欧元区成员国, 或者申请了EFSF/ESM财政援助计划的成员国, 被要求进一步提高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监管/监督报告的水平 and 频率。提高监管频率意味着, 如果某成员国被认为有可能在“过度赤字程序”最后期限到来时, 仍不能达到所要求的目标或不能调整财政整改路线, 那么欧盟委员会有权向欧元区各成员国议会发出警告, 就像在预警阶段所做的那样。这样, 这些受影响的成员国仍然会有足够的时间来

① Regulation: On common provisions for monitoring and assessing draft budgetary plans and ensuring the correction of excessive deficit of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euro area.

② Regulation: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economic and budgetary surveillance of Member States experiencing or threatened with serious difficulties with respect to their financial stability in the euro area.

执行必要的措施，以防止其拖延落实所要求的政策。

2013年3月12日，欧洲议会通过了这两包立法。这两项法规仅针对欧元区成员国。“两包立法”的条款是继在“六包立法”改革后，对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进一步补充和加强，它也使得已经签署通过的《财政契约》中的相关条款直接被纳入了欧盟法的范畴。通过这两项法规，欧盟形成了更加严密的监督和监管体系，从而能更好地加强财政预算治理。

2. Bankenunion: 银行业联盟

2009年始于希腊的欧债危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债务危机，它更多的是一个多种危机交织在一起的危机复合体。其中一个就是银行业危机。金融危机后，大量银行部门的私人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导致政府的主权债务激增，在一些经济薄弱、财政纪律执行不严的欧元区成员国爆发了债务危机。因此，可以认为，一个国家银行体系的问题与主权债务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恶性循环。为了维护欧元货币体系的稳定，建立更好的金融监督制度，更好地适应欧洲一体化的需求，2012年6月，欧元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决定建立银行业联盟。该联盟计划由三部分构成：一个是实施“单一监管机制”(SSM)，授权欧洲央行直接、统一监管欧元区银行；一个是“单一清算机制”(SRM)，即建立一支基金对受困银行进行有序破产清算或重组；一个是“共同存款保险机制”，保护欧元区银行储户的存款。这三部分共同构成银行业联盟的三大支柱。

2013年10月15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

事会正式出台了“单一监管机制”的相关条例。欧元区成员国必须加入该机制，而非欧元区成员国则自愿加入。根据“单一监管机制”条例，欧洲央行和成员国银行监管机构共同组成该“单一监管机制”的监管主体。从2014年底开始，对于总资产达到300亿欧元以上或占有本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额20%以上的大型银行，欧洲央行将直接监管；而对其他银行和信贷机构的监管，欧洲央行将与成员国监管机构密切合作。

2013年12月17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又就“共同存款保险机制”达成协议。根据“共同存款保险机制”规定，欧元区成员国银行有向本国存款保险基金缴纳资金的义务，用于偿还破产银行中金额不超过10万欧元的全部账户存款，偿还必须在破产后7天内进行。

2013年12月20日，欧盟理事会向欧洲议会提交了有关银行救助与清算的协议。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2014年3月20日宣布，三方就银行业“单一清算机制”达成了最后一项协议。2014年4月15日，事情取得突破性进展，欧洲议会批准了欧洲银行业联盟的关于“单一清算机制”的最新方案。至此，银行业联盟的三大支柱全部落成。这也意味着旨在切断疲弱的银行和政府财政之间有害联系的“欧洲银行业联盟”计划的最后一部分通过。根据决议，欧盟将成立一个单一清算委员会以出面稳定或关闭危机银行，以避免银行对经济造成更大影响。而决议更为核心的问题是，将于2016年启动清算基金计划，通过向银行课征一项税赋，在其后的10年内募集550亿欧元资金，未来问题银行的清算成本将由区域内银行业筹集的清算基金承担。^③

^③ 谢玮：《欧洲银行业联盟：欧洲金改的希望与隐忧》，<http://news.cnfol.com/guojicaijing/20140422/17645289.shtml>，2014，最后访问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

从机制的内容看出，通过“单一清算机制”，银行在破产时，不会像这次欧债危机时那样，接受政府的“救助”，而是必须实行“自救”。“单一清算机制”有助于让资不抵债的银行业进行有序破产，让健康的银行机构继续运行下去。欧盟希望通过“单一清算机制”保护欧洲普通储户的利益，尽可能避免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破产银行。今后为银行纾困买单的是股东和持有者，而不是纳税人。

从“欧洲银行业联盟”计划的提出到欧洲银行业三大支柱的落成，整整经历了两年多时间，期间有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妥协，随着“单一清算机制”方案的最终通过，欧洲银行业联盟也初具雏形，这也标志着大规模救助时代的终结。但是成立了银行业联盟的欧盟将会面临更大挑战。比如，以前银行业大而不倒的问题仅限于几个大型银行，然而一旦将成员国大型银行链接在一起，那么就意味着，大而不倒将成为系统性的问题。此

外，欧盟当前在金融领域还有许多问题待解，比如欧盟内部资产负债、坏账消化等结构性改革问题，这不是建议“银行业联盟”就能解决的。

银行业联盟是各方力量博弈与妥协的产物。当前确立的银行业联盟的具体内容与最初的规划已相去甚远。设计中的银行业联盟本欲将 28 个成员国的所有银行全部纳入一个体系，而目前只有 18 个国家承诺联合。此外，随着银行业联盟的建立，欧洲央行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欧洲央行不仅有着监管的权力，同时也掌握银行破产的最终决定权。这意味着欧洲央行成为一个超越政府的行业监管机构，直接监管欧元区最大的 130 家银行以及对 6000 多家银行进行有效监督。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政策的独立性避免信誉风险，对于欧洲央行来说是一大挑战。

所以，欧洲银行业联盟要真正“从字面走向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简介：关海霞，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Migrantenökonomie 和 EU-Fortschrittsanzeiger, Score Board

徐四季

一、移民经济 (Migrantenökonomie)

移民经济是指有移民背景的人在德国独立开业及其企业雇用移民工作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移民经济根植于特定的移民环境。

现有文献用以下三种模式来解释移民经济产生的原因：

1. 壁龛模式：第一代移民创立工商业企业的原因首先是通过其生意满足本种族群体对特定商品和服务的需要，通常是起初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自制的商品（如食品），随后在本种族群体中售卖。这些企业是德国经济的补充，起初几乎不和德国经济产生竞争。实例为由移民经营的进出口商店、餐饮企业、食品店和特色旅行社。其中一些企业，特别是餐饮企业、食品店和裁缝店以后会逐渐适应德国顾客的消费习惯，成为某些城区居民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在种族壁龛中创立的企业也会和德国人经营的企业产生竞争，本种族群体内和各种族群体间也会出现竞争局面。
2. 文化模式：移民经济的产生是移民来源国

文化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特定种族对独立开业的偏好往往具有鲜明的特征。在许多文化中，独立开业者比雇佣劳动者享有更好的形象，尽管他们的收入不稳定且相对偏低。事实上，一些欧洲国家的“独立特性”是比德国强的：20世纪90年代末，希腊和土耳其的创业比均超过30%，意大利为25%，而德国为10%左右。这种文化差异的影响有可能突破国界：来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且“商业特性”较强国家的移民创业比较高。当然，这一模式仅有条件地适用于第二、三代移民。

3. 反应模式：移民经济的产生经常是移民对其在德国特定生活状态的反应。决定独立开业的主要动机是移民在德国劳动力市场上较差的机会和企业特定经济领域中较好的市场机会。事实上，有移民背景的居民面临着较高的劳动力市场风险：有参加社会保险义务的从业者中，移民的比例自1990年以来在下降；失业者中，移民的比例在上升，而且失业的移民比德国的求职者更年轻，职业条件更差。比较而言，反应模式最关注企业创立者的个人动机。这一模式大多用来解释第二代移民的创业

行为。

实际调研显示，移民独立开业的原因往往兼有上述三种模式的因素。

在德国，移民经济发展良好且迅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德国独立开业的移民达到 35.9 万，遍及所有种族群体和经济行业。在每年新成立的公司中，35% 以上是由有移民背景的人创立的。德国的移民经济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 企业规模较小：半数移民经济企业无雇员，另一半企业的平均雇员数为 4—5 人；移民经济在德国创造的就业岗位约为 120 万个。
- 企业家族特征明显：移民企业中有约 50% 的雇员是企业主的家庭成员，这一比例在德国企业中仅为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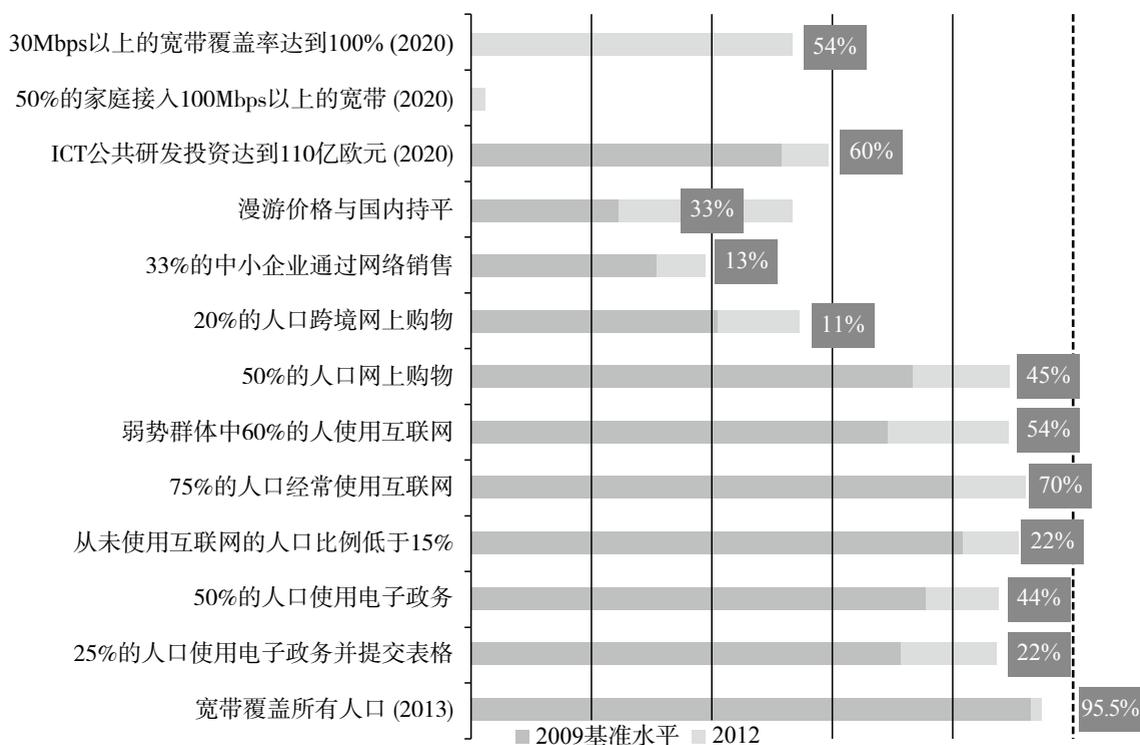
- 行业重点突出：移民企业主要集中在餐饮业、建筑业、贸易和服务业。
- 地域分布集中：移民企业主要集中在德国人口稠密地区。

当然，有两个不良势头值得关注：一是移民所创立的公司破产率仍然高于德国人成立的企业；二是移民经营的企业所拥有的行业经验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不少移民独立开业的直接动机是要摆脱失业状态。

二、欧盟数字化发展年度指针 (EU-Fortschrittsanzeiger, Score Board)

欧盟数字化发展年度指针是评估欧盟实施“欧洲数字化议程”(Digital Agenda for

2013 年欧盟数字化发展指针^①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网

Europe, DAE) 进展的年度指标系统, 由数字化议程中设置的 13 个具体目标组成。

2010 年 5 月 19 日, 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数字化议程计划, 将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部署超高速宽带, 并将促进电信领域增长定为首要任务。欧洲数字化议程是“欧洲 2020 战略”(Europe 2020) 中 7 个最重要的规划之一, 议程明确指出, 欧盟要实现 2020 年的宏伟目标, 就必须依靠信息与通信技术。数字化议程的总目标是在高速与超高速因特网与交互式应用的基础上, 发挥单一数字市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议程具体包括 101 项政策措施, 涉及以下 7 大领域: 创建统一的数字市场, 改善信息技术标准和兼容性, 互联网信任与安全, 提高宽带覆盖, 增加研发投入投资, 提高全民数字素养, 使用 ICT 技术应对如气候变化等问题。

2013 年 6 月 12 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 2013 年欧盟数字化发展指针, 评估了 2012 年欧盟实施数字化议程的具体进展:

其中, 进步有三:

- 整个欧盟实现宽带覆盖: 欧盟固定宽带

网络覆盖率已经达到全部人口的 95.5%, 卫星连接填补着剩余的缺口。

- 高速宽带覆盖过半人口: 54% 的欧盟人口已经接入了网速大于 30Mbps 的高速宽带。
- 因特网连接日益移动化: 36% 的欧盟人口通过笔记本电脑或其他移动设备上网; 第 4 代移动电话 (LTE) 的普及率在一年内上升到 26%, 增加 3 倍。

问题有二:

- 仅有 2% 的私人家庭接入了网速大于 100Mbps 的超高速宽带, 这离欧盟 2020 年要实现 50% 的目标还相距甚远。
- 50% 的欧盟人口没有或仅有较少的计算机知识; 40% 的企业在招募 ICT 专业人才时有困难, 预计到 2015 年欧盟会出现 90 万个 ICT 方面的工作缺口。

总的来看, 欧盟在实施数字化议程中取得了显著进步, 特别是在整个欧盟普及了基本的因特网服务;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对超高速网络的投资不足和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数字市场。

作者简介: 徐四季,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 博士。

- **政治舞台**

黑红联盟的形成

童天齐

【摘要】2013年德国大选的结果表明，社民党未能达到其竞选战略的目标。其原因是：尽管经历了四年的“改革进程”，它依然未能成功应对联盟党和左翼党的“两面夹击”，从而未能重获选民信任。大选之后，黑红双方被迫“复婚”。如果社民党能够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上下而求索”，就有可能在未来重新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关键词】黑红联盟 联邦议院大选 联盟党 社民党

一、社民党未能达到竞选战略的目标

1998年大选后，社民党夺取了全国第一大党的地位。在2002年大选后，由于它与联盟党得票率相同，二者在联邦议院内的席位相同。2005年大选后，联盟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社民党被迫与其组成了黑红执政联盟。此后，它确定了竞选战略目标：重获选民信任，夺回全国第一大党的地位。2009年初，当时的社民党总书记那勒斯在一篇题为《好社会》的战略文件（该文件的两个作者为克鲁达斯与那勒斯）中指出：信任构成了“个人自由的基础”，也构成了“一切政治、社会行动的基础”。^①社民党主席加布里尔也反复强调了该党重新获得信任的必要性。但是，

在2009年大选后，社民党未能如愿。它的得票率仅为23%，降到了战后以来的最低水平，被迫黯然下台。此后，它深切地感受到了党内改革的必要性，启动了旨在发扬民主、增强团结、重获信任的“改革进程”。

2013年大选结果表明：它依然未能实现既定的竞选战略目标。其原因是：尽管经历了四年的“改革进程”，但社民党依然无法成功应对联盟党和左翼党的“两面夹击”。其得票率的增幅不但没有超过联盟党，反而低于它。它自然就不能成为全国第一大党了。而尽管左翼党的得票率有所下降，但它依然具有对低收入雇员的吸引力。在自民党（2013年大选前它是全国第三大党）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下左翼党取而代之，成为全国第三大党，

^① Butzlaff, Felix/Micus, Matthias: „Über Sinn und Grenzen der Organisationsreform“, „ in: Neue Gesellschaft(Frankfurter Hefte)“, 2011/6, S.21.

从而制约了社民党得票率的增幅。

二、部分高收入雇员进入了联盟党的选民阵营

宗教在德国具有强大的地位和影响，大多数德国居民是教徒。而基督教则是德国第一大宗教。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简称“联盟党”）自然对身为基督教徒的选民具有最强大的吸引力。无论它的各项政策对忠诚的教徒们的利益影响如何，只要它的名称里有“基督教”一词，他们就会投票支持它。在东部地区，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数十年执政期间大力宣传无神论，但仍然有许多教徒没有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大选。基民盟获胜，成为东德第一大党。它的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基督教在东德的地位和影响。广大基督教徒忠心耿耿地拥护联盟党。

在德国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德国社会里存在着三大阶级。第一大阶级由管理者、自由职业者和独立经营者等组成。第二大阶级由高素质雇员组成。第三大阶级由低素质雇员组成。^②目前，在如何划分阶级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毫无疑问，高素质雇员和低素质雇员的富裕程度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红绿执政联盟在2003年制订了纲领性文件《2010年议程》。根据该文件，它开展了劳动力市场改革。改革带来的后果是：高素质雇员获得了高收入，而低素质雇员则收入低。根据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的统计，20年来高素质雇员的实际工资一直在增长，而低素质雇员的实际工资却下降到了1984年的水平。我们不妨做出这样的判断：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分化为高素质、高收入雇

员阶层与低素质、低收入雇员阶层。

从1949年到1998年，联盟党一直是全国第一大党。在此期间，它的竞选战略目标是维持自己的这一地位。但是，1998年大选后它把第一大党的地位让给了社民党。此后，它被迫逐渐提高了其竞选战略措施的机动性、灵活性。科尔下台后，默克尔接班。这位物理学家利用她精打细算的优点，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竞选战略措施，全力与社民党争夺高收入雇员阶层的选民，导致了该阶层的大量选民进入自己的选民阵营，在三次大选中均达到了联盟党的竞选战略目标。在2005年大选中，联盟党夺回了已丧失七年之久的第一大党的地位。它击败了红绿执政联盟，以黑红执政联盟取而代之。2009年大选后，联盟党维护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又以黑黄执政联盟代替了黑红执政联盟。2013年大选后，联盟党再次维护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被迫以黑红执政联盟代替黑黄执政联盟。

联盟党的竞选战略措施的灵活性、机动性表现在：（1）“后发制人”。社民党于2013年3月公布了以“公正”为主题的竞选纲领。低收入雇员坚决拥护社民党把“公正”作为竞选主题，而一部分高收入雇员则对此持保留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党于6月公布了自己的以“竞争”为主题的竞选纲领。因此，许多高收入雇员进入了它的选民阵营。（2）使用巧妙的措词宣传竞争。据统计，大选前夕，三个星期内默克尔在50场选民集会上发表了竞选演说。过去，她曾经在竞选演说中强调过竞争的残酷性，呼吁选民为提高德国产品的竞争力而做出贡献，许多选民对她的呼吁很反感。因此，她尽管在此次大选中仍然把“竞争”作为竞选主题，但却使用了巧妙的措词，不再强调竞争的残酷性。

^② Dettmer, Markus/ Schmergal, Cornelia: „Der neue Ständestaat“, in: Der Spiegel“, 33/2013, S.60, 12.August, 2013.

(3) 在辩论中尽量以理服人，避免对反对党的总理候选人发动个人攻击。从阿登纳到科尔，联盟党的多数领导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社民党采取了敌视态度。在20世纪50年代，阿登纳曾经宣称：社民党的胜利将意味着德国的毁灭。^③而默克尔则放弃了这种敌视态度，转而采取了友好的态度。例如，在2013年5月她引人注目地出席了社民党纪念其成立150周年的集会，与该党的各个领导人握手言欢，显示出了一种宽宏大量的政治家风度。9月初，在与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的电视辩论中，她始终彬彬有礼，从容不迫，从统计数据中旁征博引，获得了许多观众的好评。

在这场选民争夺战中，社民党一直处于下风。固然，社会公正是一个最古老的话题，也是社民党一贯的竞选主题。但由于德国贫富悬殊的现象日趋严重，该主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社民党把向富人增收所得税和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达到“社会公正”目标的路径，提高了低收入雇员对它的支持率，雇主们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如果说，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恩格斯语）^④，那么，总理候选人则应该是高举这面“旗帜”的“旗手”。社民党恰恰错误地选择了“旗手”。自施罗德下台之后，社民党一直苦于寻找不到能够与默克尔相匹敌的领导人，因此其领导人一直处于频繁变换的状态之中。施泰因布吕克曾经在黑红联盟执政时期担任财长，因主张政府遵守严格的预算纪律而享有较高的声誉。他属于社民党右派，与社民党左派意见不合。社民党最终排除了左派的异议，将他确定为总理候选人。但是，他所采取的竞选战略措施的灵活性、机动性低于默克尔。他的弱点是过于直言不讳。他集中

火力批评默克尔，但却未能做到以理服人。例如，他在公开场合宣称：默克尔的性别是她受到选民拥护的原因。这种言论显然不合礼仪。许多选民对他诸如此类的“失言”十分不满，出于逆反心理而对默克尔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三、左翼党对低收入雇员依然具有吸引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社民党内出现了“主战派”与“反战派”。双方之间的斗争最终导致了社民党的第一次大分裂。在21世纪，德国工人阶级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民党的第二次大分裂。

1999年6月，施罗德和布莱尔发表了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的中间道路》的联合声明。固然，社民党早已不再认为自己是“阶级政党”，而是把自己定位为“人民党”。但是，人民是由不同的阶级构成的，拥护社民党的毕竟只是一部分人民。它仍然需要确定自己的依靠对象。以施罗德为首的社民党右派认为，社民党需要走一条“新的中间道路”，需要把高素质雇员阶层作为自己的重点依靠对象。

2003年，社民党右派精心制订的《2010年议程》受到了该党左派的坚决反对，从而引起了党内的大分裂。社民党左派称施罗德为“资本家的总理”。两派之间的争论导致了党内的思想混乱，进而导致了信任危机。因此，许多党员退出了社民党。据统计，从1990年至今，该党的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2013年，社民党党员减至47万人。党员的老化现象也十分严重，党内60岁以上的党员居然占了一半左右。一部分退出社民党的左派

③ Miller/Pothoff: „A History of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p.234,1986.

④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6页。

决定另组新党。2005年1月22日，一个“站在社民党左侧”的名为“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党”的政党成立。社民党原领导人之一拉方丹在萨尔州有着很高的威望，由于与施罗德的分歧严重，他离开了社民党，成了该党的领导人。另一部分左派虽然留在了社民党内，但他们与右派之间的党内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民社党的前身是德国统一社会党（1989年12月17日它改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1990年2月4日又改名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在长达40年的时间内，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1989年反共浪潮席卷东德，导致它在1990年3月东德大选中失败，丧失了其手中的政权。它被看成短命的“政治蜉蝣”，但却出人意料地生存了下来。它始终是一个“东部党”，其在东部的得票率高于西部。2005年6月，该党与“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公正党”合并为左翼党。“合二而一”的左翼党成了一个全国性政党。

由于《2010年议程》放宽了对雇员的解雇保护，许多低素质雇员被雇主解雇了，其既得利益受到了损失。他们认为，社民党已经背叛了他们，不再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了。因为左翼党对《2010年议程》持反对态度，所以他们转移到了它的选民阵营之中。

在此次大选中，与社民党一样，左翼党也把“公正”作为自己的竞选主题，并且也把向富人征高税和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实现社会公正”的路径。它提议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10欧元，比社民党的8.5欧元高出1.5欧元。因此，低收入雇员阶层的一部分选民显然更愿意投票支持左翼党。

四、黑红双方被迫“复婚”

在大选之后，社民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

它究竟应否与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在社民党内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社民党应该珍惜这一难得的机遇，与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上一届黑红执政联盟以社民党下台告终，如果它再次在联合政府中充当“小伙伴”，它必将重蹈覆辙。经过辩论，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2013年10月20日，社民党特别代表大会批准了党中央关于建立黑红执政联盟的决定。表决结果是：198票赞成，31票反对，2票弃权。11月27日，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艰苦谈判，黑红双方终于达成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协议包括新政府领导人名单和施政纲领。12月13日，约37万（占全体党员的比例为78%）的社民党党员参加了全党公决，其中75.96%的社民党党员投票赞成黑红双方达成的协议，协议随之生效。

与联盟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是社民党的权宜之计。尽管在“离婚”四年后“复婚”，它们的“婚姻”依然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它们只不过是一对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夫妻”。社民党的竞选战略目标未变，它仅仅把实现的日期推迟到了2017年。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大选后联邦议会内左派政党与右派政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2009年大选后，左派政党（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的议席为290个，比右派政党（联盟党和自民党）的332个少42个。在2013年大选后，前者的议席为320个，比联盟党（自民党未能进入联邦议会）的311个多出9个。社民党预料：在2017年大选后德国将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届时社民党将与联盟党“离婚”，结成红红绿联盟将有可能是它的最佳选择。因此，它决定：如果时机成熟，它将在联邦层面与左翼党结盟。该决定标志着社民党改变了对左翼党一贯敌视的态度，这是社民党对其结盟方针做出的重大调整。

黑红联盟的施政纲领兼顾到了“竞争”

(有人做过统计,在长达 185 页的文件中“竞争”一词出现了 42 次)。^⑤与“公正”两个主题。在以下两个问题上,黑红双方都各自做出了妥协:(1)在税收问题上,联盟党坚决反对社民党对高收入者增收所得税的主张。最终,社民党做出了妥协。看来,这一妥协是必要的。投资引擎动力不足是德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障碍。一旦德政府决定对高收入者增收所得税,德国投资环境的竞争力将减弱,许多高收入者(投资者都是高收入者)将纷纷离开德国,投资引擎的动力将更为不足。(2)在工资问题上,社民党力图把制订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设定为不可超越的“红线”。加布里尔声称:“任何不包括法定最低工资 8.50 欧元的联盟协议都是不可想象的。”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最低工资标准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最终,联盟党做出了妥协。施政纲领规定:从 2015 年起实行每小时 8.50 欧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联盟党的妥协也是必要的。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呈低速增长的趋势,在 2013 年其增速仅为 2.8%。^⑥即使在

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其增速有所上升(德国工业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将随之有所下降),但总的来看,采取该项措施是利大于弊的。消费引擎动力不足是德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障碍。劳动力成本增速升高将刺激劳动者的消费需求,从而将增强消费引擎对德国经济的驱动作用。

综上所述,社民党在 2013 年大选中没有达到自己的竞选战略目标。于是,它被迫与联盟党“复婚”,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其执政党的权力,在四年执政期间获得更多选民的信任,在 2017 年达到这一目标。它究竟能否如愿以偿,取决于一系列错综复杂、互相影响的因素。其中的关键因素是:它能否继续推动自身的改革进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从而成为领导德国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它就建立黑红执政联盟问题举行了史无前例的全党公决,这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步骤。如果它能够继续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改革的道路“上下而求索”,就有可能在未来如愿以偿。

作者简介:童天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⑤ Münchau, Wolfgang: „Germany’s coalition will have to break promises“, in „Financial Times“, 2.12.2013.

^⑥ 谢飞:《劳动力成本“困扰”奥地利》,载《经济日报》,2014年1月22日。

逆时代潮流而思的现实政治家俾斯麦 ——解读俾斯麦的政治与外交智慧

包向飞 刘 靛

【摘要】从很多方面来看，俾斯麦都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思的一个人，但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德国才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统一。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在政治上其实却是务实的、谨慎的，在外交上他甚至是温和的。在俾斯麦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多乍看似矛盾的东西，但深层次上却不尽然。几乎所有这些矛盾都有其现实的根据。俾斯麦在政治和外交上的不足之处是他忽视文化性的东西。

【关键词】俾斯麦 德意志统一 政治 外交

一、引言

历史学家卡琳娜·乌尔巴赫（Karina Urbach）在1998年这样总结说：“他（指俾斯麦）的生平已经被讲授给了至少六代人，人民可以很公正地说，几乎每两代德国人都可以碰到一个不同的俾斯麦生平的版本。没有另外一个德国政治人物会因为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像俾斯麦一样被利用和滥用。”^①可见，俾斯麦在不同的时代，都因为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被德国人关注着。另外，2004年德国电

视二台（ZDF）组织评选了德国历史上的十大伟人，俾斯麦位列其中。当我们看到在最终的结果中，文学家只有歌德一人、音乐学家也只有巴赫一人入选时，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现代德国人对俾斯麦的认同，甚而是喜爱。

在名人众多的德意志历史中，俾斯麦为什么可以脱颖而出入选“十大伟人”呢？俾斯麦的历史功绩确实是辉煌的。我们知道，正是在俾斯麦的领导下，通过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人们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

① Urbach, Karina: „Between Saviour and Villain. 100 Years of Bismarck Biographies“, in: The Historical Journal. Jg. 41, Nr. 4, Dezember 1998, P.1142.

一；另外，正是俾斯麦任首相的德国政府引进了针对老年人、疾病和事故的国家保险制度，并且这不是模仿引进，而是首创，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早的。单单这两件事情就已经非常了不起。德国的统一，德意志人民已经盼望了几百年，如果没有俾斯麦，也许人们还要等待很久；而保险制度，从现在反观历史，人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它是一个多么具有生命力并且意义深远的制度。

但是，历史为什么偏偏选中俾斯麦来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大业呢？从很多方面来看，俾斯麦都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思”的人。他丝毫不赞同那时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当时，这些都是一些先进思潮），甚至对它们抱有敌意，他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可以说是臭名昭著。此外，他对那时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也只是冷眼旁观，直到最后他也没有真心认同它，在俾斯麦心中仿佛只有普鲁士，他只是现实地利用了“民族主义”来完成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统一。对于国外的势力，他也只是利用，而不去关心其意识形态究竟为何，他说：“有人问我是俄国派还是西方派，我总是这样回答：我是普鲁士派。”^②在殖民主义扩张狂潮席卷欧洲的时候，俾斯麦又是殖民主义坚决的反对者。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德国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呢？

历史并不总是青睐追逐时代潮流的人，因为潮流里总有太多的理想，甚而幻想的因素，它往往不能真正地扎根于现实。俾斯麦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很显然，他不会跟着潮流跑，让潮流牵着鼻子走，但他在时机成熟时会利用时代潮流，让时代潮流推他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事实上，俾斯麦很巧妙地利用

了当时的时代潮流，这个潮流就是：德意志人民渴望统一。俾斯麦曾说过：“在整个时代潮流中苏醒的民族情绪，同时加上抵御外部进攻的要求，迫使我们走向比较紧密地统一德国的目标……”^③

二、谁是德意志人民？他们为什么渴望统一？

德国人为什么渴望统一呢？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在此以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那么谁是德国人？如果说德国人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的概念，那么谈论“德国人渴望统一”就显得毫无意义。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梅尼克（Meinecke）在他的著作《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中曾作过这样的区分：“除去一些特例，人们可以将民族分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与国家民族（Staatsnation）。前者主要基于某种共同的文化经历而凝聚起来；后者首先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政治历史与法则的统一力量之上。”^④

根据梅尼克的区分，那时的德国人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组成一个国家民族，但他们确实有着共同的语言、进而共同的文学，用梅尼克的话说，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经历，因此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文化民族（Kulturnation）。这也是德国不同于英、法的地方，德国人的存在先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存在。统一，对德意志人民来说，就是在文化民族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民族。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德国人为什么渴望统一？统一会给德国人带

② Bismark, Otto von: „Die Gesammelten Werke“, Band 14, Berlin: Otto Stolberg, 1924-35, S.465.

③ Bismark, Otto von: „Die Gesammelten Werke“, Band 3, Berlin: Otto Stolberg, 1924-35, S.266.

④ 梅尼克，弗里德里希：《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4页。

来什么好处呢？

在当时的欧洲，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了强大的民族国家，像英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等。但是欧洲中部说德语的地区还是一盘散沙，至此还从未组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也许有人会提到神圣罗马帝国，但是我们知道，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就像17世纪的法学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的名言所说：“帝国是一个怪物：它不符合政治学上的任何传统定义，既不是罗马的，也不是神圣的，甚至不是一个帝国。”^⑤

这样的—个所谓“帝国”当然保护不了德国人的利益，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战火却在德意志人民的土地上燃烧。大文豪歌德就曾经精辟地指出：“为了彼此友爱，为了共同抵御外侮，德国应该统一。为了统一德国货币的价值，为了使得我的旅行箱在境内的三十六邦都畅行无阻，德国应该统一。”^⑥统一可以使德意志民族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变得强大，进而可以使德国从一场场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所以，统一早已是众望所归，到那时为止，可以说已经被德意志人讨论了几百年。但是如何达成统一呢？

关于如何统一，当时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由奥地利主导统一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大德意志方案；一个是由普鲁士主导统一德国，并把奥地利排除在外，这就是小德意志方案。大德意志方案事实上的可行性很小，就像俾斯麦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奥地利已经处于残暮之年，苟延残喘。奥地利事实上已

经没有能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即使勉强为之，统一的德国必将仍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和神圣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两样，而德意志人民渴望的真正的民族主义意义上的统一根本就没有实现。而在有些人士看来，德意志领土上小国林立的状态本来就是由奥地利造成的，就像当时的极端共和主义者和现实政治家路德维希·班贝格尔（Ludwig Bamberger）所说：“德意志小国林立的痛苦仅仅是奥地利独裁政策的后果。”^⑦所以，在现实的政治家看来，也只剩下由普鲁士主导来达到统一的道路了。

但是，人们又如何具体操作呢？这里还有一些根本的困难。在南方小的德意志国家眼里普鲁士仍是一个专制的、不自由的、军国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国家，所以由这样的普鲁士主导来统一德国对他们来说是不能令人完全放心的。比方说当时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就认为：统一的自由德国的基础是摧毁普鲁士，将之转变为小邦。^⑧符腾堡的民主人士更是“希望在普鲁士解体的基础上为德意志的自由和统一做好必要准备，他们希望完全屏斥普鲁士，因为将来的民族统一必须是一种更牢固、更联合的形式”。^⑨

而普鲁士是否愿意为德意志的统一牺牲自己呢？事实上，普鲁士政府别说以牺牲自己来重振德意志民族事业，单单在对是否成立北德意志联盟上就摇摆了好几个月，最终普鲁士承担起主导德国统一任务的原因更多是因为俾斯麦意识到：普鲁士应该尝试并引导当时汹涌的民族主义浪潮，否则其可能被

⑤ 施蒂默尔，米夏埃尔：《德意志：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孙雪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⑥ 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王颖波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⑦ Boockmann: „Mitten in Europa-Deutsche Geschichte“,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1984, S.282.

⑧ 梅尼克，弗里德里希：《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51页。

⑨ 同上，第352页。

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利用，这样就会危及到普鲁士自身的统治。

后来在普鲁士的强权下，北德意志联盟成立。虽然宪法保证民主选举和自由议会，但管理大权和军队控制权仍在普鲁士国王手里。再后来普鲁士又通过军事把美因河南部的四个邦国并入自己的版图。即使是这样，在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登基的那天早上，他还是对俾斯麦悲伤地说：“今天我们埋葬了古老的普鲁士王朝。”^⑩由此可见，让普鲁士真正地为德意志做出牺牲是非常困难的。有趣的是，德国的统一最终是由对统一最不热心的普鲁士来完成的。

三、细腻的统一工作和灵活的政治手腕

俾斯麦的外交与政治才能和他的文采一样，都是卓尔不群的，据说他的德文文采可以媲美德意志的伟大作家海因里希·海涅和托马斯·曼。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他熟谙政治领导本身的限度。从以上的引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出，普鲁士如果不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那么德意志的统一就是极其困难的，如何不牺牲自己，如何对待其他德意志国家始终是个难题；此外，德意志的统一其实并不仅仅是德国人的事，它几乎牵动着整个欧洲。就像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当时的国际秩序包括三个因素：欧洲均势；德国内部普奥相安无事；因保守理念而结合的联盟体系。”^⑪俾斯麦要想完成德意志的统一，他必然得撼动当时的国际秩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保守理念分道扬镳。令人叹服的是，俾斯麦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欧洲关系中可

以说是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这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作为现实政治家超越了自己的保守派别。他的工作是非常出色和细腻的。比方说，在1864年，俾斯麦借机于丹麦国王的不明智（丹麦试图吞并两个德语区，即两个易北河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挑起了对丹麦的战争。俾斯麦聪明地联合了奥地利，并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民族情绪轻易地赢得了这场战争。

此外，在战胜奥地利和法国之后的不同表现，也反映出了俾斯麦的政治和外交手腕的灵活性。在战胜奥地利之后，普鲁士的国王和将军都准备耀武扬威地进入维也纳之时，俾斯麦却劝阻了国王威廉一世。这样他就给奥地利保留了一些颜面和尊严，因为俾斯麦知道将来的某一天他还需要和奥地利结盟，而历史证明俾斯麦是正确的。在战胜法国之后，德国皇帝选择在象征着法国光荣和辉煌的凡尔赛王宫登基，这似乎太羞辱法国人，不太像俾斯麦的风格。其实这也有其原因，因为如果在柏林登基，这就会显得普鲁士在其他的德意志邦国面前炫耀军事和独裁，这确实是南方邦国最讨厌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普遍对普鲁士的霸权充满了愤恨和敌对的情绪，所以最好不要再火上浇油；法兰克福也不恰当，因为，法兰克福和先前的神圣罗马帝国有太多的联系，这样就会给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德意志统一并没有发生的感觉。在凡尔赛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也显示出了俾斯麦的魄力，不过反观历史，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后患，不过这又和后来的德国领导人的政治决策的失误有关。但无论如何，就像历史学家盖亚（Geyer）教授所说：“通过这场战争，德法之间的民族对立演变成了仇

^⑩ 施蒂默尔，米夏埃尔：《德意志：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孙雪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页。

^⑪ 基辛格，亨利：《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

恨和复仇的情绪。”^⑫

在内政方面，俾斯麦作为现实政治家，他的政治谋划也很少受到流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俾斯麦领导下建立的国家保障制度，虽然它后来备受赞誉，但它并不是出于保护工人的动机和人道主义的理念，而是一些很现实的统治策略——所谓的“Zähmungspolitik”（驯服政策）。俾斯麦曾经清楚地解释过他的驯服政策，他说：“谁能在年老的时候获得养老金，他就远远地比那些没有希望得到它的人好对付一些，生活得满意些。”^⑬可见，俾斯麦并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思想来做这一切的。

俾斯麦常被称为“铁血宰相”，这和他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有关，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大问题不能靠演讲和投票来决定——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依靠铁与血。”^⑭不过，按照有些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针对外交和战争，而是针对预算和社会事务而言的。^⑮把这句话放在不同的语境下理解，含义总会有些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铁血”这两个字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趣的是，据历史学家考证，俾斯麦的这句吓坏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的话并不是过去失败经验的逻辑推论，俾斯麦只是引用了别人的暗喻，也许只是为了吸引眼球，但这个被援引的人也并不是一个好战的容克，而是一个有着自由主义

理念的人——马克斯·冯·申肯多夫（Max v. Schenkendorf）。^⑯人们知道，有着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并不总是被俾斯麦喜爱，就像历史学家奥茨门特指出的那样：“民族自由党的左翼集团，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其领袖爱德华·拉斯克是俾斯麦的心腹大患，俾斯麦对他恨之入骨，甚至超过了对中央党领袖霍斯特的仇恨。”^⑰但是，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在讲话和行动时并不受意识形态牵制的政治风格。

四、后来的德国领导者为什么不能够继承俾斯麦的政治外交政策

从以上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其实是保守和谨慎的，在对外政策上甚至是温和的。他所设计的德意志帝国从其实质上讲是一个大的普鲁士王国，普奥战争的目的是想把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国缩小到一个合理的面积，这样普鲁士（或者说德国）可以更好地生存，有充足的资料显示，俾斯麦并无任意扩张和称霸欧洲的企图。有些学者认为：俾斯麦的对外政策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争霸性质。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还有很多商榷的余地。就像《在欧洲中部——德国历史》一书的作者指出的那样：（俾斯麦）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意义开展他的政治，但是只在这样的程度上，即欧洲大的权势国家的利益得到保存。^⑱

⑫ Geyer: „Durch die Vergangenheit zur Gegenwart“, Wien: Österreichischer Agrarverlag, 1980, S.262.

⑬ Deutscher Bundestag: „Fragen a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Bonn: 1993, S.212.

⑭ Bismark, Otto von: „Die Gesammelten Werke“, Band 10, Berlin: Otto Stolberg, 1924-35, S.139-140.

⑮ 戴维斯，诺曼：《欧洲史》，郭方、刘北成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775页。

⑯ Boockmann: „Mitten in Europa-Deutsche Geschichte“,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1984, S.283. Max v. Schenkendorf的诗句是这样的：Denn nur Eisen kann uns retten/Und erlösen kann nur Blut/Von der Sünde schweren Ketten, /Von des bösen Übermut.

⑰ 奥茨门特：《德国史》，邢来顺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⑱ Boockmann: „Mitten in Europa-Deutsche Geschichte“, Berlin: Wolf Jobst Siedler, 1984, S.284.

可见，俾斯麦并没有让德国争当霸主的野心。有些历史学家把希特勒看成是和俾斯麦一脉相承的，这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俾斯麦巧妙地运用他的外交才能，在当时复杂的欧洲局势中给德国以合理的定位。他懂得节制，并且深深地懂得，在德国所处的这样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为了能够持续地生存，德国必须成为权力平衡的捍卫者，而不是时刻引起邻国不安的挑战者，所以他很不情愿看到德国成为一个扩张的帝国，然而就像施蒂默尔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遗憾的是，俾斯麦以后的德国政府缺乏远见，不能理解和接受俾斯麦的治国之道。”^{①⑨}

问题是：后来的德国领导者为什么不能够继承俾斯麦的政治外交政策呢？这难道完全可以归因于他们的不理性和不冷静吗？客观地讲，我们并不能这样一味地怪罪他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历史自有其必然性。

新的德意志帝国并没有属于自己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如果说，意识形态这个词听起来太过于贬义，那么我们还可以说，新的德意志帝国还没有一个能把全民族汇集在一起的精神性（文化性）的力量。俾斯麦一手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脱胎于普鲁士，帝国的产生在具体的操作上依靠的是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但是在文化上，俾斯麦所做的工作还是太少。不过，客观地讲，在文化上俾斯麦也不可能做得太多，因为德意志的优秀文化多少都带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色彩，这样的例子很多，比方说歌德和席勒的文学作品，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著作等，但这些优秀文化和普鲁士的不自由的、专制主义的东西总有些格格不入。而在大哲学家、历

史学家和法学家留下的国家观念中又有太多的普世性的、世界主义的东西，这些都不太讨普鲁士，或者说俾斯麦的喜欢。黑格尔的哲学曾被戏称为普鲁士的官方哲学，但是即使如此，读过黑格尔的人都知道，他那一套哲学的东西太复杂了，并不适合用来做文化宣传。此外黑格尔的哲学是一把双刃剑。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在《世界主义和民族国家》中很恰当地评价了黑格尔的哲学：“谁如果沉浸于黑格尔这一理论精神之中，他就会有在一场皮影戏中只关注一方的危险，——假如我们可以进一步让这种基本思想发展下去——他也会陷于只关注国家与民族生活中的普世性因素与暴力的危险之中。”^{②⑩}站在现在的角度上反观，梅尼克对黑格尔的评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预言。最后，我们认为，也有些主观的因素，俾斯麦个人有些小瞧了文化性的（或者意识形态性的）东西。在俾斯麦看来，现实政治不应受制于意识形态。这种观点确实能给政治行动带来某种程度的解放，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明白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的人都会看到，在文化上新德意志帝国确有其尴尬的地方。

由于可宣传的“德意志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缺失，大多数德国人并不以德国人自居，于是地域自豪感和地方民族主义很是流行，他们还是说自己是“普鲁士人”、“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或者“巴登人”等等。更为有趣的是：即使是俾斯麦自己以及他一手扶植的德意志皇帝都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甚至是历史更悠久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有时称自己为普鲁士国王身边的“勃兰登堡仆人”。也就是说，由于“德意志文化”

①⑨ 施蒂默尔，米夏埃尔：《德意志：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孙雪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②⑩ 梅尼克，弗里德里希：《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08页。

的缺失，德意志人的身份是模糊不清的。即使那些极力追寻“德意志身份认同”的人，也必将会经历“身份认同危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在1895年就对俾斯麦领导下的统一表达过批判的观点：“因为这件生命杰作不应当是仅仅导向民族外在的统一，而也应当导向民族内在的统一。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他（指俾斯麦）也不可能用自己的手段达到。”^{②1}

此外，新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格局结合了皇室专制主义和议会民主制两种元素，而这种结合是妥协的产物。它显然是有着内在矛盾的，如果皇权很强，那么议会根本不能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此外，在帝国内部，普鲁士的地位也比其他邦国的地位高。所有重要的政务都由普鲁士政府来负责，由普鲁士内阁来监控。普鲁士大臣在级别上也要比帝国大臣高。在这样的体制下，不仅帝国影响力微弱，其他的邦国也无法实行任何实际的控制。俾斯麦执政的时候，他还可以用自己灵活高超的手腕化解矛盾，纵横捭阖，使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制度运转，但是人们并不能期望德国后来的执政者也同样的精明能干。法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 Eyck）在自己流亡期间（1941—1944）撰写的三卷本的俾斯麦传记中表达了对俾斯麦这种政治的批评，他批评俾斯麦使用马基雅弗利的方法，对法权缺乏重视；他谴责俾斯麦在面对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价值观时的玩世不恭。艾里希·艾克认为，俾斯麦应当对后来的民主在德国的失败负责。他也尖锐地指出，俾斯麦

虽然巧妙地建造了内政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不自然，它一经建立就意味着它的覆亡。^{②2}

如前所述，当时的德国没有行之有效的“主流”德意志文化，另外，它的政治制度也有着固有的矛盾。这两者都是致命的。这两者最终导致了在“问题和诱惑”面前，俾斯麦以后的德意志领导人们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定位，走向了极端，错误地认为通过无休止的扩张、获取殖民利益就可以增加德意志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当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时，他们不惜发动战争。这样德国就彻底脱离了俾斯麦所设想的轨道。

德意志帝国那时正处于世界性帝国主义扩张大潮中。而那时德国的一切——国力、科学和工业都在快速发展。普鲁士王室为了得到更多的财政税收，大力支持工业，创造就业机会，于是，在客观上德国的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1900年后，德国的工业产值就仅在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位。有了这样的国力，面临殖民的诱惑，德国人早已经忘却了俾斯麦的告诫。俾斯麦曾经说过：“只要我当一天首相，德国就不会有殖民政策。”^{②3}而现在，他们都认为俾斯麦的理念早已经过时了。在那个年代，欧洲列强都受到殖民地丰富的资源和专有市场的刺激，纷纷加入瓜分大潮中。在德国国内，殖民言论甚嚣尘上，人民已经为美好的殖民前景目眩神迷。就在这样的世界性的帝国主义扩张大潮中，德国没能看清自己所处的位置，最终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扩张性帝国。德国后来的历史悲剧在德国成为真正的扩张性帝国之后其实就已经开始了。

②1 Ullrich, Volker: „Die nervöse Großmacht- Aufstieg und Untergang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6, S.29.

②2 <http://de.wikipedia.org/wiki/Bismarck>.

②3 施蒂默尔，米夏埃尔：《德意志：一段寻找自我的国家历史》，孙雪晶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五、俾斯麦的政治与外交模式的现实意义

俾斯麦的政治与外交模式在今天仍具有着一定的意义。在当今，美苏两极对峙的情况已经结束，世界呈现出多极化趋势。此外，军事科技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前人的想象。我们可以这样说，现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都是复杂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要想保证生存、能够长期稳定地发展，那么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以及和许多国家建立密切关系的外交模式始终都具有借鉴意义。就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而言，俾斯麦的政治与外交模式也有着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加上以前中国屈辱的历史，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当它以“爱国主义”的面貌出现的时候就很可能把中国带到一个很不确定的方向。“有着坚定的政治外

交目标，成功后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这都是人们可以向俾斯麦学习的地方。

在基辛格看来，强大的美国也应该多向俾斯麦学习，他分析说：“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美国会发觉很难实行英国的孤立。但是她也同样不可能有能力建立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最有创意的解决办法将是建立重叠的架构，有些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原则为基础（如西半球），有些则结合共同的原则与安全考虑（如大西洋地区与东北亚），有些则大体以经济关系做基础（如东南亚）。”^{②4}这种重叠的外交架构正是俾斯麦的外交模式。

然而，俾斯麦忽略意识形态（或者说文化）的教训人们应该吸取。事实上，美国就从人权外交中（人们不能否认人权外交的意识形态性）获得很多好处。自由民主的理念也成了凝聚美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好的文化或者说意识形态模式是需要探索的，糟糕的意识形态的确会成为政治与外交行动的枷锁。

作者简介：包向飞，武汉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刘靛，武汉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②4} 基辛格，亨利：《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806页。

• 外交观察

习近平主席访德成果研析

梅兆荣

【摘要】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28日至30日对德国的国事访问，是中国新任国家主席首次出访欧洲四国和欧盟总部之行中的重头戏。此访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增进双方政治互信，充实中德关系的战略内涵，为未来5—10年两国合作定方向、绘蓝图，推进中德关系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发展。这次访问的主要看点和成果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一个定位，一份文件，两场演讲。

【关键词】习近平访德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蓝图

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3月28日至30日对德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的主要看点和成果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一个定位，一份文件，两场演讲。访问期间，双方本着相互尊重、面向未来、求同存异、务实合作、互利共赢的精神，在多个领域达成重要共识，硕果累累。双方发表的《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列出了此访的主要成果。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成果有以下几点：

首先，双方决定把中德关系的定位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在政治互信提高的基础上，将全方位地扩展战略合作领域与规模，并予以进一步深化。为落实关系定位的升格，双方将在今秋第三轮中德政府磋商中为未来

几年的合作制定行动纲要；同时，两国将发展互利的创新伙伴关系，下一轮政府磋商也将予以具体化。无疑，“行动纲要”和“创新伙伴关系”的落实将为中国实现“新四化”和两个百年目标做出宝贵贡献，而德国也将从中获得巨大商机。

第二，双方决定将迄今的中德战略对话拓展为“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这意味着，两国将就国际和地区危机以及诸如气候、环境、能源与资源安全、国际发展合作、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定期交换意见，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开展紧密合作。中德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和有影响力的国家，对维护和平与经济繁荣肩负着重要责任，并都愿意积极参与解决地区和国际冲突，两国就外交与安全问题加强沟通和协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增添正能量。

第三，双方决定在财政金融领域加强协调，为改革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做出贡献。为此，两国将定期举行高级别的财金对话，并相互开放金融业。与此相适应，两国主管部门在访问期间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包括：新的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以及关于在法兰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前者对两国企业和纳税人是重大利好举措，有助于促进中德经贸往来和相互投资，并对中欧经贸关系具有示范作用，后者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和巩固法兰克福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地位。

第四，德方首次以联合声明的形式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发展”，认为“中国由此将为国际和地区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并明确表示“支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认为这将对两国合作带来新的机遇。这些表态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意义，是对西方不时出现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否定，是对中国深化改革决定的肯定，对欧洲各国正确理解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推动中欧合作都将产生积极效应。

第五，双方明确指出中德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一共识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消除前一时期的欧盟舆论中一些人把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同时，双方明确宣示，将共同落实2013年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商定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致力于签订涵盖投资保护和准入的中欧投资协定，并在可行性研究基础上为签订一项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开启谈判铺平道路，其积极意义也值得重视。

第六，双方宣布支持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致力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相互开放投资，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并主张通过对话

解决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争端。鉴于欧盟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比较严重，近年来对华推出的“双反”调查案件较多，这一共同的表态对促进中欧贸易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双方第一次在共同文件中提到一战爆发100周年和二战爆发75周年，将历史认识问题纳入两国《联合声明》，并强调各国人民应和平相处、互相理解和共同发展，这在一定意义上策应了对一个突出问题的关切，即日本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和日本未来走向的问题。同时，《联合声明》还强调要加深对彼此发展道路的理解，以增进政治互信，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八，双方在访问期间签署了16项政府间协议和商业合同，其中，商业合同涉及金额近百亿美元。中国还宣布将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增设总领馆。北威州是德国人口最多、经济实力雄厚的联邦州，也是中国对德投资最多、中资机构比较集中的地方，这里增设中国总领馆对中德公民都是利好消息。

除了上述八点之外，习主席在访德期间发表的两场重要演讲产生的效果，亦是此访的重要成果。

一场是在柏林科尔伯基金会组织的面向德国精英的演讲。这是一篇全面、深刻地阐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杰作，回应了西方对中国新一届领导执政理念和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关切，也是面向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该演讲深入浅出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的自信和自觉，源自于三大基本因素：一是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二是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的认知；三是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习主席特别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对

中国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做这样的论证和阐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第二场是在杜塞尔多夫面向工商界的演讲。演讲不仅列举了中德互为各自地区最大贸易伙伴的数据及其给双方带来的好处，而且以大量事实阐明了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已采取了大量的改革新措施，特别是令人信服地介绍了中国的巨大市场给外方提供的机遇，提出了“德国质量”和“中国速度”相结合的概念，以及包括优化市场结构、拓宽投资合作领域、走创新合作之路、登高望远从全球角度看待合作、加强协商交流、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等六项建议。该演讲针对性很强，对症下药地回应了新形势下德国工商界对中国的关切。难怪事后媒体报道称，欧洲在习主席访问之后掀起了“中国热”。

2013年1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同欧盟领导人范龙佩和巴罗佐谈话时指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作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经济体，中欧是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市场”；作为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欧是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习主席为这次访德之行而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德合作是两大文明的交流对话，两个伟大民族的互相学习，两个经济奇迹创造者的携手并进。目前中德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水平。人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双方循着达成的共识稳步地向前迈进，中德合作将会有更多的契合点和新动力，中德合作将继续在中欧关系中起引领和示范作用，为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以及两国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梅兆荣，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Harmonie in Vielfalt

——Ein Kommentar zu Xi Jinpings Deutschlandbesuch *Exklusiv*^①

Schlagwörter: Kommentar Xi Jinpings Deutschlandbesuch

Von Prof. Yin Tongsheng / Beijing

Den Titel „Harmonie in Vielfalt“ habe ich in Anlehnung an ein berühmtes Zitat von Konfuzius „Harmonisch, aber nicht gleich“ (和而不同) gewählt, das als „in Eintracht miteinander leben, aber nicht blindlings einander folgen“ interpretiert werden kann. Es soll dem deutschen Leser ein besseres Verständnis meines Kommentars zu Xi Jinpings Deutschlandbesuch verschaffen.

Vom 28.03.2014 bis 30.03.2014 stattete Xi Jinping Deutschland einen Staatsbesuch ab. Seit acht Jahren war dies der erste Besuch eines chinesischen Staatspräsidenten in Deutschland, der weltweite Aufmerksamkeit auf sich lenkt.

I. Harmonie in Vielfalt

Xi Jinpings Deutschlandbesuch wurde vor

allem durch sein Treffen mit Bundeskanzlerin Merkel gekrönt. Als stellvertretender Staatspräsident hat Xi Jinping Angela Merkel, die damals bereits Bundeskanzlerin war, kennengelernt und ist seitdem mit ihr befreundet. 2013 wurden die beiden durch die Volkskongresswahl bzw. die Bundestagswahl zum Staatspräsidenten gewählt bzw. noch als Bundeskanzlerin durch Wiederwahl bestätigt. Bei diesem Besuch treffen sich also erstmals der neue chinesische Staatspräsident und die in ihrem Amt bestätigte deutsche Bundeskanzlerin.

Während Xi Jinpings Deutschlandaufenthalts hab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eine umfassend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beschlossen und dies in einem gemeinsamen Kommuniqué verankert. Dabei wurden auch insgesamt zwanzig verschiedene Abkommen, Absichtserk-

① 本文转载自中国网，2014年4月4日。

lärungen und Vereinbarungen unterschrieben. Der Schwerpunkt lag auf einer noch stärkeren wirtschaftlichen Zusammenarbeit, so gehören unter anderem VW, Daimler, Bayer, BMW, Siemens und die Alba Group zu den Unterzeichnern. Auch die Einrichtung eines chinesischen Generalkonsulats in Düsseldorf wurde vereinbart. Ebenso beschloss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die Einrichtung eines Handelsplatzes für die chinesische Währung Yuan (Renminbi) in Frankfurt. Das Jahr 2015 ernannten Deutschland und China außerdem zum Jahr der Innovationskooperation.

Mit diesem erfolgreichen Deutschlandbesuch ist also ein neues Kapitel in den chin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aufgeschlagen, das eine herrliche Perspektive verspricht, die sich sehr an „Harmonie in Vielfalt“ orientiert.

Unter Harmonie ist hier zu verstehen, was Präsident Xi Jinping in F.A.Z. umrissen hatte: Beide Nationen verfügen „über viele gemeinsame Tugenden, wie zum Beispiel Fleiß und Ausdauer, Bescheidenheit und Gewissenhaftigkeit, Gründlichkeit und Tatkraft sowie Mut zur Neuerung...Für China wie für Deutschland, die beide globale Handels- und Wirtschaftsmächte sind, ist das andere Land bereits Teil der eigenen Entwicklung, sie sind füreinander unverzichtbar. Gleich ob vom Stand der industriellen Entwicklung, dem Marktumfang oder der Nachfragekonstellation her-die Volkswirtschaften Chinas und Deutschlands sind in höchstem Maß komplementär... Beide Länder sind nicht nur füreinander die größten Handelspartner in ihrer jeweiligen Region geworden, sie wurden auch die wichtigsten Zielgebiete für Investitionen und Unternehmensgründungen...Im Bereich bedeutender internationaler Fragen, wie der Wahrung des Weltfriedens und der regionalen

Sicherheit, der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Klimawandel, der Ernährungssicherheit und der Förderung nachhaltiger Entwicklung, bestehen zwischen beiden Ländern immer enger werdende Austauschkontakte und Kooperationen“ sowie sich deckende oder sich annähernde Ansichten.

Vielfalt wird meines Erachtens hauptsächlich durch drei Dinge geprägt, nämlich unterschiedliche Gesellschaftsordnungen, Kulturen und Entwicklungsstände, aus denen wiederum unterschiedliche Interessen, Ideologien und Wertvorstellungen resultieren.

Angesichts dieser unterschiedlichen Lage bemühen sich die beiden Staaten auch bei diesem Besuch, ihre Beziehungen einerseits über einen gemeinsamen Nenner zu definieren, andererseits aber auch – wie in jeder guten Beziehung - Unterschiede gleichzeitig zu respektieren. Daraus ergeben sich wichtige Prinzipien oder sollen sich weitere wichtige Prinzipien ergeben.

1. Beide Seiten streben danach, eine gemeinsame Basis in grundsätzlichen Fragen, also Kerninteressen und bedeutsamsten Anliegen zu suchen und Differenzen bei nebensächlichen zurückzustellen (求大同, 存小异), um letzten Endes auf einen Kompromiss einzugehen. „Viele Gespräche über Wirtschaft, wenige über Menschenrechte“, mit dieser Überschrift ihres Berichtes hat Frau Eva Quadbeck in diesem Sinne den Nagel auf den Kopf getroffen.
2. Auch in ein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darf man nicht leichtfertig die Unterschiedlichkeiten und nationalen Verantwortungen der beiden Länder missachten. Die historisch über lange

Zeit gewachsenen Strukturen der beiden Staaten sind alle politisch, wirtschaftlich, kulturell und sozial betrachtet hoch interdependent. Die Deutschen können keine Chinesen werden und die Chinesen können auch keine Deutschen sein. Soll di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Bestand haben, muss man politische, wirtschaftliche, kulturelle und soziale Unterschiede in beiden Ländern zukünftig bewusst respektieren. Wir brauchen "mehr" Harmonie für unsere Zukunft – aber auch mehr Partnerschaftspolitik, die Unterschiedlichkeiten, Dissens und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der Menschen beider Länder berücksichtigt und nutzt. Vielfalt, nicht Gleichheit ist auch die wirkliche Quelle beiderseitiger Schöpferkraft. Di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wird vielmehr gemeinsame Vorteile nur mit den Chancen der nationalen Unterschiede erringen. Komplementarität, gegenseitiger Nutzen und Unterstützung müssen als die wahre Stärke d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verstanden und anerkannt werden. Dies ist wichtig in der Zeit, wo „auf Brokat zusätzlich Blumen gestickt“ werden (锦上添花), insbesondere aber in der Zeit, wo der anderen Seite „bei Schneewetter Kohlen geschickt“ werden (雪中送炭).

3. Mute keinem anderen zu, was dir selbst nicht behagt. Was du nicht willst, das man dir tut, das fügt auch keinem anderen zu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Es ist also nicht angebracht, der anderen Seite ihre Gesellschaftsordnung, ihr System, ihre Wertvorstellungen aufzuzwingen, was der einen Seite selbst

auch nicht behagen würde. China und Deutschland - jedes Land hat sein eigenes Wirtschaftswunder vollbracht - sind heute die zweit- und viertgrößte Volkswirtschaft in der Welt. Darum sprechen immer mehr Menschen voller Respekt von einem „China-Modell“ und einem „Deutschland-Modell“. Mit großer Genugtuung konnte man feststellen, dass beide Staaten niemals selbst damit hausieren gehen und gehen wollen, geschweige denn davon, dies der anderen Seite zu diktieren. Mein deutscher Freund Prof. Dr. Sandschneider, ein großer China-Kenner, weist darauf hin: „Man darf nicht erwarten, dass China – nur weil wir das sagen – sofort tut, was die Deutschen wollen. China verfolgt seine eigenen Interessen. Das tun andere Staaten auch.“ Denn was in Deutschland möglich ist, das mag in China aus politischen,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politischen Gründen, oder auch angesichts kultureller Traditionen, vielleicht so gar nicht möglich sein, auch nicht bei guter Absich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lieferte die Bundeskanzlerin einen aussagekräftigen Beweis, indem sie betonte, die deutsche Seite verstehe, mit welchen vielfältigen Herausforderungen China als ein bevölkerungsreichstes Land konfrontiert ist und sie verstehe, dass China den deutschen Maßstab nicht mechanisch anwenden darf.

4. Beide Seiten müssen das Ziel verfolgen, Vorurteile und Missverständnisse allmählich abzubauen. Auch mit Scharfsinn warnte Herr Prof. Dr. Sandschneider hier seine Landsleute: „Viel Kritik basiert auf Unkenntnis...doch am Ende braucht es einen

ausgewogenen und pragmatischen Zugang. Das ist wirklich dringend notwendig, weil es für uns politisch immer wichtiger wird, mit diesem Land vernünftig umzugehen. “ Beim Treffen mit Xi Jinping hat z.B. Bundespräsident Gauck darauf verwiesen: „Ich bin sicher: Sie werden umso mehr Erfolg haben, wenn Sie den Weg zu mehr Wettbewerb und zu einem Rechtssystem, in dem keiner über dem Gesetz stehen soll, konsequent gehen. “. Das ist genauso auch unser Slogan und Ziel. Wenn er ohne Vorbedingungen nach China kommt, wird er sich davon selbst ein Bild machen können.

5. Beide Seiten müssen Selbstvertrauen haben und sollen sich ordentlich benehmen, um auch die andere Seite von ihrer Richtigkeit zu überzeugen. Zwei chinesische Sprichwörter lauten: Ein tugendhafter Mensch bleibt nie allein. Er hat immer gleichgesinnte Gefährten (道不孤，必有邻). Die Pfirsich- und Pflaumenbäume stehen stumm da, unter ihnen sind jedoch Pfade (von ihren Bewunderern) ausgetreten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6.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gründen auf Verständnis, Vertrauen, Respekt und Toleranz. So müssen weitere Voraussetzungen für gegenseitiges Verständnis und Vertrauen sowie für gegenseitigen Respekt und Toleranz geschaffen werden. Dialoge auf Augenhöhe gehören dazu. Für manche Deutsche mag es noch nicht so leicht sein, Dialoge auf Augenhöhe zu führen. Durch breitere und differenzierte Informationen in den

deutschen Medien erlangen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allerdings auch immer mehr Wissen über das Reich der Mitte und seine Bevölkerung. Deutsche Chinakenner bestätigen, dass dadurch mehr Verständnis und mehr Respekt für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deren Herangehensweisen und Motivationen erreicht werden, Respekt auch für die Herausforderungen, mit denen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konfrontiert ist.

7. Heute geht die Globalisierung immer mehr in die Tiefe und Breite. Sie erzeugt jetzt aber sehr unterschiedliche Folgen, wird auch von manchen kritisiert. Diese unterschiedlichen Globalisierungsfolgen verlangen darum heute zunehmend maßgeschneiderte nationale Antwort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haben eben gleiche, aber auch ungleiche Globalisierungsfolgen sowie verschiedene neu entstandene Strukturen. Harmonie kann es für sie jeweils nur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ieser Vielfalt geben.

II. Anregungen zur wegweisenden Blaupause für bessere und schnellere Weiterentwicklung der beiderseitigen Wirtschafts- und Handelsbeziehung

In der Vergangenheit haben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Wirtschafts- und Handelsbeziehungen reiche Früchte getragen. 2013 betrug das gesamte Handelsvolumen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161,6 Mrd. US Dollar, das 580fache verglichen mit dem Jahr 1972. Derzeit haben sich über 8200 deutsche Firmen in China niedergelassen, und mehr als 2000 chinesische Unternehmen haben in Deutschland Fuß gefasst. Zugleich sehen sich China und Deutschland aber

auch mit allerlei Schwierigkeiten konfrontiert.

Unterziehen wir die gegenwärtige Welt einer umfassenden Analyse, so tauchen sofort unzählige Probleme, Unruhen und Krisen auf, die meines Erachtens vor allem auf das Auseinanderklaffen der Produktivkräfte von d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n zurückzuführen sind. Die Weltproduktivkräfte entwickeln sich rasant, während die Welt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weit hinten zurückbleiben, was Produktions- und Kapitalüberschüsse zur Folge hat. Darum ist eine tiefgehende Umgestaltung der Welt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dringend erforderlich, um ihre Übereinstimmung mit der rasanten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 wiederherzustellen. Deswegen sind China und Deutschland als globale Handels- und Wirtschaftsmächte noch einmal gefragt, ihren aktiven Beitrag bei einer notwendigen Neugestaltung der Welt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und der Weltwirtschaftsordnung zu leist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stehen beide vor der globalen, regionalen und bilateralen Kooperation. In der Weltfinanzkrise und der EU-Schuldenkrise ließ und lässt der Trend immer mehr vermuten, dass die letztere die beiden vorderen merklich überschattet. Unbestritten stellt die bilaterale Zusammenarbeit die Grundlage für die globale und regionale Kooperation dar. China und Deutschland müssen also ihre bilateralen Beziehungen um einen Schritt weiter vorantreiben, Verbindung zwischen Chinas Markt und Deutschlands Technologie, zwischen chinesischen Wachstumsraten und deutscher Qualität noch mehr intensivieren, um damit auch die globale und regionale Kooperation zu förder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chätzt China besonders die Vorreiterrolle Deutschlands in den

chinesisch-europäischen Beziehung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Weltfinanz- und EU-Schuldenkrise ist die EU immer mehr in Protektionismus geraten und gedenkt Handelshemmnisse und Antidumping-Maßnahmen gegenüber China anzuwenden. Als Mitglied der EU muss die deutsche Handelspolitik diese Aktivitäten auch unterstützen. Aber das Blatt hat sich nun etwas gewendet. Anlässlich Xi Jinpings Deutschland- und Europabesuchs haben sich China und Deutschland sowie die EU geeinigt, gegen den Protektionismus zu kämpfen, wenn möglich, so auch anhand des Vorbilds der Beilegung des Handelsstreites um Solarprodukte.

Zur Zeit werden die Stimmen immer lauter, dass sich der Handelskonflikt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zwingend zuspitzen werde, weil mit den fortgeschrittenen technischen Erneuerungen, der Steigerung der Wettbewerbsfähigkeit und Erhöhung der Innovationsfähigkeit Chinas die Faktorausstattung und die Struktur der Exportpalette beider Länder immer ähnlicher werden. Dieses Argument braucht wirklich nicht widerlegt zu werden. Im Gegensatz dazu kann man das Heckscher-Ohlin-Chamberlin-Theorem zitieren, nach dem der intra-industrielle Handel mit Nachdruck unterstrichen wird, und der mit dem inter-industriellen Handel koexistieren und schneller als dieser entwickelt werden kann. Die rasante Entwicklung des intra-industriellen Handels unter den Industrieländern ist schon sehr überzeugend. Pessimismus ist also hier nicht am Platz.

Deutschland kritisiert den Mangel an Schutz geistigen Eigentums sowie die teilweise fehlende Möglichkeit, Verletzungen vor Gericht wirklich durchzusetzen. Als ein Entwicklungsland bekennt

sich China zu seiner Unzulänglichkeit in diesem Bereich, ehrlich gesagt, es ist wirklich eine unumgängliche Station, die auch Deutschland in den 70er Jahren des 19. Jahrhunderts zu durchlaufen hatte. Es ist aber allgemein bekannt, dass es China gelungen ist, bis heute eine ganze Menge von Gesetzen zum Schutz von Patenten, Marken, Urheberrechten und speziellen Nutzungsrechten zu verabschieden. Dies hat zur wesentlichen Verbesserung beim IPR-Schutz beigetragen, weil die unzureichende rechtliche Durchsetzung der geistigen Eigentumsrechte, die Verletzung vom geistigen Eigentum und die Illoyalität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auch ernsthaft schaden. Ich bin fest der Überzeugung,

dass der chinesisch-deutsche Technologietransfer sicherlich durch vertrauensbildende Maßnahmen, gegenseitiges Verständnis, durch neue Gesetzgebungen und Verbesserung der Rahmenbedingungen von Seite Chinas beflügelt werden kann, aber immer noch unter Vorbehalt des Transfers der modernen Technologien gemäß des Wassenaar-Abkommens.

Die chine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 können auf eine sehr lange und positive Geschichte zurückblicken. Mögen sie sich besser und schneller weiterentwickeln wie der Yangtse und der Rhein.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战争与革命”时代背景出发， 总结一战教训和魏玛悲剧

吴兴唐

【摘要】今年是一战爆发 100 周年。总结一战教训，要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巴黎和会是战胜大国分赃会议。凡尔赛体系是在大国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建立起来的。巴黎和会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展开了美日英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争斗。魏玛悲剧是“战争和革命”时代的缩影。但“魏玛共和”对德意志民族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关键词】战争与革命 巴黎和会 魏玛悲剧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00 周年。总结一战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也可以进行学术讨论，以得出准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一、总结一战教训要从时代背景的高度出发

1914 年 6 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被塞尔维亚青年枪杀，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成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线。奥匈帝国在德国支持下决定吞并塞尔维亚。俄、法支持塞尔维亚，英国暗中支持俄、法。1914 年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德、俄、法、英相继投入战争。战争很快超

出欧洲范围。参战国达 30 多个，15 亿人被卷入战争。一战持续四年零三个月，战死军人达 900 万，2000 多万人受伤。战争期间平民伤亡达 1000 万人。

战争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灾难。总结一战教训要从时代背景出发。这时资本主义进入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发展不平衡，要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同时，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获得胜利的理论，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相继发生苏维埃革命，东方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掀起了民族

解放运动。因此，列宁归结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一战结束使 20 世纪初期的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世界的政治格局，即“维也纳体系”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战争使帝国主义各大国的力量对比和组合发生重大变化。德、奥、俄帝国没落，英、法实力削弱，美国和日本兴起。美国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增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展开。因此，总结一战教训，不能仅从德国一国的政治、经济出发，而要从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角度出发。

二、凡尔赛体系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

“巴黎和会”是战胜国的大国分赃会议，《凡尔赛和约》则是各大国经过争斗达成分赃妥协的产物。各大国都有各自的打算与计划。美国作为新兴大国先声夺人，提出所谓的“寻求世界和平的计划”，以做出有利于美国实施霸权的安排，但遭到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法国主张肢解德国，以确立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英国反对肢解德国，制止法国在欧洲称霸。意大利试图独霸亚得里亚海。日本欲乘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各大国在处置德国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斗。关于德国疆界问题，法国要求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夺取鲁尔工业区，并要求以莱茵河为法德边界，在莱茵河左岸建立一个依附法国的莱茵共和国。英美坚决反对。在美英的强大压力下，法国做出妥协。

关于赔款问题，“巴黎和会”设置的专门委员会提出赔款总额为 4800 亿金马克。法国要求 8000 亿金马克。英美反对过分削弱德国，提出赔款数为 2280 亿金马克。法国提出赔款的 58% 归它。由于达不成一致意见，最后决定交赔款委员会研究决定。

关于苏俄问题，“巴黎和会”讨论了武装干涉苏俄的问题，决定对苏俄进行经济封锁，并决定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组成“隔离地带”，防止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会议还多次讨论和策划武装干涉苏维埃共和国问题。

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日本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交给日本。英法美同意日本的要求，并写入《凡尔赛和约》。

经过几个月的争吵，各国达成协议，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主要内容有：（1）重新确定德国边界。德国丧失了 1/8 领土和 1/10 人口。（2）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3）限制德国军备。（4）协约国要在 1924 年 5 月 1 日前确定德国赔款总额，但德国应先支付 200 亿金马克。这就是一战后确立的“凡尔赛体系”。这个体系加深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苏维埃共和国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矛盾。

三、美日争斗的华盛顿会议

美国在“巴黎和会”上未能达到其预想的目标，于是就另寻出路，把目标放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取得了德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权益，极大地威胁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1921 年 11 月 12 日，美国邀集英、日、中、法、意、比、荷、葡八国，连同美国自身共九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美国居主导地位，美、英、日在会上进行讨价还价。经过近 3 个月的争斗与妥协，华盛顿九国会议于 1922 年 2 月 6 日闭幕。共缔结了限制海军军备的《五国海军协定》，美、英、法、日对远东和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进行分割的《四国条约》，以及《九国公约》和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等决议案。

在华盛顿会议上，当时中国政府代表提

出了取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山东的条款以及要日本放弃“二十一条”等正当要求。由于美日矛盾激化，美国支持中国政府的上述要求。1922年2月4日，中日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本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九国共同签署的《九国公约》，其中有关中国的内容称：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遵守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和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九国公约》打破日本对中国的独占，又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统治的地位。

四、希特勒血腥暴力上台

1923年年初，法国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义务为由，出兵占领德国鲁尔工业地区，称为“鲁尔危机”。“鲁尔危机”给已十分脆弱的德国战后经济带来十分沉重的打击。德国出现疯狂的通货膨胀，引起社会动荡。“鲁尔危机”严重打击了矛盾重重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各种反动势力乘机进行蛊惑煽动。1923年11月6日至9日，希特勒带领冲锋队员，在慕尼黑发动武装暴动。暴动被镇压后，希特勒被捕入狱，判刑5年，但8个月后被释放。

1933年1月30日，德国总统兴登堡改变了几天之前绝不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誓言，任命纳粹首领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和纳粹党称之为“第三帝国”。希特勒上台之初，在国会和内阁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占有多数，纳粹党处于少数地位。纳粹党于是在当年2月27日，搞了“国会纵火案”阴谋，希特勒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取消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并宣布取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解散纳粹党之外的一切政党，包括曾支持希特勒上台的中央党。第二年夏天，兴登堡病死，希特勒宣布自己为第三帝国的元首。纳

粹政权在德国各地建造集中营，由冲锋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秘密警察）组成恐怖网，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希特勒上台，德国淹没在恐怖血泊之中。第三帝国的目标还在征服欧洲和世界，进行扩军和重新武装。英法为了达到“祸水东引”的目的，于1938年9月29日—30日同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对希特勒第三帝国实行“绥靖政策”，助长了纳粹德国对外侵略的气焰。这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

五、魏玛悲剧及其文化遗产

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是1918年德国左翼“十一月革命”的产物。在德国历史上，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建立神圣罗马帝国，史称第一帝国。1806年拿破仑迫使奥地利皇帝放弃神圣罗马帝国。1871年1月，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史称第二帝国。1918年11月，德国在一战战败投降之际，国内引发了一场革命，推翻了帝制。

魏玛共和国于1918年11月9日由社会民主党的谢德曼宣布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纳粹上台共和国终结。共存在十四年零三个月。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曾一度担任总统。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大致可分5个阶段：第一阶段1918年11月—1919年7月为奠基时期；第二阶段1919年8月—1923年12月为持续纷乱时期；第三阶段1923年12月—1929年10月为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期；第四阶段为1929年10月—1932年5月终结的开端；第五阶段为1932年6月—1933年1月共和国走向终结。

产生魏玛悲剧的原因多种多样，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魏玛共和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产物，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它承担着旧帝国遗留下来的沉疴痼疾以及旧官僚体系和保守思想。它同时受到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冲击。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势力盘根错节。新生的共和体制处于脆弱与动荡之中。第二，左派犯了幼稚病。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德国左翼没有对形势做出准确估计，贸然发动苏维埃式的革命。1918年12月德国共产党成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德共成立后，特别在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力量发展很快。到20年代已拥有30万党员。但德共过于相信议会多数，过早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标。同时没有注意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和在武装力量中的工作，而热衷于“飞行集会”，做街头鼓动宣传。第三，左翼力量的分裂。德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在一战爆发后，奉行沙文主义政策，导致党内分裂。魏玛共和国时期，社民党排斥德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执政。社民党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的苏俄，因而也害怕德共搞苏维埃式革命。社民党内部也四分五裂，争权夺利。而德共也没有同社民党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反动势力的意图，反而指责社民党为“社会法西斯”。两个左翼党相互攻击，相互斗争。这就使反动势力有机可乘，联合起来对付左翼力量。第四，外部因素。魏玛悲剧主要是内因，但外因也起了重要作用。外部因素有两个。第一是《凡尔赛和约》。被列宁称为“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堪重负，造成战后德国国穷民困。沉重数额的赔款重担压在德国民众身上，最直接遭殃的是老百姓。这就给纳粹党煽动民众以口实，并以此迷惑民众，扩展其法西斯势力。第二是世界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3年席卷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是一场空前的世界性大危机。一战之后，世界经济危机之前，各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生产领域广泛地使用新科技、新技术，使汽车、电气、化工、人造纤维等新兴产业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美国，经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德国也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工商企业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进行合并。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几个企业公司都建立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同时推行“产业合理化”，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战之后，大英帝国衰落，美国的经济获得前所未有的增长，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世界贸易和世界金融中心。但是繁荣背后隐藏着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造成的危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购买力跟不上生产发展导致生产过剩。工业部门开工不足，大批工人失业。同时，金融投机活动猖獗，促使货币与信贷危机。美国首当其冲，进入大危机时期。依赖美国资金的德国企业随之陷入困境，数以千计企业倒闭，数百万工人失业，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0%。由于沉重赔款造成的德国脆弱的经济基础一下就垮掉了，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罢工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纳粹党借机进行煽动，开始扩军备战，对内暴力镇压左翼及和平人士，对外发动侵略。

魏玛共和国是战争、革命和民主共和的综合产物，魏玛的理想与文化包含新与旧的两个方面。在政治上，魏玛是矛盾、混乱和动荡的代名词。在文化上，却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之所以选在东部小城魏玛为共和国首都，是因为歌德和席勒曾在这里生活和写作过这一文化因素。魏玛共和国采用黑红黄三色国旗，这是德国1848年革命时期的旗帜。黑色代表过去，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光明的前景。“魏玛共和”时期，混乱和动荡却使德国产生了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科学家、画家、诗人、剧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作曲家和建筑师。

六、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一百年来，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又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潮流。世之潮流，浩浩荡荡，这不是某些个人或政治集团所能阻挡的，这是世界多极化、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的结果。当然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都没有解决，但和平与发展趋势仍在发展与增强。

从邓小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出“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之后，已经过去 30 多年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近几年来又提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战略思维。

研究历史，总结一战的教训，联系现实，拿现实同历史事件和人物作比喻是可以的，但必须十分谨慎和小心。要实事求是，不要牵强附会。要弄清楚时代背景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吴兴唐，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新姿态

刘立群 李 微

【摘要】2013年11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早已从国内政治危机变为严重的国际政治危机，欧美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角力既是其主要外部原因，也是其结果；该危机使本已有明显裂痕的乌克兰两大语区陷入公开对立，导致克里米亚公投独立及乌克兰政府军与东部分离势力发生军事冲突，俄与欧美积聚十余年的矛盾也一并爆发。德国是俄在欧盟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在德“与价值观相连、以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方针”指引下，德俄在经贸交往及共同经济利益不断扩大的同时，在价值观领域（含政治体制及相互认知）的分歧却不断加深。2013年12月诞生的德国新政府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想尽力改善与俄关系。但长期以来德及欧盟过于忽视甚至漠视俄方感受，对乌克兰国内问题的严重性更是认识不足，急于与乌签署联合国协定，俄国内改革较为滞后也是与欧美分歧增大的原因之一，这些终于引发了1990年冷战结束以来俄与西方关系最严重的危机并可能持续较长时间，不但形成共输局面，也严重恶化国际形势。德国新政府在调解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积极进取的外交新姿态。经德国及欧盟、欧安组织等不懈斡旋，乌克兰局势时好时坏，但真正解决危机仍需很长时间。

【关键词】德国外交 乌克兰危机 德俄关系

德俄关系在1998—2005年两届施罗德政府时期较为良好，而2005年11月第一届默克尔政府上台后有所趋冷，不过当时联盟党的执政伙伴是社民党，社民党人施泰因迈尔作为外长重视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但自2009年默克尔第二届政府开始，德俄之间关系趋于紧张。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新政府于2013年12月16日组成新政府后想在外交领域有更多作为，包括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两党《联合执政协议》中提出“德国

要承担其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塑造公正的全球秩序”；德国认为欧盟是“文明力量”，它是以和平手段来实现扩大，而绝不会使用武力扩张。不过欧盟与乌克兰签署联合国协定一事却导致乌克兰陷入严重政治危机，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加入俄罗斯，这场危机导致俄罗斯与欧美之间的空前对立，也使德俄关系陷入困境。

在解决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德国新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始终希望通过和平手段

而非军事手段解决危机。默克尔总理多次和普京总统通电话，外长施泰因迈尔也多次和俄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和会晤，并多次前往乌克兰会晤其领导人。德国政府还多次发表声明或表态，或单独出马，或与法国及波兰等国一道，或通过欧盟委员会，一再敦促有关各方采取克制态度，不要激化矛盾，其密集度之高堪称德国统一以来之最，体现了德国新政府积极进取的外交姿态。

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最后关头宣布放弃签署于2011年12月完成谈判、2012年3月30日草签的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显示其对外政策上的重大转向。第二天约3000名乌克兰民众走上首都基辅市中心独立广场示威，挥舞欧盟旗帜，抗议政府这一决定。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5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广场革命”后，2014年1月28日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突然提交辞呈，乌政府随之解散。2月21日乌总统亚努科维奇宣布提前举行总统大选，22日乌克兰议会在投票后宣布亚努科维奇“自动丧失总统职权”，亲西方的新议长图尔奇诺夫代行总统职务，并宣布加快签署联系国协定。2月27日克里米亚亲俄武装人员占领克里米亚政府大楼和议会大楼，升起俄罗斯国旗。3月4日普京首次表态称乌克兰事件性质是违宪政变和武装夺权。3月16日在乌克兰政府和西方七国动用外交和联合国手段无果之后，克里米亚举行公投，超过80%的克里米亚公民赞同加入俄罗斯。

至此乌克兰危机走到一个白热化节点，一方面克里米亚独立已成事实，另一方面乌克兰新政府和欧盟加快了联系国协定的签署。欧盟和美国分别决定对俄进行制裁，俄方没有任何退让之势，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碰撞

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这是双方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一次冲突。4月上旬乌东部俄语区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宣布成立“独立共和国”，4月中旬开始乌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5月11日此两州举行全民公决并宣布成为“主权国家”。5月25日乌克兰总统选举如期举行，波罗申科当选为总统。他上台后提出给予东部民众政治优待，并表明无意参与战争或寻求复仇。他虽想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俄与欧盟关系，并一度提出停火建议，不过他在乌政府于3月21日签署联系国协定政治部分的基础上，于6月27日同欧盟签署了联系国协定的经济部分，并加大对乌东部分离势力的军事打击，这些都引发乌国内亲俄势力及俄罗斯的强烈不满。

自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以来，德国及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就一直没有停止对该重要战略地区的较量。尤其在乌前总统尤先科2010年下台后，乌克兰改变了全面向西倾斜的外交定位，在亚努科维奇领导下实施更为灵活和务实的战略，利用自身重要战略地位，力图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积极推进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谈判，希图获得较多利益，另一方面，对俄方提出的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的邀请态度模糊，但也未明确拒绝。亚努科维奇在最后关头拒绝联系国协定，看似令人大跌眼镜，并因此迅速激起德国政界的不满和疑心，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有迹可循。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德国国际法专家约翰·珀斯茨在接受德国《每日新闻》采访时说：“我们本不该这么快推进联系国协定的签署过程……对普京来说，这像是我们在‘包围’俄罗斯，我们应当预测到俄方会做出激烈反应，但最终，理智的声音被淹没了。”^①

^① 德国《每日新闻》在线：Das wird Putin nicht stoppen, unter: www.tagesschau.de/ausland/ukraine-interview-posth100.html.

舆论认为目前乌克兰局势违背了《布达佩斯安保备忘录》的承诺。1994年2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在布达佩斯签署了《布达佩斯安保备忘录》，规定乌克兰承诺放弃核武器后，俄、美和英作为担保方，保证乌边界和独立，不干涉乌克兰内政。不过此备忘录只是一份外交文件，而非正式国际条约。

一、乌克兰事件的背景

1. 欧俄“夹缝”中摇摆的乌克兰

2004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尤先科政府上台执政，在美国公开大力支持下，乌克兰对外政策发生剧烈转变。尤先科放弃了前两位总统奉行的中立、不结盟和东西方平衡的对外政策。对外推行加入欧盟，对内大搞去俄罗斯化，在俄黑海舰队驻扎克里米亚、俄语地位等问题上丝毫不顾及俄罗斯的感受，引起俄领导人极度不满^②。针对乌克兰一边倒的“脱俄入欧”政策，俄罗斯主要予以打压和冷落，俄乌关系不断恶化。2007年欧盟和乌克兰正式开始“联系国协定”谈判。乌克兰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乌克兰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长达1200页，包括前言、正文七章、43个附录、3个备忘录，这是欧盟有史以来最长的联系国协定。尽管乌克兰曾反复强调希望加入欧盟，但在此协定的前言中未提及入盟前景，尽管按通常惯例是为将来入盟做准备。谈判从2007年开始，2011年12月结束。联系国协定的核心部分是全面的自贸协定，该协定规定双方将相互开放几乎全部市场。目前乌克兰出口额的三分之一进入欧盟。

2010年2月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后实行积极务实的外交政策，主动修复与俄关系，俄乌关系迅速升温。2010年4月俄乌总统签署了俄黑海舰队在乌驻扎问题协定，将俄舰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驻扎期限延长到2042年（目前俄在克里米亚驻扎的军舰数量符合该协定的规定）。同年7月乌议会以法律形式确定乌非集团化国家地位，扫除了俄对乌加入北约的忧虑。

2010年1月，俄白哈关税同盟启动不久，俄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关税同盟的邀请，而乌与欧盟联系国协定的谈判也在进行。乌以加入俄关税同盟有违世贸组织相关规定为由，未继续讨论该问题。在此之后，俄罗斯多次呼吁乌克兰做出正确的选择，加入关税同盟。2011年俄把天然气价格与乌加入关税同盟挂钩。俄甚至劝说乌应先加入独联体一体化进程，在经济发展更为稳固的情况下再考虑加大融入欧盟的步伐。尽管如此，乌克兰仍然坚持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2011年8月20日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独立20周年的演讲中称乌克兰最终明确自身发展前景，选择了欧洲，欧洲价值观是乌克兰发展的基础，乌融入欧洲后会得到机会和权利，而不是补贴和宽容^③。

2. 欧盟“东进”和俄罗斯“传统缓冲地缘”的冲突

乌克兰与俄罗斯在俄白哈关税同盟问题上的交锋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拉拢乌克兰，希望阻止乌加入欧盟的努力，另一方面乌克兰则显示了在对外倾向上摇摆不定。尽管“橙色革命”之后“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乌克兰多数精英和民众的共识^④，但乌克兰经济上对俄罗斯的依赖和东部乌克兰人民在

② 李勇慧：《“梅普组合”时期的俄乌关系》，载《俄罗斯发展报告（2012）》，第238页。

③ 同上，第245页。

④ 同上，第243页。

文化、宗教上的亲俄认同意识使乌无法放弃俄罗斯。乌克兰西部以信奉基督教的乌克兰族为主，东部以俄语区及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族为主，对外也倾向于向东和向西两个不同方向。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曾说乌克兰“或者向西、或者向东”。而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是向西，加入俄白哈关税同盟是向东，这些加剧了乌克兰国内民族矛盾。

此外，德国及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态度有些草率。在签署联系国协定的过程中，欧盟对乌克兰在共同价值观和法治国家建设上要求甚高^⑤，但经济上却并未满足乌克兰对欧盟所抱有的美好设想。在“广场革命”之后，乌克兰总理阿扎罗夫呼吁民众克制，称乌克兰之所以临时决定不签署联系国协定，是因乌经济濒于崩溃，在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下，乌财政吃紧，无力偿还高额债务，与俄的经济关系因联系国协定受损，对俄出口大幅缩水，在这样艰难情况下，德国和欧盟并未提供任何实质援助^⑥。

与此同时，2013年11月9日普京在与亚努科维奇会面时明确表示，如果乌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乌“将失去很多，俄将限制乌商品进口”；相反如果乌加入俄关税同盟，则能马上获得包括天然气价格在内的各种优惠。在这种局面下，乌克兰无法承担失去俄罗斯的风险，在最后关头拒绝签署联系国协定的“戏剧化突变”也就出现了。

可见乌克兰事件是以欧盟在推行“东进”过程中与坚持“乌克兰是最后底线”的俄罗斯之间长期博弈后爆发的结果。俄在乌克兰与欧盟进行联系国协定谈判的前期过程中并未将矛头直指欧盟，而是以关税同盟、降低

天然气价格等方式向乌克兰提供“调头向东”的可能路径，与此同时将更为强硬的态度放在阻止乌克兰和北约靠近上。这是因为俄罗斯在不愿放弃乌克兰地缘战略的同时，也希望与德国及欧盟保持尽量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德国虽并不愿为乌克兰问题过多得罪俄罗斯，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德国和欧盟在联系国协定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以及对协定签订前提条件上的不可通融说明他们低估了该协定对俄罗斯所产生的威胁效果，也没正确估计乌克兰国内的复杂局势。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2014年3月9日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称，欧盟委员会并不了解乌克兰内部在文化意识上的分裂是如何之大，从一开始以“非此即彼”的口号建议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时就犯下了错误^⑦，对乌克兰而言，必须在二者之间做选择是不可能的。

二、乌克兰事件中德国外交政策及其原因

1. 德国政府换届的特殊背景

从德国国内政治背景来说，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时间点恰好在德国政府换届之际。2013年9月22日德国大选结束后，由最大的两个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两党之间的巨大分歧使执政谈判持续了近三个月，直到12月16日德国新政府才正式出炉。而此前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是看守政府，德国新政府诞生后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应对欧债危机的余波和是否切实推行退休年龄和最低工资改革等。乌克兰的经济崩溃、对外战略向东调整、俄

⑤ 季莫申科被捕事件使欧盟非常不满，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释放季莫申科。

⑥ 浙江日报：《脱俄入欧，乌克兰猛踩刹车》，2013年12月2日，第19版。

⑦ 中国新闻网：《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称欧盟涉乌克兰政策错误》，2014年3月10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3-10/5932713.shtml>

在联合国协定问题上越来越强硬的态度，这些并非当时德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2. 德外交上对俄的疑虑和戒心

虽然有这样的特殊背景，但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俄外交政策趋向并非短期内形成的。尽管俄罗斯和德国在经济、地理、资源、历史和人文层面上都具有高度互补的特性，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而言，德俄关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现任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在2013年12月曾谈道：“德国在解决国际争端的时候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此外，由于地缘关系，欧洲有义务、也有责任与俄罗斯保持和谐理智的伙伴关系。”^⑧但普京在任期间的俄罗斯缺乏西方国家所看重的“民主”属性，普京外交上秉承现实主义作风，手段务实而灵活，在许多事务上与德国形成合作态势，但同时也造成了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原则性^⑨，容易造成德国的疑虑。

此外，俄罗斯对前苏联地区的认知与德国存在根本不同，俄一直认为自己在这一地区有特殊利益，德对之却不愿承认。针对乌克兰危机，德总理默克尔在2013年11月18日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乌克兰有权自己决定同欧盟的关系，第三方无权干预。她还强调，欧盟东部伙伴国及其与欧盟双边关系发展并非针对俄罗斯。欧盟东部伙伴国经济现代化，俄罗斯也会从中受益^⑩。但俄罗斯却

不这么看。2014年3月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电视演讲，就克里米亚问题阐述俄方立场时说：“我们明白，（西方的）这些行为是指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指向欧亚的融合。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骗，别人在我们背后替我们做决定，留给我们的都是既成的事实。这在北约东扩时发生过，在他们把军事设施放在我们边境边上时也发生过，西方一直向我们保证：‘喏，这跟你们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得好轻巧！”^⑪

普京的言论确实有据可依。尽管德国一再强调欧盟东扩是为了实现欧洲地区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是为了帮助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是为了欧洲统一价值观的实现，但事实上德国政府未对俄罗斯放松戒心。德国前总理施密特2014年3月26日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乌克兰局势目前是很危险的，因为西方国家被激烈情绪所主导，坚信俄罗斯会进一步进攻东乌克兰，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⑫德国《明镜周刊》专栏作家奥格施泰因也于2014年3月25日撰文指出，德国对俄罗斯存在错误的认识，认为俄的扩张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总统高克均生活在前东德，对俄罗斯多少有天然的疑虑和戒心，在实施对俄政策时，德国更多将俄罗斯和普京设想成地缘上的安全威胁，奥格施泰因认为，这是德国和欧盟需要不断东扩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而欧盟的不断紧逼令俄罗斯倍感“被包围”，对

⑧ Russland Heute: „Außenminister Steinmeier: eine Chance für Russland?“ http://russland-heute.de/politik/2013/12/17/aussenminister_steinmeier_eine_chance_fuer_russland_27353.html, 2013.12.17.

⑨ 曹阳：《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从普京到“梅普组合”》，载《东北亚论坛》，2010年9月，第19卷，第5期，第39页。

⑩ 人民网国际新闻版：《默克尔说俄罗斯不应阻碍乌克兰接近欧盟》，<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1119/c157278-23592862.html>, 2013.11.19.

⑪ 普京演讲全文见：http://www.xilu.com/special_pujingyanjiangquanwen.html。

⑫ 《时代》周报在线：Helmut Schmidt hat Verständnis für Putins Krim-Politik, unter: www.zeit.de/politik/2014-03/schmidt-krim-putin, 26.03.2014.

乌克兰事件的强烈反弹不过是数年来俄罗斯被西方不断挤压战略空间的最终爆发^⑬。

3. 德俄在地缘层面上的“安全困境”

虽然德国政界也有“亲俄派”和“反俄派”之争，但总体而言，德国政府认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是不可信任的。默克尔始终强调德国外交的“价值观导向”，其中包括作为“后民族国家时代”产物的欧盟，而俄罗斯则欠缺与欧盟相同的民主观念和价值观平台，甚至认为普京一直停留在“民族国家时代”的冷战思维之中。2008年的格俄冲突，2006—2009年期间三次俄乌“斗气”，以及每一次欧盟和北约东扩所引发的俄美欧博弈，都说明了德俄之间存在缺少互信的“安全困境”问题。

普京上任之后，俄罗斯综合国力有了长足发展，“能源外交”手段频频奏效，俄罗斯挺直腰杆，不再盲目追寻西方认同，转而走上发展欧亚一体化的独特俄罗斯外交战略。这样的定位导致俄罗斯与欧美在东欧地区频频发生矛盾和碰撞，普京的外交风格也愈趋强硬，这引发西方的不安。在缺乏双边互信的基础上，德国将俄罗斯释放的这种信号看作对自身安全的某种威胁，欧洲一体化的“脚踏车”理论也认定欧盟深化和扩大是

一个“不进则退”的过程，这导致德国在促进欧盟往东扩张的过程中未充分考虑俄罗斯安全诉求，忽视了俄在“传统缓冲区”上的战略诉求。

俄罗斯对欧盟东扩一直“展现出极大的忍耐”^⑭，但这种忍耐在乌克兰事件中到了尽头，普京在演讲中说：“他们很清楚，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在克里米亚都住着上百万俄罗斯人。这些人是多么地没有政治预见和分寸感才会如此不顾后果地行动啊！俄罗斯现在退到了无路可退的边缘，就像一根弹簧被压到底，它是会猛烈地弹起来的。”^⑮而面临经济崩溃危险的乌克兰无法承受“非此即彼”的最后通牒，最终亚努科维奇拒绝签字。

乌克兰危机是德俄“安全困境”的阶段性体现。克里米亚公投更是引发德国对俄的恐惧心理，“下一步就是东乌克兰”的言论比比皆是^⑯。结合2008年格鲁吉亚的奥塞梯危机，不少德国人担心这将成为俄罗斯在东欧地带的一种固定模式：以保护东欧各国领土上的俄罗斯人为由可以随时出兵^⑰。虽然俄罗斯一再表示对乌克兰没有兴趣，俄外长拉夫罗夫在3月29日表示俄罗斯没打算、也没兴趣越过乌克兰边境^⑱。普京则在上文提到的演讲中称：“乌克兰朋友们，不要相信那些用俄罗斯来吓唬你们的人，他们宣称，在克

⑬ 《明镜周刊》在线：Jakob Augstein: Putin und die Ukraine-Krise: Das falsche Feindbild, unter: 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augstin-kolumne-putin-und-der-westen-in-der-krim-krise-a-960354.html, 25.03.2014.

⑭ 这句话是德国社民党一位俄罗斯研究专家2012年欧盟议会说的，转引自：《明镜周刊》在线：Augstein, Jakob: Putin und die Ukraine-Krise: Das falsche Feindbild, unter: 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augstin-kolumne-putin-und-der-westen-in-der-krim-krise-a-960354.html, 25.03.2014.

⑮ 普京演讲全文见：http://www.xilu.com/special_pujingyanjiangquanwen.html。

⑯ 德国《每日新闻》在线：Das wird Putin nicht stoppen, unter: www.tagesschau.de/ausland/ukraine-interview-posth100.html.

⑰ 德国《每日新闻》在线：Das wird Putin nicht stoppen, unter: www.tagesschau.de/ausland/ukraine-interview-posth100.html.

⑱ 搜狐军事：《俄外长：俄罗斯没打算越过乌克兰边境》，见 <http://mil.sohu.com/20140330/n397439813.shtml>，2014年3月30日。

里米亚之后还会有其他地区被俄罗斯割占。我们不想看到乌克兰的分裂，我们不需要。”但德国政界一度措辞强硬，女国防部长冯德莱恩3月25日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北约应在其“外部边境”上展示出更多“存在感”^{①9}，默克尔在3月20日的政府报告中则强调应立即在欧盟框架下对俄罗斯实行制裁，因为克里米亚公投“有违人权、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违背了乌克兰宪法”，“损害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俄罗斯在所有国际组织中将被进一步孤立”^{②0}。

在欧盟春季峰会上，28国领导人于3月6日达成对俄实行三阶段制裁举措。第一阶段为立即停止与俄之间有关开放对俄罗斯人签证和签署经济协定的谈判；第二阶段制裁包括禁止高官入境、冻结资产、取消6月份欧盟与俄罗斯峰会；第三阶段制裁包含广泛的实质性经济制裁。3月21日宣布实施第二阶段制裁，而第三阶段制裁即真正的经济制裁是否实施，在德国国内有很大争论，德国政府一再表示可能实施，经济界虽也有人表态支持政府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如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格里洛3月14日在慕尼黑参加经济界与默克尔的高层谈话时表示制裁当然会导致两败俱伤，但公民权利更为重要。不过反对实行对俄经济制裁的呼声逐渐升高，包括最大的能源电力集团伊昂公司总裁等在内，认为对俄制裁对德及欧盟刚刚复苏的经济形势十分不利。

德国与俄罗斯2013年贸易额达765亿欧元，其中俄向德出口405亿欧元，德向俄出口360亿欧元。有6200家德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投资总额达200亿欧元，比欧盟其他

国家在俄企业的总和还多，德国有近40万个工作岗位与此有关。2013年德国35%的天然气从俄罗斯进口；有近四成原油从俄进口。德国经济界东方委员会主席科尔德斯3月28日在接受德国《商报》访谈中明确反对实行对俄经济制裁，认为制裁一旦开始就会升级并很难终止，认为蔑视俄罗斯是个大错，俄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需大量投资、具有很大潜力。该委员会6月上旬对德在俄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37%的企业认为经济制裁会损害俄罗斯经济、33%认为会损害德国经济、21%认为也会波及乌克兰经济，47%认为经济制裁只能是最终手段，只有9%认为现在就应对俄实施经济制裁。2014年1—4月，德向乌出口减少31%，向俄出口减少14%，若情况不改变，将对德就业产生不良影响。

作为一个270亿美元国际援助协议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一个140亿到180亿美元贷款项目，要求该国实施经济改革以帮助经济走上正轨。欧盟也加大对乌的财政援助，不过由于俄罗斯大大提高输送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对乌援助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转而落入俄罗斯之手。乌克兰无力承担此价格而宣布暂停进口俄天然气，国内物价上涨更导致矛盾激化，形成糟糕的怪圈。

第68届联合国大会3月27日就乌克兰、德国等国起草的题为《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该决议申明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确认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及其南部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市3月16日“脱乌入俄”全民公投无效，同时敦促各方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危

^{①9} 《明镜周刊》在线：Augstein, Jakob: Putin und die Ukraine-Krise: Das falsche Feindbild, unter: 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augstin-kolumne-putin-und-der-westen-in-der-krim-krise-a-960354.html, 25.03.2014.

^{②0} 默克尔3月20日政府报告全文。德国政府官网：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03/2014-03-20-regierungserklaerung.html.

机。该决议草案以 100 票赞成、11 票反对和 58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不过联合国大会决议只有象征意义，而没有法律效力。

三、乌克兰危机中德国外交政策走向

1. 近期前景：德国坚持制裁，乌克兰继续动荡

欧盟委员会的决议、德国政府的强烈态度以及普京演讲都说明在一段时间里乌克兰危机将会继续升级，直至进入双方胶着状态。这虽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取向——经济制裁对德俄都是把双刃剑，乌持续动荡对双方地缘安全诉求都不利——但德国的“价值观”导向及埋藏已久的“安全困境”和彼此不信在此次强烈爆发之后很难一步过渡到平息事态的阶段。同时，德国和欧盟还抱着迅速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稳定乌局势、加强法治国家和民主进程建设，从而彻底将乌克兰拉入欧盟框架内，共同对抗俄罗斯的美好设想^①。而俄罗斯方面虽一再强调没有越过乌边境的打算，但如果欧盟持续对俄和克里米亚进行制裁，并大张旗鼓拉乌抗俄，乌克兰政府加大对东部分离势力的军事打击，则难保普京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德国舆论普遍认为俄是在通过武力手段阻止欧盟这个“文明力量”的扩大，是倒退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上半叶列强争雄的局面，因此严词抨击普京在实施“强权政策”、“战争政策”、妄图修改二战后 70 年的版图，并哀叹冷战结束 25 年来欧洲的和平局面和秩序付之东流，甚至有些人把普京和希特勒相提并论，连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曾把俄“吞并”克里米亚与希特勒吞并捷克苏台德地区

相比，而默克尔总理则明确反对做这种比较。但德国舆论也普遍承认西方对普京的所作所为无能为力、十分无奈，只能在口头上强硬，实际上不可能有太多作为，包括若实行经济制裁则对欧盟的伤害要大于对俄罗斯的伤害。客观上看，普京行动上的强硬与欧盟及美国行动上的软弱确实形成很大反差。有德国学者甚至预言，普京很可能赢得 2018 年大选，这样至少可执政至 2024 年，而这个时间对于当今世界来说过于漫长。^②

虽然在 2014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举行的第 5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统、外长、国防部长都提到德国应准备“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包括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承担更多军事任务，称“历史包袱不应继续成为外交克制的理由”，不过在乌克兰危机中却多次强调绝不使用武力，而且明确反对美国的动武舆论。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默克尔总理多次和普京总统通电话紧急磋商，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她在电话中敦促俄方放弃支持克里米亚独立这种“违反国际法”、“破坏领土完整”的举动。她 3 月 13 日发表政府声明中批评俄“强者的权力取代了正义的力量，单方面地缘政治利益压倒了谅解和合作”；同时强调欧盟不会对俄动武，“军事行动绝不是我们的选项”。女国防部长冯德莱恩在 4 月 9 日接受《图片报》访谈时也表示绝不考虑军事手段，而且乌克兰加入北约目前也不符合条件，所以不是当前议题。

欧盟于 2009 年在“欧盟睦邻政策”框架内建立了“东部伙伴关系”计划，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联系，包括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

^① 默克尔 3 月 20 日政府报告全文。德国政府官网：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4/03/2014-03-20-regierungserklaerung.html。

^② <https://zeitschrift-ip.dgap.org/de/ip-die-zeitschrift/archiv/jahrgang-2014/maerz-april/>; 18.03.2014

而乌克兰是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地缘因素，德国是该计划的积极推动者。但此次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该计划陷入困境。创立于2001年、用于促进德俄两国公民社会交往并开展一系列活动的“圣彼得堡对话论坛”活动目前也处于停顿状态。

2. 中期前景：德国制裁应放缓，采取其他措施解决乌克兰危机

鉴于乌克兰军事力量与俄罗斯差距太大，欧洲也不愿看到事态往武力方向发展，不过乌克兰已陷入内战边缘。但经济制裁不符合三方利益。欧洲经济和能源都对俄罗斯有较强依赖性，而乌克兰如果完全得罪俄罗斯的话，经济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虽然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乌克兰的10亿美金援助，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还在欧债危机余波影响下的欧盟也无力在经济上对乌做出较大支持。乌克兰的重要经济区域位于东部，那里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大部分居民都说俄语、信奉东正教。一旦与俄罗斯彻底决裂，乌克兰国内动荡形势加剧，签署联系国协定后只会成为欧盟的拖累。

目前德国前总理科尔、施罗德，以及媒体、学界都对德国和欧盟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了担忧和告诫。有学者认为，德国不应逼得俄罗斯太紧，而应通过欧安组织派出观察员，以斡旋者的身份促使俄乌坐下来好好谈判，使乌克兰局势尽早稳定下来，继而解决欧俄在此事上的矛盾和分歧，联系国协定谈判可从长再议，这才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理智解决途径^{②③}。

3. 远期前景：德俄“安全困境”很难找到出路

乌克兰危机演变到今日非一日之寒。普京第二次登上俄罗斯总统宝座之后的种种行为都令西方国家坐立难安。西方首脑对普京早已不满，乌克兰危机更使双方矛盾彻底摆上台面。德国和俄罗斯互指对方以“冷战思维”行事；希拉里曾称普京为“希特勒”；索契冬奥会上，西方首脑更是几乎全未现身。相反，克里米亚事件使普京在国内威望大增，民调支持率达到近年来最高，80%以上的俄罗斯人认为即使伤害俄罗斯与西方各国关系也应保护克里米亚。双方在国际事务上的认知差异达到巅峰。这种局面在普京下台之前很难有所改善。

值得指出的是，欧美在此次与俄罗斯的争端中关系拉近，默克尔强调应进一步加快美欧自贸区谈判。此外，欧美俄的矛盾尖锐化导致双方都有向中国靠拢的倾向。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时，德国总统高克就中国在联合国就乌克兰事件表决时投弃权票一事指出，中国应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②④}。而普京在演讲中则称“我们感激中国，中国领导人从历史和政治角度全面地考虑了克里米亚局势”。经济制裁的双刃剑效果也可能使双方向中国寻求新的合作契机。

德国是俄罗斯在欧盟中最重要的伙伴，而此次也成为欧盟与俄冲突的领头羊，尽管德国力图避免与俄冲突进一步升级，原定于4月底在莱比锡举行的第15届德俄政府磋商已无限期推迟，这对德俄关系显然是雪上加霜。几年来，德国努力改善与俄关系，希望与俄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但照目前发展

②③ 德国《每日新闻》在线：Das wird Putin nicht stoppen, unter: www.tagesschau.de/ausland/ukraine-interview-posth100.html.

②④ 《时代》周报在线：Gauck und die Menschenrechte in China, unter: www.zeit.de/politik/ausland/2014-03/China-Deutschland-Gauck-Fuenf-vor-Acht, 26.03.2014.

态势，过去几年德国及欧盟对俄外交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将付诸东流。乌克兰危机也使德国国内形势复杂化，并将德国及欧盟带入某种混乱。

在签署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定问题上，德国及欧盟从一开始就未充分重视甚至漠视俄罗斯的感受并低估其可能的反应，也未充分重视和低估了乌克兰国内两大族群的不同诉求，甚至认为欧洲不再存在任何领土争端。假若能预先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欧盟就不会急于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德国舆论

也承认当初在签署联系国协定时没人想到会有日后局势的发展，特别是俄“吞并”克里米亚之举。德国及欧盟虽有其制度及价值观方面的优势，但本应充分考虑其他国家接受程度，而不应急于求成，片面指责俄罗斯显然无济于事。这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和欧俄矛盾激化德国及欧盟方面所应汲取的深刻教训。目前乌克兰国内局势仍不稳定，亲俄和亲欧两大势力的矛盾仍在加剧，如何应对乌克兰复杂的局势和不确定的前景对德国、欧盟及国际社会都是巨大的挑战。

作者简介：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微，北京科技大学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Die Ukraine-Krise und di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Von Michael Staack

1. Einleitung

Innerhalb weniger Wochen hat sich aus der Krise in der und über die Ukraine eine der größten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dnung nach dem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entwickelt. Diese Krise verfügt über das Potenzial, sehr viel oder sogar alles zu zerstören, was in den vergangenen 24 Jahren an Strukturen kooperativer Sicherheit für Europa aufgebaut worden ist und könnte außerdem zu einer neuen Spaltung des Kontinents, zu einer dauerhaften Konfrontation zwisch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der NATO und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führen. Aus dem Streit über die außen- und innenpolitische Orientierung eines in den letzten zwei Jahrzehnten außergewöhnlich schlecht regierten Landes ist längst ein geopolitischer Konflikt mit internationalen Auswirkungen geworden.

In diesem Aufsatz wird die These vertreten, dass sich die außenpolitische Dimension der Ukraine-Krise direkt aus dem ungelösten konzeptionellen Konflikt zwischen gesamteuropäisch und teileuropäisch organisierter Sicherheit

ergibt. Der ursprüngliche Versuch, nach 1989/90 ein gesamteuropäisches Sicherheitssystem auf der Grundlage der KSZE zu schaffen, wurde als Ergebnis westlicher Politik seit 1993/94 durch die Osterweiterung des Militärbündnisses NATO ersetzt, also durch die teileuropäische Erweiterung einer teileuropäischen Organisation unter Ausklammerung Russlands. Spätestens zu dem Zeitpunkt, als sich die NATO auch für ehemalige Teilrepubliken der Sowjetunion öffnete (die baltischen Staaten ausgenommen), setzte eine Integrationskonkurrenz zwischen der NATO und Russland ein. Diese Integrationskonkurrenz wurde seit 2007, der Etablierung der „Östlichen Partnerschaft“ der EU, auf die Beziehung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usgedehnt.

Ein mit dem Konzept gesamteuropäischer Sicherheit vereinbarer Ausweg aus dieser Integrationskonkurrenz kann nur erreicht werden, wenn (1) der außenpolitische Status der Ukraine einvernehmlich definiert und (2) Russland, wie in den 1990er Jahren versprochen, als gleichberechtigter Partner insbesondere der

NATO anerkannt wird. Das setzt sowohl eine Änderung der westlichen als auch der russischen Politik voraus. Während der Westen nicht umhin kommen wird,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als Partner mit legitimen eigenen Interessen zu respektieren, muss Russland zur Achtung grundlegender internationaler Verhaltensstandards wie des Völkerrechts, insbesondere der territorialen Integrität der Staaten, zurückkehren. Falls eine am Primat gesamteuropäischer Sicherheit ausgerichtete Lösung nicht gelingt und der teileuropäische Lösungsansatz weiter dominiert, droht die Verfestigung einer spannungsgeladenen Konfliktkonstellation, aus der sich jederzeit neue, gefährliche Krisen entwickeln können. Weitergehende Lösungsoptionen können erst realisiert werden, wenn die russische Führung ihre Destabilisierungsstrategie beendet.

Nachfolgend soll zunächst ein kurzer analytischer Blick auf die Prozesse geworfen werden, die zur Eskalation der Ukraine-Krise führten. Anschließend werden die unterschiedlichen Interessen Russlands, der USA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besonders Deutschlands, in Bezug auf die Ukraine und di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 erörtert. Dem schließt sich eine Zusammenstellung denkbarer Lösungsansätze an, deren Tauglichkeit am Konzept einer gesamteuropäischen Sicherheitsordnung gemessen werden sollen.

2. Die Eskalation der Krise

Innerhalb von wenigen Monaten, zwischen November 2013 und Februar 2014, ist aus einem innenpolitischen Konflikt eine internationale Krise geworden. Die nach langem Abwägen- oder Zögern – getroffene Entscheidung Präsident

Janukowitschs, das Abkommen über eine Assoziierung der Ukraine mit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nicht unterzeichnen zu wollen (November 2013), löste Demonstrationen vornehmlich in Kiew und in den westlichen Landesteilen aus, bei denen auch der Maidan-Platz im Zentrum der Hauptstadt von den Demonstranten dauerhaft okkupiert wurde. Waren die Proteste anfangs eindeutig pro-europäisch und auch pro-demokratisch orientiert, trat spätestens seit der Jahreswende 2013/14 die Forderung nach einem Rücktritt Janukowitschs und seiner Regierung in den Vordergrund. Im Zuge dieser Entwicklung gewannen politische Kräfte wie der „Rechte Sektor“ und andere nationalistische oder sogar faschistische Gruppen an Bedeutung, die eine Annäherung an die Europäische Union und „westliche Werte“ ablehnen und auf den notfalls gewaltsamen Sturz der Regierung abzielten. Rückblickend betrachtet, erwies sich das „Krisenmanagement“ Präsident Janukowitschs und seiner Regierung als katastrophal. Angebote zum Dialog kamen zu spät und waren wenig glaubwürdig und selbst der verzweifelte Versuch, den Maidan in Kiew Mitte Februar 2014 durch Sondereinsatzkräfte räumen zu lassen, geriet zu einem Fiasko mit über 100 Toten. Die genaue Verantwortlichkeit von staatlichen Sicherheitskräften und/oder rechtsgerichteten Gewaltakteuren für diese Todesopfer muss angesichts unterschiedlicher Sachdarstellungen noch objektiv untersucht und bewertet werden. Politisch war es zweifellos richtig, dass die Außenminister der drei EU-Staate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Großbritannien direkt im Anschluss an diese Gewaltexzesse gemeinsam in die Ukraine reisten, um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russischen Sonderbotschafter Lukin einen

Weg aus einer Krise zu finden, zu deren Lösung die innenpolitischen Kontrahenten offenkundig nicht in der Lage waren.

Tatsächlich gelang es dieser „3+1“-Gruppe, die ukrainische Regierung und die parlamentarische Opposition an einen Tisch zu bringen und ein Ergebnis zu vermitteln: vorgezogene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noch 2014, den Rücktritt der Regierung, einen nationalen Dialog über notwendige Reformen einschließlich einer Verfassungsreform (20. Februar 2014). Diese Vereinbarungen wurden innerhalb von 24 Stunden zur Makulatur, weil die Protestierenden auf dem Maidan die Ergebnisse nicht akzeptierten und deren gewaltbereiter, rechtsgerichteter Teil mit der Erstürmung des Präsidenten- und Regierungssitzes drohte. In dieser Situation floh Janukowitsch auf abenteuerliche Weise aus dem Land, dessen demokratisch gewählter Präsident er immer noch war. Auch die Gründe und Umstände dieser Flucht bedürfen noch der genauen Aufklärung. Die Vermutung liegt nahe, dass der Präsident sich nicht mehr auf die Unterstützung seiner eigenen Sicherheitskräfte verlassen konnte (oder wollte). Jedenfalls definierte die Flucht Janukowitschs die politische Konstellation völlig neu. Erst sein peinliches Verschwinden, nicht eine Intervention westlicher Staaten, machte den nachfolgenden politischen Umsturz in Kiew möglich.

Nachdem die Hälfte der bisherigen Regierungspartei der Regionen zur Opposition übergelaufen war, wurde Janukowitschs Abwahl ebenso möglich wie die Einsetzung des Übergangspräsidenten Turtschinow und des interimist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Jazenjuk. Die neue Regierung stützte sich lediglich auf die „Vaterlandspartei“ der früheren Minister-

präsidentin Julia Timoschenko und die nationalistische „Swoboda“-Partei sowie den „Rechten Sektor“. Die pro-europäische „Udar“-Partei um den früheren Boxweltmeister Klitschko trat dem Kabinett nicht bei. Zu den ersten, wenig später eiligst zurückgenommenen Entscheidungen der neuen Machthaber gehörte die Aufhebung eines Gesetzes, mit dem die Russische als zweite Staatssprache eingeführt worden war. Von Anfang an fehlte der neuen Regierung offensichtlich die strategische Einsicht, dass sie sich nicht nur auf den Westen des gespaltenen Landes stützen konnte, sondern auch um den Osten bemühen musste. Gestützt auf einen politischen Umsturz mit zweifelhafter verfassungsrechtlicher Basis, massenhafte parlamentarische Überläufer und ohne echtes demokratisches Mandat, war und ist die rechtliche Legitimation der Übergangsregierung schwach. Das gilt ebenso für ihre politische Legitimation: das Führungspersonal kommt eher aus der zweiten Reihe und die Ostukraine ist kaum vertreten. Hinzu kommt, dass Selbstbereicherung, Korruption, Miss- und Vetternwirtschaft die gerade erst vier Jahre zurückliegende Amtszeit der ehemaligen Ministerpräsidentin Timoschenko, deren Vaterlandspartei die Übergangsregierung bestimmt, fast ebenso stark kennzeichneten wie dann unter Janukowitsch und seiner Gefolgschaft. Die Erinnerung daran ist in der Ukraine präsent geblieben.

Mit der Abspaltung der Halbinsel Krim von der Ukraine und der nachfolgenden Eingliederung in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wurde aus dem innen- nunmehr definitiv ein außenpolitischer Konflikt. Die Motive der russischen Führung unter Präsident Putin, diesen Prozess zu forcieren, werden im nächsten Abschnitt

behandelt. Ist die Sezession der Krim, wie in Russland behauptet, vergleichbar mit der Sezession und späteren Unabhängigkeit Kosovos? Vor allem drei Argumente sprechen gegen eine Parallelisierung mit dem Kosovo-Konflikt: (1) Den Sezessionsbestrebungen im Kosovo waren mehrjährige, immer stärker auch gewaltförmige Repressionen Serbiens gegen die Bürger dieses autonome Gebiets vorangegangen. Von einer Repression der Krim-Bevölkerung bzw. ihrer russischsprachigen Mehrheit durch die neue ukrainische Zentralregierung konnte hingegen nicht die Rede sein. (2) Der Entscheidung der NATO zum militärischen Eingreifen im Kosovo gingen intensive diplomatische Bemühungen für eine friedliche Lösung der Krise voraus. Eine solche internationale Diplomatie mit dem Ziel einer Garantie der Rechte der Krim-Bevölkerung fand nicht statt. Der diplomatische Weg wurde von Russland und der Krim-Regierung gar nicht erst beschritten. (3) Im Kosovo gab es stets eine in freien Wahlen artikulierte Mehrheit für die Autonomie. Die Entscheidungsprozesse auf der Krim wurden aber überschattet durch die Verlegung regulärer russischer Truppen auf die Halbinsel. Damit waren vollendete Tatsachen geschaffen. Viele Gründe sprechen dafür, dass sich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Krim-Bevölkerung auch bei einem längerfristig vorbereiteten, international – z.B. durch die Vereinten Nationen – überwachten Referendum für den Beitritt zu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entschieden hätte. Das Völkerrecht kennt aber kein Recht zur einseitigen Abtrennung von einem Staat gegen den Willen dieses Staates. Die Anerkennung eines solchen Sezessionsrechts hätte weitreichende und tiefgreifende Konflikte in vielen Teilen der Welt, auch in Russland (Kaukasus/Tschetschenien),

zur Folge. Deshalb bleibt das Eingreifen der NATO im Kosovo ohne vorherige Zustimmung der Vereinten Nationen, also völkerrechtswidrig, rechtlich gesehen ein Regelbruch, der keine neue Regel begründet hat. Die Berufung Russlands auf diesen Regelbruch beim Georgien-Konflikt 2008 und in der Krim-Krise 2014 zeigt, welche unerwünschten Folgewirkungen ein solcher Regelbruch nach sich ziehen kann. Eine Legitimationsgrundlage wurde dadurch nicht geschaffen.

Nach vollendeter Aufnahme der Krim-Republik in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antworteten die USA un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mit zunächst moderaten Sanktionen gegen Russland. Der Weg zu einer Verhandlungslösung sollte offen gehalten werden. Die Besetzung von Regierungsgebäuden in der Ostukraine durch bewaffnete Separatisten führte zu einer militärischen „Anti-Terror-Operation“ der Kiewer Übergangsregierung gegen Teile der eigenen Bevölkerung, ohne dass zuvor ein ernsthafter Dialog versucht worden wäre. Der Westen nahm dieses Vorgehen anfangs stillschweigend hin oder unterstützte es sogar aktiv, wie die USA. Der Konflikt in der Ukraine befindet sich in einer Eskalationsspirale, zu der vor allem Russland, aber auch die ukrainische Übergangsregierung beitragen.

Aus der Analyse dieser Entwicklungen der letzten Monate ergeben sich vier Schlussfolgerungen:

- (1) Die Eingliederung der Krim-Halbinsel in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stellt einen Verstoß gegen das Völkerrecht dar, insbesondere gegen das Prinzip der territorialen Integrität von Staaten. Damit und mit seiner gesamten Politik gegenüber der Ukraine seit dem

Umsturz Ende Februar 2014 bis hin zur gewaltsamen Einmischung in die inneren Angelegenheiten des Nachbarlandes hat Russland aber auch gegen den ungeschriebenen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verstoßen, der das Staatenverhalten in einem multipolaren und multilateral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 leiten sollte.

- (2) Die Europäische Union hat ihre Politik gegenüber der Ukraine bis weit in die Krise hinein als eine „technische Angelegenheit“ betrieben, vergleichbar etwa mit der Aushandlung eines Assoziierungsabkommens mit Island. Es ist völlig unverständlich, dass die Ukraine-Politik nicht früher, entschlossener und differenzierter als hochpolitische Frage mit großem Eskalationspotenzial wahrgenommen worden ist. Nach den Erfahrungen der letzten Jahre, insbesondere den umkämpften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2004 und 2010, musste jedem sachkundigen Beobachter klar sein, dass der Versuch, das politisch zwischen West- und Ost-Orientierung zutiefst gesplante Land einseitig festlegen zu wollen, nur mit einer Krise enden konnte. Nachdem die Europäische Union 2011 vom „Arabischen Frühling“ überrascht wurde, erwies sie sich in ihrer Politik gegenüber der Ukraine zum zweiten Mal innerhalb kurzer Zeit als ein unzureichend informierter, nur bedingt strategiefähiger Akteur selbst in der unmittelbaren Nachbarschaft.
- (3) Die EU und ihre Mitgliedsstaaten haben die russischen Interessen gegenüber der Ukraine entweder falsch eingeschätzt

oder nicht ernst genommen bzw. ignoriert. Ebenso falsch eingeschätzt haben sie den bis zum Winter/Frühjahr 2014 erreichten Grad der russischen Frustration in Bezug auf die westlichen Politikstrategien und die Interessenswahrnehmung in der Welt. Russland betrachtet inzwischen nicht nur die USA und die NATO, sondern auch die EU als geopolitischen Rivalen und möglichen Gegner. Eine informiertere Politik hätte wesentlich zu einem rechtzeitig einsetzenden Krisenmanagement beitragen können.

- (4) Dieses Krisenmanagement hat zwar nicht völlig versagt, sich aber als äußerst begrenzt wirksam erwiesen. Nach dem Georgien-Konflikt wurde ein zweites Mal deutlich, dass die Mechanismen zur Krisenfrüherkennung und zum Krisenmanagement mit bzw. gegenüber Russland gerade in Krisen nicht funktionieren. Die NATO demonstrierte erneut, dass für sie der Dialog mit Russland offenbar lediglich eine nicht krisenfeste Schönwetterveranstaltung darstellt. Das Krisenmanagement von EU und NATO bedarf folglich dringender Überprüfung. Außerdem wäre es zielführend gewesen, die gesamteuropäische OSZE nicht erst nach erfolgter Eskalation, sondern schon im Vorstadium entschlossener zum Zweck des Krisenmanagements zu einzuschalten.

3. Die Interessen Russlands, der USA,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d Deutschlands

Seit der Auflösung der Sowjetunion betrachtet Russland die Ukraine als ein „Brudervolk“; mit dem großen Nachbarn sprachlich, kulturell und historisch eng verknüpft.

Außerdem sieht es das Land als Teil seiner geopolitischen Einflussphäre an und perzipiert Bestrebungen zur Integration der Ukraine in die NATO und die EU als Bedrohung seiner sicherheits- und wirtschaftspolitischen Kerninteressen. Ein zentrales Ziel der Politik von Präsident Putin in den letzten Jahren war die Einbindung der Ukraine in sein Projekt einer „Eurasischen Union“ und damit die Verankerung einer möglichst irreversiblen Russland-Bindung des Landes. Um dieses Ziel zu erreichen, bediente sich Putin einer Kombination von Anreizen zur Kooperation und Drohungen bei deren Nichtbefolgung. Sein Verhältnis zum seit 2010 amtierenden Präsidenten Janukowitsch war keineswegs durch freundschaftliche Zusammenarbeit bestimmt, sondern durch eine Mischung aus Unterstützung und - auch öffentlich geäußert - Herablassung. Russland hat die Ukraine nicht als gleichberechtigt behandelt und die starken pro-europäischen Stimmungen im Westteil des Landes nicht hinreichend berücksichtigt.

Durch die anwachsenden Demonstrationen gegen die Janukowitsch-Regierung, durch dessen hilfloses Krisenmanagement und erst recht durch den politischen Umsturz in Kiew sah sich Russland mit der – aus seiner Sicht – offensichtlichen Gefahr eines sehr weitgehenden Kontrollverlusts konfrontiert, zumal von der Übergangsregierung kaum positive Signale für den Willen zur Zusammenarbeit nicht nur mit dem Westen, sondern auch mit Russland ausgingen. Mit seiner Unterstützung für die Abspaltung der Krim und des ostukrainischen Separatismus entschied sich Putin für eine Destabilisierungsstrategie, um Russland die strategisch wichtige Schwarzmeer-Halbinsel

auf Dauer und zu sichern und nach Möglichkeit auch veränderte politische Machtverhältnisse in Kiew herbeizuführen. Angesichts der absehbaren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Folgeschäden für die Russische Föderation kann diese Strategie als eher defensiv interpretiert werden. Der russischen Führung ist bewusst, dass es für längere Zeit keine pro-russische Regierung in der Ukraine mehr geben wird. In einer deutlich zu seinen Ungunsten veränderten Konstellation sicherte sich Russland das politisch und territorial Erreichbare. Diese Feststellung soll das russische Vorgehen ebenso wenig rechtfertigen wie die Unterstützung Präsident Putins durch eine große Mehrheit seiner Bevölkerung. Richtig bleibt, dass Putin bei einer Hinnahme des Umsturzes in der Ukraine seine innenpolitischen Leadership-Qualitäten als Architekt eines wieder erstarkten Russlands eingeübt hätte.

Den Entscheidungen in der Ukraine-Krise vorausgegangen war eine seit 2007 zu beobachtende Abwendung Russlands vom Westen. Dabei hatte Präsident Putin ebenso wie sein Vorgänger Jelzin in den ersten Jahren nach Amtsantritt ganz auf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m Westen gesetzt, insbesondere mit Deutschland und mit den USA. Die Erwartungshaltungen und konkreten Zielsetzungen beider Seiten erwiesen sich aber als nur sehr bedingt vereinbar. Erschwerend kam hinzu, dass Putin die Arbeitsmöglichkeiten für die Opposition i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immer weiter einschränkte und sich die Wertedifferenz zum Westen vertiefte. Aus russischer Sicht war der Westen, vor allem die USA, zu wenig bereit, russische Sicherheitsinteressen zu respektieren und zeigte außerdem wenig Achtung vor dem Völkerrecht, dessen

traditionelle, souveränitätsorientierte Interpretation Russland vertritt wie kaum ein anderer Staat. In seiner Rede zur Eingliederung der Krim hat Präsident Putin die lange Liste der Konfliktgegenstände nochmals benannt: Kosovo-Krieg 1999, Unabhängigkeit Kosovos 2007, Aufbau eines Raketenabwehrschildes der USA in Europa ohne bzw. gegen Russland, NATO-Osterweiterung, Überdehnung des VN-Mandats bei der Libyen-Intervention 2011, unilaterale Interventionsdrohungen gegen Syrien 2013. Vor diesem Hintergrund wurde der Umsturz in Kiew als eine westlich gesteuerte Inszenierung interpretiert. Ohne die Zuspitzung der Ukraine-Krise hätte sich die russische Führung wahrscheinlich nicht so konfrontativ gegen den Westen gewandt. In der konkreten Entscheidungssituation räumte Putin geopolitischer Großmachtstrategie und nationalem Prestige dann Vorrang vor der unbeeinträchtigten Aufrechterhaltung vor allem der wirtschaftlichen Verflechtung mit Europa ein. Objektiv schadet sich Russland damit selbst, denn es gefährdet nicht nur seine auf Energieexport beruhende ökonomische Basis, sondern schränkt auch seine außenpolitischen Partnerschafts- und Handlungsoptionen stark ein. Daher liegt es durchaus im Interesse Russlands, einen Ausweg aus der Konfrontation über die Ukraine zu finden.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haben die Ukraine-Krise nicht herbeigeführt, aber sie nach Kräften zur Erreichung ihrer geopolitischen Zielsetzungen genutzt. Seit der Administration George W. Bush ist es das erklärte Ziel US-amerikanischer Politik, die Ukraine in die NATO zu holen und die geopolitische Konstellation in Eurasien durch nochmalige Ostverschiebung des Westens entscheidend zu verändern.

Präsident Obama hatte diese Zielsetzung vorübergehend zurückgestellt, um einen „New Start“ mit Russland zu ermöglichen und das Land insbesondere als Partner für nukleare Rüstungskontrolle sowie internationales Krisenmanagement zu gewinnen. Ohnehin zunehmend frustriert über geringe russische Kompromissbereitschaft, könnte Obama nun unter dem innenpolitischen Druck der Republikaner und der Hillary Clinton-Demokraten zur Bush-Politik zurückkehren. Die Ukraine-Krise bietet für die USA eine einzigartige Chance, Russlands internationale Position zu schwächen, sich als Krisenmanager in Europa zu positionieren und das Gewicht der NATO gegenüber der EU zu stärken. Durch den Interessenseinklang zwischen den USA und der EU in der Ukraine-Krise konnte auch der tiefgreifende Vertrauensverlust als Folge der Enthüllungen von Edward Snowden über die US-amerikanische Spionagepraxis gegenüber ihren Verbündeten zumindest vorübergehend überdeckt werden. Ihrem pragmatischen Ansatz entsprechend, will die Obama-Administration sich aber auch die Option einer neuen Verständigung mit einem dann geschwächten Russland offenhalten.

In Bezug auf die Ukraine-Krise verfolgt die Europäische Union mehrere Zielsetzungen. Es geht ihr um die Erhaltung einer politisch selbständigen und territorial unversehrten Ukraine, um die Bewahrung einer kooperativen Sicherheitsordnung in Europa und damit um die Vermeidung einer neuen Spaltung des Kontinents. Nach der Eskalation der Krise ist die Union bestrebt, als einheitlicher Akteur wahrgenommen zu werden und dementsprechend mit einer Stimme zu sprechen. Damit soll vor allem der Komb-

ination von Dialogangeboten und Sanktionsdrohungen gegenüber Russland Nachdruck verliehen, aber auch ein gemeinsames Auftreten gegenüber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gewährleistet werden. Deutschland bzw. der Bundesregierung ist dabei eine Führungsrolle zugewachsen, die in enger Abstimmung besonders mit Frankreich und Polen ausgeübt wird. Ungeachtet der Einigkeit über die zentralen Zielsetzungen gibt es zwischen den EU-Mitgliedern durchaus unterschiedliche Interessen. Während die östlichen EU-Staaten, aber auch Schweden und Großbritannien, einen grundsätzlich „härteren“ Kurs gegenüber Russland befürworten, treten Deutschland, Frankreich und andere westeuropäische Staaten stärker dafür ein, alle Möglichkeiten zu nutzen, um Russland von seiner Interventionspolitik abzubringen – nicht zuletzt durch Kooperationsanreize. Auch in der Beurteilung der ukrainischen Übergangsregierung und in Bezug auf den Wert ein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mit Russland und auf eine Beitrittsperspektive der Ukraine gibt es Differenzen, die durch das aktuelle Krisenmanagement überdeckt werden.

Seit dem Ende des Ost-West-Konflikts ist das vereinte Deutschland mit der Russischen Föderation in einer strategischen Partnerschaft verbunden. Sicherheit in Europa, so ein grundlegendes Prinzip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könne nur mit Russland und nicht ohne oder gegen Russland erreicht werden. Dementsprechend setzte sich Deutschland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23 Jahren immer wieder für eine möglichst intensive Ein- und Anbindung Russlands an westliche Institutionen wie EU, NATO und G 7/8 ein, besonders auch durch eine enge NATO-Russland-Partnerschaft begleitend zur Osterweiterung des Bündnisses. Bis zur

Krim-Krise war Deutschland im Westen der wichtigste Unterstützer legitimer russischer Interessen. Umgekehrt betrachtete die jeweilige russische Führung die Bundesregierung stets als ihren wichtigsten westlichen Partner neben und gelegentlich auch vor den USA. Zentrale Grundlagen für dieses gute Verhältnis waren eine zunehmende wirtschaftliche Verflechtung, die Wertschätzung des russischen/sowjetischen Beitrags zur deutschen Vereinigung sowie die Versöhnung zwischen beiden Völkern nach den Gräuel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Obwohl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zwischen beiden Seiten unter der zweiten Präsidentschaft Putin zunahm, änderte dies nichts an den zentralen Axiomen.

Ein weiteres grundlegendes außenpolitisches Ziel Deutschlands besteht in der Gestaltung einer multipolaren internationalen Ordnung, in d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sich gegenüber den USA und China erfolgreich behaupten kann. Angestrebt wird eine möglichst enge Verflechtung mit Russland als Voraussetzung eines größeren europäischen Einflusses in der Welt. Demzufolge hat Deutschland kein irgendwie denkbare Interesse an einer neuen Spaltung Europas. Deshalb hat es – gemeinsam mit Frankreich – im Jahr 2008 sein Veto gegen eine NATO-Erweiterung um die Ukraine und Georgien eingelegt, wie sie damals von der Bush Administration mit großem Nachdruck gefordert wurde. An der Sachlogik, die diesem Veto zugrunde lag, hat sich seither nichts verändert. Die von Deutschland angestrebte multipolare Ordnung soll aber auch regelbasiert sein, gestützt auf das Völkerrecht, wirksame internationale Organisationen und Kooperationsmechanismen. Mit einer solchen regelbasierten Konzeption ist die

russische Eingliederung der Krim-Republik ebenso wenig vereinbar wie russisch unterstützte Destabilisierungsmaßnahmen in der östlichen Ukraine.

Gemessen am Verhältnis zu Russland, waren Deutschlands Beziehungen zur Ukraine immer nachrangig. Dafür war nicht allein die strategische Partnerschaft mit Moskau ausschlaggebend, sondern ebenso eine nüchterne Einschätzung des ökonomischen und politischen Entwicklungspotenzials des Landes. Seit Beginn der 1990er Jahre finanziert Deutschland eine große Beratergruppe zur Wirtschaftsreform und unterstützte Transformationsprozesse in der Ukraine auch auf vielfältige andere Weise. Im Vergleich zu den östlichen EU-Mitgliedsstaaten, aber auch zu Russland fiel die Ukraine jedoch immer weiter zurück. Ungeachtet ihrer „pro-westlichen“ oder „pro-russischen“ Orientierung zeichneten sich alle ukrainischen Regierungen seit der Unabhängigkeit durch ein hohes Maß an „bad governance“ aus, insbesondere durch Korruption und durch ein politisch wie wirtschaftlich von Oligarchen-Cliquen dominiertes System.

Seinen Interessen folgend, befindet sich Deutschland in einer doppelten Dilemma-Situation: Es muss, auch gegen widerstreitende Interessen im Westen, alles dafür tun, um eine neue Spaltung Europas zu verhindern und die Strukturen gesamteuropäischer kooperativer Sicherheit mit Russland zu erhalten. Zugleich kann es das russische Verhalten in der Ukraine-Krise nicht hinnehmen. Eine Beendigung der Destabilisierungsstrategie Russlands in Bezug auf die Ukraine ist daher die zentrale Bedingung, damit Deutschland sich für die Bewahrung des politisch Erreichten und für einen konstru-

ktiven Neuanfang im Verhältnis des Westens zu Russland einsetzen kann.

4. Wege aus der Krise

Die Ukraine-Krise wird Europa und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noch längere Zeit beschäftigen. Deshalb muss, wenn es um Lösungsperspektiven geht, zwischen kurz- und mittelfristigen Ansätzen unterschieden werden. Kurzfristig sind folgende Schritte erforderlich:

- (1) Die Ukraine benötigt eine demokratisch legitimierte Regierung. Daher sollte alles dafür getan werden, die Präsidentschaftswahlen, wie geplant, am 25. Mai 2014 im ganzen Land durchzuführen – oder, wenn das nicht machbar ist, so zügig wie möglich danach. Dem sollten sich auch Wahlen zum ukrainischen Parlament, der Rada, anschließen, deren Zusammensetzung ebenfalls nicht mehr dem Volkswillen entspricht.
- (2) Alle Konfliktparteien müssen den Einsatz von Gewalt beenden. Das gilt für die Übergangsregierung mit ihrer fehlgeleiteten „Anti-Terror-Operation“ ebenso wie für die Separatisten im Osten des Landes oder für bewaffnete nationalistische Gruppen. An die Stelle der Gewalt muss ein „nationaler Dialog“ auf gesamtukrainischer Ebene treten, der sich insbesondere mit einer Verfassungsreform und einer Stärkung der regionalen Autonomie befassen sollte. An diesem nationalen Dialog müssen selbstverständlich alle Konfliktparteien beteiligt werden. Er muss ergänzt werden durch entsprechende Dialogformate auf regionaler und lokaler Ebene.

- (3) Die Ukraine muss wirtschaftlich dringend stabilisiert werden. Weder Russland noch die Europäische Union haben ein Interesse an der Entstehung eines scheiternden Staates mitten in Europa. Aufgrund der wirtschaftlichen Verflechtung des Landes mit beiden Nachbarn ist auch die Kooperation Beider für die Stabilisierung des Landes unverzichtbar. Eine Lösung ohne oder gegen Russland stellt schon aus Gründen der wirtschaftlichen Vernunft keine realistische Alternative dar.
- (4) Die Blockfreiheit der Ukraine ist seit einigen Jahren in der Verfassung des Landes verankert. Auch die Übergangsregierung hat klargestellt, dass sie keine NATO-Mitgliedschaft anstrebt, nachdem die Vaterlandspartei Timoschenkos im Zuge des Umsturzes eine entsprechende Forderung erhoben hatte. Der Verankerung der Blockfreiheit in der Verfassung sollte unbedingt erhalten und nach den Wahlen politisch bekräftigt werden. Damit ist eine zentrale Bedingung gegeben, um die geopolitische Integrationskonkurrenz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r NATO zu beenden und der Ukraine die Möglichkeit zu eröffnen, sich auf fester außenpolitischer Grundlage auf ihr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zu konzentrieren.
- (5) Der politische Prozess in der Ukraine sollte durch eine starke Führungsrolle der gesamten europäischen OSZE begleitet und abgesichert werden. Die OSZE verfügt nicht nur über die entsprechenden Instrumente und Kompetenzen, sie ist – im Gegensatz zur EU – auch keine Konfliktpartei. Die

Führungsrolle der OSZE sollte ergänzt werden durch eine Internationale Kontaktgruppe, bestehend aus den ständigen Mitgliedern des Sicherheitsrates, der Ukraine und Deutschland. Damit wäre ein internationales Kooperationsformat geschaffen, das für alle Konfliktbeteiligten annehmbar ist.

Alle diese Vorschläge sind vereinbar mit dem Konzept einer kooperativen Sicherheitsordnung für ganz Europa. Sie ermöglichen die Eigenentwicklung der Ukraine auf der Grundlage von Souveränität und territorialer Integrität. Darüber hinaus müssen zwei weitere Schlüsselprobleme bearbeitet werden, nämlich die mit einer EU-Assoziierung tatsächlich verbundene Zukunftsperspektive für die Ukraine und die künftige Gestaltung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EU, NATO und Russland.

Die Mitglieds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haben sich erst einmal selbst darüber zu verständigen, welche Ziele sie gegenüber der Ukraine und anderen Ländern ihrer „Östlichen Partnerschaft“ verfolgen wollen. Ursprünglich war diese Partnerschaft als Ersatz für eine Beitrittsperspektive gedacht. Zu weit waren – und sind – diese Staaten von den zu erfüllenden wirt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Standards entfernt. Dessen ungeachtet, wurde schon vor der Ukraine-Krise von einigen EU-Staaten die Forderung erhoben, auch der Ukraine und anderen „östlichen Partnern“ die Beitrittsperspektive zu eröffnen. Damit wäre die latente Integrationskonkurrenz zwischen der EU und Russland auch formal eröffnet. Stärkt oder schwächt eine Beitrittsoption für die Ukraine die Europäische Union? Liegt es im Interesse der Union, Staaten den Beitritt in Aussicht zu

stellen, die weit von europäischen Standards entfernt sind, viel weiter als die Türkei? Kann für einen solchen Schritt die Zustimmung der Bevölkerungen gewonnen werden oder wird das mit der Euro-Krise in die Kritik geratene europäische Integrationsprojekt dadurch nicht weiter delegitimiert? Gibt es Wege, um EU-Assoziierung und „Eurasische Union“ miteinander zu kombinieren? Die Debatte über diese Fragen muss in der Union geführt werden. Jedes europäische Land hat das Recht, die Mitgliedschaft in der EU zu beantragen. Aber die Mitglieder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haben auch das Recht, darüber zu entscheiden, ob die Eröffnung von Beitrittsperspektiven in ihrem Interesse liegt.

Die Eskalation der Ukraine-Krise hat dazu geführt, dass in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m Westen die Vertrauensgrundlage verloren gegangen ist oder zumindest sehr stark beschädigt wurde. Dieses Vertrauensdefizit lässt sich kurzfristig nicht beheben. Die Erfahrungen im Ost-West-Konflikt haben aber gezeigt, dass der institutionalisierte Dialog auch in Krisenzeiten weitergehen kann und muss. Das gilt erst recht in Bezug auf die gegenwärtige Konstellation, die mit dem überwundenen Großkonflikt nicht vergleichbar ist. Die vorhandenen Strukturen kooperativer Sicherheit sind deshalb unbedingt zu erhalten. Die Verständigung auf gemeinsame Lösungsansätze in der

Ukraine-Krise bildet die wesentlichste Voraussetzung für einen Neuanfang zwischen Russland und dem Westen. Beide Seiten sollten ihre gemeinsamen Interessen in den Vordergrund stellen, z.B. bei Wirtschaft und Sicherheit. Die legitimen Interessen der jeweils anderen Seite müssen stärker als in der Vergangenheit respektiert werden. Russland sollte nicht jede Aktion der NATO als gegen sich gerichtet betrachten. Und der Westen sollte davon Abstand nehmen, von Russland Anpassungsleistungen zu fordern, ohne dafür eigene Leistungen zu erbringen. Die NATO-Russland-Partnerschaft muss zu der Institution werden, als die sie 1997 konzipiert wurde: zu einem Kooperationsformat mit einem zentralen Partner auf der Grundlage der Gleichberechtigung. Diese Partnerschaft sollte reaktiviert, intensiviert und durch neue Projekte praktischer Zusammenarbeit ausgestaltet werden. Eine gesamteuropäische Sicherheitsorganisation ist nicht in Sicht, ebenso wenig wie der immer wieder von einzelnen westlichen Politikern und Sicherheitsexperten geforderte NATO-Beitritt Russlands. Teileuropäische Organisationen wie die EU und die NATO können teileuropäische Sicherheit, nicht aber Sicherheit für ganz Europa herbeiführen. Notwendig bleibt deshalb die Erhaltung und Vertiefung der Strukturen kooperativer Sicherheit zwischen EU, NATO und Russland.

Autor: Prof. Dr. Michael Staack, 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iversität der Bundeswehr Hamburg.

德国如何看待战争手段

于 芳

【摘要】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令德国人拒绝战争、拥护和平，在解决国际问题上偏好和平手段。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的联邦国防军都只具有防御功能，海外行动主要是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德国重新统一，国家实力和地位的变化使得海外军事行动成为可能，西方盟友的期待给德国履行参与义务带来压力，德国的克制文化与开放的安全政策之间存在矛盾。经过了多次国际问题的考验，德国始终在努力平衡军事义务和和平手段。联邦国防军已经发展为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的重要手段。然而，军事手段始终是解决危机和冲突的最后手段

【关键词】德国 联邦国防军 军事手段

一、德国政府对战争的态度

德国在历史上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发动战争的动因和教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分别表明了德国承担国际责任的两条线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开始，参战人数约为五百万，后来发展为世界大战而结束，最终参战人数超过了五千万。所有参战国损伤惨重，大约九百万士兵阵亡，伤员人数达到一千九百万，无辜受害的平民约有六百万，因病或被俘的人员更是不计其数。^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比之第一次范围更大、战况更为激烈、死伤人数更多，这次战争中

德国再次战败，世界范围内很多地方被炸为废墟，经济损失巨大。两次战争给德国带来的教训是，必须穷尽所有政治和外交手段阻止战争的发生。

在德国，和平、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拒绝战争的观念深入人心，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也始终在多边合作中寻找维护和平的解决方法。联邦国防军的海外行动也秉承了这一理念。

2009年的黑黄联盟执政协议中关于安全政策部分开篇就提到，德国的克制文化将仍旧引导着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制定，德国只有在联合国、北约或者欧盟的框架内，或

^① Berghan, Volker: Der Erste Weltkrieg, München, 2003, S.9.

者经由国际法授权许可的条件下，才会采取军事行动。当然，自我防卫的权利不含在上述条件之内。

德国认为，安全是一个复合型的概念，既需要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也需要合适的非军事手段，以及更加紧密的协作。^②

2011年联邦国防部出台了《防务政策方针》，阐明了联邦国防军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并表述出德国安全政策的目标和利益。其副标题清楚地表明了方针的三个重点：维护国家利益，承担国际责任，共同建构安全。该方针强调，世易时移，德国并不会面临传统军事手段的直接领土威胁。风险和危险主要源自正在垮掉或者已经垮掉的国家，源自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政权，源自气候和环境灾害，源自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瓶颈等等。

德国经历的历史，德国在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德国与国际政治和经济条件相互依存的关系，德国既是依赖资源、原料贫乏的出口国家又是高科技发达国家的特点，这些条件决定了德国的安全利益。“德国是欧洲中部的强国”以及“德国对和平与自由负有的国际责任”决定了德国的安全利益不是静态利益，而是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

德国认为，在当今世界，保证安全、拒绝战争更多地意味着遏制危机和冲突带来的负面后果，积极避免潜在危机的发生。德国愿意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使用一个民族国家所有的行动手段，包括武装力量。并且德国军队将会跨出国界执行任务，消除国外的危机和冲突。传统的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的界限已逐渐消失，维护安全利益更多地要求各部门各领域的协作，调动政治、外交、经济、发展政策、人道主义、社会福利、军

事等各种措施。^③

二、联邦国防军成为外交和安全政策手段的演变

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让德国之外的国家对德国军队普遍有一种担心，担心联邦国防军的职能范围超出防御功能。战后国际社会对德国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和民主化的处置、德国基本法，以及联邦国防军融入了北约集体安全体系，决定了德国军队的任务范围，即保卫德国以及德国的盟友。冷战结束后，联邦国防军的作用受到两个核心要素的制约：首先，联邦国防军执行任务必须符合价值规范；其次，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这种双重特点与德国的外交政策风格完全一致，要求联邦政府在“克制文化”和“履行对盟友的义务”中实现平衡。把握这一平衡，对任何一届政府而言都是一种挑战。

1960年摩洛哥著名的旅游城市阿加迪尔（Agadir）遭到强烈地震的破坏，为联邦国防军首次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提供了契机。联邦国防军派出空军和医疗士兵，支撑联邦政府这一决策的，正是前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深入人心的影响：德国不推行利己主义、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而是要推行救助他人的外交政策；同时，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应当在多边合作的框架下进行，绝对不走单边主义的路线。从1960年至今，德国的海外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从来没有间断过，为德国武装力量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做了良好的铺垫。冷战结束初期，海外军事行动还是一个敏感问题，德国人不确定世界会如何看待德国士兵到其他国家地区去参与军事行动。联邦政府需要谨慎地权衡国际框架下的军事行动，

^② Koalitionsvertrag, 2009, S.122-124.

^③ Verteidigungspolitische Richtlinien, am 27. 05. 11, S.5-6.

在国内外都创造出有利的舆论环境，同时还要符合宪法、国际法和正当的政治流程。当时，联邦政府的做法是用资金援助来弥补无法参与盟友军事行动的亏欠。然而，盟友对此并不领情，反而称之为“支票外交”。美国期望德国更积极地参与北约框架下的多国军事行动，而德国政府则以宪法规定为由只参与军事行动中的民事任务，对军事任务敬而远之，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主要以本国国防和北约领土的防卫为主要任务。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不愿意因此坚持“克制文化”而损害了与盟友的关系，尤其是德美关系。1982年联邦德国和美国签订了战时东道国支持条约，在遭遇战争或危机时提供民事和军事支援。该条约的签订看似有违前述的核心要素，但实际上，德国是希望借广泛的其他形式的支持来取代美国要求的德国海外军事行动。^④这个策略一直到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都很奏效，德国履行对盟友义务时主要是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援助，或者提供物资。

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要求联邦政府一道对侵略邻国的伊拉克进行军事干预。德国一开始保持了以往的克制态度，提出鉴于基本法的规定德国不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当时德国政府为沙漠风暴行动提供约160亿马克的资金，但没有投入任何队伍参加干预。美国感到失望，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团结提出了质疑，不太认可德方提出的经济和物资上的支持。

这一时期距离德国签署《2+4条约》尚且不远，当时一系列欧洲国家都警告德国不要重新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大国。德国

的政治精英十分重视一点，即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一定要具有崇尚和平、反对武力的特征。在上述条件的综合作用下，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陷入了矛盾之中，德国掀起了一场重新审视德国外交政策的大讨论。在西方盟友的强烈期待和压力下，德国不得不做出让步，在1991年向北约派遣了18架战斗机和212名德国士兵，从“绝不参战”逐渐演变为“绝不独自作战”。

此举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很多人公开表示反对。当时的科尔总理在关于德国在欧洲角色的演讲中回应到，不是为了用军事行动实现最小化的解决方案，而是根据联合国章程第七章的内容用积极的军事行动来提供支持，加强西欧联盟，尤其是在深化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利益。^⑤从他的表态中可以看出，德国应当具有支持盟友和强化欧洲的能力，如果德国只能和其他欧洲盟国享受相同的权利却无法尽到相同义务，那么德国就不能算作完全平等的成员国。海湾战争带给联邦政府很大压力，一直尽力在维持平衡。

直到联邦国防军的军事行动范围扩大，并且关于德国军队军事行动的争论从议会转移到联邦宪法法院后，问题才得以缓解，不过占据上风的始终是“绝对不再参战”的信念。

1995年波黑战争爆发，制造了惨重的人道主义伤害，冲突的升级令德国联想到二战中痛苦的历史，遂决定从“绝对不再参战”到“绝不再有奥斯维辛集中营”。此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已经判决联邦国防军允许参加武装军事行动，北约成员国领土也被视作为

④ Siedschlag, Alexander: Die aktive Beteiligung Deutschlands an militärischen Aktionen zur Verwirklichung kollektiver Sicherheit, 1995, S.37.

⑤ Siedschlag, Alexander: Die aktive Beteiligung Deutschlands an militärischen Aktionen zur Verwirklichung kollektiver Sicherheit, 1995, S.41.

合法的防卫范围，参与武装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是在北约、联合国和西欧联盟的多边框架下进行，并且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标。所有军事行动都必须经过联邦议院的简单多数授权。

三、军事手段是外交政策的最后手段

联邦国防军因为其海外军事行动形成了新的发展方向，联邦国防军的主要功能不再主要是保卫国家，而是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如打击恐怖主义、保护人权、危机和冲突的预防。

1. 科索沃战争

科索沃战争爆发后，联合国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工作，但都归于失败。联合国安理会就对其军事干预进行表决，由于俄罗斯不同意，所以联合国安理会没有能够做出决议授权。北约在美国的领导下，罔顾缺乏联合国授权的事实，单独采取行动，这一行动至今仍备受争议。此次干预中，德国向北约提供了14架战斗机，自1945年以来首次参加战斗。联邦政府支持此次军事干预，主要是红绿联盟政府认为可以由此体现政府的执政能力，体现德国是美国的可靠伙伴；此时民众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对于德国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⑥

1997年，科索沃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德国和法国一起积极推动欧洲外交斡旋，为的是避免冲突升级为战争。到1998年，科索沃问题造成80名阿尔巴尼亚人死亡，其中有25名妇女儿童。参照国际标准，这是严重暴力事件。欧洲国家呼吁双方放弃武力，进行对话，国际危机应急小组提出了多种建议和措施，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160号

决议，对南斯拉夫实行武器禁运。

然而该决议并没有强调交战冲突双方放弃使用武力。5月，美国方面通过武力威胁将问题的解决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小步。此时，北约也开始审视是否存在军事上的选择。同时，德国和俄罗斯一起致力于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7月，德国倡议双方停止交火，但停火只可能在“驻扎国际武装力量”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美俄反对这一提议。到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1199号决议，要求冲突双方立即停火，采取措施避免人道主义灾难，进行政治对话。

德国大选之后，施罗德政府强调，联邦国防军有限度地参与军事干涉行动，提供人道主义干涉。1999年1月，当时的外交部长菲舍尔组织了一次高级外交官员的密会，得到了回应是在拉卡可（Racak）大屠杀。德国再次提议召开和平会议。与会官员迅速做出决策，将和平会议作为和平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最后和平手段。美国要求德国在会议失败时参与“不可避免的”军事行动。北约盟国和俄罗斯的策略是在北约的武力威胁之下，要求各方参与此次和平会议。同时，科索沃再次出现难民潮，联合国秘书长在1月底造访北约总部，强调了通过谈判以政治方式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性。朗布依埃（Rambouillet）会议于1999年2月6日召开。德国提出的外交方案对于结束对南斯拉夫制裁、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菲舍尔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外交尝试。在经过18天的谈判之后，阿方在美国的压力下宣布愿意签订协议，但塞方不同意。和平会议失败后，北约于3月开始干涉，并认为会议失败都是贝尔格莱德的责任。

在整个过程中，德国的表现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文明力量角色特征，优先考虑和推动

^⑥ Dalgaard-Nielsen, Anja: *Germany, Pacifism and Peace-Enforcemen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S.76.

多边框架下的合作，通过刺激和说服来发挥积极作用，及至外交和政治手段穷尽后，鉴于人道主义灾难严重，才进行武力干涉，确保人权不受侵害。一旦战争爆发，将会直接导致人道主义灾难和人权的损害。

1999年3月24日，“联盟力量”行动开始。民意调查显示，65%的德国人支持此次干涉行动。^⑦5月14日，菲舍尔在绿党大会上获得了800票中的440票赞成参与军事干涉。他在演讲中提出了口号“决不再让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现！”，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尽管此次干涉行动受到德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但德国在干涉开始后不到一周之内已经开始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德国外长密集的多边外交对于结束干涉行动意义重大，同时也向德国民众强调了这一讯息：军事手段并不是和平手段的替代选择，并且也不应当成为和平手段的替代选择。^⑧

在德国参与干涉行动后不久，即开始寻求外交方式解决科索沃问题，推动欧盟授权，使得欧盟在科索沃和平进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且积极推进八国集团讨论科索沃问题的解决方案，呈现出明显的建构意愿和建构力量。

德国此次参与军事行动，一方面体现了对盟友强烈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对科索沃的人权状况展现出极大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与德国自二战以来深刻内化的自我认同紧密相关。在科索沃问题上，原本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将其视为一国内部事务，由该国人民自己解决；另一种则是西方国家选择的

“军事干涉”。德国认同第二种选择，很明显是基于人权高于主权的原则，目的是捍卫西方价值体系，提升德国的建构能力和建构空间。在德国逐渐正常化的过程中，手段的选择趋势是从主要选择和平手段，并不完全排除军事手段，军事手段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演变为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同时使用。

2. 联黎部队维和行动

2006年联邦国防军士兵参与联黎部队，是德国首次参加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且是在黎巴嫩海岸负责领导海上部队。此次参与联黎部队同样是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符合德国基本法规定的法律框架条件，具有合法性，同时也具有多边合作的特点——联黎部队原本就是多国部队，由30个国家派遣的维和人员组成。然而，德国参与维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优先考虑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却给德国提出了一个难题。德国绝对不会走单边主义道路，希望通过承担国际风险和义务，在国际上以可靠的伙伴/盟友的身份出现。因此，出于德国自身利益考虑，德国是希望加强国际组织的，即加强联合国在解决国际冲突中的地位。

然而，此次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冲突双方有一方是以色列，与德国有着特殊而复杂的历史关系，就如黑红联盟时期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所指出的，德国必须问问自己，德国士兵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以色列边境上能否起到作用。^⑨他提出的问题清楚地

⑦ Joetze, Günter: Der letzte Krieg in Europa?: das Kosovo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Stuttgart, München, 2001, S.91.

⑧ Miskimmon, Alister: Falling into line? Kosovo and the course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No.3, May 2009, S. 561-573, hier S.565.

⑨ Steinmeier, Frank-Walter: Militärische Gewalt muss verhältnismäßig sein. Interview mit Frank-Walter Steinmeier, in: Südliche Zeitung, 31. Juli 2006, <http://jetzt.sueddeutsche.de/texte/anzeigen/327346/Militaerische-Gewalt-muss-verhaeltnismaessig-sein-Frank-Walter-Steinmeier-im-Interview>, letzter Zugriff: 2014-01-12.

表明了德国议会和公众中对联邦军队参与黎黎部队的矛盾焦点。联邦总理默克尔也强调，不能让德国士兵陷于需要向以色列士兵开枪的境地。^⑩

在联邦政府的提议下，2007年欧盟制定了中东行动战略。除了派兵之外，德国也积极提出各种谈判方案，重新启动中东和平路线图。此外，德国通过发展援助来稳定以黎地区，2007年联邦政府决定到2010年止向巴勒斯坦地区提供高达2亿欧元的资助。^⑪ 联邦国防军的军事任务体现出更多的支持性，以强制性实现和平的特点比较弱。

此次联邦国防军的行动成功地坚持了德国外交政策文化一贯的风格，对联邦政府而言，是一次成功的平衡政策。

3. 利比亚问题

2011年利比亚战争爆发，5月20日，西方盟国的空战开始。德国是否应当拒绝安理会已经授权的军事行动，激起了国内外的广泛讨论，各种意见都见诸报端。最终，德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态度可以集中为四点：

1) 德国并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直接参与1973号决议的投票过程中，同俄罗斯、中国一道持保留意见。

2) 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是保护平民、建立禁飞区的空中军事行动，德国决定不参加。

3) 关于对利比亚进行海上封锁监控禁运

情况时，德国政府决定从北约中撤出四艘原应监控武器禁运的德国船只，因为没有法律基础来对卡扎菲进行海上封锁。

4) 地面部队在为平民提供运输时所需的人道主义救援，德国政府显示出了愿意参加的意愿。^⑫

4. 叙利亚危机

同样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危机中，德国始终站在叙利亚的反对派一方，支持其推翻阿萨德的政权，迎来政治和经济上新的开端。德国积极推动政治方式解决叙利亚危机，政府领导人几乎每个月都会与叙利亚反对派领袖和阿盟领导人磋商，寻求停止暴力冲突的计划。

德国和欧盟承认叙利亚全国联盟是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期待有新政府来取代现在的阿萨德政府。德国认为，叙利亚的暴力行动必须停止，应建立一个过渡政府，同时反对派也应当建立一个共同的、具有民主、包容和多元主义等价值观的“平台”。前外长韦斯特韦勒曾表示，只有在叙利亚的经济形势好转时，政治过渡才能取得成功，国际社会应当只管做好准备去提供援助。2012年底，德国准备了2200万欧元的资金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和接受难民。至今，德国的全部人道主义救援资金已经达到了9000万欧元。^⑬ 从经济资助上衡量，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⑩ Mekel, Angela: Warum sollen unsere Soldaten in Libanon, Frau Merkel?, Interview mit Angela Merkel, in: Welt am Sonntag, 20. August 2006, <http://www.welt.de/print-wams/article86911/Warum-sollen-unsere-Soldaten-in-Libanon-Frau-Merkel.html>, letzter Zugriff: 2014-01-12.

⑪ Siehe www.auswaertiges-amt.de, letzter Zugriff: 2014-01-12.

⑫ Krause, Ulf von, Die Bundeswehr als Instrument deutscher Außenpolitik, Springer VS, 2013, S.358.

⑬ Rede von Außenminister Westerwelle zur Eröffnung des 2. Treffens der AG Wirtschaft und Wiederaufbau der Freunde des syrischen Volkes,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Infoservice/Presse/Reden/2012/120904-BM-AG-Wiederaufbau-SYR.html?nn=342580>, letzter Zugriff: 2014-01-12 und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Amt/zz_Archiv_BM-Reisen/2012/12_Marokko/121210-Marokko_node.html, letzter Zugriff: 2014-01-12.

救援国。

对于德国是否有可能参加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韦斯特韦勒在一次采访中表明，既没有参与对叙利亚军事行动的需要，也没有考虑这个可能。德国的宪法和法律设置了行动界限。德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尽快达成一致意见，能尽快结束联合国观察员的任务。^⑭在叙利亚问题上，德国坚持推动政治方式来结束叙利亚内战，恢复和平，建设和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然而，国际社会对叙利亚问题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在美俄之间。

2013年9月第一批叙利亚难民抵达德国，共107人，后续还会有叙利亚难民抵达，德国拟接受的难民人数约为5000人。在欧盟范围内，德国是首位如此大规模接受难民的成员国，自叙利亚危机开始后，已经有17000人逃离到德国。外长韦斯特韦特表示，德国接收难民是希望能在欧洲树立典范，推动其他成员国也能在这方面更加积极。

在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上，德国迈出的第一步是向禁止化学武器OVCW组织提供200万欧元的资金，除了能提供资金外，

还能提供技术支持。2013年10月16日，经由联邦国防军培训中心培训过的OVCW组织的观察员被派往叙利亚，执行高风险的任务。^⑮德国一直敦促联合国和OVCW组织制定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具体方案。2014年1月9日，德国政府表示接受联合国OVCW组织的请求，愿意销毁在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过程中产生的、类似于工业垃圾的剩余物质。^⑯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阿富汗行动中，还是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中，联邦国防军已经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和平、执行维和任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德国的决策和事态的发展都体现了德国对战争的认识：军事手段不能带来长久和平，政治手段才能实现稳定、和平和发展，即便需要用军事手段来提供支持。在默克尔领导下的黑黄联盟政府任期内，德国没有参加新的战争，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派往海外军事行动的德国士兵人数，在国际问题上优先考虑外交和政治手段解决冲突，军事手段只能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最后手段。

作者简介：于芳，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⑭ Deutsche Beteiligung weder nachgefragt, noch in Betracht gezogen.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DE/Aussenpolitik/Laender/Aktuelle_Artikel/Syrien/130820-ChemiewaffeninspektionSYR.html, letzter Zugriff: 2014-01-12.

^⑮ Chemiewaffeninspektoren trainieren bei der Bundeswehr,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Archiv/DE/Archiv17/Meldungen/2013/10/2013-10-17-syrien.html>, letzter Zugriff: 2014-01-16.

^⑯ Deutscher Beitrag zur UN-Mission der OVCW,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Pressemitteilungen/AA/2014/1/2014-01-09-deutscher-beitrag-zur-vnmission-der-ovcw-in-syrien.html>, letzter Zugriff: 2014-01-16.

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联合执政协议》 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部分（译文）

6. 强大的欧洲

德国在欧洲政策方面的责任

欧洲联合事业仍然是德国首要的任务。近年来，我们的欧洲伙伴国对德国的期望有所转变。欧盟正经历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发生着经济、社会与制度的变革。在这个变革阶段，德国作为成员国中的经济强国和稳定锚，肩负着越来越大的责任，也面临着其伙伴国的特殊期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作为欧盟的创始成员国及可以充分信任的伙伴国必须承担起责任，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德国将尽其所能，再次增强和扩大人们对欧洲联合事业未来竞争力的信心。我们将倾尽全力，克服欧洲的危机，为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强大而又能体现社会公正的欧洲开启新的篇章。稳固而可持续的财政离不开增长与就业，而各国自身承担的必然责任必须和欧洲的团结与民主相伴共生。欧盟需要具有行动力的共同机构来完成这些任务。

民主的欧洲

欧洲政策的各项决定往往会对我们公民的生活境况造成深远的影响。因此，为了保

障人们对欧洲及欧盟的信心，我们需要加强民主的合理化进程，使欧盟的各项决定易于理解。为此，建立一个强大的欧洲议会正如各国议会的密切参与一样，是十分必要的。欧盟委员会需要一个严谨、高效、委员间职权明确的咨询委员会（Kollegium）。

要使欧元区的危机管理得到认可与接受，重点在于将其纳入欧盟的民主结构以及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与各成员国相辅相成已被证明切实有效的合作中。欧洲联合的核心在于其联合统一的方式。部分国家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领先于别国，此时的目标应当是面向所有成员国，尽快将这些政治领域纳入欧洲所有条约的框架之中。

联邦政府主张实行统一的欧洲选举法以保障欧洲议会中的可靠多数，维护欧盟立法程序的稳定。据此，应对席位的分配设立一个较为合理的最低门槛。

一个欧洲公民社会的形成是实现欧洲民主活力的关键性前提。为此，继续推动青年政策的发展格外重要。欧洲中学（Europa-schulen）、青年的活动以及青年之间更强的流动性都会对此产生积极影响。在这方面我们积极推动建立德国与希腊青年协会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将作为友好的伙伴继续支持希腊的改革努力，重点在于推动与促进德国-希腊大会（Deutsch-Griechische Versammlung）的发展。

为了使公民更好地接受一个一体化程度加深的欧洲，我们必须严格遵守辅助性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有当成员国的举措不足以解决问题时，欧盟才能够采取行动。各项任务须交至能够保证其得到最好解决的层面上：欧洲层面、国家层面、地区层面或是地方层面。此外，欧盟的法规必须要经过“比例原则”（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的检验。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亲民的欧洲、一个尊重城镇自我管理的欧洲。各城镇与地区的语言和文化都对欧洲的多样性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多样性正是人们身份认同感的来源。我们支持欧盟维护所有成员国的独特性及其传统的多样性，欧盟须倾力关注其重大的未来使命。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团结共进的欧洲。

在欧盟机构中，对德语的态度应当与其在欧盟的法律地位和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德语须在实践中获得与其他两种工作语言英语和法语平等的地位。

挑战—欧洲摆脱危机之路

我们愿意尽一切力量使欧洲增强实力，摆脱当前的危机。我们坚信，只要欧洲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以全方位的政治举措应对欧元区挑战，就有可能战胜危机。危机的原因是多重的：从欧洲某些国家自身债务的过度堆积到竞争力的缺乏、经济的不平衡以及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结构性缺陷，再到金融市场的畸形发展，不一而足。

最新的增长前景呈现出乐观的态势。然而危机造成了严重的创伤，还远远没有得到治愈。许多成员国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尤其是青年失业率。而许多中小企业已无力

进行投资。高额的债务与低迷的增长相结合，使得欧洲的国民经济依然十分敏感而脆弱。

为了能使欧洲找到一个摆脱危机的长远之计，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政治理念，该理念将把提高竞争力和长期严格地稳固财政的结构改革同不断增长的面向未来的投资以及实现社会平衡的就业结合起来。

欧洲危机管理的下一步目标将是克服银行私人债务与国家公共债务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确保今后主要由银行本身、而非纳税人对风险承担责任。同时，必须改变银行和金融市场的规定，避免今后金融市场的主体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财富。金融市场必须共同承担危机的代价，最终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之中。

此外，必须通过一步步改革，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尤其是经货联盟的经济政策。必须把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中各种卓有成效的规则作为经货联盟未来发展的基本框架。

经济货币联盟的进一步发展

欧元区的危机暴露出欧洲经货联盟的结构性缺陷。首先，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经济货币联盟应当更好地协调经济政策并使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而且需要更为高效的财政政策，以此持久而有效地兼顾竞争力、金融稳定性、未来投资的可能性与社会平衡。德国愿与伙伴国加强交流与协作，促进经济货币联盟在此意义上的继续发展。共同机构应该在其机构角色的框架内参与经济的协调。

德国坚决维护统一的货币。我们的目标不变，即引领欧洲增强实力、走出危机，塑造一个稳定与增长的欧洲。我们的原则是：团结互助与自我责任相结合。我们欧洲人民也要借助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

通过结构改革与可持续的未来投资来提高竞争力是欧洲实现增长的关键。各国自身

的努力与欧洲整体的努力应当携手共进。我们自觉遵守得到充实《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各项规定，切实贯彻该公约是保障共同货币持久稳定的基础。

我们需要一种着眼于可持续标准的财政与经济政策以维护我们行动的信誉。欧元国家必须降低其过高的国家负债率。这是当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必须坚持财政整固政策，并将其与结构性增长的改革和可持续的未来投资相结合。

德国愿继续通过援助性贷款和技术援助等方式提供团结性的支持，帮助受援国推行改革政策，进而重新赢得竞争力、降低失业率。

必须继续坚持各成员国对自身债务负责这一原则，任何将国家债务推至共同体层面的行为方式都将不利于每个成员国对各自国内政策进行必要的纠正。各国的担负制定预算的责任和超国家层面的共同担保是无法统一的。欧洲救援计划的援助性贷款只有在整个欧元区的稳定受到威胁时才能作为最后手段投入使用。我们希望危机国家在对抗危机的过程中能够加强自身参与，在获得援助性贷款之前首先注入自己的资金。而提供这种援助性贷款的条件则是受援国必须严格履行义务、实行改革、推行稳固政策，前提是制定出一个确保债务承担能力的明确计划。此外，对于各项援助的民主监管也具有突出的意义：欧洲稳定机制的资金只有在得到联邦议会的批准后才能够投入使用。

危机表明，欧洲在纠正错误上往往过于迟缓。为了避免货币联盟今后的失误，必须要更好地监管财政政策和债务发展的情况，通过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的协调努力减小欧元区经济的不平衡。为此，我们必须坚决利用经过充实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及失衡处理程序（Ungleichgewichtsverfahren）。

新的规定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利用和监

管才能够令人信服。应当继续运用针对就业与社会发展而设计的、提供就业与社会指标的欧盟数字化发展年度指针（Score Board），这样，这些新兴手段就能够在2014年的欧洲学期（das Europäische Semester）中得到运用。而这些经过扩展的指标有助于在欧盟范围内实现对社会福利发展的更为广泛的理解。

所谓的“两包立法举措”含有欧盟委员会对国家预算计划进行监督的规定，我们希望将这种监督扩大为一种高效手段，此手段在成员国明确违反欧盟规定时能够让国家预算的法律制定机构提前进行自我修正。该手段也包括增长、革新和就业等目标。

我们致力于在欧元国家与欧洲层面间签订合约式的改革协议，而且这些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实可行的且建立在民主决策基础上，以期实现提高竞争力、发展稳固与可持续的财政、促进增长与就业以及兼顾社会团结等目标。

我们将根据经货联盟的规定确立合约的基础。

在欧元区危机程度严重的国家里推行改革是为当地及整个欧洲创造可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有必要将欧洲投资银行（EIB）与欧盟财政的各种援助，包括欧洲结构基金，专用于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上。此外，应当有效改善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而在这个领域，欧洲投资银行也可以通过与各国开发银行的协作提供帮助。这一系列手段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增长、缓解欧洲金融市场的分散局面。

（陈思译）

竞争力和就业

内部市场是保障欧洲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一根支柱。它必须能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且继续得到深化。完善内部市场、设立适合的规则、互相承认对方国家的学历和资格

证书以及可以在欧盟内部转移社会保险等，这些举措可以为增长注入重要的推动力。

尤其是竞争力、扎实的结构性和经济增长以及未来投资可以长期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并且保障福利。这特别适用于欧元区中的问题国家，这些国家的失业率过高，生活在危机中的人们的收入遭到了大幅度削减，很多人甚至还失去了工作岗位。

我们将全力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整固财政预算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同时顾及到社会的可接受度，并加强对革新和增长方面的未来投资，作为对推进上述政策的补充。

我们将继续改善经济环境，成就高质量的生产和高收入的就业。私有经济和国家可以巧妙合作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贡献，其中，私有经济施展其活力和效率，国家则可以利用社会福利市场经济的调节框架、教育以及基础设施。这一切则视国家和欧盟层面的职责而定。

为了让欧洲适应未来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在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能源利用效率、交通、跨欧洲网络、数字媒体或者宽带、教育以及研发等方面进行更多投资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

我们将坚决要求贯彻实施于2012年夏天通过的《增长与就业契约》（1200亿欧元）。增长契约和财政契约是可持续增长和稳固的国家预算政策的两个组成部分，同样重要。简化中小企业获取财政资金的措施对于促进增长和就业特别重要。其中包括：欧洲投资银行增加贷款；加强利用循环基金，以使用结构和投资基金的资金。

联邦政府将会关注欧洲投资银行是否有效且全面地利用了额外分配给它的资金。中期财政计划协议中拟定的灵活性工具（Flexibilisierungsinstrument）将用于投资、增长和就业等方面。

在紧缩的欧盟财政预算框架内，我们主

张在构建欧盟预算时更加符合任务的要求。考虑到2016年将进行多年度财政框架的修订，还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明确欧盟预算重点应是增长、就业和创新。

联邦政府主张在欧盟层面上尽早对欧洲项目债券（europäische Projektanleihen）的试点阶段进行评估。欧盟财政预算为项目债券提供担保，可以鼓励更多促进增长的投资。

欧洲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源地。但是，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工业失去了活力。欧盟认识到工业对于可持续增长、福利、生活质量以及就业的重要性，也认识到欧洲去工业化的问题，但未能成功扭转这一消极趋势。鉴于强大的欧洲工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同欧洲的各个机构以及伙伴国一起努力，使欧洲在未来再次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的诞生地。为此，我们必须并将通过职能部门之间合作来改善工业的区位条件，在德国和欧盟决策时同时顾及到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更加注重我们对工业方面决策的成本效益。

欧洲特别重要的还有以下几方面：私人和国家在研究、开发和创新等领域，在改善培训体系方面的投资，改善促进出口的措施，尤其是促进出口弱国的对外出口，针对工业需求的在现代化基础设施以及在欧洲内部大市场中具有促进作用的秩序政策框架。

为了增强欧洲的竞争力，在欧盟层面上削减制定规则的消耗是不可缺少的。欧盟委员会必须界定能够尽可能简化、减少治理成本的领域，特别是对中小型企业关系重大的领域。对于这些领域，我们要求给出具体的削减目标，同时也要将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以及雇员保护等方面纳入考虑范围。原则上，我们愿意一一执行欧盟的规定——这也保障了欧洲内部市场上的机会均等。

在欧洲层面上，也必须要考虑能源转型。只有一体化的能源内部市场和成员国之间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扩展和运输网络的扩建等

方面密切配合才能保障能源供应的可靠、可支付及环境保护，这样德国也可长期保持在欧洲作为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和工业区位中发动机的地位。

欧洲在 21 世纪将要扮演的角色，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成功地在数字世界领域与世界接轨、启用欧洲标准并且维护我们自己的欧洲社会模式。

因此，我们支持整合消费者保护、数据保护、创新以及互联网和信息安全的、内容全面的欧洲数字议程（europäische digitale Agenda）。

此外，我们的数据处理还需要一个国际化的新法律框架。我们的目标是，达成世界范围内保护网络自由和个人操守的国际公约。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动目前正在进行的优化欧洲数据保护协定的举措。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还要与美国就数据保护协议顺利进行磋商。

当我们在欧洲框架内协调经济政策时，也会坚定保有国际视野。例如，我们将继续推动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我们遵循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久经考验的基本方针，并且保障我们德国和欧洲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优先地位，以此克服公司和区位之间日益增长的全球性竞争所带来的挑战。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只有强大的欧洲才能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继续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为此，我们需要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以及经济和社会的高度稳定性。

德国的欧洲政策也将文化和媒体的特殊保护需求纳入考虑范围，特别是在欧盟制定法律、在欧盟援助问题上或者在同第三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在欧盟与美国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时，也必须借助例外条款（Ausnahmeregelungen）将上述方面考虑在内并予以保障。

（桂榕璟译）

增强社会福利、创造就业、克服青年失业问题

欧债危机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失去工作岗位对于欧洲民众及欧洲的社会安定是最大的威胁。因此，要保证民众收入、个人参与、社会的融合与稳定，一个最佳且长期成功之路便是解决失业问题，创造足够多的高质量且具有长期竞争力的就业岗位。必须合力支持自我责任感、个人的就业和创造就业的积极性。这一点在欧盟的团结稳定政策中也有所体现：成员国的结构性改革、整固措施以及未来投资都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重要基础，因此也成为欧洲公民之间进行社会融合的基础。

由于此次债务危机，诸多成员国的青年失业人口急剧增加，我们不能对这些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置之不理。所以欧盟政策的重中之重应该是解决青年失业问题。

在实施欧盟青年保障计划（die Europäische Jugendgarantie）方面德国一直走在前面，成为良好的范例。要在所有成员国中成功实施此项计划首先需要足够的资金作为铺垫，这样才能在青年失业最为严重的国家建立必要的保障结构。我们欢迎建立有关实习的质量框架。联邦政府致力于在一个欧洲学期内建立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而定的可经审核的目标。其中各国议会和欧洲议会也必须充分发挥好各自的作用。

欧盟下一批财政预算中计划用于促进年轻人就业的资金必须尽快在下一个财政预算期的最初两年中得到使用。增加解决青年就业的资金，必要时可在再规划欧盟结构基金的框架内及通过聚集可支配财政经费的方法来实现。我们支持为提款和使用资金提供技术支持方面的动议。（Wir unterstützen Initiativen zur technischen Hilfe bei Abruf und Einsatz der Mittel.）

我们也十分支持欧洲投资银行通过提供

信贷和保证金来为教育、培训和定期工资成本补贴方面的投资进行融资，同时我们也谋求欧洲投资银行信贷和欧洲基金的进一步联合，而且要更充分利用为双轨制培训项目——“Erasmus für alle”（所有人的伊拉斯谟计划）提供的机会。

同样，我们也要改进语言传介、提高毕业证书认证和社会保险转移来推动欧洲共同劳动市场的建设。

我们也致力于大幅度提高欧洲培训和劳动共同市场中的流动性和互通性（Durchlässigkeit）。我们采取了有针对性的措施以便于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青年人才在德国完成职业培训和就业。

此外，我们包括各种协会组织，也愿意帮助其他成员国引进包括能力大证明（der Große Befähigungsnachweis）在内的成功的德国双轨制培训体制，并为欧洲培训联盟（die europäische Ausbildungsallianz）的成功实施做出贡献。

为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和就业岗位，我们支持企业、工会以及欧盟各成员国的共同行动。

我们将把德国在《职业培训协定》（Ausbildungspakt）中所积累的经验注入我们的合作中来。要扩大创业者计划，这同德国的创业补贴计划类似。这些计划必须伴以全面的咨询服务。

成员国对社会福利政策负有首要责任，为此欧盟尊重各成员国的这一传统。在欧洲经济与社会福利模式的框架下，我们支持发展反对工资与福利倾销的共同原则与标准，来应对同样会伤害到内部市场企业与雇员利益的竞争扭曲这一问题。

欧洲的雇员必须更加有效地得到保护，免遭剥削以及违反道德伦理的工作条件。在跨国经济活动中，雇员的权利不能只在一国有效。我们支持对最低工资标准执行情况的

检查，国家要构建和定义最低工资标准，使其可以提高就业程度，保障工资的公平——可以选择立法或者协议工资的方式。

同时，还应该保证平等实施欧盟基本权利章程所规定的社会基本权利与欧洲内部市场中的市场自由。劳资双方的社会福利对话在欧盟层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机制同欧洲职工委员会以及欧洲企业中的共决制都必须进一步得到加强。

在目前就派出雇员方针（Entsenderrichtlinien）执行原则的谈判中，我们都支持采用德国现行的高标准：即具有明确的责任规则、主管机构享有全面信息权以及各成员国拥有高效的监管权。抵制滥用权利的行为不能因监管权削弱而受到阻碍。要坚决打击诸如通过皮包公司（Briefkastenfirmen）和假派遣的方法来滥用权利的做法。必须进一步发展欧洲雇员派遣法，使各目标国的工资水平，即同工同酬，及工作条件都相同。

公共民生保障（die öffentliche Daseinsvorsorge），特别是地区和县市层面的生存关怀（比如供水）属于国家的核心任务之一。许多乡村地区的人口变迁与人口下降凸显了这一领域采取行动的必要性。

欧盟内部市场的竞争原则、运转有效的公共体与福利均衡等因素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公民的承认。各成员国、各区域及县市必须继续拥有建构能力，以完成服务于公众利益的任务。我们将通过欧盟政策积极抵制任何限制生存关怀的行为。欧洲政策的制定不能忽视公共的生存关怀中国家、区域及地区特点。

（李珍译）

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自信的欧盟，它能在参与建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决维护和平、自由和富裕。

德国将在强化对欧洲联合事业的信任方面积极做出贡献。伙伴国之间充满信任的合作对于共同取得成功不可或缺。对中小成员国利益的考量是我们欧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欧盟在维护人权方面的国际行动是否令人信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坚定践行其价值观并在内部制裁侵犯其价值观的行为。联邦政府根据《欧洲联盟条约》第七章，支持遵照欧洲范围内民主和法制国家标准建立起来的有效机制，以保证《欧洲联盟条约》第二章所规定的价值观得到维护。

德法伙伴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深度和广度。两国作为经济强国具有特殊的关注点，也享有特殊机遇，这就是决定性地推动欧洲联合、增强欧盟富裕程度、安全和竞争力。我们将继续逐步执行2013年1月22日通过的德法议程（deutschfranzösische Agenda）。

我们要继续深化同波兰的伙伴关系，继续发展多样的邻国关系。我们将增加德波青年协会的工作机会并使克赖梢（Kreisau）及奥斯维辛的青年活动基地长期存在。我们将加强与同属“魏玛三角”（das Weimarer Dreieck）的法国、波兰的合作，并扩大同中欧伙伴国的双边动议。我们保证“德国—捷克未来论坛”（das deutsch-tschechische Zukunftsforum）及德国—捷克未来基金（der deutsch-tschechische Zukunftsfonds）将持续到2017年之后。

欧盟扩大与东部邻国关系

欧盟扩大是积极的欧洲和平政策。迄今的欧盟扩大符合德国和欧洲的利益。我们主张，此进程要在严格遵守入盟标准的前提下继续进行，西巴尔干国家有望加入欧盟。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必须履行已承诺的义务。我们愿随安全局势发展逐步减少科索沃部队直至全面撤军。我们将与各伙伴国及盟国共同

积极推动西巴尔干国家靠近欧盟和北约。对欧盟扩大而言，采用严格标准及可清晰检验的步骤至关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有候选国的入盟实力，还有欧盟自身的接纳能力。

土耳其对于欧洲有着战略和经济意义。此外，两国民众之间多样性的关系使德、土之间紧密相连。我们愿进一步深化欧盟与土耳其关系，包括外交与安全政策问题上紧密的战略合作。我们不仅看到土耳其经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而且特别欢迎其基于入盟谈判所进行的改革努力。谈判进程随着新谈判议项的开启而继续。无条件尊重承托着欧盟的价值观，如民主、法治国家、宗教和言论自由及其在国内贯彻这些价值观，这些是土耳其入盟获得进展的前提条件。2005年开启的谈判以入盟为目标，其结果仍悬而未决，它不会自动完成，其结果也不能得到事先保证。土耳其国内也在进行关于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讨论。如果欧盟吸纳能力不足或土耳其不能完全彻底地履行成员国的义务，土耳其仍应以某种方式继续发展同欧盟和德国的特殊关系，尽可能紧密地同欧洲结构相连。

在周边地区促进稳定、民主、法治国家体制和经济发展也是德国及欧盟的切身利益所在。在此问题上欧洲睦邻政策卓有成效。联系国协定（Assoziationsabkommen）、自由贸易协定和签证便利化协定（Visaerleichterungs-Abkommen）仍是发展东部伙伴关系的最佳方式。

地中海东部、南部海岸邻国对欧洲具有战略意义。这些国家同欧盟更加紧密的联系将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

世界上的一个强大的欧洲

我们希望，欧盟在未来仍能胜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责任。欧盟必须在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中参与构建国际政策，因此它必

须发挥强大的、独立的作用。联邦政府将在2013年12月欧盟峰会之后着手推动新的动议，以强化、深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理事会应按照惯例一年一度地在国家、政府首脑层面研究外交、安全和防务政策。

我们赞成强化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职能。欧盟对外事务部必须加强在预防性危机监管和对危机快速反应方面的行动能力。精简后的欧盟对外事务部主要承担职能性而非主要承担代表性任务（keine überwiegend repräsentative Aufgabe）。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对外事务部应就外交政策问题、贸易政策及发展合作进行更好的联系、更紧密的协调。

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就一个问题进行战略讨论，即其首选非军事手段或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能够并且希望达到何种目标。欧盟及其成员国可以为第三国（非欧盟成员国）在民主建设、法治国家体制建设及高效行政管理建设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尤其在警务和司法领域。

我们主张将欧盟的非军事手段、军事手段进一步结合并提高欧洲危机预防和冲突调停的军事、非军事能力。欧盟和北约的军力部署应更加紧密地协调，避免重叠。北约和欧盟的军事力量应互为补充。

我们要优先在毗邻地区采取维护和增强欧洲安全的欧洲共同行动。毗邻地区外的行动应更多地委托给区域性伙伴或组织，如非洲联盟、西非经济共同体或海湾合作委员会。上述组织、其他区域性组织及可靠的当地伙伴在承担责任时必须获得支持。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与欧洲委员会

我们要强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联邦政府在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伙伴国，尤其是在与波兰和法国的协议中表示愿意在组织中承担更多责任。我们希望欧洲委员会及其各机构意识到其作为基本权利和人权捍卫者

的核心职能。我们愿为此积极努力。

（徐曼语译）

7. 全球范围内的责任

全球范围内的可信赖伙伴

德国面临着国际责任。在利益与价值观的双重引导下，我们愿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秩序。德国将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和平、自由、安全事业，并将致力于维护公正的国际秩序，切实保障人权，维护国际公法的权威，倡导可持续发展以及推进国际扶贫事业。

只要国际社会期望德国能在各类危机和冲突中有所作为，我们愿意随时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外交手段、和平方式的冲突管控以及发展合作将始终是我们的首选方案。我们一贯奉行令人信任与忠于联盟的原则。我们愿成为参与构建公平国际秩序进程中的良好伙伴。

加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及北约的发展

跨大西洋合作不仅对欧洲而且对北美洲而言都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基石之上，因此，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保障自由、安全和共同福祉的关键。最近一段时间，双方互信有所受损，而这必将得到恢复。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明确承认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我们愿进一步明晰伙伴国之间的相处之道，并致力于达成可信赖的并能够经受检验的协议，以保障公民私人领域不受侵犯。

计划与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是进一步深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核心项目之一。我们希望相关谈判能够取得成功，而不希望条约中的议会监督以及司法保护条款受到质疑。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全面消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关系中现存的一切障碍。与此同

时，对缔约的各方来说允许合理的例外存在必将构成该协定的一个部分。我们将对以下方面予以高度重视：巩固欧盟各类保护性标准，尤其是在数据保护、欧盟社会福利标准、环保标准、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公共生存关怀领域、文化和媒体领域。

我们拥护北约并且赞同它的新型战略观。跨大西洋联盟是而且一直将是我们的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新危险和新威胁的安全防卫政策的基石。在北约组织中，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各方都能平等地协商和协调彼此的战略安全防卫政策理念。我们在联盟中积极发挥作用并且致力于以此方式保证北美和欧洲间的联系具有承受能力，并使之得到进一步深化。德国也将在未来以值得信赖的方式承担它在联盟中理应担当的责任。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同北约伙伴国共同致力于实现关于联盟战略导向转型的芝加哥决议。

我们支持在“灵巧防卫倡议”（Smart-Defence Initiative）基础上的防卫合作，以期实现共同规划、共同创建、共同部署军事能力以及维护联盟内各国武装力量间的相互协作能力。德国愿意作为该组织的框架国同其他北约伙伴国共同为联盟聚积上述能力。

我们将继续充分利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ATO-Russland-Rat）这一平台，并将进一步强化其战略价值。驻阿富汗维和部队（ISAF-Truppen）撤出阿富汗的进程已向我们充分展示，北约同俄罗斯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符合双方利益的。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经验也应当被运用到其他安全政策方面的挑战中，例如关于北约导弹防御建设的对话。联邦政府坦陈自己所作的各项有关北约政策的承诺，并将致力于推进北约导弹防御建设的进程，我们急需导弹防御的建设，以有效保障我们免受来自危险国家导弹的威胁。联邦政府将在不导致造成新的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的前提下，就这一问题与其他北

约伙伴国一道探寻共同的合作解决之道。

同俄罗斯坦诚对话，拓宽合作

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着深厚曲折的历史渊源。俄罗斯是欧盟最大以及最重要的邻国，一个经济强大、政治民主的现代俄罗斯不仅符合德国而且符合欧盟的利益。我们愿将与俄罗斯的现代化的伙伴关系拓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从而促成俄罗斯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方面的进步。为此，我们将同俄罗斯的领导层坦诚讨论关于现代化进程中伙伴关系的不同观点。

我们欢迎并且支持不断拓展和深化双方政府和民间层面交往的各项努力。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圣彼得堡对话。此外我们也将同俄罗斯开展新型的社会层面对话，并将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同俄罗斯新兴中产阶级代表以及公民社会代表之间的双边联系。

俄罗斯应当恪守法治国家以及民主标准，同时，践行这些标准也是俄罗斯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同理，俄罗斯也应当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义务。

我们致力于进一步放宽对俄罗斯企业家、科研工作者、公民社会活动家以及大学生等人群的赴德签证规定。我们希望把德国对俄罗斯及东欧国家交往的能力（die Russland-und Osteuropa-Kompetenz in Deutschland）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为此，我们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科学分析评估。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欧盟范围内对俄政策的协调性。我们希望实现以下目标：一，同俄罗斯签署一份新的伙伴关系协定；二，拓展双方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合作；三，加强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领域内的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深化德国、波兰、俄罗斯间的三方对话机制具有关键性作用。在构建同俄罗斯的关系过程中，我们也将顾及德俄两国共同邻国的合理利益诉求。

欧洲范围内的安全以及有利于欧洲的外部安全环境只有同俄罗斯一道、而不是在彼此对立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为实现该目标，我们愿同俄罗斯一道首要推进双方在共同邻国的冲突管控，并且特别期望在德涅斯特河沿岸问题上（Transnistrienfrage）能够有所进展。

为裁减军备与军控增添新动力

裁减军备与军控政策是德国外交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控、裁减军备以及核不扩散政策切实为我们的和平、安全、稳定做出了贡献。我们赞成在全球范围普遍开展常规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裁减和军控。

我们同北约伙伴国一道在芝加哥峰会上拟定了共同目标，即为建设无核世界营造必要条件并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逐步削弱核武器的作用。但是，只要核武器在北约的战略理念中依然充当战略威慑工具，那么德国就有意参加相关的战略讨论和规划进程。

联邦政府将致力于促使美国与俄罗斯就在次战略（substrategisch）领域内进行完整且可检验的军备裁减的问题开展谈判，联邦政府同时也积极支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步骤。成功的军备裁减谈判将为撤离部署在德国以及欧洲的战术核武器创造前提。

与此同时，欧洲的常规武器裁减和军控进程需要新的政治推动力。我们将致力于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das KSE-Vertragswerk）之外，进一步推动欧洲军控机制的现代化，这一军控机制以具备可检验的透明性为基础。我们愿通过由德国搭建的观察平台进一步支持《开放天空协定》（das Open-Sky-Abkommen）的进程。

我们将致力于在国际层面上支持《联合国小型武器公约》（VN-Kleinwaffenabkommen）的全面落实，并推动该公约在国家层面落实为适当的管控机制。所有下列武器将

来都会被打上极难消除的特殊标记，包括目前在德国非政府领域交易的轻型、小型武器，用于出口的轻型、小型武器，被《联合国小型武器公约》收录的轻型、小型武器，此举旨在可以追踪武器的使用情况。此外我们也将大力推动《武器贸易条约》（ATT）的进一步落实。

德国还将支持关于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的区域性协定。依托共同的欧盟立场，我们将为2015年即将召开的核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最终成功做出贡献。

叙利亚国内发生的化学武器事件向我们清晰地表明：仍需付出巨大努力并通过新的动议来推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Ü）在全球范围内的落实。此外，必须严格控制尚未签署该公约的国家出口军民两用化学品及装置。

（鲁肖译）

联合国、全球对话和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国在维护和平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我们与欧洲伙伴达成新的动议，希望以此为联合国架构的创新和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与扩大。德国准备在联合国层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未来，我们将争取欧盟的常任理事国席位（ständigen Sitz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为履行维和任务，联合国需要用于维和政治使命的合适配置，以推行有效的多边和平政策。

为了获得在联合国领导层面的地位，我们正努力制定出有效的人员安排方案（Personalkonzept）。为此，我们将更加重视跨部门协调联合国政策。我们将强化波恩作为联合国驻地的地位。

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将有利于联合国在全球范围促进自由和人权的落实。“保护之

责”(Schutzverantwortung)的理念需要进一步建构,并能得到国际法意义上的合理贯彻。这首先要在国际上强化“保护之责”的预防性支柱(präventive Säule)。

联合政府承认妇女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中的关键作用。政府将与公民社会紧密协调,逐步落实针对联合国1325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

我们愿通过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在欧洲以外地区坚定地为安全与和平尽力。

2015年德国将再次成为G8峰会轮值主席国。此外,我们将继续积极与G20伙伴开展合作。我们将继续举办“国际德国论坛”(Internationale Deutschlandforum)。

中东和阿拉伯世界

我们相信,德国对犹太人的国家和民主国家——以色列及其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对我们而言,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安全是毋庸置疑的。2015年德以两国将庆祝建交50周年,联邦政府将给予这一纪念周年以恰当的赞誉。

德国和欧洲高度关注中东的和平与稳定。我们的目标是实行两国共存方案,以色列的边境应得到承认并获得持久的安全,巴勒斯坦应成为一个独立、民主、有生命力的国家,两国应携手生活在和平安全的环境中。

我们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转型,他们的转型正显现出迈向民主和社会多元化的积极发展趋势。我们愿继续发展已经开始的转型伙伴关系(Transformation Partnerschaften)。我们支持这些国家的决定性标准是:与反对派交往,提供基础性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权利,包括宗教自由权和新闻、媒体自由。宗教少数派必须可以自由从事与其信仰相关的活动而免受暴力侵害。不应存在针对阿登纳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判决和多年监禁的处罚。必须保证2013年1月德国与埃及声明的有效性。必须保证德国政治基金会能够在埃及自由开

展工作。

我们非常忧虑地看到,在独裁政府倒台后,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基督徒及其他宗教少数派、少数民族的境况日益恶化。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上述地区全力支持多元化社会的发展,保障和实现宗教自由。必须保证基督徒在这一地区享有未来。

德国将同伙伴国家一道积极参与寻找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出路。我们将同国际社会一道保持对叙利亚独裁政府的压力,要求其切实遵守已做出的承诺。我们非常忧虑地看到伊斯兰势力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愿帮助流亡在邻国的叙利亚难民和被驱逐者减轻痛苦,并支持叙利亚境内的慈善机构进行人道主义活动。我们将同联合国难民署一道,动员其他欧盟国家,形成关于接收叙利亚难民的欧洲共同动议。

我们要求伊朗消除外界对其核计划非和平性质的怀疑。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是地区和世界的危险,并严重损害全球裁军和防扩散的努力。为防止伊朗具备生产核武器能力这一危险,我们支持在英、法、德、美、俄、中(E3+3)谈判框架下的一切外交手段解决伊核问题的努力。我们坚持“双重政策”(“doppelter Ansatz”)。国际社会对伊朗既表达合作意愿,也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这一政策已使此前搁浅的谈判出现了松动。我们的目标是使伊朗重新成为国际舞台上值得信任的伙伴。

亚洲

我们愿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我们要利用美国外交政策重返亚太地区的机遇,使合作与利益平衡的政策也在该地区获得优先地位,而不是对抗。

对日友好关系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我们欢迎当前正在进行的欧盟—日本自贸区谈判。

由于拥有众多共同利益，中国是德国和欧盟的战略伙伴。我们也将定期举办政府间磋商的框架下强化与中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多方面合作。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对我们的网络安全的保护。中国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下，为解决国际争端做出与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相符的贡献。

印度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我们愿扩大与印度在政治、经济、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合作，为此我们要定期举办政府间磋商。我们支持欧盟与印度进行的自贸区谈判。

阿富汗

十多年后，德国在对阿富汗安全政策方面的努力将发生变化。通过跨部门参与，我们努力为阿富汗建设稳定的未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将于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军，在此之前应保持军事行动力，保证安全撤军。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应信任德国将履行承诺，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民事援助是我们在阿富汗行动的重点。我们也希望尽可能保护自己的民事力量。阿富汗的本地人曾为我们工作过，撤军后他们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我们应当接受他们及其家人来德国。

联合政府认为，在符合国际法、并在盟友参与的情况下，德国也应参与北约领导下的顾问团（Beratungsmission）。

非洲和拉丁美洲

非洲的意义日渐重要，我们更加重视其逐渐增长自我责任，愿扩大与非洲合作的可能性。德国着眼于帮助非洲国家自行解决地区问题。因此，我们将支持非洲强化该地区合作和跨地区合作的努力。我们寄希望于合作和伙伴式的交往，为此我们强化非洲伙伴国的制度，促进其私人产业的发展，强化良政在对非政策的中心地位。我们将继续支持在非洲联盟框架下建立安全机制的努力，

我们也将参与联合国和欧盟框架下的和平动议。

德国、欧盟与拉美之间强大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已获得长足增长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的基础之上，这种关系蕴含着共同价值观和利益。我们愿深化这些传统的共同点和联系。我们愿扩大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愿同拉美所有国家一道在应对紧迫的全球性挑战方面取得进展。我们愿抓住经济机遇，互惠互利，并为此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促进投资和贸易。

我们将为增强科学、研究、教育、文化的跨境网络式联系做出贡献。在这过程中，我们将特别关注与我们共享价值观的国家。

（徐帜译）

对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

对外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一直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第三根支柱。现有可供使用的手段应当用于促进文化间对话、广义的预防危机以及传介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文化交流和德国文化机构，如德国考古研究所、歌德学院、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以及德国的驻外学校和科学合作项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歌德学院是适应项目计划和语言工作的需要而建立的，并且同德国驻外学校一样一直是联邦政府国外活动的固定组成部分。

我们希望利用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在国外传递一个正面的、符合事实的德国形象，唤起外国对德国语言和文化的兴趣，同时宣传德国的经济区位、科技区位和创新区位。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国外传授和推进德语。我们将在中小学和大学领域扩大国际教育合作，强化行之有效的奖学金项目，在对外文教政策中考虑到国外对双轨制职业教育有着强烈兴趣，其中的一个措施是通过在德国驻外的公益性学校里提供

职业教育。

我们认为在对外文化和教育政策中，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支持伊斯兰世界中的温和力量实现民主和法治国家体制也符合我国利益。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太主义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特征之一。

欧洲也是一个文化项目。德国及其传介组织对于欧洲共同文化空间负有特殊责任。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大联合政府致力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产品的保护。联合政府会主动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das UNESCO-Übereinkommen zum Schutz des kulturellen Erbes unter Wasser)。

政治基金会

政治基金会对国际对话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提高了联邦德国的声望。我们在未来依然支持政治基金会并予以法律保障。在这方面，我们希望通过提供相应的资源以强化新的地区重点。

跨部门制定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

联合政府致力于加强旨在实现高效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的跨部门合作，其成功有赖于民事和军事手段的互补。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中我们应该进行网络式的思考和行动。在早期识别危机、危机预防、铲除源头和克服冲突的方案中，发展合作也是一个组成部分。利用民事手段预防危机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应该强化并继续发展其结构。

我们将在未来四年推动和扩大对和平与冲突的研究。现有的促进和研究和平的机构，如国际维和行动中心(das Zentrum für Internationale Friedenseinsätze)、民事维和事务中心(der Zivile Friedensdienst)、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die Bundesakademie für

Sicherheitspolitik)以及德国和平研究基金会(die Deutsche Stiftung Friedensforschung)经受住了考验，今后应当更多参加政策的咨询。

我们希望通过有针对性的举措鼓励德国官员、法官和检察官参与国外的行动。我们希望为参与维和使命的警察改善法律、组织和财政方面的条件。另外，联邦政府将在下一任期中与各联邦州协商出一个完成共同责任的联邦一州全面协议。

我们应该感谢和承认士兵、警察、外交官、发展援助者和建设援助者的付出。他们应该得到我们特别的关心。

(赵梦同译)

联邦国防军新定位

我们以一支极具作战能力的现代化军队承担强大的国防任务。联邦国防军作为民主环境中的军队，经受住了捍卫民主的考验。联邦国防军领导层及士兵的中心理想是成为身穿军装的公民，这将深刻影响联邦国防军的任务及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与自由的行动。联邦国防军是一支执行任务的军队。随着它的重新定位，它将瞄准21世纪不断变化的国际安全形势所提出的挑战。我们将坚持不懈地推进这一新定位并使之取得成功。

联邦国防军新定位的实施需要一个巨大的适应过程。军队官兵及其家人，都要求可测度性和规划的保障性(Berechenbarkeit und Planungssicherheit brauchen)。现有的中期财政规划便是此类可测度性和规划保障性的基础。从原则上讲，我们坚决遵守已出台的相关决策，这着重考虑到对军人、工作人员的保障。对这一新定位的评价将持续到2014年底，在此期间，我们将根据此框架内产生的修订意见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随后实施的各步骤中，我们将严格注意军队的经济性、运转能力、吸引力和驻扎的覆盖面(Präsenz in der Fläche)。联邦国防军

男女士兵的定员最多为 18.5 万，这不仅能够满足以任务和投入为导向、行动高效的联邦国防军的需求，也符合德国与其他欧洲伙伴国不同的角色。我们将根据任务分工来评估文职岗位。联邦国防军的规模将不会进一步缩减。

吸引力

使在联邦国防军服役始终具有吸引力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将不断推进并提升其吸引力的措施。我们将努力使兵役更有利于家庭的和谐，尤其是在照料军人子女方面的改善，我们将根据需求与当地的县市进行协商。考虑到军队驻地与军人家乡之间的高额往返费用，我们将尽力安排军人在距离家乡较近的部队服役。此外，我们将提供分居补贴（Trennungsgeld）和搬迁优惠（Umzugskostenvergütung）的条件，供服役军人选择。联邦国防军完成重新定位后，会有军事和文职人员共同服务的职位。我们也将为此对《士兵参与法》（Soldatenbeteiligungsgesetz）进行修订。我们将力图制定出这样的规章制度，它将军人职业的特殊性、保障军队的行动、兼顾家庭和职业等诸多方面要求协调统一起来。我们将拟定短期服役士兵退役后的社会福利保险方案，使其社会保障不受影响。大联合政府将取消对退役士兵在经济领域就业情况下的退役金补贴（Hinzuverdienst）限制。

立足社会

我们支持并促进对军人职业特殊性的理解，保障军队作为武装力量能受到的广泛认可。军人入伍时的庄严宣誓表达了联邦国防军植根于民主社会的根本性质。联合政府继续支持联邦国防军在社会中开展的及与社会进行的对话。我们将共同承担关爱老兵、伤残军人的责任，并开展悼念阵亡战士和死难

者的活动。青年军官在向社会传达联邦国防军任务信息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特别欢迎尽可能多的教育机构可以利用这一可能性。我们认为，联邦国防军理应深入中小学、大学、教育展会或类似的论坛。

新的志愿兵役制（der Freiwillige Wehrdienst）已被证实是可行的。但现行的志愿兵役制的服役时间将受到进一步检验并视情况予以调整。联合政府认可预备役在完成联邦国防军任务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预备役在联邦国防军和社会之间起到了很好的联系作用。地方的安保和支持性力量在军事和民事力量合作中得到适当的装备，以完成其任务。为提升预备役的吸引力，我们将研究养老保障等方面补偿条款的调整和简化。我们将有针对性地推进预备役及退役后职业发展的协调性。在这方面，公务领域要起到示范性作用。

准备迎接境外军事行动

未来仍会存在联邦国防军执行境外军事行动的需求。这一需求要求军队具备多样的军事能力。我们将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在欧盟框架内共同利用国家的军队力量（集中与共享计划 Pooling and Sharing），加强任务分工。这一举措也适用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行动（灵巧防御 Smart Defence）。军事合作的原因可归结为同盟国之间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以及框架国（Rahmennation）的整体构思，框架国是指一些国家结成互相支持的群体。我们同盟国共同加强军队薄弱的力量，提高军队的坚持能力（Durchhaltefähigkeit）。我们努力推进欧洲军事力量更加紧密地联合，使其发展成为受议会监管的欧洲军队。

联邦国防军今后依然是议会监管的军队。议会参与决策联邦国防军如何行动的做法已被证实可行。这成为联邦国防军植根于社会、在社会领域工作的基础。议会保留监管军队

的权利并非德国的劣势，而是优势。正因为我们需要与同盟伙伴国展开更多的合作和分工，我们要保证议会能够参与决定士兵的军事行动。同时，德国部队应更多地参与到欧盟和北约层面的一体化结构和指挥部中。为此，我们将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从事一年的考察活动，研究在联盟不断融合的道路上和任务分工专业化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议会的权利，并将以此为基础提出各类行动方案。

德国特种部队（KSK）的军事行动始终受到高度威胁，因此必须保密。我们以可靠的方式保证向议会汇报关于特种部队的军事行动。

军备、购置及利用

我们的部队需要尽可能质优的装备，其安全性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联邦国防军按需求而非按供给购置武器。国家购置的武器按照既定的价格和质量依照合同准时收到供货。国家与工业的合同关系必须清晰明了。最近购置大型装备的经验表明，对于项目的追踪和监管应在各个层面上得到改善。随着联邦国防军的新定位，军购程序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必须坚决得到贯彻。德国议会国防和预算委员会将改进研发及购置军事器材和材料的信息情况。

德国十分关注自主、高效且具有竞争力的安全和军事工业的建设。我们要努力保护核心技术和工业的能力，这尤其适用于中小企业。我们坚持贯彻在欧洲及欧洲大西洋（euroatlantisch）国家的军备合作，在各国执行军事装备及购置计划的相同标准。对此，欧洲防务局（Europäische Verteidigungsagentur）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统一军事装备的认证和许可标准，是改进欧盟内和北约框架下军事合作的前提，这尤其适用于航空军事装备。德国在这一领域走在前面，成为一个范例：从2014年初开

始，德国将建设一个统一的军事航空管理局（militärische Luftfahrtbehörde）。

在联邦国防军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无人机的投入对侦查活动和保护士兵起到了重要作用。德国联邦国防军将继续使用这一手段。联合政府将推动欧洲继续开发无人机技术，并继续倡议欧洲尽快制定无人机在欧洲航空领域的准入与参与的统一标准。

我们坚决反对非法的和违反国际法的杀戮与武力威胁。德国主张将武装无人机纳入国际裁军及军控机制，并主张依照国际法消除全自动武器系统，该系统使人类无法决定如何使用武器。

在决定购置质量更新的武器系统之前，尤其是在使用兼具侦查和其他战斗能力的最新几代无人机的问题上，我们将细致考虑一切与此相关的国际法、宪法、安全政策和伦理问题。

（梅霖译）

保护国家对武力的垄断

在国际对外军事行动中，越来越多的军事任务分包给私有企业，我们是不认可这一做法的。联邦议会委任联邦国防军在国外参加军事行动，包括在必要时使用军事手段。军事任务是不能委托给私有企业的。

联邦政府将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中努力在欧安组织关于政治军事安全方面的行为代码框架内，将私有军事安全企业纳入到各国的汇报内容中。

保护与促进人权

人权具有普遍有效性，不可分割看待。我们致力于保护并促进国内及外交关系中的人权。侵犯人权的行为不但会侵害受侵犯者的尊严，而且会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力求坚定不移地奉行前后一致的人权政策，将基本法、欧洲与国际人权公约（die

europäischen und international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en) 以及国际人道法 (das humanitäre Völkerrecht) 作为行动基准。同时我们支持欧盟人权政策新战略。

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在全世界废除死刑及刑讯逼供。我们同各国共同支持德国国家反酷刑局 (Nationale Anti-Folter-Stelle) 的各项工作。

妇女和儿童的人权尤其受到威胁。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人口贩卖、奴役、器官贩卖、强迫卖淫、逼婚、割礼以及任何打着“名誉”旗号的侵犯人权行径。我们要提高使儿童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的机会，他们需要食物、教育和医疗，我们支持一切反对滥用儿童充当童工、性奴以及童兵的努力。

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并视其为一项基本人权，其中包括无信仰的自由和变更信仰的自由。我们尤为关注团结弱势的和受到压制的宗教少数派的问题。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基督徒因其信仰而被压迫、迫害甚至驱逐。而伴随宗教冲突的往往还有社会和经济局势的紧张。

我们在国际上倡导新闻和言论自由，并视其为西方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根基。我们支持、保护勇敢的人权捍卫者，并促进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公民社会的各种力量。

我们谴责对同性恋的歧视，推动建立一个宽容且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

我们尽力敦促联合国在世界范围内禁止驱逐难民，扩大世界难民日的影响，以纪念在驱逐中的受害者。世界上的大多数难民是在其国家境内流离失所的，因此，我们要推动传播并落实联合国关于境内难民的准则，以使它们得到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主张更加注重人权保护事业，加强联合国保障人权手段。我们希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令人信服地处理有关侵犯人权的行径。我们大力支持国际刑事法庭 (IStGH) 的

工作，拥护其作为独立的国际刑法机构的地位。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削弱欧洲人权法院的行为。联邦政府将积极参与修订国际人道法的工作。

我们敦促跨国公司遵守社会、环境和人权的运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公司与福利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 (ILO-Erklärung über multinationale Unternehmen und Sozialpoliti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准则》和《联合国有关经济和人权的指导原则》(UN-Leitprinzipien über Wirtschaft und Menschenrechte) 为此设定了框架，我们将把联合国的指导原则落实在国家层面。

德国人权研究所应根据“巴黎原则”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道主义援助

鉴于人道主义援助日益重要，我们今后将加大对它的关注力度，强化国际人道主义的原则，这主要通过贯彻实施欧洲“人道主义援助共识”来实现。我们将在欧盟层面致力于保持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独立性，将人道主义援助送至最需要的地方，关注已淡出公众视线的、生活在危机地区的民众。

为防自然灾害，我们将高度重视早期预警系统、灾害预防、减少灾害风险等方面，努力在国际层面上找到解决全球气候难民这一日趋严重问题的办法。

经济合作与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发展政策的目标是，以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和贫困，切实加强民主和国家法制化。我们致力于维护和平、自由与安全，尊重并实现政治和社会性的人权以及保护生物界。我们倡导建立以社会和生态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系，倡导良政和公民社会的参与。我们的发展政策是以他助促自助。在我们看来，

发展政策亦是全球结构政策，我们希望实现可持续的、人人平等的全球化发展。发展政策是预防性政策，同时也是前瞻的和平政策。我们以千年发展目标为导向，并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框架下的持续发展。

建构框架条件

我们致力于保护全球公共商品，打造公平的世界贸易环境。因此，我们力求以发展导向为出发点，结束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回合，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公正的利益平衡，这也针对全球的农产品贸易。我们力求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条件。我们主张制定出具有约束力的、被国际认可且符合人权、生态和社会标准的最低准则，如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劳工标准（Kernarbeitsnormen）。同时我们也主张将这些标准纳入所有欧盟贸易协定。

我们要在2015年后推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该目标旨在创造高效、包容性、资源节约型及低碳型增长。我们希望发挥积极作用，使千年发展目标向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继续前进。

发展政策应在G8和G20峰会上作为特别议程得到处理，我们将关注峰会上有关发展政策的承诺更快地得以落实。

我们将以效率为主旨，继续推进德国发展合作机构工作的改善，加强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与德国复兴银行的合作，改善以发展为导向的跨机构协作。对于我们向多边发展机构缴纳的会费以我们对其进行评估的有效程度和行动能力为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将依据双边与多边手段的相对优势，对其加以灵活运用。在有效、透明地监管资金等框架条件得以保证的情况下，预算支持（Budgethilfe）可作为提升自我责任的一种手段。

可持续融资

我们坚持将国民生产总值的0.7%用于提

供官方发展援助这一目标，并通过每年增加联邦预算内的发展合作资金来逐步达到这一目标，继续引领德国走向“0.7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0.7-ODA-Ziel）的融资道路。

德国履行在国际上的承诺，是全球范围内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将与国际伙伴一道，借助科学的支持，为继续推行官方发展援助献计献策。同时我们也要确保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得到恰当利用，我们严格履行在哥本哈根承诺的义务，与此相关的支出应在国内各部门间公平分配。

重点议题

在发展合作基本方向的框架内，我们尤其鼓励农村的发展。我们反对投机粮食等不负责任的行为，提倡落实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自愿准则，以确保负责地利用土地。我们认为，全世界范围的努力对世界粮食安全以及获取粮食的权利至关重要。因此，联邦政府将作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在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挥专业性的作用。

健康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此，全球基金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就反映在联邦政府的政策当中。为更好应对健康风险，我们要帮助建立起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包括行之有效和公平的税收体系。

我们要实现男女平等，将保障妇女和女童权益切实贯穿到德国发展合作的各个领域。

教育是推动面向未来发展的关键。我们要为成年男性、女性和男女青少年创造同样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机会。另外，我们应更多地将残障人士纳入发展合作援助对象中，并系统地构建这一援助工作。

我们将继续专注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保护气候的措施，包括高效、可再生的能源供应，保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后果方面必要的支持。

我们大力倡导以民事手段防范危机、以非暴力手段解决冲突以及采取冲突善后措施。

重点区域与合作伙伴

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消除饥饿与贫困，我们将继续加强援助最贫穷国家，重点关注脆弱国家（fragile Staaten）。

倘若在合作进程中，受助国政府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抵触，那么，我们的援助将只有在能够促使受助国做出改变，或者出于必要的人道主义、服务于和平与安全目的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施行。

在与新兴国家的双边政府合作中必须考虑到其较高的行动能力和业已增长的国际责任。新兴国家应能够独立承担实现其民众享有食物、健康和教育等人权的责任。我们专注于保护全球公共商品，寻求资源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酌情开展有益于贫穷的

发展中国家的三边合作。重中之重是要推动这些国家建立公民社会以及开展公民社会的合作。

我们的发展合作积极支持地中海南部和东部以及东部伙伴关系成员国的转型。这些地区同撒哈拉以南非洲都是我们发展政策的特别关注点。

联邦政府鼓励公民社会中的各种努力，增强教会、非政府组织、政治和私人基金会、经济界以及地方政府的责任。这不仅适用于我国，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伙伴关系国。我们要加强商会、协会以及职业教育部门间紧密的伙伴关系。我们要加强发展政策方面的教育，支持贸易公平。只要有益于社会、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我们将同德国经济界合作，在政府与私人经济持衡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壮大。

（李冰溪译）

译者简介：陈思、桂榕璟、李珍、徐曼语、鲁肖、徐帆、赵梦同、梅霖、李冰溪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硕士研究生。

- **经济视野**

德国的企业兼并与中企兼并德企^①

殷桐生

【摘要】企业并购在西方工业化初期就已经出现，先后已经历了五次企业并购浪潮。^②而最后一次并购浪潮则越出了美国的藩篱，席卷了欧美各国，德国自然也在其中。欧债危机爆发后，德国同样受到牵连，2012年至2013年增长速度放慢，市场信心缺失，投资大幅下降，急需增长的刺激。相比中国经济，虽也放慢了增长速度，但仍然保持着稳中有进的态势，对外经济突出的问题是三压力和两过剩。三压力是指：出口压力，外汇储备风险压力和通胀压力；两过剩则是指：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强我国对德投资，加强中企对德企的并购，加强中德之间的经贸合作就成了发展之必然。

【关键词】企业兼并 中企 德企

企业并购在西方工业化初期就已经出现。19世纪末开始。并购日益加剧，先后已经历了五次企业浪潮。

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主要特点是以横向并购为主，突出表现为，有竞争关系、经济部门相同或产品相同的同行业之间的并购。

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15年至1930年之间。其特点是以纵向并购为主，突出表现为，在生产和经营方面互为上下游企业间的并购，大企业并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之间的并购也在同时进行。

第三次并购浪潮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之间，6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其特点是以混合并购为主，突出表现为，大垄断公司之间互相并购，出现了一批跨行业、跨部门的巨型企业。

第四次并购浪潮发生于1975—1992年间。其特点是并购后形成的产业规模达到了空前巨大的程度，并购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第五次并购浪潮始于1994年，世纪之交达到高潮。

前四次并购浪潮主要集中在美国，第五次并购浪潮则席卷了欧美各国。

① 本论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13XG003）。

② Siehe Wikipedia: Mergers & Acquisitions, am 17.01.2014.

一、并购形式

当今国际并购按行业来分主要有横向并购、纵向并购及混合并购三种；按支付方式来分，主要有现金交易与换股交易；按并购双方的意愿不同，又分成善意并购和敌意并购。

1. 横向并购

横向并购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领域相同或生产同质产品的同行业之间的并购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横向一体化，如奔驰公司并购克莱斯勒公司。横向并购可以迅速实现规模经济和提高行业市场集中度，扩大企业的市场地位。横向并购对行业发展影响最直接，因而在并购中发展得也尤为迅速。

2. 纵向并购

纵向并购是发生在同一产业的上下游之间的并购。纵向并购的企业之间不是直接的竞争关系，而是供应商和需求商之间的关系。因此，纵向并购也就是纵向一体化。实质是处于生产同一产品、但属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间的并购，并购双方彼此熟悉，因而有利于并购后的相互融合。纵向并购中相关行业的原料成本对行业效益有很大影响，因而有利于强化企业。

3. 混合并购

混合并购是发生在不同行业企业之间的并购。从理论上讲，混合并购的基本目的在于分散风险，寻求范围经济，为企业进入其他行业提供方便。混合并购主要发生在实力较强、效益较好的企业中，因此混合并购又称多元化并购。一般包括：1. 产品扩张型并购，这是指相关生产企业之间的并购，这有

利于拓宽企业的生产线；2. 地域扩张型并购，是指在不重叠地理区域上企业之间的并购，旨在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3. 纯混合并购，是指没有任何生产或经营联系的企业之间的并购。

4. 现金交易并购与换股交易并购

按照并购的支付方式分类，并购又可分为现金交易与换股交易。1990年以前，采用现金交易方式的跨国并购项目数和金额均在3/4以上，换股交易只占1/4。到1998年前者已降为1/3，后者则提高到2/3以上。在戴姆勒—奔驰公司并购克莱斯勒公司交易中，克莱斯勒公司的普通股股东以1:0.62的比例换取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新普通股；而戴姆勒—奔驰公司的股东以1:1的比例换取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新普通股。交易完成后，戴姆勒—奔驰股东拥有新公司57%的股份。

5. 善意收购与敌意收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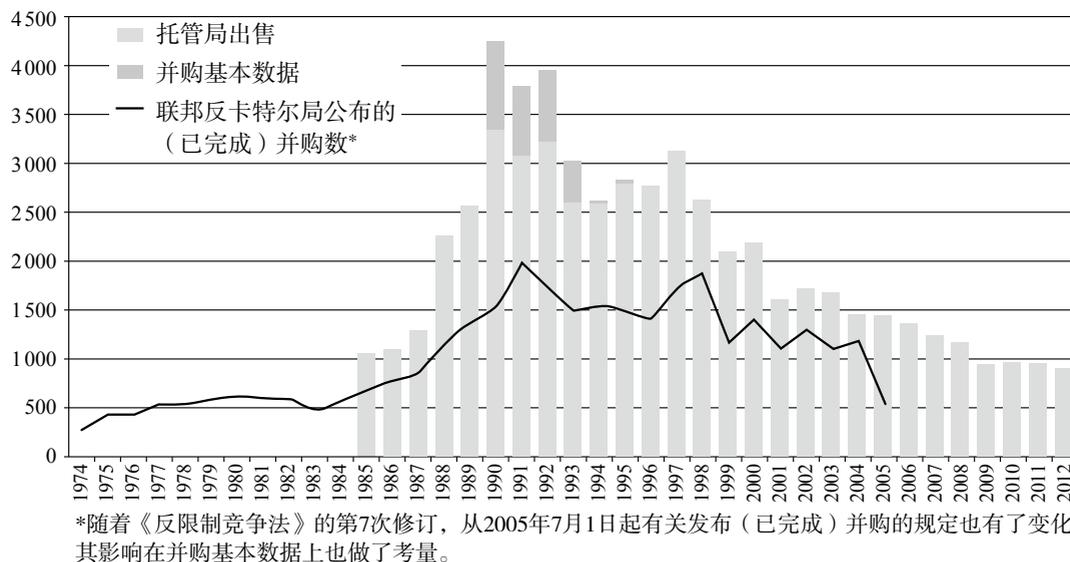
按照并购双方的意愿不同，并购分成善意并购和敌意并购两种。善意并购是指并购方开出合理的并购价格与目标公司股东和经营者协商并购条件，在征得其理解与配合之后进行的并购；敌意并购是指并购方在事先未取得目标公司股东或经营者的同意或配合的情况下，不顾被收购方的意愿而强行收购目标企业，夺取其控制权。

二、德国的企业并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企业并购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即1974年开始，以美国企业为主的大量外资并购德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③；第二阶段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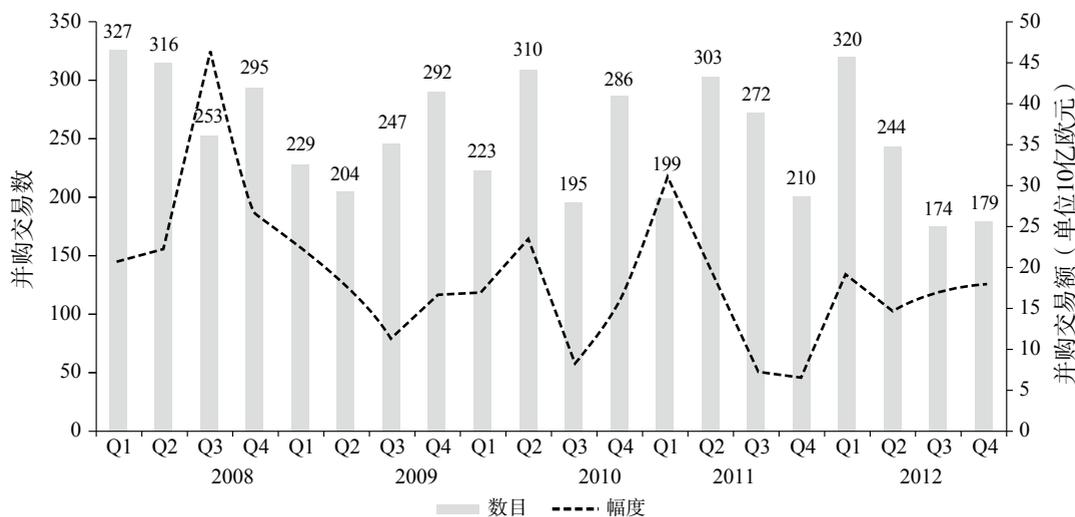
③ 邓果宇：《德国企业并购的做法和经验》，载《冶金管理》，2009年，第11期。

1974 年来德国企业并购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M&A DATABASE, Universität St. Gallen

2008—2012 年德国并购交易的概况



资料来源：M&A DATABASE, Universität St. Gallen

(1985 年并有了官方的统计数字)，随着德国经济的发展，被并购企业数量达到 8000 个；第三阶段是德国统一后，直至上个世纪 90 年

代末，企业并购大幅上升，连同托管局出售的数字总数超过了 3 万个；第四阶段是进入新世纪，德国企业并购明显下降。2008 年后，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发展并购更是一路走低。2013年随着欧债危机逐步走出低谷，德国企业的并购再次上升。据托马斯·路透数据公司统计，2013年世界企业的并购金额为16.4万亿美元，德国为918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6%。

与世界企业并购相比，德国的企业并购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其特性主要表现在：1. 在德国企业并购中横向并购、换股交易并购和善意收购占主要地位；2. 德国企业的并购主要

突出企业发展的战略定位，把无关联业务剥离出去，并购同类业务企业，突出主业，使企业生产经营范围更加集中；3. 追求强强联合，寻求规模效应；4. 主动寻求并购居多。

并购统计一般分为并购交易数目统计和并购交易金额统计两种。从上图看，2008年德国并购事件为1191起，2009年降为972起，2010年上升为1014起，2011年又回落至975起，2012年更进一步下降至917起。

2013年12月* 德企参股的10大并购事件（按交易金额排序）

日期	目标公司	收购公司	交易额（千欧元）	并购类型
12月9日	德 OXEA GMBH	安曼 OMAN OIL COMPANY SAOC	1 800 000**	100%
12月5日	克罗地亚 HRVATSKI TELEKOM	德 T-MOBILE GLOBAL HOLDING NR.2 GMBH	948 540.65**	51%
12月3日	德 THYSSENKRUPP AG	德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882 349.00	9.091%
12月2日	德 BERLINER WASSERBETRIEBE	BERLIN STATE	590 000.00	从75.5%股份增至100%
12月23日	德 P&I PERSONAL & INFORMATIK AG	德 KALLISTO NEUNZIGSTE VERMÖGENSVERWALTUNGSGMBH	353 623.00	机构购股91.85%
12月9日	德 HOCHTIEF AG	HOCHTIEF AG	255 545.00**	回购股份5.601%
12月27日	智利 LABORATORIOS ANDRÓMACO SA	德 GRÜNENTHAL GMBH	210 119.27**	81.5%
12月3日	德 LABCO SA'S GERMAN LABORATORY BUSINESS	德 SONIC HEALTHCARE LTD	76 000.00	100%

(续表)

日期	目标公司	收购公司	交易额(千欧元)	并购类型
12月2日	德、美 MULTITEST GMBH EVERETT CHARLES TECHNOLOGIES INC.	美 LTX-CREDENCE CORPORATION	68 807.06	
12月2日	德 INDUS HOLDING AG	德 BAYERISCHE VERSICHERUNGSKAMMER INVESTORS	60 082.00	9.091%

资料来源：Datenbank Zephyr, Bureau van Dijk

* 以交易签约为准。

** 交易额已宣布，但尚未得到参与方的确认。

三、德国企业并购的基本流程

德国并购一般分为准备阶段、谈判阶段、签约成交阶段和实施阶段，其具体流程为：

1. 准备阶段

企业要明确为何要进行并购以及通过并购想达到的目的。企业并购的动机一般都为内部战略驱动，要扩大市场份额、排挤竞争对手、提高利润率、分散投资风险、获得品牌等。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要考虑获得现有销售渠道、先进管理技术和经验，规避反倾销和配额限制等贸易壁垒；要制定并购战略：选定目标公司的行业及其产品、获得其规模、营业额和税前利润的数据，分析其产品市场及产业发展的前景，初步核算出并购成本，拟定并购方案；成立内部并购小组，由公司领导及各有关部门领导组成，以保证快速应变、决策及对外联络的畅通；选择并购投资总顾问，一般都选择知名的会计咨询

公司或律师事务所来担任并购投资总顾问，如系大型跨国并购，则需聘请投资银行来担任并购总顾问。

2. 谈判阶段

寻找目标公司。一般需与并购总顾问签约，委托其在规定的期限内寻找目标企业，接着与并购总顾问讨论初选名单，从中选出3至5家较为理想的目标公司；并购总顾问出面了解目标公司的股东背景、股权分配和董事会意向等情况，并向股东发出正式的洽谈邀请；聘请税务、审计顾问和律师参与目标公司的谈判；签订并购意向书；对目标公司进行资产评估与财务审查，摸清目标公司的负债结构与偿还能力、盈利来源与前景等情况，以降低并购风险；选择合理的并购方式。多数德国企业采用横向并购、股权并购和善意并购的方式。绝大部分德企都采取吸收合并方式，如并购的双方处于均势的情况下，则采用新设合并；全面分析财务风险、

技术风险、产品风险、法律风险等并购风险，制定风险应对预案，使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3. 签约成交阶段

买卖双方就并购合同达成一致后，即可安排合同的签署时间和地点等细节。并购有限责任公司的合同文本需经德国公证机关公证。并购合同应对资产移交手续有明确的规定。并购方一般先将合同款项汇入公证师的账下，待全部资产和文件清点和核准无误后，方通知公证师付款，同时将资产转移到并购方名下。按德国法律规定，资产只有经过正式的移交才能变换所有人并结束并购流程。

4. 实施阶段

实施阶段要全面检验前三个阶段的工作，特别要注意企业的整合工作，包括战略整合、管理整合、企业文化整合等。在德企并购活动中，对整合工作的主要要求是：1) 争取在5—10年之内，并购双方形成统一的企业文化；2) 被并购方的产品、市场营销网络、供货商、客户能得到收购方的重视，不能在短期内做出较为重大的变动；3) 被并购方的管理人员要保持工作的平稳性和连续性，至少要有过一年的过渡期；4) 中层管理人员在一年以后才能调换、提拔。

四、德国企业并购的特点

1. 承认并购的合理性，但反对滥用

并购有很大的好处但也有风险，因此各国都十分谨慎。德国的方针是，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上都不禁止企业的兼并，而是分清利弊，禁止企业滥用。

并购的有利之处：进入国外（西方）市场、获得技术、知识、品牌、提高产量、降

低成本、降低价格、提高工资；有利开展科研，引进新工艺，开展革新；减少因景气下滑而解雇雇员的风险；实现增产、开展培训和进修，更好更快地提高产量；增加产品的品种，获得信贷和补贴，保持并提高在国内的市场地位。

并购的不利之处：会加强垄断，形成倾销物价，消灭竞争者，丧失就业岗位；大企业会向依附于自己的供货商提出苛刻的条件，顾客也难以成为竞争者；会高估融合效应，错误判断形势，减少盈利；并购费用不足，出现破产威胁；企业文化差异影响合作；联邦反卡特尔局要求过高过严，给企业带来损失。

2. 规定了许多例外、补充条款

德国出于种种考虑在并购中规定了许多例外和补充条款，还规定了部长可以特批的各类条款。

1) 合法卡特尔

德国认为部分卡特尔虽有限制竞争作用，但对市场不一定产生明显影响，相反可能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社会效益远远超过对竞争的阻碍，因而明确规定了许多例外条款，允许一些卡特尔合法存在。

2) 特殊条款

如果中小企业联合起来应对大企业的竞争，或是为了节省费用将单个企业标准化并统一价格口径，但并不排除或限制竞争，此时均可应用特殊条款，而不受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约。

某些部门，如能源、农业、交通不属竞争部门，在那里可以继续实行兼并。

国内市场因进口少而难以对现有供应商形成实际的竞争压力，或市场不透明，影响市场的准入时，可采用部门和地区补充条款，

同意实施兼并。

之所以设立例外、特殊和补充条款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和部门如果实施竞争将会出现市场失灵，统一价格口径可以改善市场的经营，通过限制竞争自由可以改善市场的供销，特别是在涉及公共商品和有益商品的情况下。

3) 部长兼并

如整体经济收益大于竞争限制，大众利益的优先地位得到保障，或兼并并未破坏市场经济制度时，虽已被反卡特局确认为兼并而联邦经济部长仍可以允许其兼并，这被称为“部长兼并”。

4) 腐败兼并

通过行贿、腐败和裙带关系达到的兼并，一经查出立即取缔。

五、欧债危机给中企提供了利好的并购机遇

2010年爆发的欧债危机严酷地冲击了欧盟，也影响了德国的经济。如今，欧债危机虽已走出低谷，但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即便是德国经济从2012年至2013年也降低了增长的速度，市场信心缺失，投资大幅度下降，但急需增长的刺激。相比中国经济，虽也放慢了增长速度，但仍然保持着稳中有进的态势。突出的问题是三压力和两过剩。三压力是指：出口压力，外汇储备风险压力和通胀压力；两过剩则是指：产能过剩和流动性过剩。直接投资，特别是并购外国企业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举措，它可以替代出

口，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原产地多元化，替代中国的出口；可以获取先进技术，输出边际产业，优化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利用人民币的增值形势，因为本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值则有利于对外投资；缓解流动性过剩，缓解外汇储备风险和通胀压力；发挥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积极性；充分利用外企、外资，扩大劳务出口，使中企从向国外“输血”过渡到在国外“造血”。因此中企对外企（包括德企）的并购便有了迅猛的发展。^④

据外媒报道，2013年中国企业并购案例数量为1232起，同比增长24.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额增长30%，达到384.95亿美元，连续第3年创造历史纪录。其中，中海油以151亿美元价格收购加拿大石油企业尼克森，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则收购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肉供应商史密斯菲尔德。^⑤

2013年1月23日，德国发表了格特·布吕歇尔博士和贝恩德·费诺尔博士这两位企业咨询专家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间中企共收购了59家德企。

2002年9月，TCL以820万欧元收购德国施耐德电子公司，连同“施耐德”和“DUAL”两个世界知名品牌及其产品分销渠道，成为欧洲高端彩电主要生产商；2004年，大连机床集团收购德国兹默曼公司，沈阳机床集团并购世界顶级重大型数控机床设备企业德国希斯公司。2005年，哈尔滨量具刀具集团收购德国凯狮公司，沙钢集团收购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旗下的多特蒙特钢厂。2011年6月1日联想以3.4亿美元收购了德国电子厂商梅迪昂36.66%的股份。2012年3月，凌云集团收购了全球最大的车锁制造商德国凯毅德公

④ 殷桐生：《欧债危机与中国的对欧直接投资》，载《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第1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6月。

⑤（作者不详）：《2013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现新跨越》，中国行业研究网 <http://www.chinairm.com>，2014年2月11日。

司 100% 的股权。7 月，徐工集团收购了德国混凝土巨头施维英公司。8 月，三一重工出资 3.6 亿欧元买下德国工程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9 月，山东潍柴动力花费 7.38 亿欧元收购凯傲集团 25% 的股份，以及凯傲下属林德液压业务 70% 的股份，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制造业同德国企业的最大一起合作案例。2012 年 10 月 12 日，国内工程机械巨头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国机集团）向德国 MAG Group 提交收购要约。

六、三一重工并购普茨迈斯特带给我们的启示

2012 年 1 月 21 日，三一重工联手中信产业基金共同收购世界混凝土机械第一品牌——德国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控股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收购价格总额为 4.5 亿欧元，即 26.54 亿人民币。上演了一场“龙吞象”的活剧。

普茨迈斯特成立于 1958 年，在业内素有“大象”之美称，曾蝉联全球混凝土机械销量冠军 20 年。三一重工 1989 年进入混凝土机械行业，发展迅速，2010—2011 年排名世界第九，年营业额 500 亿元人民币，利润 100 亿元。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爆发后，普茨迈斯特也陷入运转危机，债务增长，流动性不足，不得不考虑出售，而且出售价格从欧债危机前的 10 亿欧元降到 4.5 亿欧元。

当时参与投标“大象”的共有五家，其中包括世界工程机械排名第一的美国卡特彼勒集团和中联重科这些工程机械制造巨头。最终三一重工中标，这是十分耐人深思的。

1. 要正确估计欧债危机对中企并购德企的影响

欧债危机给我国企业扩大对欧、对德投资和并购创造了很大的利好条件，引起了中企的很大的兴趣，目前已有 37.40% 的中企表示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和并购活动。剩下的企业对欧债危机还是有所担心。但我们也要提醒中企，在并购中要小心谨慎，不要被资产低价所诱惑而盲目并购。

2. 要进一步认清大型并购的重要意义

从三一重工并购德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大型并购的重要意义：（1）能快速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加快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此次并购后，三一重工就一步站到了行业之巅，至少使其国际化进程缩短 5 年至 10 年。（2）可获得研发与技术上的新突破，降低成本。三一重工将全部拥有普茨迈斯特的技术、专利；普茨迈斯特将拥有三一重工的营销体系，并从三一重工全球化采购链条上降低生产成本。（3）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市场份额互补。三一重工总销售额占中国内地的 90%，国际占 10%。而“大象”销售额在其本国占 10%，国际占 90%。三一重工与“大象”的销售网络互补，收购后在中国与国际的市场份额均名列前茅。（4）享有遍布全球的生产基地、销售体系、老顾客群和服务网络。（5）减少强有力的竞争对手。（6）有利于开拓新兴市场。显然，此次并购，有望实现“龙象共舞”的局面。

三一收购德国“大象”预示着中国大型企业走向德国、走向欧洲的新阶段。潍柴动力宣布，将投资 7.38 亿欧元于全球第二大工业叉车制造商凯傲集团及其液压业务。^⑥ 德国

⑥ 摘自 2012 年 9 月 1 日《东方早报》登载的《中德总理与企业家座谈，温家宝表示：“一个民族靠模仿抄袭是没有前途的”》。

机械制造商施维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凯毅德和太阳能企业森韦斯等也被中方收购。此外，山东重工获得全球豪华游艇巨头意大利法拉帝集团 75% 的控股权，广西柳工并购东欧最大的波兰工程机械企业 HSW 的工程机械事业部，国家电网收购葡萄牙电力 21.35% 股份，长江三峡集团入股葡萄牙电力等等。

3. 投资企业要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

三一重工实力雄厚，其年销售额是普茨迈斯特的好几倍。此次收购价格还包括“大象”的一系列债务。如果三一重工不是拿出高于其他竞争对手很多的收购价格，“大象”是不会临时取消招投标会的。

三一重工工业做足了准备，并充满信心。其总裁表示，当时“三一重工董事会认为，即使 200 亿我们也要拿下普茨迈斯特”。

三一重工也有强劲的技术实力，它拥有世界上最长的 86 米臂架泵车，世界第一台全液压平地机，世界最大吨位挖掘机，并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因此收购普茨迈斯特，也被称为“龙吞象”。

4. 并购双方要互补性强

普茨迈斯特跟三一重工在业务上基本是不重叠的。被收购后，普茨迈斯特作为独立品牌会继续保留，专做高端品牌。

5. 要获得准确的信息

三一重工摸准了普茨迈斯特要出售的真正原因：一是欧债危机，企业经营乏力，前景堪忧；二是近年来三一重工等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创新能力整体提高，挤压了“大象”等大企业的利润空间；三是该公司创始人施莱西特的子女对继承产业兴趣不大。

6. 要采用先进的并购方法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率达 40%，高于世界的 25%，中资企业海外并购 80% 盈利。但问题也不少，如 TCL 收购法国汤姆逊、联想收购 IBM 全球 PC 业务等都不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购的手法笨拙”。三一重工汲取了这些教训，采用了先进的并购方法：

发达国家市场的传统产业往往产能过剩，如果我国企业建新厂，吸纳当地企业人才，很容易与当地企业和政府发生冲突，于是三一重工采用了并购的方式。

联手中信产业基金，实施产业资本加私募股权投资 PE 的做法。PE 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一般都具有比较专业的跨国收购知识、丰富的国际并购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并能和企业共担风险。产业资本与 PE 联手收购，有可能将成为未来跨境收购的主流。

充分发挥被并购企业，特别是其领导的积极性。三一重工董事会提名普茨迈斯特 CEO 肖毅为三一重工董事，并委托他继续领导普茨迈斯特的发展。同时肖毅及其德国团队将负责完成对中国以外全球混凝土机械业务的整合并与三一重工共同发展中国市场。三一重工交给肖毅的任务为 2012 年实现 7 亿欧元销售额，2016 年要达到 20 亿欧元销售额，也就是普茨迈斯特历史最好业绩的两倍。

7. 要保证不削减就业岗位

在收购案消息爆出之后，普茨迈斯特数百名员工到公司总部门前抗议，强烈要求不得解雇职工。中方当即做出保证，从而排除了兼并中的一大障碍。当前德国经济也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保就业”仍然是关键。

8. 要斟酌投资的背景

早在 2011 年 12 月之前中联重科已经拿到了发改委批准其并购普茨迈斯特的批文。

根据有关法规规定，为避免中国企业海外恶性竞争，同一行业的国内企业针对同一家海外公司并购时，仅一家公司能获得发改委的批文。中联重科本以为这是它的最大优势，没想到，适得其反。据肖毅透露，恰恰是因为这一背景，中联重科落选了。但这不能作为普遍规律适用，有的企业却是更看重政府背景。

9. 风险仍在

欧债危机背景下，并购欧洲和德国企业既有利，也有弊。况且中国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与欧洲与德国差别巨大，企业在进行并购决策时要多方衡量。目前虽然面临欧元汇率走低的有利局面，但也要看到人民币上行，中企不能不考虑汇率反向波动的风险。而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人们，并购容易整合难，两家企业的后续文化融合仍让人担心。

应该说，中企并购德企还刚刚开始，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并购企业的面过于狭窄，

而且大多为经营不善、甚至破产企业，并购手法也比较简单、“笨拙”。德企，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中企的并购还忧心忡忡。对此，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改进，但我们也必须说，中企并购德企开局良好，意义重大。三一重工在完成对普茨迈斯特收购之时，其副总裁何真临坦言，德国有着历史悠久的制造业传统，“德国制造”这种底蕴是长期积累形成的。而中国工程机械制造水平的提升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其核心是人，这不是简单地拿到图纸，按部就班就能做到的。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要实现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恐怕不单单靠几个并购案例就能实现，归根结底还需要引进并建立自己完整的研发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实现再创新，建立世界水平的加工体系、产品质量检测控制体系和产品试验基地，确保产品的制造加工质量水平，推陈出新，彻底转变旧思路，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创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之路。^⑦

作者简介：殷桐生，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⑦（作者不详）：《中国机械制造巨头闯荡德国市场》，载中国行业研究网，2012年4月24日。

对奥地利经济特色的看法

卢永华

【摘要】奥地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从欧洲地区的一个落伍者转变成成为领先者。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2012年奥地利仅次于卢森堡和荷兰，已位居欧盟前三位，在全球排名第11位。2008—2009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接着欧洲与欧元区发生债务危机。但奥地利仍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高于其欧盟伙伴。奥地利的经济之所以能如此发展是因为它具有自己的特点。本文特对此作一番剖析。

【关键词】奥地利经济 旅游业 中奥双边经贸关系

中国百姓对奥地利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奥地利是闻名遐迩的“音乐之乡”，是风景优美的“人间天堂”。这些印象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奥地利却还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奥地利地处欧洲中部，是欧盟成员国之一，面积8.38万平方公里，人口844万，首都维也纳人口约173万，下设9个州。奥地利环境优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仅孕育了诸如海顿、莫扎特、舒伯特、施特劳斯等伟大的音乐大师，更有多位奥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奥地利经济发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欧盟成员国前列，失业率亦为欧盟最低。奥地利经济在世界经济不甚景气的大环境下运行平稳，表现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奥地利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发

展可再生能源和环保技术，其绿色产业尤其引人注目。奥地利被称为“欧洲的心脏”，是中东欧交往的重要枢纽和桥梁，拥有现代化的电信和交通基础设施，是中东欧地区货物与资讯流通的重要枢纽。奥地利企业具有与中东欧国家企业开展商业合作的成熟经验。

一、奥地利经济的历史沿革

众所周知，奥地利在其近代历史上经历了两次重大的领土变迁，一次是19世纪作为普奥战争的结果，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使当年疆域浩大的帝国一下子缩小为奥地利本土和中欧部分国家结盟的奥匈帝国；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东欧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

回归到如今袖珍国家的模样。随着疆土的急剧缩小，原来的经济命脉被切断，需要经过长期努力，花大力气建立起新的体系。

奥地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从欧洲地区的一个落伍者转变成为领先者。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2012年奥地利仅次于卢森堡和荷兰，已位居欧盟前三位，在全球排名第11位，达33 283欧元^①，也因此成为欧盟乃至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2008—2009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接着欧洲与欧元区发生债务危机。但奥地利仍然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高于其欧盟伙伴，2010年增长2.1%，2011年增长2.7%。奥地利也因此在国际竞争中，使自己成为欧洲具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经济区域，成为一个违约风险极低而信誉度极高的国家，2012年获得了三个债务评级机构中两个机构给予的最好的债务评级（AAA级）。

奥地利处于中心的地理位置及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这些条件为企业开展业务提供了极大的优势。大约300家国际企业选择奥地利作为其欧洲主要分部的所在地，或者将其欧洲的生产地点安置于此，这其中包括28家“财富500强”企业。

二、奥地利经济的特点

1. 因地制宜，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系。奥地利是一个山地国家，矿产资源比较匮乏，但旅游资源十分丰富。为此，该国建立了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奥地利的经济产业主要由服务业和高度发达的工业构成。2011年，在新增产值中，虽然服务业（贸易，商业服务，金

融服务及其他服务）比例高达69.4%，所占据的份额最大，而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仅占29.1%，但其重要性却不容忽视。主要工业部门有金属制造和加工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和汽车工业及汽车零配件加工业。在电子工业方面，奥地利的量身定制的电子产品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农林业仅占1.5%。

2. 奥地利的一张“国家名片”——旅游业。奥地利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西有横贯多半国土的阿尔卑斯山，东有举世闻名的多瑙河，自然风光优美迷人——源纯净，空气清新，土壤洁净。据联合国统计。奥地利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再加上深厚的历史底蕴，音乐氛围，吸引着全世界追逐旅游梦想的人们。2011年和2012年间，世界各地赴奥旅游人数高达3616万多人次，过夜人数则达到1.3亿多人次。其中，约2/3的游客来自国外，1/3是本国游客。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约为8%。奥地利国家旅游局是国家级的旅游经营组织。该组织是一个协会，其成员为奥地利经济部（75%）和奥地利商会（25%）。协会会长一直由经济部长担任，旅游局全部工作人员约为230人。

3. 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是奥地利企业的中坚力量，并直接影响到奥地利的经济结构。超过99%的奥地利企业为中小型企业（约41万），雇佣了近2/3的从业人员，而其中员工数量超过250人的企业仅有约1090家，员工数量超过1000人的企业仅有约180家。民众的总体创业意识

^①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卢69 166，荷33 448，爱尔兰33 220，瑞典32 776，丹32 301，德31 318，比30 294，芬29 509，英27 873，欧盟27国平均25 676，欧元区17国平均27 633，美38 143，日27 419，瑞士40 180）。

非常强烈，尽管创业市场在危机后暂时恶化，但建立企业的长期趋势仍在上升。2012年全年约新成立公司3.45万个，主要分布在商业服务、贸易、企业咨询和IT行业。

4. 工业门类不求全，但求精。奥地利经济部门并不齐全，许多工业领域并没涉足，也没有大的跨国公司。但它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优势做大做强。例如钢铁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曾经利用林茨钢铁厂制造枪炮，该厂技术力量雄厚，于是战后便组成了奥钢联，重点发展冶金业。机械制造业也是奥地利的强项，它生产的汽车发动机和零部件装在了德国制造的汽车上，低水头发电机组和旅游缆车出口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
5. 以创新求发展。奥地利人深深懂得，在当今激烈竞争的世界，只有创新才能生存。众所周知，奥地利首创了氧气顶吹炼钢技术和熔融还原炼钢法，奥钢联能生产100多米长的钢轨。奥地利低水头发电机组很有特点，其涡轮机组是卧式的，只要水源有落差就可以发电。施华洛世奇水晶玻璃，是在捷克波希米亚水晶玻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只不过配方更加科学，切割更加准确精细。

为了满足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适应全球化的竞争，自2011年以来，奥地利政府以科研、技术和创新为战略目标，力争到2020年将奥地利建设成为欧盟科技先锋，以期实现高品质的就业，持续的经济和就业增长。到2020年，研究和开发的份额将增加至奥地利国内生产总值的3.76%，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2.81%。目前科研和开发的支出达89.6亿欧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其中大约39.3

亿欧元来自于奥地利企业，占43.9%。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际合作，奥地利驻华使馆于2012年成立了科技处。

6. 绿色环保产业是奥地利的强项。从很长时间以来，奥地利就从理念、政策措施、人员素质等诸方面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例如较早提出了“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等理念；奖励退耕还林还草，惩罚乱砍滥伐；鼓励利用可再生能源，治理污染，大力推广环保技术，等等。奥地利在欧盟国家中，乃至在全世界都是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先行者，近67%的电力及近30%的国内能源总消耗均来源于可再生能源，两个指标分别列欧盟27国的第2和第4位。此外，在能源强度和能源高效利用方面，奥地利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人均耗电量明显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或美国的水平。奥地利还是欧盟内部除丹麦、爱尔兰、英国之外，能源强度最低的国家。
7. 奥地利系出口型经济。奥地利是个小国，作为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体，与世界上220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经贸关系，其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近年来基本保持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2011年商品出口总额为1217.7亿欧元，同比增长11.3%，远远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最高值（2008年为1175.3亿欧元），使出口继续成为奥地利经济的领头羊。

在奥地利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欧盟成员国是其主要伙伴，约占70%，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占奥出口的31%，占奥进口的38%。除了中东欧国家外，对奥地利出口而言，海外市场 and 新的潜在市场（例如金砖四国和土耳其）在出口市场上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例如，

2011年,奥对美出口增加28.9%,对巴西增14.7%,对俄增15.2%,对中增4%,对土增17.5%。具体说来,奥出口分布为:欧盟69.7%(整个欧洲81.4%),亚洲9.1%,美洲5.9%,非洲1.2%,太平洋地区0.6%。

8. 奥地利是通往中东欧国家的桥梁。从历史上看,奥地利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有着悠久的渊源。随着欧盟的东扩,奥地利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原来的欧盟边缘,如今成了欧盟的中心,传统关系的恢复,为奥地利企业提供着有力的竞争优势。

尽管经济危机后奥地利与该地区的关系出现了某种衰退,但奥地利对该地区的出口与奥加入欧盟的1995年相比,仍然增加了4倍以上(目前约为180亿欧元)。目前,奥地利在该地区的投资总额已占奥对外投资总额的41.7%左右。其中,奥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塞尔维亚为第一大投资者;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为第二大投资者;在阿尔巴尼亚、捷克和匈牙利为第三大投资者;在马其顿为第四大投资者;在乌克兰为第五大投资者;在黑山为第六大投资者;在波兰为第九大投资者;在俄罗斯为第十大投资者。与中东欧相比,奥在德国直接投资234亿欧元,在美洲130亿欧元,在亚洲77亿欧元,在非洲10亿欧元。

三、中奥双边经贸关系

1. 历史回顾。中奥经济合作历史悠久,硕果累累。奥方早已认识到中国作为在亚洲的贸易中心的地位,两国1956年签署了第一个非国家贸易协议,1966年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71年5月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奥经济关系得到长足发展。

1967年,奥钢联将一个完整的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厂出口我太原钢铁厂,这是奥地利承接的中方第一个大订单。1978年,奥地利两家著名企业埃林(Elin)和沃伊特(Voith)完成了湖南省河床式低水头电站的项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奥地利中小企业也发现了中国的市场潜力。特别是在高科技产品、创新解决方案以及许可证销售领域,奥地利企业异常活跃。2011年,胡锦涛主席访奥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共同在中国南通设立苏通生态园的意向书,目的在于让奥地利企业参与到生态园的规划和建设中去,并在园区开设企业或工厂。该项目将奥地利的节能环保技术与中国的制造实力及巨大市场相结合,将为两国企业和人民带来经济和环保等多方面实实在在的好处。目前,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进展顺利。

此外,诸多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也为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1年以来,两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技术科学合作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在铁路、航空和卫生领域的相关协定。从1985年奥地利正式向我国提供第一笔政府贷款起,两国间便开始了财政合作。结合奥方的技术优势和我国建设的实际需要,项目主要分布在能源、重工、化工、基础设施和环保领域。此外,两国还促成20多对友城和友好省州关系、伙伴关系,1995年开通了北京到维也纳的直飞航线。2011年至2012年间,中国赴奥旅游人数每年增长36%,达35万多人,过夜人数达50多万人次。

2. 目前双边经济关系。自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长。据奥方统计,2012年达创纪录的98亿欧元,同比增长5.0%,奥方出口为30亿欧元

(中方统计, 2012 年达 67.6 亿美元, 2013 年 1—6 月, 达 32.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8%)。中国是奥地利在欧洲以外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出口的主要商品有: 纺织品、服装、粮油食品、畜产品、工艺品、有色金属等, 机电产品的比重有所增加。我进口的主要产品有: 技术设备、机械、五矿、化工和轻工产品等。

奥地利是中国在欧洲重要的技术引进来源国之一。在冶金、载重汽车、铁道、城建、电力、食品和塑料工业等奥地利具有优势的领域, 双方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除商品贸易外, 投资活动对双边经济关系也特别重要。据中方统计, 自 1978 年以来, 奥地利企业在华投资项目已超过 1000 个, 截至 2013 年上半年, 实际投资额累计高达 16.14 亿美元。约 800 家企业已在中国市场(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奥地利企业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和南京等地, 投资主要行业有电子、汽车发电机、化工等。仅 2012 年, 奥地利对华投资项目就达 43 个, 实际投资金额达 2.16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6%。除北京和东北的汽车制造基地外, 越来越多的奥地利企业对中国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 特别是在成都和重庆地区建立了数个新的中心。例如, 奥地利奥特斯公司在这里投资 3.5 亿欧元, 建立了一个新厂。这也是迄今为止奥地利在中国西部地区的最大一笔投资。与此同时, 中国对外投资项目也呈上升趋势。2012 年, 中国对外投资总额达 770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29%。奥地利作为投资区位也日益受到中方的重视。中国在奥投资厂商已近 20 家, 累计投资金额达 4.82 亿美元, 特别是 2009 年以来,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收购奥地利 FACCC 公司, 中国卧龙集团收购奥地利 ATB 驱动技术公司, 投资金额达 4.8 亿美元。此外, 中国华为、中远、中纺、国航等公司在维也纳都设立了分公司。

3. 展望。中奥两国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 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的潜力巨大。奥地利是欧洲经济发达国家, 在钢铁、化工、机械制造、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和农业等领域拥有优势, 正符合当前中国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发展的需求。如今, 欧元区 and 世界经济正逐步从危机中复苏, 而中国经济也正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中奥两国未来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今后, 奥方计划在如下领域进一步与中方加强合作: 汽车工业、教育输出、工业自动化、生活方式和消费、创意产业——设计和建筑、航空航天技术、旅游体育和休闲、高新技术、再生能源和环境技术等。尽管双方在合作中仍存在一些分歧, 如中方希望奥方进一步放宽技术出口限制, 更加方便人员往来; 奥方希望中方进一步开放市场, 保护知识产权, 增加在奥投资, 等等。但我相信, 这些分歧是发展中的问题, 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

作者简介: 卢永华, 中国前驻奥地利大使。

瑞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借鉴

任丁秋

【摘要】瑞士自1997年以来，在联邦议会和政府的主导下，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促进了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本文探讨瑞士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行动计划、监测体系和评价方法，提出对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战略目标 行动计划 监测体系

一、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内涵。瑞士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基于 Brundtland 报告的定义。1987 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1992 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Gro Harlem Brundtland 女士担任大会主席，由此产生“Brundtland”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如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的各方面需求，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条件和能力，这种发展就是可持续的。此后，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于 2002 年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于 2012 年 6 月重返里约热内卢。

可持续发展的质量目标。瑞士根据上

述“Brundtland”定义，确立了本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即社会和谐、环境责任和效率三个质量目标。这三个指标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瑞士，可持续发展即是通过这三个质量目标的管理、施行和监测得以推动和实现。

可持续发展进入联邦新宪法。瑞士将“可持续发展”写入 1999 年联邦宪法^①。1999 年瑞士颁布新的联邦宪法。新宪法明确规定：瑞士联邦将推动共同福利、可持续发展、内部和谐，以及国家的文化多样性。这部宪法在第 2 条、第 54 条、第 73 条多处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瑞士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订与联邦的立法计划紧密配合。瑞士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期为 4 年一个阶段，瑞士联邦立

① 瑞士联邦宪法 1999。

法期为4年一个周期，在时间划分上相互吻合。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阶段划分。自1997年以来，瑞士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历了三个战略阶段：第一阶段的发展战略于1997年以来通过；第二阶段的发展战略于2002年之前发布；第三阶段的发展战略于2008—2011年实施。目前瑞士可持续战略进入第四阶段，即2012—2015年。

可持续发展的衡量尺度。瑞士认为，观察一个国家是否正在迈向可持续发展社会，需要提出和回答四个问题^②：1) 我们的生活状况怎样？2) 社会的资源如何分配？3) 我们将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4) 我们如何有效地使用自然资源？亦即满足需求、社会公正、资源储备和协调发展，这是一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需要不断加以考量的4个尺度。正是基于上述思考和理念，瑞士制订了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和计划。

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是瑞士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和主体部分。在2012—2015年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瑞士提出国家面临的10个重大挑战，制订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构成2012—2015年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③。

1. 保护气候环境和防范自然灾害。瑞士联邦议会发布了经修订的二氧化碳(CO₂)法案。根据该法案，2013—2020年期间与1990年相比，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至少减少20%。
2. 减少能源消耗和推动再生能源的使用。瑞

士2011—2020年能源计划提出，到2050年，再生能源所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至少为50%。瑞士联邦政府2050年能源战略，将重点放在提高能源效率和继续扩大再生能源的使用上。

3. 保证可持续的空间规划。努力实现本土多维空间发展，定居紧凑，尽可能节约空间。采取的政策措施有：改善客运公共交通和以铁路为主的货运交通；实施“非机动车交通”项目；创新移动和休闲交通；继续坚持自2001年采取的城镇群政策；修订空间规划法案；采取“移动定价”政策。
4. 既提高生产率，又合理利用资源。产品的制造和消费必须满足较高的经济、生态、社会的标准。相关的政策措施有：年投资570亿瑞郎用于建筑行业，其中1/3是公共部门的合同。实行一体化的产品政策，减少资源消耗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制订2014—2017年农业政策，其要点是：加大农业产出，提高农民收入，支持与自然环境及动物友好的农产品形式。制订瑞士清洁技术详细规划。倡导企业社会责任。在实施“瑞士作为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中，贯彻可持续发展原则，高度关注该战略对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影响。新的政策措施有两项：一是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内建立统一的质量监控和动物健康战略，国际上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工作；二是信息和通讯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把握信息和通讯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同时防范和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推动资源和能源在该领域的有效

② Swiss Confeder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Brief Guide 2013, p.13.

③ 瑞士联邦：可持续发展战略2012—2015年，第21—49页。

使用。

5. 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实施 2020 森林政策和木材资源政策，将森林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加以利用、保护和管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合作，推动包括空间规划、能源、交通和农业等“多层治理”的一体化农村政策。制订新的生物多样性战略，确立了 10 个具体的战略目标，包括安全区、资源可持续利用、推动多样化、在该领域更积极的国际参与等。瑞士已于欧盟签订了化学品协议，还将引入欧盟制订的全球性化学品分类体系^④。
6. 增强社会凝聚力，鼓励文化发展与融合。构造正确的制度框架，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机会参与社会生活。首先，住房建设必须满足关于环境保护、有效能源和可用建筑的高标准要求。其次，继续加强联邦的一体化政策，保证不同社会群体的和平共处，民众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平等。
7. 改善公共健康。采取的政策措施有：推动大众体育锻炼，提供高质量的运动设施。实行全民节食减肥项目，以预防癌症等非传染性疾病。在健康领域减少不平等状况，使移民享有基本的医疗条件。在制定全民健康目标和预防政策时，考虑和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8. 对全球发展和环境负责任。统一协调国际发展政策和国际环境政策。第一，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重点是气候环境、生物多样性、化学制品、垃圾处理、森林和水资源保护等方面。第二，在 WTO 和双边

自由贸易协定下，推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第三，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绿色经济”项目合作。重点领域是环境、能源、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农业、食品安全、化学制品和垃圾、可持续贸易、清洁产品、技术转让、水和森林保护等，瑞士的发展合作投资到 2015 年占国民收入的 0.5%。第四，准备迎接 2015 年发展目标^⑤的重启。第五，积极参与改革和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

9. 保证公共预算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长期融资。保证财政政策的稳定，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就业繁荣和社会融合。采取的政策措施有：一是报告预算风险。财务报告要显示气候变化对于公共部门预算和瑞士经济的影响，还要显示由于减税或税收优惠所造成的收入损失。二是“绿化”税收体系，消除不合理的税收和补助的激励措施。三是推行关于社会保险的财政法规，限制公共部门的公司或机构的支出、逆差或债务水平，以保证社会保险的长期资金。
10. 教育、研究和创新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联邦议会优先制订教育、研究和创新政策。高等教育机构要保持和加强研究活动，以应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性挑战。首先，瑞士的教育体系要瞄准可持续发展，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其次，可持续发展原则在非正规教育领域也必须得到贯彻。根据新的高等教育法，大学和学院必须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教学、研究、服务设施等方面，执行更加严格的可

④ EU CLP (Classification, Labelling, Packaging) Directive by 2015.

⑤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千年发展目标于 2000 年确立，将于 2015 年满期。自 2013 年，国际社会开始讨论重启千年发展目标的问题。

持续性标准。

三、可持续发展的监测体系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纲领，瑞士设计了称之为“MONET”^⑥的监测体系，选取75个指标，从多个方面观察和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状况，同时选择16或17个指标作为监测的关键指标。《可持续发展—2013指南》^⑦采用了17个关键指标，报告瑞士可持续发展的进步状况。

这17个指标是：健康、收入、人身安全、失业、贫困、官方发展援助、平等、青少年阅读能力、公共债务、投资、创新和技术、生物多样性、渐增长区域、货运交通、客运交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17个关键指标被分别纳入可持续发展的质量管理目标，即社会和谐、经济效率和环境责任。

社会和谐类指标包括：健康、人身安全、贫困、青少年阅读能力。健康和安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和愿望，作为生活目标对于推动经济和社会利益很有价值。贫困现象反映了社会的不发达程度。青少年的阅读能力关乎一个民族的信息采集和加工能力，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创新性和竞争力。

环境责任类指标包括生物多样性和渐增长区域。生物多样性可以保持生态平衡，还可为研制新药储备和提供资源。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有赖于它们生存的环境，如森林、湖泊、湿地等。因此生物多样化是衡量环境状况的指标之一。土地是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支撑。工业化进程使得房屋、道路不断扩展，造成农场流失和田园生活方式的改变，这被称为渐增长区域，该指标也用来观测环

境状况。

其余均属于经济效率类指标。收入指标显示社会成员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的程度。失业是最重要的经济观测指标之一。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反映向贫困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水平。平等指标主要体现为男女同工同酬。公共债务要维持在合理范围，不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过重而影响公共服务。投资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必须保持一定规模和良好效益。创新和技术是保持瑞士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而科技人力资源则是创新的根本保证。货物交通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应尽可能减少。客运交通倡导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更有利于环境和人们的健康。能源须保证供给，原材料消耗应逐渐减少。

“MONET”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监测体系，为适应当前形势和未来需求的发展，它也在不断增添新的监测内容，改进和创新监测的方法。例如，从1992年提出“绿色经济”概念，到1997年首次制订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后来阶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监测体系及其指标设计不断发展完善。

四、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

自1992年至今，瑞士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整整20年。2012年，瑞士出台《可持续发展报告2012》^⑧，对20年来坚持可持续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12个方面做出总体评价。

1. 生活条件。瑞士的生活条件总体比较高，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比较高。但是人均可支

⑥ MONET: The Monito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⑦ 瑞士联邦统计局、空间发展局、发展与合作署、环境局：可持续发展—2013指南。

⑧ 瑞士联邦统计局、空间发展局、发展与合作署、环境局：可持续发展报告2012年。

配收入的水平没有显著变化，约 15% 的人口面临贫困风险，同时暴力犯罪案件有上升的趋势。

2. 健康。2012 年瑞士人平均期望寿命女性为 84.7 岁，男性为 80.5 岁，表明健康水平有较大提高，但超重的人数增加。人均健康支出相对较高，占 GDP 的 11.4% (2009)。统计显示，瑞士人的身体锻炼情况和精神健康状况得到改善。
3. 社会和谐。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改善，男女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妇女更多地从事政治生活，如在国民院的席位增加，但其代表性还不够充分。15 岁少年的阅读能力提高，外籍人和瑞士人在受教育方面的差距缩小，但仍存在某些歧视和机会不平等的现象。
4. 国际合作。瑞士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收入的 0.41% (2010)，仍低于联合国规定的 0.7 的目标要求。瑞士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持续增加，2010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 50% 流向发展中国家。瑞士移民向其原籍国的汇款也在增加，1992 年为 30 亿瑞郎，2010 年达 54 亿瑞郎。
5. 教育和文化。不同收入群体在因特网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高收入群体使用因特网更加频繁。瑞士联邦、州和市镇提供财政支援，以推动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在继续教育方面，瑞士居于世界前列。2010 年，在 25—64 岁的人口中，参加继续教育课程的人数约占 31%。
6. 研究和科技。瑞士的研发支出 1990—2008 年间增长了 16%，占 GDP 的 3%，

企业研发活动集中于在日内瓦湖区和瑞士西北部地区。科技领域的人力资源显著增加，1993—2010 年间增长 85%。2011 年，瑞士有 96.2 万名受过教育者在科技领域工作，大约占劳动人口的 1/5。

7. 就业。1991—2012 年，受经济形势影响，瑞士的失业率呈波动性增长，2012 年瑞士的失业率是 3.7%，失业人数达 17 万人。从失业的年龄结构看，15—24 岁人口的失业率为 6.1%，大大高于 15—64 岁总劳动人口的失业率 3.7%。从失业的地区差异看，日内瓦地区的失业率高于 6%，而中东部地区的失业率低于 4%。
8. 经济体系。1990—2010 年间，劳动生产率指数提高了 21 个百分点。公共债务比率 2010 年为 38%，又恢复到 1992 年水平。税收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来自与环境相关的税收收入稳定增长，已经超过 110 亿瑞郎，2010 年占总收入的 7%，最大收入来源于能源和交通税、燃油税。
9. 生产和消费。为满足生产和消费需求，物质资料的使用有所增长。1990—2009 年物质密度^⑨下降 6%。1992—2009 年，总物质需求增长 (22%) 低于实际 GDP 增长 (28%)。原材料消费依赖于外国进口。物质消耗导致垃圾增加，从而实行垃圾分类，执行“污染者付费”，废物的回收利用也相应提高。
10. 移动和交通。自 1998 年以来，公共交通在人们出行方式中的所占比例增加，2011 年达到 21.1%，自行车或步行占 6.3%，

⑨ 物质密度表示：为在本国获得一瑞郎增加值，使用或搬运、在瑞士和海外所提取的原材料规模。

汽车是使用最广泛的个人交通工具。1992—2009年，货物运输的增长高于同期GDP的增长，2010年超过280亿吨公里，铁路占货运交通的2/5。

11. 能源和气候。能源供给严重依赖进口，再生能源所占比重增加。自1990年，人均最终能源消费每年超过3.2万千瓦小时，大约相当于3800立升石油，增长了14%。2010年，最终能源消费相当于大约3000万立升的石油。
12. 自然资源。湖水和空气的质量得到改善，鸟类的数量增加，大约有170多种，有40个濒危物种列入红名单。渐增长区域扩大，总面积增加了13%，占地327平方公里，其中50%是房屋建筑，30%是道路和铁路，6%是再造区和公园。

以上12个方面是围绕社会和谐、经济效率和环境责任三个质量目标进行评价的，概括了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所取得的主要进步以及存在的问题。

五、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瑞士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设计与规划，对于我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制订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战略选择。我国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的一般国际原则，制订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在经济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迅速积累，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在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⑩的总体布局，引领和推动我国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质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⑪，即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集中体现了我党对于可持续发展要素的认知和理念，可以作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和指导思想。

2.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政策

可持续发展绝不是—个孤立的部门性政策，而是作为—个核心的原则，必须渗透到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在内的所有政策领域。

我国在经济领域要推动市场化方向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革能源定价机制^⑫等；要培育与可持续发展相融合的创新机制，如扶植区域低碳创新发展机制^⑬等，以促进和保障可持续发展。要优先改革党政领导干部评价考核任用制度^⑭，不再把GDP增长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要树立经济发展与生

^⑩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司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课题组：“从‘五位—体’高度把握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关系”，《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38卷，第3期（总第659期），第5—8页。

^⑪ 刘希颖，林伯强：《改革能源定价机制以保障可持续发展——以煤电联动政策为例》，载《金融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2—126页。

^⑫ 倪外：《基于区域创新的发达地区低碳发展机制研究》，载《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7期，第132—137页。

^⑬ 夏光：《生态文明建设‘三板斧’》，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38卷，第3期（总第659期），第1页。

态文明建设并举的明确导向，从决策源头上保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落实。

在金融领域，第一，进一步探索绿色金融政策，把环境保护贯彻于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各个环节。2005年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制订了“负责任的投资原则”，于2006年颁布实施，旨在规范金融投资政策，在金融机构投资企业项目中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的影响。2007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⑭，是我国最早关于绿色信贷的指导性文件。但与西方银行业相比，我国银行业还有较大的差距。要在国际机构制定的共同规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制订具体、明确、兼顾区域差别、可操作性强的金融标准，实现经济发展与绿色金融政策一体化的融合。

第二，鼓励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市场交易。“碳金融是指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⑮

第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创新金融监管制度。例如2007年开始实施的上市融资环保核查制度^⑯，即是中国证券市场监管与环境经济政策结合的创新举措，这项政策将环保合规作为证券市场融资的准入条件，有效遏制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扩张，对于管控由污染引起的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监控体系

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确立适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设计一整套观测和评价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建立相适应的监控组织架构。可以参照瑞士的指标设计方法，围绕社会和谐、经济效率和环境责任三个方面，确立可持续发展的质量管理目标，并分类设置三组具体指标，形成指标体系，用以监测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况。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监控组织框架，可以借鉴瑞士的做法，即瑞士联邦议会指导、联邦政府实施、主要业务部门协同参与的做法，我国可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作为顶层组织机构，协调若干职能部委推进工作，统筹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涉及的政策领域包括：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环境政策，以及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4.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

我国与瑞士及欧盟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与瑞士可持续发展双边合作的新亮点。2013年7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2013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瑞士联邦主席于利·毛雷尔时强调，中国正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⑰瑞士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及配套政策，可供我国决策参考。特

^⑭ 宋晓玲：《西方银行业绿色金融政策：共同规则与差别实践》，载《经济问题探索》，2013年，第1期，第170—174页。

^⑮ 杨姝影，蔡博峰，肖翠翠，刘文佳，赵雪莱：《国际碳金融市场体系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38卷，第2期（总第658期），第27—29页。

^⑯ 胡梦泽，李巍：《上市融资环保核查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基于事件研究法的评价》，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第38卷，第5期（总第661期），第30—36页。

^⑰ 《北京日报》2013年7月19日。

别是瑞士的环境保护立法、环境保护技术和环境保护教育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仿效和创新。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会见中还指出，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地理和自然条件同瑞士相似。希望双方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山地经济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好、

更快发展。^⑮ 这为贵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指出了方向，为中瑞的可持续发展合作开拓了新的领域。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和山地经济的合理开发，贵州可望成为“东方的瑞士”。中国与瑞士将携手再度创造“第一”，为全世界树立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样板。

作者简介：任丁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⑮ 同^⑰。

从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史看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

姚 燕

【摘要】中德经济交往历史悠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西经济交往史和文化交流史，以史鉴今，可以通过对中德经济交往史的反思而实现自我理解、对他者的理解，探寻中德经济交往的伦理，并扩展到国际经济交往的伦理：交往主体平等、相互尊重、宽容、合作、理解、学习并以发展视角看待问题，以求互利共赢。

【关键词】跨文化 交往 伦理 交往伦理 经济交往

跨文化的经济交往，不仅是不同文化的产品和服务的交换，更是文化深层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交汇、碰撞，因此需要创生伦理来规范与协调来自不同文化的交往主体的经济交往活动。跨文化经济交往作为人的活动，应当遵循交往主体平等、相互尊重、宽容、合作、理解、学习、互利共赢及以发展视角看待问题的伦理标准和价值观念，从而保证自身有序且和谐地进行。中德经济交往历史悠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西经济交往史和文化交流史。历史是过往的现今，以史鉴今，通过对中德经济交往史的反思而实现自我理解、对他者的理解，探寻中德经济交往的伦理，这对于世界各国间的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都有借鉴意义。

一、中德经济交往史简述

中德两国经济交往史可以大致划分为3段：1840年以前，囿于地理交通条件和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及德意志邦国林立的分裂状态，中德贸易往来有限；1840—1949年，德国参与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进行的经济政治扩张和殖民侵略，国力衰弱的中国反抗殖民侵略，争取经济、政治、主权独立；1949年以后，中国主权独立，与德国经济贸易往来历经曲折，逐步走向平等互利的稳步发展。

1. 1840年以前

早在1303年，科隆的传教士阿诺尔德兄弟（Bruder Arnold）就跋山涉水来到今日的北

京。1330年前后，中国编订的世界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德国，名称“阿尔曼尼亚”^①(A-lu-mang-ni-a)。^②两国的通商始于16世纪末，16、17世纪奥格斯堡(Augsburg)的福格尔和威尔赛尔商行(Fugger u. Welser)同澳门有贸易往来。那时的德中贸易在各自的对外经济关系中都无足轻重。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之后，中德之间在17、18世纪已有一些文化、科技交流。而国家间成规模的经济交往则展开于近代18世纪，其标志性事件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特准设立“普鲁士王家艾姆敦对华亚洲贸易公司”(Königliche Preussische Asiatische Handlungs Compagnie von Emden auf China)。从此，中德之间海上和经俄国的陆路贸易都有了较多发展。但是到鸦片战争之前，尚未统一的德意志地区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主要是德意志几个强大的邦国，特别是普鲁士。另外，汉萨同盟城市也与中国逐渐建立贸易关系。这一期间，德对中的贸易大部分处于英国控制下，通过伦敦转口贸易；德方只有每两三年到广州一次的“路易莎公主号”(Prinzess Louise)海外贸易船将布匹运到中国销售，而中对德贸易则主要是茶叶、丝织品、瓷器，中德之间的直接贸易微不足道。^③

2. 1840—1949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英国用武力打开国门，从此开始了屈辱的历史。此时，尚处邦国林立状态的德意志地区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开始讨论和谋求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从独霸一方的英国手中分得一杯羹，

从此加入侵略国行列。当时，德意志地区在中国的贸易只是从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得到些许利益。到19世纪60年代，中德之间的贸易大大增加。德意志地区内部政治分裂状态和远落后于英、法的经济，都制约了它在中国与英法争夺。在这期间，德意志商人做得最出色的是在中国的沿海航运业，其地位远超过了他们在中国的贸易地位。

至此，德意志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大体还是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互通有无，没有直接动用武力或其他政治手段对中方施以威胁强迫，这与其他西方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相比，还是比较友善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后，德意志地区开始直接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侵略中国，并为此建立了东亚远征队。在德、英、法等国胁迫之下，中德于1861年签署《通商条约》，中国被迫向德意志地区进一步开放沿海和内陆地区，为德意志地区政治、经济、宗教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敞开了大门。

德国在1871年统一以后，开始大肆向海外扩张，中国又在德国的军事威胁下于1880年签订中德《续修条约》，给予在中国装卸货物客商的德国船只以税收优惠。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通商条约》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在中国的贸易迅猛发展，交易货物除普通的生活用品、农产品之外，还向中国出口枪炮、军火武器。德国还开始在中国投资，如建立加工厂和食品厂、轻纺工厂、办报纸、设立银行等等。德国在中国的经济侵略性扩张必然伴以政治的侵略。1895年，德国借口在中日甲午海战后逼迫日

① 顾俊礼：《德国研究在中国》，28页，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3期，第28—30页。

② Bauer, Wolfgang: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n der Vergangenheit und die daraus zu ziehenden Lehren“, 8页，in: Auswärtiges Amt: Zeitschrift für Kulturaustausch. 23. Jg. 1973/4. Vj. 第8—10页。

③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本退还辽东半岛有功，向清政府强行索取在汉口、天津建立租界的权力，^④成为德国在中国进行殖民主义活动的开端。

为使殖民活动有“根据地”，德国借口1897年两传教士被杀的山东曹州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1898年签订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方再次向德国允诺各种特权，为德国资本入侵提供便利，也使西方列强掀起了新一轮强行“租借”沿海港湾、进行殖民活动的狂潮。

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霸道行径必然遭到中国人的反抗。著名的义和团运动便起因于德国人在山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在袁世凯统治期间，德国通过《善后借款合同》控制了中国的盐税收入和借款的使用，从此，德国人进入北京政府的重要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中国经济。^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它虽然向中国归还了部分特权，在山东的权益问题仍因日本的无理要求悬而未决。尽管青岛于1922年被归还中国，中国仍然没有改变被列强欺凌侵略的状态。

蒋介石统治的国民政府时期，中德之间的经济往来与军事紧密结合。德国不仅向南京国民政府派遣军事顾问，为蒋介石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咨询，而且通过易货贸易向中国出口军火以换取战略原料物资。此外，中德拟在重工业方面合作，在中国开发矿产，建金属冶炼厂、机器制造厂等。抗战爆发之前，中德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在各自的对外关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中国国

内经济凋敝、战乱四起，德国国内经济危机也日益严重，爆发战争的态势日渐明显。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德日结盟。起初，德国希特勒政府招回在中国的所有顾问，由此与南京政府关系恶化，并实行对中国武器禁运，而德国军事工业及运输行业也因此蒙受严重损失，使军火商大为不满。但是德国对中国的军火输出依然秘密进行，直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德之间还试图恢复易货贸易。但随着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同盟的建立，南京政府断绝同德国一切外交关系，停止向德国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料，让希特勒政府自食其果。^⑥

3. 1949年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被分裂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分属以苏、美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和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新中国和民主德国、联邦德国都成立于1949年。中国早在1950年就同民主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易货贸易：中国向民主德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农产品，民主德国向中国提供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期急需的工业设备、器材、化工原料、化肥等。两国间的经济贸易、科学文化技术合作关系不断加强。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受到极大影响，贸易额下降。进入80年代，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贸易稳步增长，中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的货物中，工业品比例显著增加。

④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41页。

⑤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9—99页。

⑥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9—216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同联邦德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处于隔绝状态。因为联邦德国成立初期并不享有完全的国家主权，1954年，美、英、法三个占领国同联邦德国签订《德国条约》之后，才宣布结束对其外交事务的发言权。但中国和联邦德国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并没有断绝经贸往来关系。两国的经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建交前阶段

中国始终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1955年4月7日，中德之间战争状态正式解除，为发展两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经济关系消除了障碍。而联邦德国虽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方针，一度追随美国参与对中国实行“禁运”，但联邦德国政府一直没有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从而未给两国后来建交和发展关系造成障碍，表现出其政治远见。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中，两国之间以间接、民间和半官方等形式的经贸往来较早得到开展，一直没有中断。

50年代末60年代初，联邦德国工商界与民间要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签订贸易协定的呼声高涨。但艾哈德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联邦德国和中国之间的首次官方接触夭折了。而中国时值经济发展波动，先是经济困难，后又爆发“文化大革命”。中德贸易关系也因之大起大落，忽高忽低。60年代初期，中德双边贸易额一度降至不足5000万美元；60年代中期，由于我国经济恢复和开始进口成套设备，双边贸易额一度接近3亿美元；60年代后期，贸易额又有所减少。到建交前夕的1971年，中德双方贸易往来金

额为2.8亿美元。^⑦

2) 建交后阶段

1972年初，尼克松总统访华并签署中美《上海公报》，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进行政治与经济对话，尽管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共识。两国在建交的当年年底，在北京草签了中德两国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1973年该协定在波恩正式签订，为双边贸易往来打下了稳固的基础。1975年10月，中国同联邦德国政府间通过换文成立了促进经济和贸易关系发展的混合委员会，将两国企业的业务合作纳入政府管理的范围。1978年10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合作基本协定》，使两国的合作范围扩大到科技领域。之后，两国又不断签订经贸合作协定，涉及航空、海运、铁路、专利合作、工业投资，等等。贸易投资额不断增长。

3)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阶段

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和联邦德国经贸关系进入崭新的阶段。联邦德国信守一个中国政策的诺言，不止一次做出拒绝向中国台湾省出售潜艇的决定；中国在面临德国统一的问题上毫不犹豫地表明尊重德国人民选择的立场，受到德国各界的好评。两国之间高层互访频繁。^⑧尽管两国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经济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两国都主张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对话，增进了解，扩大共识。

⑦ 梅兆荣：《中德建交谈判回顾》，第5—7页，载《德国研究》，2002年，第3期，第4—12页。宋坚（主编）：《德国经济与市场》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278—279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德国的关系》，载：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oz/1206_12/sbgx/，最后访问时间为2010年7月19日。

在总体良好的政治伦理语境中，中德经贸关系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1993年9月德国政府推行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亚洲政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更加大幅度增进。德国一直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经贸、技术合作伙伴，中国也是德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中德之间的合作广泛，涉及教育、环保、农业、能源、通信、交通、医疗、材料等诸多领域。德国的磁悬浮技术首次在上海投入商业运行，中国与德国西门子公司改造中国铁路网，都是经济与高技术合作的突出例子。中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而且双方都有“存异求同”的合作愿望，这正是推动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强劲动力。在贸易、财政、技术合作、直接投资、金融等经济关系方面，中德交往都取得了互利共赢的成果。^⑨

中、德两国在科技、教育、法制国家建设、环境保护等很多方面开展合作和对话，对于经贸关系发展也有促进作用。总体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德经贸关系发展规模最大、速度快的最好时期，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经济的共同发展。

二、反思中德跨文化经济交往史中的交往伦理

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用合乎人道的理

性原则确立一种交往伦理，指导开展跨文化的国际经济交往，在当今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趋势下尤为必要。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认为：“了解跨文化交往过程的起源对于正确理解当前的各种结构十分重要。在当今的跨文化接触中，历史性的经验表现为在历史中形成的自我理解（Selbstverständnis）和自我认同（Identität），以多种方式起着重要作用。”^⑩在反思经济交往史的过程中形成文化的自我理解与认同，有助于思考和建构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

德国经济伦理学家乌尔利希指出：交往伦理中四个规范性要求之一是“使道德存在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伦理之主导思想。”^⑪这也适用于包括中德经济交往伦理在内的国际经济交往伦理，即国际政治伦理的语境是先决前提，合理的跨文化经济交往必须建立在政治主体及其文化平等的基础上。中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深入接触始于19世纪，工业技术、航海技术的发展使相距遥远的东西方之间延续古老的丝绸之路传统来展开跨文化经济交往。在尚未出现政治、文化不平等的畸形态势时，两国还有可能通过平等地互通有无来相互增进经济利益。但在19世纪中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意图争霸的西方列强（包括德国）和古老但衰弱的中国处于极不平等的政治、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中国同德国的关系》。载：<http://www.china-botschaft.de/chn/zdgx/zdngxk/t839647.htm>。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6月11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德国的关系》，载：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_603916/oz_606480/1206_606796/sbgx_606800/，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6月11日。

⑩ Leutner, Mechthild/Mühlhahn, Klaus: „Interkulturelle Handlungsmuster: Deutsche Wirtschaft und Mission in China in der Spätphase des Imperialismus“, 第9页, in: Leutner, Mechthild/Mühlhahn, Klaus (Hrsg.):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m 19. Jahrhundert: Mission und Wirtschaft in interkultureller Perspektive“, Münster 2001, 第9—42页。

⑪ Ulrich, Peter: „Integrative Wirtschaftsethik: Grundlagen einer lebensdienlichen Ökonomie“, 2. Auflage, Bern u. a. 1998. 82页。其他三个要求是：所有的对话参与者拥有旨在达成共识的态度，毫无保留地愿意采取合理性（legitim）的行动，责任伦理。

文化关系。当时的中西经济交往并不是平等互动的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经济交往”，实为西方对中国的军事胁迫和武力侵犯下的经济政治侵略，没有平等的国际交往主体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互动，而主要是西方列强单方面对中国的压迫、销蚀。但正如德国学者罗梅君、余凯思（Klaus Mühlhahn）指出的：“在不平等和政治压迫状况下来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体系本身而言也是违背自身利益的，最终会失败。……帝国主义最终培育了对付自身的各种社会力量。”^⑫

在这种武力侵略造成不平等、不正当的政治经济交往语境中，列强没有对中国人的尊严与人权予以尊重，谈不上存在尊重、维护中国人的道德权利的正当性，双方文化间更没有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可言。西方文化借助武力和经济优势进入中国，其自身的伦理文化在不正义的国际交往层面上也已根本完全扭曲，无正当性可言，完全为列强的侵略行径张目，甚至要向被侵略的中国“讨还公道”。威廉二世于1900年在不来梅港礼

送参加八国联军的德国远征队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时，发表“匈奴演讲”（Hunnenrede），张扬德国的霸权伦理^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嫁祸于人，完全暴露出霸权伦理对中国人民的残忍和以所谓“基督教文化”征服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企图。

秉持这种恃强凌弱、盛气凌人的霸权伦理，自然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与开展和平、正当的跨文化经济交往。西方列强凭借武力的强硬手段和宣扬所谓基督教文化的软手段强占中国市场、剥掠财富，毫无人道可言。基督教本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和现代国家的产生铺垫了精神的基石，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特别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学习和接受西方的科技文化，有些传教士功不可没。然而利用基督教为霸权服务，要上帝来保佑士兵对其他民族的侵略，与西方的基督教博爱教义和伦理相违背，是基督教的异化和对基督教的莫大讽刺。^⑭侵略者是短视的，不懂得平等互利的经济交往才有真正、长远的效益与价值。市场由人口、购买力和

⑫ Leutner, Mechthild/Mühlhahn, Klaus: „Interkulturelle Handlungsmuster: Deutsche Wirtschaft und Mission in China in der Spätphase des Imperialismus“, 第42页, in: Leutner, Mechthild/Mühlhahn, Klaus (Hrsg.):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im 19. Jahrhundert: Mission und Wirtschaft in interkultureller Perspektive, Münster 2001, 第9—42页。

⑬ Die „Hunnenrede“, 其中有一段为：“你们担负一项伟大的任务：讨还严重的不公。中国人践踏了国际法，他们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方式嘲讽使节的神圣和担负的款待宾客的义务。一个以自己历史悠久的文化而自豪的民族犯下这样的罪行，更令人愤怒。你们要显示普鲁士古老的英勇传统，作为基督徒，你们要以友善的态度忍受痛苦，愿荣誉追随着你们的旗帜与武器，用你们绅士的礼仪与纪律给世人以榜样。也许你们知道，你们要对付的敌人诡计多端、英勇善战、武器精良、手段残忍。当你们遇到敌人时，一定打败他，决不赦免，决不收容战俘。用你们的武器让中国人一千年也不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上帝的嘱咐伴随在你们左右，整个民族为你们祈祷！”<http://www.deutsche-schutzgebiete.de/hunnenrede.htm>，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6月11日。

⑭ 1869年，河南某个地方曾发生了乡绅带领当地居民把一个传教士从大城里撵出去的事，并对教士说：“你们烧了我们的宫殿，你们杀了我们的皇上，你们卖毒品给百姓，现在你们还大言不惭地来教我们做什么好人！”[德]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乔松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27页。

需求三种要素构成，一种文化遭到压迫贬损，其文化成员遭受欺凌、民不聊生，对外来侵略者心存憎恨，没有购买力与有效需求，稳定且持续的市场就不易形成。

从中国方面看，19世纪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遭受屈辱和灾难，也给中国以历史性的深刻教训。中国经济长期自给自足，封建中央集权体制完备，文化得益于悠久历史的积淀而一度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这一切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自高自大，对西方国家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毫不敏感，不能及时学习、引进西洋文明的有益成果，对最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威胁茫然无知，更不知该如何应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则是皇权对外软弱，政治经济腐败，国库亏空虚弱，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府缺乏集中社会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也没有发展的总体方案。为应付外来侵略而一时兴起的洋务运动没有统一且目标明确的社会经济发展方案，没有政府的有效支持，加之侵略者的干扰，因此失败。内忧外患交加，军事力量脆弱，政府面对外来经济政治军事侵略一再委曲求“和”，任西方列强占据政府经济部门中极为重要的官职，甚至连国家关税权也被外来侵略者强行夺取。所以，一个国家没有主权、没有经济实力、没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在当时就不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不可能建树和实践合理的对外经济交往伦理，也就没有平等基础上互动的跨文化经济交往。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了独立的主权，有了国际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平等权，才具备开展对外跨文化经济交往的前提条件。但中西跨文化经济交往的历程曾一度缓慢而曲折，也没有自觉地发展出一种交往伦理来推动这一进程。这主要归因于国际上以意识形态斗争为主导的冷战大环境。当时，中国与西方工业国家经济往来有限且颇费周折，因此，

中国没有从西方工业国家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知识，没有系统了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理念、理论、体制，并排绝、否定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文化。20世纪70年代初，全球化大趋势日益明显，中国仍然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在国际社会中经济上仍然处于劣势。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中国一直尚缺乏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的思索。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大幅度地发展经贸关系，特别是中德经济关系的发展相对更为平顺、迅速。究其主因，首先是中国在不断扩大的经济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一整套对外经济交往战略与政策，它们实质上内含了交往伦理，即：在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倡导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经贸往来；在经济交往的实践中，深化认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及其内含的经济伦理文化，同时，结合自身的现实情况，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社会制度、基本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其次，西方国家也给予中国比较积极的回应。特别是德国，在中德经济交往中突显了其理性民族的思考特性，放眼长远，与中国在经贸等各个领域积极合作，并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中德双方都从这种积极的合作中受益。最近30年的中德经济交往实践证明，只要遵循合理的经济交往伦理原则，跨越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使其不同的经济伦理文化融汇于跨文化经济交往的实践，在现实条件下是可行的。同时也可看到，由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复杂的国家关系、伦理价值差异等种种原因，中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发展不是一马平川、毫无障碍的，矛盾、摩擦与来自多方的干扰也一直并仍将存在。而且这种跨文化的经济交往涉及从国家、组织（如在华跨国公司）到个人的各个层面，规模不断扩大，也不断

产生新的矛盾与问题，这些都需要建树经济交往伦理的“秩序框架”来匡正、调解。

三、在全球化背景下确立合理的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

伦理的实质是以道德手段、行为规范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应然性认识。在经济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关系，其实质是一种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经济交往伦理的目的就在于协调经济利益的关系。

利益与交往密不可分，交往主体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通过他人的映衬而辨识自己的利益，可以说，利益产生于交往过程，是交往主体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但它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交往过程中交往主体相互协调的对象和产物，因此，利益本身就是交往的结果，内含着伦理道德的成分。中国自古看重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义利之辩”纵贯中国古代哲学，古人主张“以和致利”，反对“以争得利”。这种“以和致利”的思想至今影响着中国从宏观层面的对外交往主张到微观层面的对外交往具体实践。

即便在强调市场和竞争的西方，也有关于利益的道德问题的考量。西方一向强调经济理性，其哲学基础渊源于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而功利主义的最高原则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虽然始自“人性自利”的假设，却以整个社会为参照系，将整个社会的利益纳入考察的视野。甚至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有时可以牺牲个人利益。^⑮经济活动的实践也证明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结合不会影响个人利益，在规范且成熟的市场上，只有遵循道德的行为才能给个体带来

最大利益，并使利益得到保障。这是因为遵守规范和道德可以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效率，防止经济失灵。因此，利他行为最终也使自己受益，也可被视为一种经济理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将中西方这种对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交往中合理获取和分配利益的道德伦理考量扩大到全球范围内，在世界范围内通过正当的经济交往而合理分配利益，却是一个新议题。

在文化间的经济交往中，利益关系主要体现为国家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为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这一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诸多利益的有机统一体之核心，因此很多国家都从战略高度去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在经济竞争中获胜，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意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交往呈现出新的特点。国际经济的主体已不局限于国家，国际性的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地成为经济交往主体，一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不局限于国家内部事务，而更加有赖于全球的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互交织，密切相连。在这种全新的发展趋势中，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与以往国家经济相对封闭时期的经济交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技术和人才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但彼此的经济利益关系相互渗透，这又要求各个国家必须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寻求共同利益。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到国际经济循环的网络当中，而且，发达国家的境况越来越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发展。因此，竞争合作、相互依存、利益共享，是国家间交往的发展趋势。在最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强调重视国家的长远利益，注意把握好国家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同时，顺应世界

^⑮ 功利主义者穆勒说：“假如自行抛却个人的生活享乐能够对于增加世界上的幸福的总量上有贡献，那么，这些能够这样抛弃的人应该受极端的敬仰。”穆勒：《功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7页。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打破狭隘的地理疆界的局限，从更广阔的空间范围看待中国国家利益与世界共同利益的关系，即：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力求与世界各国建立互利互补的经济合作关系，利用自己的资源和巨大市场，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强调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本身也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注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间形成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积极谋求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这种处理利益原则和立场是坚持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的“互利”，是在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考虑和兼顾交往各方各自的利益，在共同利益或者说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进行沟通和结成信任合作的关系，以此维护本国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为世界各国的利益维护提供条件。这也是摒弃了冷战时期的封闭视角，不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为出发点同其他国家交往，而从战略高度来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长远共同利益，谋求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这种处理国家利益问题的原则和立场为跨文化经济交往伦理提供了有效的实践经验和证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它应当得到重视和推广。

中德两国的经济交往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交往中具有代表性。两者处于市

场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不同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人口和资源状况也完全不同，也因此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然而，德国有中国需要的技术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经验，中国则可以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的支持。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多年来经济往来和合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经历了近五年以来中德关系的起伏波折之后，2010年7月默克尔对中国访问期间双方签订的《中德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以及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签订的《建立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显示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表明德国将中国定位为利益相关者，双方着眼长远利益，不仅发展涉及双方利益的战略性的伙伴关系，而且看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大环境以及不发达国家对双方利益的重要作用，双方的长远共同利益不仅有赖于中德两国的合作意愿和努力，也有赖于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中德经济交往的历程和新发展，反映出双方看待利益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封闭心态到全球化时代开放心态的过程，这种过程本身也是中国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典型形式，为未来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树立了典范。

作者简介：姚燕，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元交际型冲突风格之特点与文化解读 ——中德员工交往中之冲突研究（下）

赵倩

三、文化解读

即便是在单一文化语境当中，人们也都在有意无意地进行着元交际活动，以保障交际的顺畅进行。而在中德跨文化语境下，元交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德两种文化有诸多差异：除了语言差异之外，双方在认知和行为层面也显现出很多不同。

聚焦职场，认知差异有比如中德很多工作标准不同，本研究的访谈中提及的有员工绩效评估标准和工作成果评价标准；而行为差异则表现为双方工作方式的不同，包括计划方式和交流方式。在能对矛盾冲突的症结准确定位的前提下，通过元交际可以有效化解很多由这些差异引发的不解和误解，从而预防冲突的发生或者升级。

1. 中德跨文化语境中元交际的必要性

多位受访者认为，在中德跨文化语境中，在更高的交际层面上就之前交际中的不解和误解进行元交际是必要的。

单一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尚有诸多差别，

跨文化语境下，合作双方就更需要沟通了解，以排除双方在某些常识、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不同理解。这些差别增加了双方交流产生“不解”或“误解”的几率，因此元交际不可或缺。

如同 Peter 所说的：

“您初来乍到，还不了解这片‘热带丛林’；不了解周边潜伏的那些危险或者可能伤害您的风险……这的确是个难题，可能您开始时无法理解，因为……您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这些事物；因为没有人会给您解释。从人事管理问题一直到专业问题无不如此。”（Peter 语）

当 Schmidt 先生被问道，相对于德国员工是否要更多地追问中国员工时，他答道：

“是的，绝对是这样！之前我就说过，必须得对所有的事情进行监督。没有监督根本行不通！无论大事小事！如果您分派下去一项任务，交代说，请在周五之前完成。那您几乎可以确信，到了周五这项任务十有八九还没有完成。除非之前有人再去追问一下。所以我总是在日历上把事情记在之前的那天，然后到时间去提醒他们……一贯如此！一贯如

此!非常糟糕!所以,这的确是个问题!”
(Schmidt语)

对此,Brigitte也深有同感:

“但我觉得,恰恰是涉及中国人的时候,这一点(追问)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对中国人的很多事情还不太了解。”(Brigitte语)

Peter也认为,在他所经历的专业冲突和目的冲突中,至少有80%是因为误解所致,或者因为忽视,或者因为不知。其中很多误解或者不解在现实工作中被忽视了。

受访者Hagen先生则表示,在中德双方的交流中会不断出现不和谐音符,原因是:“双方各自有所期待,而且两种期待经常不相符。但人们往往不去就此进行交流或研究对方的期待。”(Hagen语)这都说明,在中德跨文化语境中,人们更加有必要进行元交际。

根据访谈结果,中德交流中的误解、忽视和不知,可以追溯到双方在“常识”和“逻辑”(Wolf语)以及语言上的千差万别。

2. 中德不同的“常识”或者“逻辑”

中德不同的常识和逻辑,“其实就是文化差异”(Wolf语),导致了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在认知和行为范式上相去甚远。

Wolf认为,很多时候,自己之所以不理解中国员工的举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的逻辑和常识与中国员工有所不同。在被问道如何看待中国人的时候,他首先提到了中德之间常识上的差异:

我所熟悉的逻辑并不是中国人熟悉的逻辑。也就是说,之前被我称作‘常识’的东西,在欧洲有它的作用,……它们是基本规则,每个人都理解,……并会遵守这些规则。而当我来到中国时,却发现我的“常识”不再是“常识”。也就是说,我在欧洲的常识,——它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都适用,在中国却失效了。或者说,在一段时间中它是有效的,它的效果持续不久后,我就发现,

这里适用的是另一套逻辑。(Wolf语)

他发现,当他试图解决问题,陈述解决方案时,他必须用自己的逻辑进行解释,而它们却是一种欧洲范式,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或者说它们是一些打着西方国家烙印的价值取向。……其中有些东西到了中国就没有用武之地了。(Wolf语)因为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常识不同,他在尝试用欧洲常识解决问题或者作解释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在访谈中,多位受访者都提到了中德差异:在工作中,有受访者提到的认知差异中涉及饮食文化。比如,对于什么是德餐,双方就有不同的认知:对很多中国人而言,德餐和西餐大同小异。另外,在“早餐桌”、“会议室”到底应该如何布置等问题上也存在认知差异;在行为层面上,受访者也提出,双方的交流范式有很大不同:比如,采取何种交流方式,是主动找领导谈问题还是等着领导前来询问。再比如如何制订计划,以及计划制订后是严格执行,还是仍旧可以灵活处理?这些认知或者行为层面上的文化差异是中德跨文化交际中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发冲突。

1) 认知层面

① 日常生活中的常识

面对中国员工“我已经尽力了”的说法,Haydn先生进行了自我反思:对于德国人而言,会议室或者早餐桌应该如何布置,不言而喻,因为这些属于他们生活工作中耳濡目染的常识;然而中国人的头脑当中却并没有这种所谓“常识”,或者说中国人对此的“常识”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在中国长大的人绝不可能形成与德国人一样的常识。

Hansi遭遇过的一次冲突就是由于中德双方对“德餐”理解的不同导致的。Hansi的公司曾预定了某饭店的德式西餐,然而那里的中国厨师们做出来的所谓“德餐”让德

国人大跌眼镜。笔者认为，很多没有接触过欧洲文化的中国人很难区分“西餐”中什么是“德餐”，什么是“法国大餐”，而什么又是“意大利餐”。“德餐”对于德国人来说不言而喻，而大多数中国人却对它不甚了解。在 Hansi 的那次经历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元交际，冲突一触即发。

② 工作成果评估标准

涉及工作成果的评估，德国几近完美主义的评估标准和中国的“差不多—文化特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同事的‘差不多—文化特点’肯定是德国人完全无法接受的。……对我而言，‘差不多’就是‘随意性’：‘这样就行了’，‘就可以了’！”（Haydn 语）从手下的中国员工那里，Haydn 先生得到的大多都是某个“差不多的解决方案”。这种中国的“差不多—文化特点”让他很伤脑筋。

访谈中其他多位受访者也表示自己对此难以接受。Brigitte 就对中方的“差不多—文化特点”感到很头疼。在她所在的设计行业里，德国式精确的工作标准在中国很难落实。她经常从中方合作伙伴那里听到类似于，“1.3 公分，差不多了吧！”的说法。对此，起初她经常据理力争，“可‘差不多’并不是一公分！我要的是一公分！……这得精确！如果我们说，我们想要这样那样，中国人经常认为‘差不多’就够了。”（Brigitte 语）中德双方的工作标准之差异，从中可见一斑。对于 Brigitte 的中方合作伙伴，“差不多”就可以接受了；而对于 Brigitte 而言，“差不多”却是不精确，不达标。

德国人的工作风格以严谨精准著称于世。“差不多—文化特点”显然与德国的工作标准有着天壤之别。让中方了解什么是德国的工作标准，是项长期工作。

③ 员工绩效评估标准

Wolf 公司“薪金之争”的起因便是中德

双方对于何为“达标”，何为“优等”的迥异认识。从 Wolf 对冲突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中国人自评的“优等”甚至不及德国人眼中的“达标”。

在加薪标准问题上见证了一次严重的中德冲突之后，Wolf 作了一番比较，在工作中，德国人更加公私分明，而中国人则经常用私事作为要求加薪的论据：在德国总部，他也会在年初和每位员工共同确定薪金标准以及该员工一年的个人工作目标。如果目标没有完成，那么理论上就不存在加薪的可能。大家都用事实说话，工作业绩是讨论的全部内容，一切都理所应当，运行起来相对简单很多。Wolf 表示，在中国他也曾尝试着只用事实说话，“因为我当时用的就是我之前所了解的那套做法。也是（先）统一目标，然后就事实状况进行讨论，或者去评述某人的工作业绩达标与否……”（Wolf 语），然而中方员工却时常拿家庭原因作为加薪的理由。

显然，在 Wolf 的公司，中德双方对绩效评估中何为“达标”有不同的认知。Wolf 认为：“‘达标’就是达到目标了。对我而言，或许在德国人那里它并非负面评价，恰恰相反，目标达到了，太棒了！……然而这对所有中国同事来说，以前在大学里他们都是拿最高分的，怎么突然一下子换成了‘达标’。（只是）‘达标’？这怎么可能！？我特别棒的！我是最好的！……这当然就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冲突……”（Wolf 语）

总而言之，达标对中国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是个接近负面的评价，在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后，对一贯优秀的他们而言，被评为“达标”几乎是个耻辱。

由于该企业的部门领导既有德国人也有中国人，中德部门领导对绩效评估标准的不同定义让“薪金之争”更加趋于激化。

中国经理把所有的员工都评为“优等”。（最后的局面）很有意思，中方经理领导的团

队都是优！优！优！……只要团队是欧洲人（管理），（员工的）得分就是“达标”！这种局面确实让人很难受……（Wolf 语）

最后问题就聚焦到对评级标准的理解和定义上。因为 Wolf 的某个员工比中国经理手下的另一名员工更好，结果他只得了“达标”，而中国经理手下的那名员工却得了“优等”。这一标准差异在 Wolf 的公司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一批中方员工集体辞职。

面对那次失败的交际，德方进行了反思：为了让中国员工更好地理解德企在“薪金之争”中对该问题的态度及一贯做法，“我们当然不断地和他们交谈。……不断地邀请他们，尝试着跟他们解释，总是把大门敞开着，他们可以找我们（交谈），（我们会）倾听他们（的问题），给他们解释”。（Wolf 语）另外，德方还“组织了多次培训”，目的是让中方经理明白标准到底是什么，作为一个大型的跨国企业，该德企的经营理念是什么，无论是在哪个国家，中国或是别的国家，这种理念都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Haydn 先生也认为，在作绩效评估时，谁来评，以及怎么评都可能导致问题，让双方都很恼火。因此 Haydn 先生认为事先与员工“尽可能清楚地确定评价的标准”格外重要。（Haydn 语）

2) 行为层面

Hagen 先生认为中德文化在“……价值取向、或者说……如何彼此交往的基本原则方面截然不同。”（Hagen 语）

① 交流范式的差异

Peter 也在访谈中提到了中德交流范式的不同。他感觉，除非主动去问，否则很多中国员工不太愿意提供信息。于是，他便采取了“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方式，有时候会有意外的收获。

我有时候会问，“有没有什么我必须知道的事情？尽管我没问到，但仍旧应该知道的事情？”这有时候听起来几乎有点滑稽，不过我会变换形式地提问。比如下一步要做什么？问题是什么？这可能伤害谁的利益？这可能对谁有益？（Peter 语）

Peter 在意识到中方不愿给出信息之后，通过主动发起交流，寻求更多的信息。Müller 先生也提到，在本地员工这里，我当然必须要注意，看谁不提任何问题，我就得问他，“您的意见怎样，您觉得应该怎么做？”以确保他也了解我们的做法。因此，我们也尝试着去“教导”本地的员工，这（个字眼）听起来很讨厌！或者应该说去指导，指导他们应该怎么做事情。（Müller 语）

Hansi 认为“追问”的必要性源于中德上下级间的交流习惯不同。在德国，“如果我让某人去做什么……工作完成时，他会到你面前来说，‘嗨，这项工作我做完了。’或者，如果有问题，这个人就会说，‘嗨，我很想完成这项工作，不过，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咱们再修正一下（工作）思路吧……’”（Hansi 语）。她认为，德国的上下级之间会有很多交流：介绍工作情况，报告工作已经完成或者告知工作已进行到哪个阶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提出困难，寻求支持等。交流结构是双向的，很多情况下是自下而上的。

而中国员工则不习惯于自下而上的交流。在交代中国员工做事时，Hansi 感觉“有时候就像是推轮椅”，“我有这种感觉，你告诉对方做什么，之后这事就没有下文了。”（Hansi 语）之所以没有下文，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有可能，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没遇到什么困难；也有可能工作刚开始就遭遇阻碍而搁浅了。……如果上司不主动过问，这事可能就只会石沉大海”。（Hansi 语）因此，她通常会主动去找中国下属询问，工作完成了没有，有没有困难？——追问、追问

再追问。^⑩

② 计划范式的差异

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中德计划行为范式的差别已经见怪不怪了。Babala 在参与中德合作时发现存在一种“典型的中德冲突”(Babala 语),其导火索就是中德双方到底应该提前多长时间制订计划这个问题。德方习惯于做长期计划,提前数月就把计划制订好;而中方则习惯于做短期计划,事情往往到了即将开始的那一刻,计划方才最终敲定。Josef 也发现,在中国,往往在跨文化活动开始前的最后一刻,一切乱象方才归于井然有序,计划才最终被确定下来。

一次,当 Josef 因为中德双方在计划行为上的差异陷入冲突时,他去找了平素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中方某领导。二人一见面,Josef 便开门见山地向对方介绍了事情的原委以及德方的想法,而后说:“你知道吗?如果现在你们还不……,你就是在给我找麻烦!你们能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们现在不这么做的话,你们就不够友好。”在 Josef 介绍了情况,直接表示抱怨并提出要求之后,LL 很爽快地向他道歉,告诉 Josef,之前他并不知情。结果问题在两天之后就解决了。通过及时解释,就以前双方不成功的交流以及双方在计划上的不同行为方式进行进一步的反思、反馈和交流,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③ 工作独立性的差异

Müller 先生这样界定了自己的工作,这在本研究的受访者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工作的环境,我这里所说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作,……在我们这个环境中工作的大多数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凭借经验和智慧完成工作,……都是专家,老板对要做的工作内容或者一无所

知,或者不如具体负责的工作人员了解得多。(Müller 语)

他解释说,这样的工作环境要求员工必须要具备独立性,并且要确保工作完成的时间。

Babala 在欧盟的驻京机构实习时,领导有时会跟她说,“我们要接待一位政界要人!制定一份日程吧!”之后我就会问,“要来中国的是个什么人?”然后我就会考虑,他们可能会愿意参观什么?什么会让他们感兴趣?之后我就开始着手制订计划了。也就是说,一个比较泛泛的指示,只要告诉我,事情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就可以了。我就可以完全独立地做事了。(Babala 语)

但 Babala 手下的中国员工却做不到这一点。她需要非常精确的指示。不过如果给她这样的指示,她就会把工作做得超级好,她能记住很多事情。“请现在去做这个,这个,这个……,先给他打电话,再问一下可不可以……!”她都能记住,而且会完成得很完美。但是她却很少自己思考,也很少来问我应该怎么做……(Babala 语)

当然,所有上述的差异,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受访者也提到,现在的工作环境中也不乏某些中国员工计划到位,独立性强。上面总结的差异是受访者在对中国员工一般性看法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为了澄清这些认知与行为范式上的差别及其导致的误解,并规避冲突,或者限制冲突升级,有必要使用元交际型冲突管理方式。

3) 语言差异

除了上述差异之外,语言差异也极易引发跨文化误解乃至冲突。语言导致问题有三种可能性:其一是语言水平差;其二是个人

^⑩ 赵倩:《预防冲突—德国在京工作人员的元交际型冲突管理风格》,第51页,载《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月,重庆,第48—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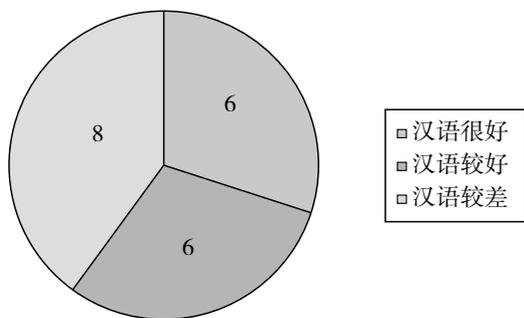
语言习惯的差异导致不解或者误解；其三则是交际口误。

① 语言水平

在京德企的工作语言主要有三种：德语、英语和汉语。相对于单一文化而言，在中德跨文化的语境下，这三种情况都更容易引发误解和冲突。

受访者的工作语言大多是德语或者英语，只有六人明确表示自己在工作中实际使用或者可以使用汉语。

图3 20名受访者的汉语水平^{①7}



从上图可见，大部分受访者的汉语水平不足以让他们使用汉语作为工作语言。在某些受访者的公司，尽管工作语言是英语，但是，中国同事在工作中进行某些交流时会使用汉语。比如 Jens 就曾因为汉语差而遭遇困难：公司里除了他之外都是中国人，开始时他坚持要求重要文件都用中英文双语撰写，但由于翻译工作耗时费力，后来中国员工们便要求只用中文撰写这些文件。然而这却让 Jens 失去了又一个能获取重要工作信息的途径。而 Peter 所在的跨国公司，很多邮件干脆是用中文写的：

更有甚者，您（我）不仅仅什么都听不懂，而且大字也不识一个，因为这里的文字也完全不同。……我必须就每一封短小的邮件求助于（中国）同事，有时候我根本不清楚，这封邮件有没有什么应该保密的内容。但我必须找人来给我念（翻译）。我甚至不知道，对面楼上的霓虹灯上写的是什么！我看不懂！就是这样，很大一部分交际内容就从我身边流失了。……我不知道，刚才邮件里有什么内容我还没弄明白。但过会儿，那个人可能又会发一封邮件（来催），（又是）用中文写的。原来上封邮件是要问我什么事……我每天都会接到很多这样的邮件……有时候我只能希望，我没看懂的那封邮件里没有什么重要内容。（Peter 语）

可见，受访者汉语语言技能的缺失，使交际效果难以保证，误解甚至不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如果工作语言是德语，外企的中国员工会德语的倒是大有人在。但几位受访者却抱怨很多中国员工的德语是“中国式德语”，发生误解的几率仍旧较高。

比如受访者 Wolf 在与中方员工的交流过程中就发现，有时中国员工并不是刻意要向他隐瞒什么，或者要撒谎，他们其实已经用属于“中国人的语言”^{①8}向他暗示过了，只是他自己没有领会而已，因为他没有正确理解这种“中国人的语言”，而且他的逻辑也和中国人的不同。他注意到中国员工习惯使用的某些词汇，比如“可能”^{①9}，并试着去理解这些说法：如果一个中国员工对他说“可能”，这意味着什么。Wolf 花了相当长时间，才搞清楚中国员工的这些习惯说法。

而如果工作语言是英语，就意味着双方

^{①7} 笔者注：受访者汉语水平的自我评价参见本刊第二辑本文上部分的附录。

^{①8} 笔者注：中国式德语。

^{①9} 笔者注：“vielleicht”。

都不是用母语交流，中方员工的“英文水平也不一样”，（Peter语）交流效果也是差强人意。

英语既不是我的母语，也不是他们的母语。我们尽可能地（用英语）彼此交流。这个环节极易造成误解。（Peter语）

从语言上看，在中国工作给Peter带来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我会一点意大利语，会说不错的法语，当然还会英语。这样一来，在欧洲我大致都能应付得过去。总能理解不少东西。但在这里，没有！什么都没有！^{②⑩}这里的一切都完全不同。（Peter语）

就像Becker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很多误解，……部分是语言导致的，……部分是不同的工作方式导致的。（Becker语）

由此可见，语言水平欠佳乃是工作中产生误解的一大原因。

② 个人语言习惯

当受访者Karin被问到是否曾有过与中方员工有误解，但通过交流消除了误解的经历时，她作了如下讲述：

她们（员工们）问我什么事，……我的印象是，当时我已经表示过同意了，或者，我已经说了，好的，就这么做吧！然而，显然我说得不够清楚。……当时我脑子里原本想的是，这事很明确，我们现在就这么决定了，现在就这么做。但很可能我没有（清楚地）表达，好的！你们就这么做吧！现在就开始这么做！（Karin语）

表示同意时她还经常会这样说，

你们有时间的话，就做这个或者那个事吧！如果你们有时间，就去做吧……！（Karin语）。由于Karin的表态过于模棱两可，员工们对她的指示经常产生误解，而导致不快。……我以为我已经做出决定了，已经说了，现在可以这么做了！之后，我却发现，

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做。后来，我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交流。（交流的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我必须给出更加明确的指示，而不仅仅是点一下头，或者说一句“好的”，然后走开。我必须把话说清楚！（Karin语）通过与中方员工进行元交际式的交流，Karin意识到，做出明确答复十分重要。接受访谈时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已经有了改进，给出的工作指示已经“相当清晰了”。（Karin语）

③ 口误

有时语言引发的问题源于口误。受访者Peter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冲突。有几次，我发现有冲突，它们已经隐藏了很久，我一直没察觉。……之后以某种方式，在某个时间它们一下子冒出来——因为总会有这样的机会，（中方同事）会让对方感觉到（不对劲）。每到这个时候，我当然都很惊讶，后来，就像之前说的，我就通过交谈，更确切得说是一对一的交谈澄清了事实。交谈中我发现，当时我说的是“东”，他理解得却是“西”……我们会互相解释，当时我嘴上说的是华东地区，但其实想说的是华南地区，等等。总之无论如何，都会找到一个解释。（Peter语）通过元交际，隐喻或者事实得到了澄清。Peter自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他和中国同事大都能冰释前嫌。

当然，由于中方不愿与领导交流，因此要看元交际的效果如何，还需假以时日。Peter在访谈中就曾经表达了这样的忧虑：“……也或许，我走出来，自以为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而对于（中方）员工却并不这么认为，而且也不会告诉我。”（Peter语）但就他所能感知的情况来看，这种“元交际式”方法迄今为止还是有效的。当然，他并不敢百分之百保证，事实的确如

^{②⑩} 笔者注：这句话是受访者用中文说的。

此，因为中国员工通常不会谈他们的感受，因此事实到底如何，谁都说不清。

四、讨论

本研究借助质性访谈所获得的一手资料，对中德跨文化语境中德国在华外籍员工的元交际型冲突风格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五大特

点，并对其作了文化解读。这有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该冲突风格，促进跨文化语境中元交际型冲突管理方式的使用。

本论文的不足之处在于，关于该冲突风格的效度问题，笔者仅根据德方的描述做出了简单判断。下一步有必要了解中方合作者如何评价德国外籍员工的元交际冲突风格。

作者简介：赵倩，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博士。

欧洲经济复苏

张 凯

【摘要】自 2013 年年中起，欧洲经济释放出景气复苏的明显信号，各项经济景气指标出现回暖趋势，但依然存在不稳定因素。从指标分析看，欧洲经济如今已经走出衰退的泥沼，但通向增长与繁荣的道路并不平坦。失业、金融市场以及财政一体化等许多深层结构性问题是否能得到正确的处理影响着欧洲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欧洲 经济 景气增长

在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欧洲经济自 2007 年秋起就出现了持续下滑的衰退景象，各种主要经济指标纷纷呈现大幅恶化态势。在各国救市措施的影响下，欧洲以及欧元区经济急剧下滑的速度在 2009 年第二季度开始放缓，显示出经济衰退触底反弹的迹象，国内生产总值开始微幅正增长。正当人们为 2010 年的经济回暖感到庆幸之时，意大利的债务危机使得欧债危机进一步升级，国际评级机构降低欧洲 9 个国家的信用等级等不利因素又再次拖累欧洲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在 2012 年底到 2013 年初又一次经历负增长。这之后，欧洲经济又重新步入增长的曲线，释放出景气复苏的明显信号。^①

一、曲折而缓慢的复苏

在 2009 年第 3 季度，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有关欧元区经济展望的报告中指出经济危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衰退已到达底部，经济复苏即将来临。^② 这样积极的预测让当时正饱受危机和衰退煎熬的欧洲各国终于能看到一丝光明，对经济重新增长再次充满信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打消了在经历了 2008 年底、2009 年初的经济大幅下挫后对欧洲经济是否会就此崩盘的疑虑。

欧盟经济包括欧元区主要 15 国的经济在 2009 年第一季度出现了此次经济危机中最大的降幅，其中欧盟 28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环

① 本文数据除特殊标注，均源自 eurostat 数据库。

② ifo: 《Euro-zone economic outlook》，in: <http://www.cesifo-group.de/de/dms/ifodoc/docs/facts/forecasts/EZEO/eo-2009/eo-20091007-dt.pdf>, 2009.10.

比下降甚至达到了 4.58%，欧元区 15 国的生产总值也萎缩了 2.63%。但这种大幅衰退在当年的第二季度就得到了控制，欧盟 28 国经济转负为正，环比增幅为 0.4%；欧元区 15 国经济尽管依然是负增长，但下降幅度仅为 0.16%。从 2009 年第三季度到 2012 年第三季度的 3 年间，欧洲整体经济一直处于复苏乏力的状态，欧盟 28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环比增幅平均值只有 0.78%，扣除物价浮动因素，实际增长基本为零。尽管在这一期间欧洲经济停滞不前，但对比前期的大幅衰退，已经是迈向复苏的方向了，各国都在此时做出了谨慎乐观的经济预测。

2012 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让欧洲各国又一次对能否尽快走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衰退以及停滞表现出怀疑。欧债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不确定性以及受其影响较深的南欧各国政府的动荡更迭都使欧洲经济再次步入负增长。尽管 2012 年第四季度欧盟整体经济仅仅下滑 0.24%，但也让人对欧洲经济的发展前景担心不已。2013 年一季度的数据更是加剧了这种担心，0.36% 的负增长似乎又预示着经济的再次回落。但自 2013 年第二季度起，欧洲经济起稳，包括欧元区在内的欧盟各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平稳上升的趋势。这也使得各经济研究机构的季度预测纷纷转为积极乐观，认为欧洲以及欧盟经济真正处于复苏阶段，从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打击的阴影下走出来了。

二、经济的重要指标喜忧参半

欧洲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力市场平稳发展，国内消费持续上升，工业加工订单又重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向上拐点，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新的增长，欧洲主要企业的市场信心指数呈现乐观向上的趋势。另外，主要受欧债波及的南欧

各国又重新出现在金融市场上，这表明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恢复正常秩序，整体经济重新步入正轨。但从这些经济景气指数的发展看，欧洲经济现在也只是摆脱衰退，离真正的增长还有一段距离。

1. 劳动力市场

从欧盟数据看，自 2013 年 8 月起，欧盟以及欧元区国家的失业率出现稳中有降的发展态势。欧盟 28 国的失业率在 2013 年前七个月一直为近年来的历史高点 10.9%，自 8 月起逐步下降，到 12 月降为 10.6%，2014 年 4 月的最新数据表明，欧洲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复苏随着经济的回暖在稳定持续发展。4 月欧盟 28 国的失业率下降到了 10.5%。但各欧盟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展还依然是不均衡的。

从失业率的现状看，奥地利、德国属于失业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仅为 5% 左右；而葡萄牙、塞浦路斯、克罗地亚三国的失业率都已超过 15%；西班牙和希腊两国的失业率甚至高达 25% 以上。从失业率变化的方面看，在近期，各国失业率几乎都呈下降的趋势，或者失业率的增长出现放缓的趋势。其中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都比去年的历史高位下降了一个百分点，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失业率甚至下降了 2 个百分点。塞浦路斯、意大利等国的失业率在过去一年虽然出现上升，但幅度已大大减少。

尽管欧洲各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转好的迹象，但前景依然不容乐观。根据安永的研究报告，欧元区的失业率在 2014 年并不会出现根本性转折，或许在 2015 年才会出现根本性好转。欧盟委员会也对欧洲就业前景持同样的立场。尽管 2013 年底欧盟公布的有关危机对劳动力市场的调查结果显示，公众的悲观情绪在进一步消退，但失业问题的

解决并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③从经合组织(OECD)5月最新发布的有关法国的经济预测中,也同样对近期法国的就业市场较为悲观。对法国实施的推动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措施虽然积极肯定,但认为其效果近期并不明显,而具有时滞性。

2. 赤字与负债

从整体负债率来看,2013年欧元区整体国家负债从92.6%上升到95.5%,2014年还将进一步达到95.9%。据预测2015年才能略降到95.4%。欧盟28国的统计数据也展现出同样的趋势。整体负债率在2013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达到89.7%,今年还将小幅增长,预计为90.2%。专家预测这将是欧元区国家整体负债率的最高点。希腊在2013年以175.1%的高负债率成为欧盟国家债务最重的国家,但这已经低于之前预测的188.4%的值。紧随其后的是意大利(132.6%),葡萄牙^④(129%)和爱尔兰(123.7%)。塞浦路斯和比利时的负债率也都超过了100%。西班牙、法国、英国、匈牙利、德国、奥地利等国的负债率虽然略低,但依然没有达到欧盟财政标准。

欧盟大部分国家的财政整顿还远未完成,仍需进一步深化。但现在两难的局面是紧缩影响经济复苏,而扩张却又更加重负债。欧盟货币委员会主任Olli Rehn指出,这些国家的巨额财政赤字以及目前经济实际增长依然很低的情况都预示着这些高负债率的国家在

一段时间内的总体债务水平仍然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⑤如2013年西班牙的年度赤字达6.8%,超过既定目标6.5%的标准。2014年的预计赤字也将达5.9%,2015年欧盟委员会预测会重新出现增长,达到6.6%的赤字状况,这将远远偏离4.2%的目标。这将使得西班牙总体国债接近一万亿欧元,造成经济重新增长之路上的巨大障碍。

3. 国内需求与私人消费

整体欧盟国内需求的增长并不稳定。虽然自2012年起国内需求的下降幅度在逐渐缩小,在2014年二季度转为持平,并在三季度出现0.8%的增加,但总体内需并未呈现稳定增长的局面,对经济复苏的拉动力仍然很弱。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经济形势逐步平稳,私人消费方面出现了转好的迹象。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最新公布的欧洲消费预测指数显示,人们对自身以及国家经济的预期都有所提升,更有40%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增加消费。在受调查的12个欧洲国家中,有六个国家的结果为消费大于储蓄。这些都表明欧洲消费者对前景的乐观态度。^⑥

从欧盟整体私人消费数据的发展看也印证了随着经济形势转好,消费出现持续上升。自2013年一季度起,欧盟私人消费转为正增长,环比上升率为0.1%至0.3%,同比数据尽管在前两个季度依然是负增长,但负增长出现放缓趋势,自第三季度更是转为增长

③ Standard-Eurobarometer 80, Herbst 2013, Die EU-Bürger, die Europäische Union und die Krise, in: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80/eb80_cri_de.pdf.

④ OECD Economic Surveys: France in: 2013 http://www.keepeek.com/Digital-Asset-Management/oeed/economics/oeed-economic-surveys-france-2013_eco_surveys-fra-2013-en#page18

⑤ (Verfasser unbekannt), Schuldenländer bekommen Defizite nicht in den Griff, <http://www.welt.de/wirtschaft/article121549140/Schuldenlaender-bekommen-Defizite-nicht-in-den-Griff.html>.

⑥ Commerz Finanz, Europa Konsumbarometer, http://www.europa-konsumbarometer.com/PDF_Dateien/Executive_Summary_Konsumbarometer.pdf.

0.2%，第四季度为 0.6%。尤其是在那些受到经济衰退打击严重的南欧各国，如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们能明显感觉出私人消费释放性增长。自 2013 年二季度起，西班牙私人消费环比增长分别为 0.1%，0.5% 和 0.5%，呈稳定状态。葡萄牙在 2013 年的私人消费更是出现了 1.1% 的增长率，为 4 年以来的最高值。

4. 进出口贸易

欧盟整体出口自危机爆发以来曾在 2008 年底至 2010 年初之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在 2010 年间出现补偿性出口增加，尤其是对欧盟之外的国家出口对欧盟整体出口起了主要支撑作用。欧盟内部出口的增长在 2011 年至 2013 年中的时期内明显小于对外的出口增速。随着欧盟经济自 2013 年中不断回稳，欧盟内部出口同比变化幅度收窄，呈现相对稳定趋势。

从各主要欧盟国家的出口增长看，德国依然是一枝独秀。深受国家债务危机的南欧各国如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出口也从去年年中开始稳步增长。从年度出口总额看，欧洲各国的出口自 2009 年大幅下滑后，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尽管增幅较小，但向上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5. 其他指标

欧盟 28 国近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开始逐步增加。从季度数据看，2013 年二季度出现了环比 0.7% 的增长，结束了自 2011 年以来的负增长趋势。在第三和第四季度也分别呈现 0.7% 和 1.1% 的环比上升。但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暖主要是源于德国等经济较好的国家，南欧各国的投资情况还是处于不稳定的状况。2013 年下半年，西班牙的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增长，而意大利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第三季度下降了 0.6%，第四季度又有所回升，增加了 0.9%。葡萄牙也在第二、第三

季度实现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小幅增加。

固定资产投资的回暖表明投资者又重返欧洲，对欧洲市场的信心在不断提升。这也体现在金融债券市场上。各主要评级机构对欧洲各国的信誉评级逐渐转好。如惠誉对西班牙的信用评级从“负面”提升到“稳定”。在 2013 年 10 月底，西班牙国债利率首次回落到 4% 警戒线以下，爱尔兰和西班牙不再依赖欧洲救助基金，葡萄牙也将退出救助计划、再次发行国债，连希腊也能重返债券市场，这些都反映它们正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

通货紧缩问题自 2013 年下半年起成为人们对欧洲经济未来发展的新的担忧。欧盟整体物价水平自 2013 年 8 月起一直处于 2% 以下，欧元区的物价环比值还要普遍低 0.1 个百分点。2014 年 3 月公布的欧元区同比数据仅为 1.1%，这与欧洲央行所设立的中期物价水平 2% 的目标相差甚远。希腊、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三国 3 月的物价同比值均为负值，希腊的通货紧缩更加明显，并有不断加剧的趋势。2014 年 3 月的物价同比值为 -1.2%。立陶宛、瑞士、爱尔兰、葡萄牙、瑞典和丹麦几国的物价上涨水平也仅在 0.5% 以下。

三、增长之路任重道远

对于未来欧洲的发展，此次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为欧洲各国提供了思考空间和机会。欧洲经济如今已经走出衰退的泥沼，但通向增长与繁荣的道路并不平坦。许多深层结构性问题是否能得到正确的处理影响着欧洲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欧洲依然面临着各种难题，例如如何缓解欧洲劳动力市场上的压力，如何进一步纾解金融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疑虑，如何平衡各国经济发展及利益分配，如何改革欧盟内部体制结构等等。这些深层问题相互交织，亟待处理，它们能否得到巧妙解决是欧洲经济今后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关键。

危机爆发后，一系列救助计划和财政紧缩以及改革政策的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欧洲各国内部存在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摆在眼前。从欧元区目前的行动方向看，推行财政联盟成为今后稳固欧洲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2011年1月欧盟25国签订的新财政条约规定了国家年度结构性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0.5%。但这仅是向财政联盟迈出的第一步，各国的预算和税收仍然保留在各自国家，条约只是起到监管和统一标准的作用。今后财政联盟如何深化，欧盟各国对于是否能完全接受并有条件承受和实施这一实际上是由德国等欧盟强国强势输出的财政紧缩模式，还是顾虑重重。在财政联盟的进程中，仅仅有统一的财政标准是不够的，欧盟内部的税收改革、各国福利制度的趋同发展都会构成不小的困难。从目前欧洲主要国家的赤字和总体负债情况看，财政联盟和其改革都需经历漫长的磨砺。

面对欧洲的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极不乐观的局面，如何扩大投资、刺激就业市场成为许多国家面临的难题，而这些国家恰恰就是处于财政监管、被硬性实施财政紧缩的国家。对于这种两难的选择，德国的就业政策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就业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必须双管齐下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调整就业供给，改变就业观念，切断福利性失业的源头，调动雇佣需求的积极性、增加供需信息交流是未来这些高失业率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方向。但就如同德国的“哈尔茨”改革（Hartz IV）一样，这样的改革设计、实施直至效果的出现是需要时间的，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是经历了

几乎八年的阵痛才摆脱高失业率的阴影的。这样的改革也意味着削减福利，也就意味着政府需面对选民的流失和下台的危险。那些现在处于同样困境的欧洲各国政府是否能在权衡选举结果和长期效果之间做出这样的选择呢？也许答案是他们不得不这样选择。但在过渡时期内的困难和质疑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波动都会成为欧洲解决就业问题的绊脚石。

另外，欧洲金融市场的前景现在仍是扑朔迷离。欧洲央行已承诺在未来的三年间会提供无限额的流动资金，并放宽公开市场操作的抵押担保标准，并连续降息，以期扩大市场流动性，增加市场信心。欧央行将其对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可能与欧元区国家是否能加快实现“财政联盟”挂钩，但随着欧洲银行业的资金缺口不断增加，同时欧洲银行监管局新的要求实施，市场期盼欧央行能进一步扩大后续融资措施。但从欧洲央行目前收购国债的规模来看，并没有满足市场预期。这也使得市场参与者的观望情绪加剧，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前景如何无法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在这种微妙的市场情绪下，如果欧债国家出现突发恶化的情况，欧洲金融市场很可能再次出现混乱，也会再次拖累经济走向增长之路。

欧洲以及欧元区经济如果在未来的两年中能够继续持续增长，那对各国、尤其是南欧各国将会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赋予新的动力，给予更大的信心。但如果欧债危机又重新爆发，那么希腊、西班牙等国将会重新回到衰退的阶段，面临更大的挑战，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作者简介：张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德国社会福利国家代际公平性研究

徐四季

【摘要】世纪之交，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开始面临代际冲突问题，即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问题和两大社会热点相关：一是不断扩大的国家债务会增加子孙的经济负担，掠夺后代的发展机会；二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的筹资困难，要么提高年轻一代的缴费率，要么降低老年一代的养老金。代际冲突一般产生于代际公平受损，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德国社会福利国家中是否存在，或者在多大范围内存在年轻一代利益受损的现象。针对这个研究课题，本文首先明确代际公平的定义和度量标准；然后从整体经济角度出发，从资产转移和养老金支付两个方面具体考察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代际公平性。

【关键词】德国 社会福利国家 代际公平

一、引言

世纪之交，德国社会福利国家开始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即代际冲突。具体来讲，是老年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一问题至少和两大社会热点相关：一是不断扩大的国家债务会增加子孙的经济负担，掠夺后代的发展机会；二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的筹资困难，要么提高年轻一代的缴费率，要么降低老年一代的养老金。就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有

学者称：“如果说在社会福利国家的形成时期直到 20 世纪，缓解阶级冲突是所有社会福利政策讨论的背景议题，那么在 21 世纪，这一议题变成了缓解代际冲突。”^①

一般来讲，代际冲突产生于代际公平受损。本文将明确代际公平的定义和度量标准，并在此基础上从整体经济角度全面考察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代际公平性，即是否存在，或者在多大范围内存在年轻一代利益受损的现象。

① Kaufmann, Franz-Xaver: „Schrumpfende Gesellschaft-vom Bevölkerungsrückgang und seinen Folgen“, Frankfurt am Main, 2005, S. 201.

二、代际公平的定义和度量标准

所谓“代际公平”是指代际间的公平关系，体现为各代人平均生活状况的比较。这种比较事实上包括两个范畴：一是针对某一时点的静态比较，即今天生活着的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比较；二是针对一定时间区间的动态比较，即过去曾经生活过的、今天正在生活着的和未来将要来生活的人之间的比较。^②

对于代际公平的要求，经济学家们普遍认同福利不减少原则，即代际公平的实现意味着后代的福利状况不低于现在已经达到的水平。索洛（Robert Solow）称：“可持续性要求我们承担起这样的义务：要给予（后代）一切必要的东西，以使他们的生活标准至少达到我们自己的水平。”^③其实，代际公平隐含着要提升后代福利水平的要求，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也不在少数。豪泽尔（Richard Hauser）明确指出：“每一代人都应该向其后代进行正的净转移，其金额应当高于他们从其上一代获得的数目。”^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使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甚至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之和，也不是地球的所有者。它们仅仅是占有者、受益者，最终要将其作为家族遗产更好地留给下一代。”^⑤系统论证提升后代境遇要求并提出代际公平理论的是特雷梅尔（Jörg

Tremmel），他说：“如果下一代成员满足自身需要的机会平均好于其上一代成员，那么这个社会就实现了代际公平的目标。”^⑥代际公平的三个中心问题是：1）对后代我们是否有亏欠？2）如果有，我们的义务有多大？把我们所拥有的东西等量地留给后代是否足够？还是应该为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3）我们的代际义务涉及哪些资源和物品？什么才是一个“更好的生活”？^⑦

定义的抽象性决定了具体度量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代际公平的目标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从理论上讲，“我们需要结算历史给某一代人所带来的所有优势和劣势，需要将发明、战争、经济危机和人口发展趋势的赢利和费用依据归因原则分摊到各代人身上去，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⑧。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一思路近似地将相关问题纳入到一个简单模型中去考察，例如一个由三代人所组成的农庄模型：中年一代经营着农庄，老年一代居住在农庄里，农庄最终将由年轻一代来继承。在这个模型中，考察代际公平性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资产继承问题，中年一代从老年一代那儿继承了农庄，谨慎经营后最终要交到年轻一代手中；二是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中年一代有供养年轻一代和老年一代的义务。具体来讲，如果中年一代能将经营得很好的农庄交由年轻一代继承，就实现了代际公平的目标；相反，如

② Stiftung für die Rechte zukünftiger Generationen (Hrsg.): „Handbuch Generationengerechtigkeit“, München, 2003, S. 44.

③ Solow, Robert M.: „Growth with Equity through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Minnesota“, 1992, P. 15.

④ Hauser, Richard: „Generationengerechtigkeit, Volksvermögen und Vererbung“, 载 Böhning, Björn / Burmeister, Kai (Hrsg.): „Generationen & Gerechtigkeit“, Hamburg, 2004, S. 29-44.

⑤ Marx, Karl: „Das Kapital -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Berlin, 1975, S. 784.

⑥ Tremmel, Jörg: „Eine Theorie der Generationengerechtigkeit“, Münster, 2012, S. 290.

⑦ Ebenda.

⑧ Börsch-Supan, Axel: „Zum Konzept der Generationengerechtigkeit“, <http://www.boersch-supan.de/axel/GenGerechtigkeit.pdf>, abgerufen am 10.04.2014..

果中年一代经营不善而造成农庄资产贬值甚至消耗殆尽，则违背了代际公平的原则。同样，如果中年一代能够工作到年轻一代可以接管农庄，就实现了代际公平的目标；相反，如果中年一代在年轻一代能够妥善经营农庄之前提前退休，则违背了代际公平的原则。简单来看，代际公平性体现为总资产的稳定转移，总资产是指继承的资产减去养老金支付的现值。也就是说，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代际公平的度量包括两个要素：一是资产转移，二是养老金支付。^⑨ 笔者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考察德国社会福利国家的代际公平性。

三、资产转移

在代际公平的研究框架内，谈到资产转移，首先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加重后代负担的国家债务。其实，国家债务仅仅是国民经济总资产的一个部分，具体来讲是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货币债务的一个子项目；在代际间转移的净资产包括资产方的货币债权、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本，当然要减去负债方的货币债务（参见图表 1）。

图表 1 整体经济资产负债表图示

资产	负债
货币债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对本国国民的债权 ● 对本国政府的债权 ● 对外国的债权 	货币债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本国国民债务 ● 国家债务
实物资产 人力资本	
净资产（净货币资产 + 资产物）	

据统计，本国国民的债权和债务基本可以抵消，因为本国国民和国家债务的债权人大多是本国国民和机构。也就是说，国家债务其实是他们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债务并不一定意味着资产缩水。因此，在德国整体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中，就国家债务问题仅统计了国外债务。图表 2 显示，

1991—2011 年，德国整体经济的净资产从近 6 万亿欧元增加到 11 万亿欧元以上。这说明，德国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创造了极大的经济财富，年轻一代从其父辈手中继承的资产将大大高于其父辈从其祖辈手中继承的数量。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德国社会的代际公平并没有遭到破坏。

^⑨ Bofinger, Peter: „Gerechtigkeit für Generationen: Eine gesamtwirtschaftliche Perspektive“, Bonn, 2008, S. 4-5.

图表 2 德国整体经济资产负债表 (单位: 亿欧元)

资产			负债				
	1991	2001	2011		1991	2001	2011
对外国的债权	8240	30730	58580	外国债务	6470	30000	54200
实物资产	58084	82490	110123				
				净资产	59854	83220	114503

数据来源: Statistisches Bundesamt/Deutsche Bundesbank: „Sektorale und Gesamtwirtschaftliche Vermögensbilanzen 1991-2011“, Wiesbaden, 2012, S. 6-7。

但是, 德国净资产的所有者结构暴露了德国社会在保障代际公平方面的潜在危机。综合图表 3、图表 4 和图表 5,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德国, 私人住户正变得越来越富有, 其净资产总量从 1991 年的近 4 万亿欧元稳步上升到 2011 年的 9 万亿欧元以上; 与此同时, 国家变得越来越贫穷, 其净资产从 1991 年的近 8 千亿欧元迅速下降到 2011 年的

114 亿欧元。这一趋势极大地限制了国家的财政能力, 导致国家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严重不足。以人力资本为例, 2009 年, 德国公共教育开支占总公共开支的比例远远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倒数第七位 (参见图表 6)。从这点上看, 后代的发展机会受到了限制, 德国社会的代际公平性还有待提高。

图表 3 德国私人住户资产负债表 (单位: 亿欧元)

资产			负债				
	1991	2001	2011		1991	2001	2011
货币资产	19260	36069	471145	借贷资本	8293	15359	15495
实物资产	28569	43360	61394				
				净资产	39536	64070	930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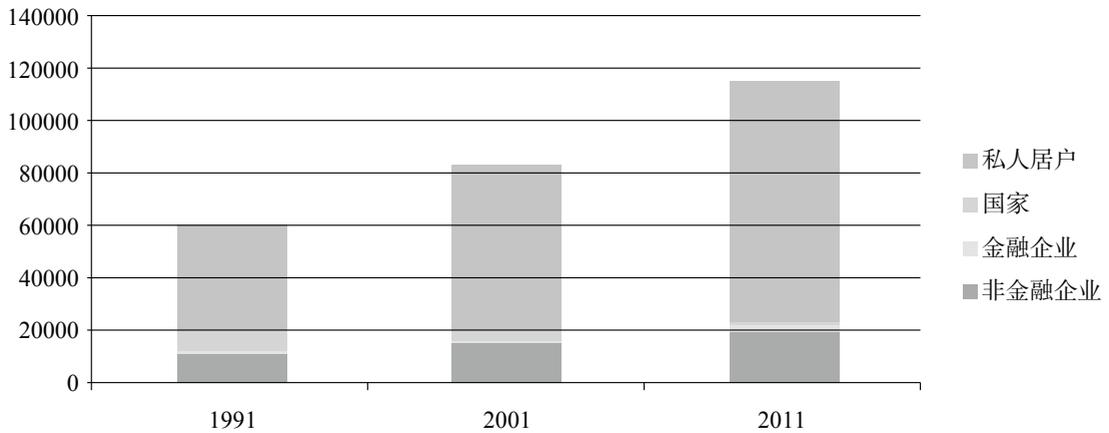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Statistisches Bundesamt/Deutsche Bundesbank: „Sektorale und Gesamtwirtschaftliche Vermögensbilanzen 1991-2011“, Wiesbaden, 2012, S. 10-11。

图表 4 德国国家资产负债表 (单位: 亿欧元)

资产			负债				
	1991	2001	2011		1991	2001	2011
货币资产	4526	5042	9036	借贷资本	5802	12651	22377
实物资产	9245	11193	13455				
				净资产	7969	3584	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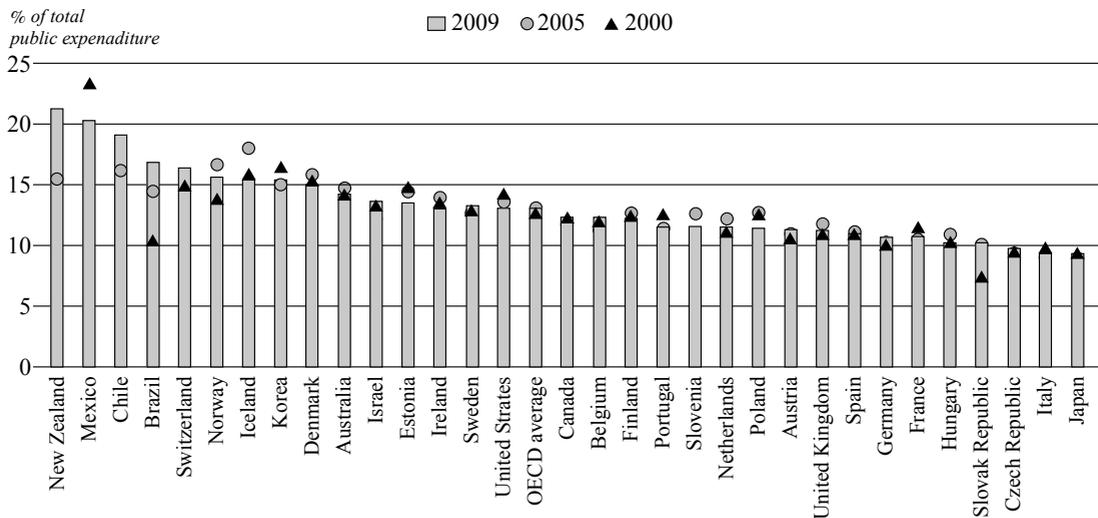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 Statistisches Bundesamt/Deutsche Bundesbank, „Sektorale und Gesamtwirtschaftliche Vermögensbilanzen 1991-2011“, Wiesbaden, 2012, S. 8-9。

图表5 德国私人住户、国家、金融及非金融企业的净资产（单位：亿欧元）



数据来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Deutsche Bundesbank: „Sektorale und Gesamtwirtschaftliche Vermögensbilanzen 1991-2011“, Wiesbaden, 2012, S. 6-11。

图表6 2000年、2005年和2009年公共教育开支占总公共开支的比例（单位：%）



注：国家按2009年公共教育开支占总公共开支的比例从高到低排序。

数据来源：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 OECD Indicators“, Paris, 2012, P. 262。

四、养老金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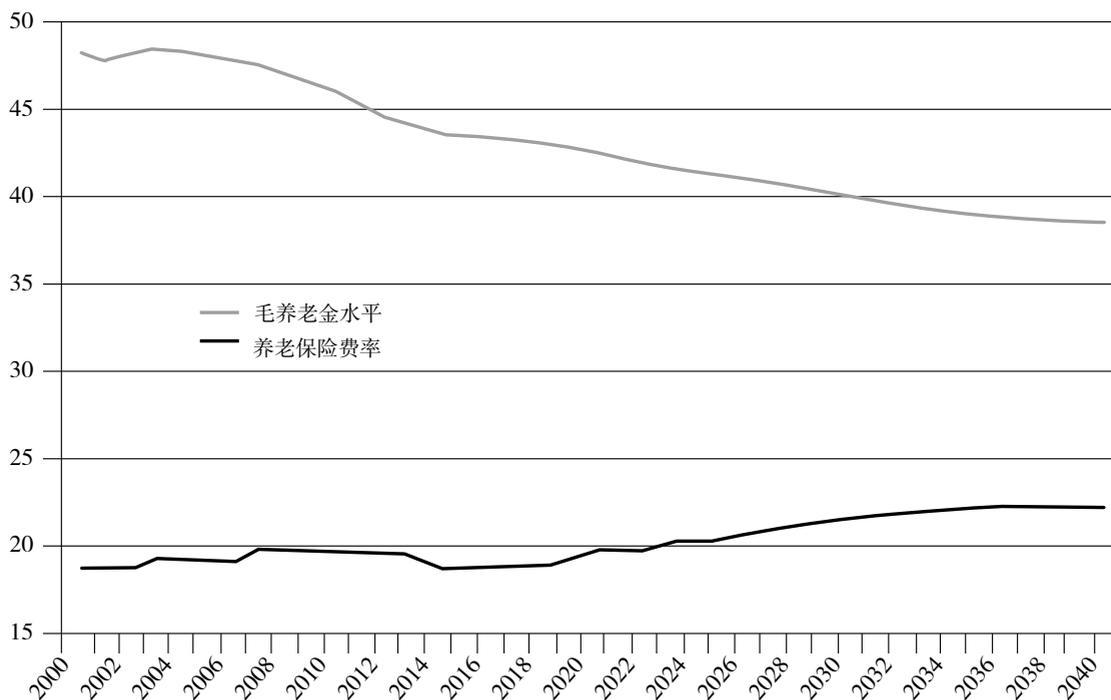
人口老龄化一直被认为是对德国社会代

际公平的直接挑战，因为养老保险缴费人数和养老金领取者人数比例关系的恶化会加重后代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但事实上，经过

1992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养老金改革^⑩，德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一种稳定养老金水平的体系转变为一种稳定养老保险费率的体系；也就是说，现在不再是由要追求的养老金水平决

定养老保险费率的高低，而是由固定的养老保险费率决定可实现的养老金水平。从长期来看，这一转变将导致养老金水平的缓慢下降，但减轻了年轻一代的压力，从而保障了德国社会的代际公平（参见图表7）。

图表7 德国毛养老金水平和养老保险费率的发展趋势（单位：%）



注：“毛养老金水平”是指标准养老金和平均收入的比例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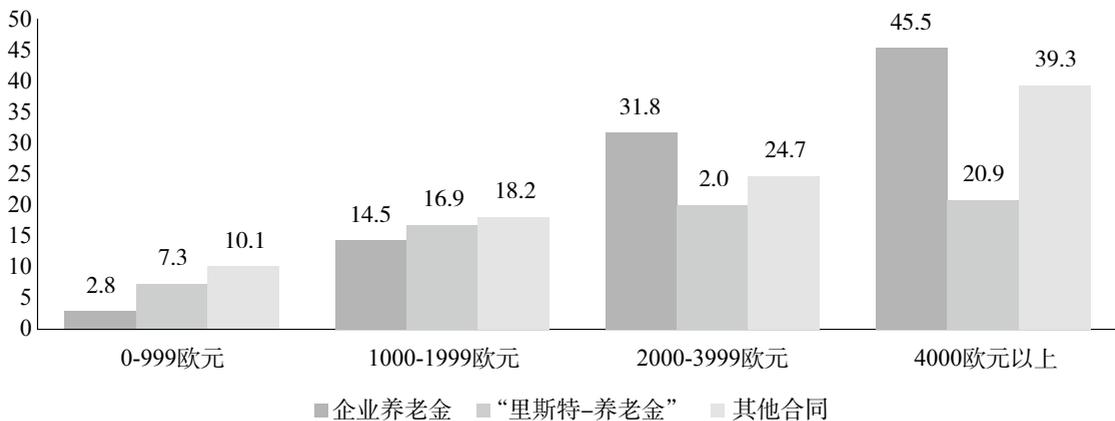
数据来源：Sachverständigenrat zur Begutachtung der gesamt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Das Erreichte nicht verspielen-Jahresgutachten 2007/08“, Berlin, 2007, S. 187。

⑩ 德国这几次养老金改革的目的都在于克服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消极影响。1992年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要抑制法定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增长趋势，具体措施为将养老金水平的适应对象从1957年以来的毛工资水平改为净工资水平，从而避免养老金水平上升而净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2001年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要长期降低法定养老金的水平，同时促进私人养老保险，具体包括“里斯特—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2004年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要使养老金的发展水平同退休人数和就业人数之比的变化联系起来，具体措施为在养老金适应公式中加入了可持续性因素—每一个缴费者所对应的养老金领取者人数增加，养老金水平将下降。2007年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延长退休年龄，将在2012—2029年间把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标准逐步从65岁提高到67岁。

作为配套措施，国家鼓励私人养老保险形式，比如“里斯特—养老金”和企业养老金，以弥补法定养老保险所提供的养老金的不足。对于“里斯特—养老金”，国家给予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转变为企业养老金的雇员收入，国家自然就免除了缴纳社会保险费和收入所得税的义务。实施这些促进措施的成本是巨大的：据初步估算，国家每年的补贴费用和收入损失达到了90亿欧元。^⑪另外，从参加私人养老保险的人员结构来看，国家

的巨额资金支持恐怕也用错了地方：低收入群体恰恰很少参加这些私人养老保险（参见图表8）。从代际关系上看，德国养老保险体系转变的负担主要是由1964年以后出生的中年一代来承担的，因为他们若要追求像过去一样的养老水平就必须额外参加私人养老保险。从整体经济角度来看，德国目前对私人养老保险的促进措施是缺乏效率的，也隐含着一些不利于代际团结的因素。

图表8：各收入群体参加私人养老保险的比例（单位：%）



注：各收入群体的划分依据是居户月收入。

数据来源：Börsch-Supan, Axel, „The Savings Behaviour of German Households - First Experiences with State Promoted Private Pensions“, Mannheim, 2007, P. 22。

在此，笔者想特别谈谈颇具争议的“里斯特—养老金”。2001年引入的“里斯特—养老金”是一种国家资助的私人补充养老保险形式。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法定养老保障水平不断下调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在此背景下，德国政府希望通过推广资金积累制的“里斯特—养老金”来继续保证老年人的生活水准。原则上，个人只要签订了经政府

认可的私人养老保险合同（包括银行储蓄计划、投资储蓄计划和各种私人养老保险等）就可以获得国家资助。国家资助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政府直接提供补贴，二是将个人的缴费作为“特别支出”免征个人所得税。补贴由基础补贴和儿童补贴组成，获得全额补贴的前提是投保人须将上一年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注入个人养老储蓄账户；国家对免税

^⑪ Bofinger, Peter: „Gerechtigkeit für Generationen: Eine gesamtwirtschaftliche Perspektive“, Bonn, 2008, S. 16.

的“特别支出”亦有最高额度的限制（具体标准详见图表9）。具体采用哪一种方式，要看哪种方式对个人更有利，由税务局通过计算最终确定。

图表9 “里斯特—养老金”——直接补贴额度和免税“特别支出”最高限额

年份	最低个人缴费比例 (%)	基础补贴 (欧元/年)	儿童补贴 (欧元/年)	免税“特别支出”最高限额 (欧元/年)
2002	1	38	46	525
2004	2	76	92	1050
2006	3	114	138	1575
2008	4	154	185	2100

数据来源：„GABLER - Wirtschaftslexikon“, 16., vollständig überarbeitete und aktualisierte Auflage, Wiesbaden, 2004, S. 2560。

引入和推广“里斯特—养老金”的积极意义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它标志着德国的养老保险体制从比较单一的法定养老保险向三支柱（即法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私人补充养老保险）的保险体系发展。^⑫通过2001年的“里斯特—改革”，作为第二和第三支柱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私人补充养老保险对于未来老年生活保障的意义大为加强。在法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企业和个人补充养老保障的作用无疑是稳定老年保障水平的无奈但却明智之举。^⑬因此，“里斯特—改革”被认为是“德国历史上自1957年改革后，最重要、最全面、最具创新精神的改革”^⑭。其次，采

用可选的两种资助形式体现了政策的社会公平性。一般来说，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选择直接补贴方式获利更多；对于高收入群体而言，选择免税方式会更为合适。如果只采取直接补贴的形式，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补贴金额过少，优惠政策的吸引力不强，那么政策效果就无法显现；如果只采取免税形式，对低收入群体来说，他们本来就不需要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那么这样的政策显然无法使他们受惠，有失公平。^⑮再次，考虑到第二种免税的资助形式，“里斯特—养老金”其实是对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有益探索。所谓“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在税前列支保费，在领取保险金（即

⑫ 陈飞飞：《人口老龄化与德国法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载《德国研究》，2006年，第4期，第30—33页。

⑬ 于秀伟：《从“三支柱模式”到“多层次模式”——解析德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载《德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70—79页。

⑭ 同上。

⑮ 李俊飞：《德国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改革及评述——以里斯特改革为例》，载《武汉金融》，2012年，第3期，第34—38页。

养老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在购买保险和领取保险金的时候,投保人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退休后的收入通常不会高于退休前,因此这一保险形式对于投保人而言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从而能拉动个人购买养老保险的需求。对于国家而言,由于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的延交,税收收入在短期内会有所减少;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会带来商业性保险公司业务量的上升,保险公司缴纳的营业税与公司税的增加会弥补国家的财政损失。当然,最大的受益者将会是商业性保险公司,“里斯特—养老金”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对于各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因此是一种非常值得探索的养老保障形式。

但是,“里斯特—养老金”的具体实践情况并不太理想,近年来引起了德国各界的强

烈批评。主要问题是“里斯特—合同”的种类和形式纷繁复杂,投保人难以精确核算成本与收益;在咨询师的商业推介下,大多数“里斯特—合同”的个人收益率过低;国家资助基本被这些金融产品的费用所侵吞,最终落入了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口袋。德国经济研究所对“里斯特—养老金”推广10年的总结性研究表明,一名35岁、有两个子女的母亲现在签订“里斯特—合同”的话,若每年增加2.5%的储蓄额,要到85岁才能收回自己的投资,若每年只能投入最低储蓄额,就得等到109岁了。^⑩此外,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低收入者和长期失业者老年的“里斯特—养老金”收入仅仅相当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因此,“里斯特—养老金”也不能像其引入时宣称的那样成为解决老年贫困问题的有力工具。

作者简介:徐四季,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博士。

^⑩ Aischmann, Frank: „Die Riester-Rente - kompliziert und wenig ertragreich“, <http://www.tagesschau.de/inland/riesterrente104.html>, abgerufen am 10.04.2014. Neitzsch, Peter: „Magere Rendite bei Riester-Rente“, <http://www.stern.de/wirtschaft/geld/magere-rendite-bei-riester-rente-alt-werden-ist-pflicht-1754391-print.html>, abgerufen am 10.04.2014.

德国新政府最低工资政策评析

李 微

【摘要】2013年12月17日，德国新政府组阁成功，默克尔再次出任联邦总理，中左翼的社民党和中右翼联盟党组成了大联合政府。在新内阁的组建过程中，双方在教育投入、退休年龄及养老金问题、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问题上博弈激烈，而两党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则是在全德国范围内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在组阁成功的当天，默克尔终于做出妥协，同意社民党提出的8.5欧元/小时的最低工资线，标志着最具社民党烙印的一项政策被正式提上德国新政府议程。但在最低工资立法最终获得议会通过并付诸实施之前，德国“左右两党”在法规细节制定上的博弈仍将继续。本文追溯了德国最低工资标准引入的历史，分析了在这个问题上所产生的争议，探究了该问题产生的理论及现实背景，最终对政策实施前景做出了预测。

【关键词】德国新政府 最低工资标准 施政前景预测

2013年12月17日，在德国大选结束83天后，默克尔终于组阁成功。在这场创下组阁谈判纪录的角力中，默克尔对社民党做出了一系列妥协，最终实现中左翼社民党及中右翼联盟党的联合执政。这是继1966年和2005年后出现的第三次左右两大政党联合执政，也是默克尔任内的再度大联合政府。

本次谈判耗时如此之长，原因主要在于社民党和联盟党之间存在的分歧较大。此外，作为德国政坛最大的两个党派，双方均拥有基础深厚的支持群体，较难做出原则上的妥协。在新内阁的组建过程中，双方在教育投入、退休年龄及养老金问题、欧洲一体化进

程等问题上博弈激烈，而两党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则是在全德国范围内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在组阁成功的当天，默克尔终于做出妥协，同意社民党提出的8.5欧元/小时的最低工资线，标志着最具社民党烙印的一项政策被正式提上德国新政府议程。

尽管全国范围内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被写入两党联合执政协议，但这仅代表德国新政府的大政方针，并未形成确切严谨的法律文本。协议规定，德国将尽快立法，最迟于2015年1月1日开始推行8.5欧元标准，并在2017年1月1日之前完全覆盖德国全部行业。但在正式法律出台之前，许多细节问题

仍有待商榷。例如是否可以存在“例外规定”？协议中仅规定公益义工不在最低工资标准保护范围内，但德国劳动部部长安德烈娅·纳勒斯在接受德国《图片报》周日版的采访时表示，她反对将18岁以下的就业者纳入享受最低工资标准的人群，因“每个年轻人都应当去接受职业培训。我们必须阻止年轻人为了更好的报酬选择去做临时工，而放弃职业培训的机会”^①。尽管纳勒斯同时表示，其余“例外”都是不被允许的，并在3月19日代表社民党提出的“最低工资立法草案”中，基本否认了除此之外的任何例外情况^②。但最低工资的反对者们依然将此视为大框架之外的一道曙光，一个开启“后门”的可能。可以预见的是，在最低工资立法最终获得议会通过，并付诸实施之前，博弈仍将继续。

一、德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历史与现状

1. 德国最低工资标准引入历史

在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中，都已实施国家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欧盟28个成员国中的21个均已通过最低工资法，最低时薪由1.04欧元（保加利亚）至11.10欧元（卢森堡）不等。

根据《基本法》第9条第3款的规定，德国保证基本的劳资自主权，这意味着由劳资双方来共同决定薪酬标准。在新政府最终同意实施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最低工资标准之

前，德国仅确定过某些行业内部的最低工资标准。例如1996年开始在德国建筑行业实施的《劳动者现场派遣法》（AEntG），该法令旨在保护德国国内建筑工人的权益，避免出现低工资雇佣外籍劳动力造成建筑业市场上不平等竞争的状况。2005年始的上一次大联合政府执政期间，联盟党在最低工资问题上向社民党做出妥协，于2007年6月同意将《派遣法》的范围扩大至建筑行业之外，由各行业劳资协会自行提出加入申请。但前提是，该行业应首先拥有联邦范围内的统一劳动合同，但在一些低工资行业领域，如农业和酒店餐饮行业，并没有劳动合同，因此，也无法受到《派遣法》的保护。至2011年底为止，受到《派遣法》保护的行业总共从业人员为290万人^③。

此外，为了应对东欧劳务向德国的无限制流动和输出，1972年开始颁布实施的《劳务派遣法》（AÜG）于2011年做出了重新修订。根据该修订，德国的临时务工人员应获得东部最低7.01欧元、西部最低7.89欧元的工资待遇。

另外，在社民党执政的汉堡和柏林，也通过了地方性质的《最低工资法》，并分别于2013年6月及2014年1月正式实施地区性最低工资标准。

2. 德国政坛对最低工资标准引入的争议

尽管全国性质的法定最低工资标准直

① 《图片报》在线：„Mindestlohn nicht für unter 18-Jährige“, unter: <http://www.bild.de/politik/inland/andrea-nahles/im-bild-interview-ueber-mindestlohn-rente-ab-63-macht-und-toechterchen-ella-35087236.bild.html>, 16.03.2014。

② 《明镜周刊》在线：Gesetzentwurf: Nahles will Jugendliche bis 18 vom Mindestlohn ausnehmen, unter: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nahles-will-jugendliche-bis-18-vom-mindestlohn-ausnehmen-a-958985.html>, 19.03.2014。

③ „Mindestlohn“. unter: <http://www.bpb.de/politik/innenpolitik/arbeitsmarktpolitik/55329/mindestlohn,05.11.2011>。

至 2013 年底才正式被德国政府写入执政协议，但就此问题的争论与博弈却早已甚嚣尘上。长期以来，德国左翼各政党对于制定法定最低工资的目标孜孜以求，而右翼各政党则一直持反对态度。因此，对于德国最低工资标准的争执，从政党角度而言基本可以看作“左右之争”。在新世纪的首次大联合政府执政期间（2005—2009），中右政党联盟党对中左的社民党做出妥协，同意扩大《劳动者现场派遣法》的范围。而在 2013 年的组阁谈判中，社民党抓住默克尔希望联合执政的意愿，再次迫使联盟党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共同法定最低工资标准，取得了巨大进展。

在妥协的背后，我们应看到两党的巨大分歧。由于在本次选战中传统右翼自民党遭遇到惨痛失败，默克尔失去了与右翼伙伴结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联盟党获得的议会席位也不足以令其单独执政。进入议会的其他三个政党均属于左翼政党，相比起更加激进的左翼党和更加“剑走偏锋”的绿党来说，社民党似乎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尽管有分析认为，欧洲传统中左翼政党早已“自由主义化”，左右界限相对模糊，默克尔做出的实质妥协有限^④。但联盟党历史上对全国性最低工资标准的屡次拒绝，以及在日前推进阶段针对社民党提出的种种质疑，都显示出在该问题上的“左右之争”远远没有结束。

在竞选初期各党派所提出的竞选纲领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德国左右政党在最低工资问题上的分歧。传统左翼政党社民党，左翼党和绿党都主张提高实质工作酬劳，认为就业率应更重质量而不应只重就业人口数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三党都认为应引进覆盖全行业的法定最低工资。其中，社民党和绿党认为每小时最低工资应在 8.5 欧元，而左翼

党则认为应保证 10 欧元的最低时薪，且到下一个执政周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数字应上升到 12 欧元。在这个问题上，自民党和联盟党与上述三党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同时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自民党坚决反对引入覆盖全行业的、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最低工资，认为这将损害德国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丧失工作岗位。而联盟党出于充分就业的目标考虑，虽然也反对普遍的最低工资，但提出了较为灵活的解决模式。即在劳资双方没有确定合同工资的情况下，引入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工资底限。但这个工资底限应由劳资双方的共同委员会确定，以使工资的决定权继续掌握在工会和雇主协会的手中。此外，对于已经签署的劳动合同，即使其中确定的薪酬低于工资底限，也应保持其合法性^⑤。

即使在联合执政协议已经签订，联盟党最终做出妥协，同意实施全国范围内的法定最低工资之后，左右政党就此问题的争论也依然没有结束。在联邦劳动部部长、社民党人安德烈娅·纳勒斯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提出《最低工资法》的 57 页正式提案之后，新一轮来自右派政党力量的反对声浪再次高涨。在该草案中，社民党几乎没有听从任何来自联盟党的意见，完全坚持他们最初、最理想化的立法路径：

- 没有任何行业能够成为“法外特例”；
- 只有培训实习或大学实践工作以及公益义工被排除在外；
- 仅涉及 18 岁以上人员。

这样的草案完全否定了联盟党要求更多“特例行业”以及更高“最低年龄”的要求。就在草案提出之前不久，基社盟（CSU）主席霍斯特·泽霍费尔还在呼吁加大《最低工资法》的例外范围。他认为，长期失业者在

④ 宋冰：《新一届德国政府会向左转吗？》，载《第一财经日报》，第 A06 版，2013 年 12 月 17 日。

⑤ 李微：《从各党竞选纲领看德国大选》，载《德语国家资讯与研究》，2013 年第 1 期。

重新进入工作之后，应同意在其适应期获得低于法定 8.5 欧元的工资。在这之前，他已经将退休者、短时工作者和季节性工作者列为“法外特例”的建议之中^⑥。

对于《最低工资法》所涉及的最低年龄，联盟党与社民党也具有明显分歧。基民盟（CDU）中产阶级联合会（MIT）曾经建议将最低年龄设定为 25 岁，与法国相同。“低于这个年龄的话，将会危及年轻人的培训机会，令他们过早扔掉未来的无限可能”，德国工商总会（DIHK）总干事马丁·万斯雷本在接受《图片报》的采访时这样说道^⑦。德国教育部长约翰娜·万卡（基民盟）也同样支持 18 岁以上的最低年龄限制，因为 60% 以上的德国人都在 18 岁之后才开始进入职业培训。基民盟经济政治家克里斯蒂安·冯·施特腾则认为，最低年龄应定为 21 岁。据施特腾称，纳勒斯的 18 岁年龄限制将造成 18 至 21 岁年轻人面临失业前景，他甚至将之称为“纳勒斯失业”^⑧。

但这样的反对声音并未动摇纳勒斯的决心，目前看来，也并未能动摇最低工资立法前行的步伐。纳勒斯称，该草案的提出是“一个美妙的时刻”，她希望她的“同事们会对此满意”。尽管她同时对 4 月 2 日联邦议会将对该法案做出的裁决还抱有担心，但在 3 月 20 日的三党主席（基民盟默克尔、基社

盟泽霍费尔以及社民党加布里尔）见面会上，均未对此草案做出过多评价或者反对。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联盟党知道，最低工资法案是社民党的标志性工程，很难迫使他们做出实质性让步^⑨。

3. 最低工资标准争议产生的现实及理论背景

德国最低工资标准争议的产生，具有厚重的理论背景及复杂的现实影响因素。从纯理论视角而论，自由学派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主张国家干预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在最低工资政策是有损还是促进经济平等性上展开了激烈的争锋^⑩。主张国家干预的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政策在保障弱势劳方基本生存、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经济发展持续动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为政府公权力干预劳动价格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尤其在劳动力市场不健全条件下，最低工资政策的推行可视为市场机制缺陷的弥补措施，在不平衡的天平一端加上砝码^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则认为，国家出台的干预性措施将有损市场机制的独立运行，影响合理价格的产生，降低市场效率，从而损害劳资双方利益。

随着世界各国以不同形式设定最低工资界限（主要包括全国性、地区性、行业性、

⑥ 《时代》周报在线：Seehofer fordert neue Ausnahmen beim Mindestlohn, unter: <http://www.zeit.de/wirtschaft/2014-03/mindestlohn-csu-seehofer-nahles>, 18.03.2014.

⑦ 同上。

⑧ 《明镜周刊》在线：SPD-Kernanliegen Mindestlohn: Nahles boxt ihr Prestigeprojekt durch, unter: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mindestlohn-spd-nahles-legt-gesetz-vor-widerstand-in-der-cdu-a-959653.html>, 19.03.2014.

⑨ 同上。

⑩ Thomas W.Volscho, Jr.: Minimum wag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American States, 1960-2000, I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05, Volume 23, S.343-368.

⑪ 周荀：《最低工资政策：从“要不要”到“如何做”的研究文献述评》，载《特区经济》，2014年1月号，第201页。

工种性四种最低工资形式), 理论界对最低工资的争论逐渐由“存废之争”转为“如何合理制定”, 并围绕最低工资所产生的效果展开探讨。自由主义者强调最低工资线带来的负面效应, 认为由于主观信息的缺失, 国家难以做出全面且合理的决策, 与时俱进的设定。诺思在《最低工资经济学》一文中认为, 在一个无限制的劳动力市场, 会有一个均衡工资率, 当政府利用法规所指定的最低工资强制推行较高的工资率时, 将会使某些雇主不再雇佣那些对总产量所贡献的市场价值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 同时最低工资上涨也会使雇主以少数较高技能和较高工资的工会工人取代更多低技能的非工会工人。国内也有学者认为, 劳动力的合理价格应由市场自发形成, 人为提高劳动力价格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因为劳动力成本过高, 会使企业老板不再扩大生产规模或者倾向于在其他地方建厂, 从而减少就业; 因为劳动力价格的提高, 使企业倾向于使用技能更高的劳动者, 这对低技能的就业者是个伤害^⑫。

但在最低工资标准的支持者看来, 劳动力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并不一致。不能按照传统市场规律办事。秩序经济学家、德国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之父瓦尔特·奥肯认为, 在工资过低的情况下, 一旦劳动者为了保证生存需求而加大自己的劳动力供给, 那么劳动力市场上的供应曲线将呈现异常发展趋势。如果这种异常趋势有长期发展的可能, 国家

应当通过设定最低工资的方式进行干预^⑬。此外, 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主和雇员应当被看作主动的、有创新精神的行为主体。最低工资的设定应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 并使雇主有意识地增强雇员的素养。通过这种方式, 企业的生产率将会得到提高, 从而增加社会总收入^⑭。购买力理论则认为, 工资增加会导致购买力的增加, 从而拉动消费, 促进投资, 最终导致经济的升温。国内也有学者认为, 虽然政府过分干预市场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低效率, 尤其在完全竞争市场的作用极其显著, 但市场并非万能, 失灵现象时有发生。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不完全符合现实, 现实生活中存在垄断性市场或“独买”、“独卖”市场, 更有局部市场存在特殊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 导致工人工资偏离边际产品价值, 影响劳动者基本生存需要^⑮。

在德国, 以上经济学思潮也极大影响着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但与此同时, 最低工资标准设立的发展与德国经济状况息息相关。据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委托民意调查机构 infratest dimap 所进行的调查问卷显示, 2013年6月份, 有高达86%的德国人同意实施全国范围内的法定最低工资, 而这个数字在2006年的时候仅为57%。即使是联盟党支持者, 对最低工资的态度也大为好转——从2006年的46%支持率上升至2013年的79%, 而社民党支持者支持率为94%, 绿党支持者93%, 左翼党支持者则为89%^⑯。

⑫ 段拥军:《不干预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观点失之偏颇》, 见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4704132.html>, 2006.08.08。

⑬ Eucken, Walter: Grundsätze der Wirtschaftspolitik, Mohr Siebeck (UTB), 7. Aufl., Tübingen 2004, S. 304.

⑭ Bosch, Weinkopf: Gesetzliche Mindestlöhne in Deutschland?, unter: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asfo/03980.pdf>, S. 26.

⑮ 杨纛:《现代经济学与我国工资下降、失业增加的悖论》, 载《江西农业大学学报》, 2004年, 第3期。

⑯ 问卷调查结果见: http://www.mindestlohn.de/w/files/umfrage/infratest-6-2013/2013.06.05-wegewerk_mindestlohn-graf.pdf。

这样的结果无疑与德国在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灵活就业政策有关。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克劳斯·马特基认为，“社会的风向已经悄然改变”^{①⑦}。2009年至2013年的黑黄联合执政期间，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德国的就业率却一直势头良好。这得益于哈茨方案所带来的灵活就业模式。其所倡导的个人企业和微型工作、小型工作大大缓解了德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压力，二档失业金的引入则促使失业者更快回到劳动力市场中去。但与此同时，这些改革措施没能完全解决困扰德国的主要问题：低技能者的失业陷阱问题。这些人的市场工资不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对于那些有多个子女的工人家庭来说就更是如此。对于这些人来说，一旦找到低收入工作，失业金就会被取消，增加部分的收入的税率甚至可以超过100%。因此，找一份工作所要承担的过高的边际税率产生了负面的激励效果^{①⑧}。在过去的几年中，“工作贫困”、“非正常就业”等字样在德国各种报道中屡见不鲜。不知不觉间，德国的“低工资部门”早已超越了传统行业领域，即便拥有高等院校毕业证，也有可能只能拿到低于8欧元的时薪。在最低工资标准引入之前，德国有750万就业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在这样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实施覆盖全行业、全德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也是容易理解的。

虽然民众对最低工资标准呼声很高，德国右翼政党及一些学界和经济界人士还是不断发出担心的声音：德国经济领域最具权威的“五贤人”之首，克里斯托弗·施密特在2013年7月2日接受德国《焦点》杂志的采访时就曾指出，“五贤人”反对全国范围内的最低工资标准，即使无法避免，也应确定更低的底线，如5欧元/小时。他当时预测，如果德国政府真的将最低工资标准定为时薪8.5欧元，那么将有20%的就业岗位受到威胁。他同时认为，在金融危机尚未完全过去的现在，对过去的改革措施进行回调是相当危险的^{①⑨}。德国贸易协会（HDE）总干事施特凡·根特则在2014年3月初表示，由于小型企业的用工成本占到基本投入的20%，8.5欧元的最低时薪将对“小型企业产生巨大威胁，甚至有令它们关闭的风险”^{②⑩}。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德国农业雇主联合会（GLFA）主席波尔克·莫勒，他在接受《世界》杂志的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②⑪}。

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引入主要涉及原本时薪低于8.5欧元的行业，因此这项变革对于德国未来的出租车行业、安保业、清洁公司和零售业影响尤为巨大。马丁·万斯雷本表示：“对于这些行业的企业而言，这真是一项挑战。”因为这关系到利润。万斯雷本指出，最终这将取决于顾客的反应。支持制定最低工资者，就必须做好理发厅或餐厅涨价的准

①⑦ 德国工会联合会官网：www.dgb.de/presse/++co++231f6692-d335-11e2-b7a3-525400808b5c。

①⑧ 杨伟国等：《德国哈茨改革及其绩效评估》，载《欧洲研究》，2007年，第3期。

①⑨ 《焦点》在线：Christoph Schmidt: Mindestlohn gefährdet jeden fünften Job in Deutschland, unter: http://www.focus.de/finanzen/news/staatsverschuldung/tid-32146/chef-der-wirtschaftsweisen-schlaegt-alarm-christoph-schmidt-mindestlohn-gefaehrdet-jeden-fuenften-job-in-deutschland_aid_1031446.html, 02.07.2013。

②⑩ 《明镜周刊》在线：Mindestlohn: Einzelhandel warnt vor Sterben kleiner Geschäfte, unter: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mindestlohn-zu-hoch-einzelhandel-warnt-vor-sterben-kleiner-geschaeft-a-957226.html>, 06.03.2014。

②⑪ 同上。

备^②。除此之外，实行全国统一的最低工资对原本薪酬较低的德国东部地区也会形成冲击，最低工资的支持者称，这样的冲击将促使东西部经济发展速度走向趋同，反对者则认为这将损害东部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加大东西部经济差异。

二、前景预测

尽管对最低工资标准的争论远未结束，但德国实施全国范围内的法定统一最低工资标准的大框架已经不可逆转。社民党在此事上的坚决态度和联盟党的不断妥协也预示着在法条细节的制定上应当会更趋严格。纳勒斯强调，在实施最低工资时将加大监控力度，设置监督热线，坚决制止雇主支付低于工资标准的薪酬。她同时坚信，8.5欧元的最低时薪不会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任何负面效应。

纳勒斯的自信其来有因。根据 Ifo 民意调查机构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企业都不会因此裁员。仅有 11% 的被访企业表示会因此减少雇员数量或者暂停雇佣新职员，80% 以上的企业都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对它们的用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③。此外，据调查显示，早已实施全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国

(2014 年 9.53 欧元 / 小时) 并未因此在其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于 1999 年开始引入最低工资标准的英国 (2014 年 7.43 欧元 / 小时) 更是展示了正面的效果。在原本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行业，就业率甚至有所提升^④。

但期待德国最低工资“一帆风顺”的实施也是不现实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丹尼斯·斯诺尔指出，本着创造社会公平精神的最低工资标准，一旦伤害了企业吸纳就业的积极性，只会进一步加剧失业人群和就业人群之间的不平等^⑤。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德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居高不下的出口额，有赖于德国企业的创新技术性产品，但也同样得益于德国灵活就业模式所带来的生命力。最低工资标准的引入会否危及这种良好的就业形势，损害德国企业的竞争力，目前还没有定论。

4 月 2 日，联邦政府通过了纳勒斯的提案，但该提案能否在 2015—2017 年的两年时间里在全行业顺利推广仍然悬而未决。一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对德国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来自德国学界、经济界及右翼政党的反对呼声必定再度高涨，联邦政府能否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推行此项政策，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李微，北京科技大学德语系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② 张筠青：《德国2014经济发展尚可乐观》，载《中华工商时报》，2014年2月11日，第004版。

③ 《明镜周刊》在线：Firmen planen kaum Entlassungen, unter: <http://www.spiegel.de/karriere/berufslieben/mindestlohn-firmen-planen-kaum-entlassungen-a-959688.html>, 20.03.2014。

④ Mindestlöhne in Europa, unter: <http://www.mindestlohn.de/hintergrund/mindestloehne-in-europa/>。

⑤ 宋冰：《新一届德国政府会向左转吗？》，载《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12月17日，第A06版。

德国 2013 年经济发展分析与 2014 年 经济走势展望

李晓海

【摘要】2013 年下半年起德国经济开始摆脱低迷形势，国内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动力。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与欧元区经济均显示出明显的复苏迹象，企业界与工业界对市场的信心显著回升，2014 年德国经济发展预期将大幅提速，新一届大联合政府的年度经济报告也对 2014 年德国经济发展趋势做出乐观预测。虽然各界一致看好德国经济前景，但新一届大联合政府仍需冷静分析德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理智应对外部波动，以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德国 经济发展 大联合政府

德国经济在经历了 2013 年的低速运行之后，在世界经济回暖和国内需求拉动的条件下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伊福经济研究所预测称，2014 年欧元区国家 GDP 将平均增加 0.7%，德国是增长最为强劲的国家，预计增速将达到 1.7%。虽然德国经济前景被普遍看好，但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仍然任重道远，国内层面需继续解决好能源转型等问题，欧洲层面也需要彻底解决欧债危机影响，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14 年将是德国经济的转折之年。

一、德国 2013 年经济形势较为低迷

2013 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4%，为

2010 年以来最低增长率。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欧洲部分国家经济持续衰退，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出口不畅。德国企业 2013 年的出口增长仅为 0.6%，远低于预期的 2.8%。这与国际外贸环境与世界经济整体低迷有直接关系。2013 年新兴国家经济增长远低于预期，造成世界经济增长不力，只有 2.75%。劳动市场方面，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3 年德国就业率增长了 0.6%，就业人数达到 4200 万人左右，这一涨幅较 2012 年下降了 0.5%。失业率较 2012 年小幅上升至 6.9%。个人消费与支出增长 0.9%，个人储蓄率由 10.3% 降至 10%，个人消费增长超出预期。国家财政方面，2013 年国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

总体来看，2013 年德国的经济形势较为

低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一是企业界与经济界对欧债危机后的经济康复失去信心，从而造成投资不力，经济增长困难。在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下，德国企业投资意愿萎缩，对机器和设备的投资减少 2.2%。二是德国的出口受到世界经济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增长不畅，无法带动经济发展，去年德国出口增幅由前一年的 3.2% 大幅收窄至 0.6%。三是内需增长有限，不能强力拉动经济上行。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所谓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其实是种误传，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也经历了衰退。2013 年德国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仍为 80.8%，且多年超过欧盟规定的上限 60%。虽然德国模式在欧债危机中表现出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些优越性，但这并不说明德国模式就是最佳模式，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同样受到了冲击，也需要不断地调整与完善才能够逐渐摆脱欧债危机的影响，重回稳定增长的轨道。

二、2014 年德国经济将呈现全面上升趋势

2013 年 11 月份，德国经济五贤人在其对德国总体经济发展的鉴定报告中预测，2014 年德国经济形势将继续好转，预计国民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1.6%。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尤其是用于购买设备的投资。2014 年就业率将保持较高水平，物价水平保持平稳。国家财政将继续实现盈余。2014 年 3 月 18 日，五贤人上调对德国 2014 年经济增长预期至 1.9%，并称此次经济增速预期的上调，主要是因为本年度初期德国经济增长强劲。

德国经济部发布的 2014 年度经济报告认为，德国经济呈现出稳定、向好的上升趋势，预计 2014 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1.8%，

2015 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 2%。

报告指出，种种意向性指数都说明消费者和企业看好德国经济前景，认为经济增速将再一次明显超过欧元区国家平均水平。2014 年德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是国内经济，就业市场的积极表现将成为国内经济的主要支撑。2014 年的劳动力市场有望创造新的就业纪录，预计就业人口将达 4210 万人，失业率将降至 6.8%。同时，企业良好的增长和盈利前景会提升就业和工资水平，显著提高个人收入，促进私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根据经济发展报告，在国际环境不出现重大动荡的情况下，德国出口将恢复增长。随着世贸组织的不断发展，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世界贸易前景将有所改善。预计今年德国出口增幅为 4.1%，有望突破 2 万亿欧元大关。进口额增幅将达 5.0%，德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将有所减少。进口的增长与德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也将有利于欧洲经济的进一步恢复。

与前两年相比，2014 年德国的经济形势已经转入稳定的增长期。一方面，企业家和消费者恢复对市场的信心，恢复投资意愿，拉动经济增长并促进欧洲经济复苏。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形势的恢复也为德国出口的增长提供了新动力。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加布里尔也表示：“德国国内经济恢复活力不仅对德国是好消息，对我们的欧洲伙伴也是如此。”德国企业进口及对外投资的增长，有助于欧洲经济复苏，今年德国通过进口增长可以缩小贸易顺差规模。“我们离减轻欧元区不平衡的目标又近了一点。”

三、大联合政府的挑战与举措

2013 年 12 月选举产生的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将自己描述为肩负着大任务的政府。

总理默克尔曾在采访中表示,完成能源转型是新一届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在能源转型问题上,德国正面临多重压力。在默克尔看来,未来国内就业和经济环境均取决于能源转型的成败。根据执政协议,到2025年,新型能源在能源供应中所占份额要由目前的25%上升至40%—45%,2035年达到55%—60%。新能源份额的提高也意味着传统能源比重下降,传统能源企业利益受损,并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如何平衡各方利益,保持就业市场稳定,这将是新一届政府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同时,能源转型的效率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保证生态环境承受力、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可支付水平这些因素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推动能源转型成功进行,这是新政府的当务之急。

除此之外,新任经济和能源部长的加布里尔还在2014年度经济报告中指出了很多德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如:较低的投资水平;交通、信息和通讯技术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不足;存在于就业市场和低工资劳动领域之间的不断扩大的分化趋势;科研成果投入工业实践耗时过长;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专业人才需求的变化,等等。

针对上述挑战,加布里尔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了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几个着眼点,分别是:1)投资。推动企业和公共财政投资,投资额争取达到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上。2)创新。着眼于21世纪的领先市场与领先技术,为工业发展提供科学的基础设施,完善创新的实际应用。3)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保证德国在数码和信息交流领域的发展与竞争力,继续推进宽带建设。4)国际化。在国际贸易中加大对德国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支持,吸引更多外国投资。5)融合所有人才储备。专业人员对于德国的发展至关重要。更好地利用国内人才,降低学生肄业率,为没有文凭的35岁以下的人提供第二

次机会。欢迎外来人才等。

四、总结

德国经济自2013年秋季起逐步走出之前的低迷,呈现出上行趋势。工业生产小幅提高,建筑业增长较为显著,相比2013年上半年,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出了德国经济走出低迷,恢复增长的趋势。实体经济各项景气指标与基于问卷调查的其他指标都显示出自2013年下半年起德国总体经济形势的良好状态。企业对于市场的期望与信心显著改善,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恢复,尤其是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经济情况的改善,外贸出口恢复增长。欧元区经济6个季度持续下行趋势在2013年第二季度告一段落,虽然个别国家经济前景不明朗,但欧元区成员国都对走出欧债危机的阴霾显示出了信心。

2014年德国经济发展拥有良好的外部条件,即世界经济发展摆脱颓势,欧元区国家逐步摆脱欧债危机影响,这为德国的进出口增长提供了外部保障。与此同时德国的内需增长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也体现了德国经济的内在韧性。持续为德国经济把脉的五贤人,以及德国新一届大联合政府出台的年度经济报告都对2014年德国的经济形势做出了乐观估计,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8%,进出口均会有大幅度增长,德国的大量贸易顺差将有所削减。与此同时就业市场的形势也将呈现出良好态势,2013年德国就业人数创纪录新高达到4200万人,2014年的失业率预计将进一步降低,最低工资的推行也将为就业市场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在良好的外部条件与稳定的内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消费者与企业对于市场的信心都大幅提升,投资意愿也将进一步增强,内需的增长与投资的增加将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德国经济迎来稳定增

长期，并将为整个欧元区的经济稳定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虽然各界普遍看好德国经济发展前景，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良好局势来之不易，欧债危机的阴霾刚刚退去，世界经济还处于缓慢复苏阶段，任何波动都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能源危机等问题已成为欧

盟国家必须面临的挑战，如何在国内成功完成能源转型，如何保证企业界与经济界对市场的信心，如何保护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受外部波动影响，如何实现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利益的结合，这些都是今后德国大联合政府必须处理好的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应对这些挑战，相信 2014 年将成为德国经济摆脱低迷走向繁荣的转折之年。

作者简介：李晓海，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博士研究生。

• 文教论坛

做

新生代大学生交际行为新趋势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①

刘悦

【摘要】中国新生代大学生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后出生，在信息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背景下成长的群体，他们的人际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与父辈相比呈现较为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尤其体现在个体对自我价值和个人自由的追求上。一些被标榜为中国人行为特点的“文化标准”在许多新生代的身上已不具备普遍代表性。只有重视这一差异，才能有意识地区别对待代际差异、地域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职业差异等影响因素，促进不同文化内群体参与的跨文化交际的成功，有效促进跨文化意识和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新生代 思维与行为方式

一、引言

自从“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于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诞生以来，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分别从社会心理学、语言学、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和角度，对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在彼此交往时的行为进行研究。“跨文化交际”在早期英美研究语境中多被称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以强调对文化屏障的跨越。上世纪90年代后，相对更强调文化间交流和

融合的另一称谓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逐渐为更多学者所接受。总的来说，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石在于对“文化”的定义与分析。鉴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多学科化特性，研究者对文化的定义根据学科背景各有差别，至今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普遍适用于不同学科的文化定义对跨文化交际研究进行限制。跨文化交际语境下的文化可被视为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它包含几个重要特点：^②

首先，不同文化(圈)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本身带有文化烙印。与一些语言中“文化”

① 本文系浙江大学“985工程”三期跨文化研究基地项目部分成果。

② Liu Yue: „Kulturspezifisches“ Kommunikationsverhalten? Eine empirische Untersuchung zu aktuellen Tendenzen in chinesisch-deutschen Begegnungen [M]. München: iudicium. 2010.

与“文明”的概念界限明显不一，culture 与 zivilisation 在英美文化圈中的模糊分界就是实例。这一特点决定了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结果往往带有地域特点，基于某个文化（圈）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机械照搬，用于解释另一个文化（圈）的现象。第二，文化的含义多元化，“文化”一词不仅可用来形容对一个社会的成员广泛影响的物质及非物质因素，也可以用来形容所谓“亚文化群”以及作为词缀形容在某些小规模或者特定范围内造成影响的综合因素，如“青少年文化”和“饮食文化”等。第三，文化涵盖内容广阔，通常在泛指时包括物质与非物质因素，而在针对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一般学者更关注关于“人们如何生活和他们如何从自身和环境中进行创造的方式”^③的非物质文化，也就是研究文化对交际载体即人类在价值观、行为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第四，文化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文化对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文化的载体和“继承者”，但由于个体差异、社会变迁、文化间的交汇和融合等原因，文化的传承绝不是机械、僵硬的，而总是处于流动状态。个体不仅传承文化，同时也在反哺和创造文化。

相对于前三个特点，文化的第四个特点在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受到社会快速变迁影响的今天，尤其需要得到加倍重视。在文化间缺乏广泛及直接接触的年代，不同文化的发展就像平行线，各自伸展，难以形成交集。在经济全球化带动全球不同国家、社会、机构、人员频繁交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多元格局的今天，文化间的接触和互相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加速了文化的流动发展。文化的变迁来自于文化成员对于文化的反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又首先体现在个体的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变迁上。因此，对于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跟踪调查，在当下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实践中，频繁的跨文化接触在提高人们对他者文化兴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例如被称为“临界冲突”(critical incident)的跨文化人际交往问题。一些学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从文化影响下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方面寻求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方案。德国文化心理学家 Alexander Thomas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文化标准”理论(cultural standards)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该理论将文化定义为一种“全面的、对于一个社会、组织和群体非常典型的定向体系”^④，它以解构文化差异为出发点，强调文化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受到其文化的全面影响。文化标准理论的典型应用方案是提炼和对比各文化的典型特点即“文化标准”和“文化特定行为模式”，模拟它们在交际情境中的表现和作用，以预防和解决跨文化交际问题。由于它以解决文化特定的交际问题为导向，这一理论在德语区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及培训实践中被广泛采用。根据这一理论，中国文化体现的核心“文化标准”有：人际和谐、等级取向、关系、集体主义倾向（“单位”体制）、间接话语方式、面子、礼貌及谦虚、高语境交流等。与中国“文化标准”相对，德国文化的核心“文化标准”为：对事不对人、契

③ Maletzke, Gerhard: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zur Interaktion zwische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M]“.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6.

④ Thomas, Alexander: „Psychologie interkulturellen Lernens und Handelns[C]“. In A. Thomas, „Kulturvergleichende Psychologie. Eine Einführung“. Göttingen: Hogrefe. 1993: 377-424.

约与结构思维、时间规划、个人主义倾向、明确私人领域、直接话语方式、低语境交流等。^⑤

今天，美国学者在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中相对占据垄断地位，^⑥文化标准理论从欧洲学者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值得肯定的探索。但从文化的流动特点角度来看，文化标准模式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Alexander Thomas 将“单位”视为中国文化的特定产物，并将其归类为中国文化标准之一。但对于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新生代来说，“单位”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虽对其父辈产生过深刻影响，但随着体制的变化和单位概念的萎缩，“单位”对于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形成已经不再具有决定性影响力。

文化标准理论建立在总结文化特点的基础上，以解决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跨文化交际冲突和问题。但我们在研究当前中国新生代交际行为的时候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提炼和对比文化差异或文化特点的时候，如何能够保证获得的文化特定模式能准确反应该文化的实时现状？如何能确定某种被认为“典型”（或曾经有效）的文化特定行为模式，在文化间交融和互相影响加剧的今日仍具备典型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历了全面转型阶段，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受到时代变革的剧烈影响，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中国

新生代成长在一个与父辈完全相异的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环境中，在剧烈变迁的社会条件下，“文化标准”是否还能充分代表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新生代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在国内学界被广泛关注。社会转型期带来的最大冲击是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转变。针对这一转变的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进行。在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价值观、尤其是青少年价值观的转变，^⑦因为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及行为的意义、效用的评定标准，是推动并指引人们决策和采取行动的核心因素”^⑧，是我们的“思维、感知和行为”^⑨的基础。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层次，指导和决定着人在社会行为中的思维和行为方式。^⑩使用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对于人际交往行为模式的分析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围绕价值观变化进行的许多实证研究主要沿用德国哲学家 Eduard Spranger 早在 1928 年提出的价值类型模式，将人的价值观导向分为科学型、实用型、社会型、政治性、信仰型、审美型等六种价值类型，通过美国心理学家 Gordon Willard Allport 等人开发的价值观研究量表（Study of Value）找出被调查对象的主导价值观类型。综合 80 年代以来关于中国人价值观变化的主要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的价值观倾向处于不停地变化

⑤ Müthel, Miriam: „Erfolgreiche Teamarbeit in deutsch-chinesischen Projekten[M]“. Wiesbaden: Deutsch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06.

⑥ 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与实证方法 [J]》，载《中国外语》，2008年，第9期，第96—103页。

⑦ 金盛华、辛志勇：《中国人价值观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56—64页。

⑧ 许燕：《北京大学生价值观研究及教育建议》，载《教育研究》，1999年，第5期，第33—38页。

⑨ Maletzke, Gerhard: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zur Interaktion zwische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M]“.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96.

⑩ 袁贵仁：《关于价值与文化问题》，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第5—10页。

中。例如 80 年代末的价值观倾向呈现关注自我实现、强调奋斗进取的趋势, 90 年代末则主要关注家庭和谐、强调安全自由, 到 21 世纪初则表现出对个人快乐自由的关注。^⑪ 价值观体系的变化与国情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初期的无序到 90 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完善, 再到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经济稳定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继续发展, 中国人, 尤其是新生代的价值观经历了与时代进步息息相关的转变阶段。研究发现, 新生代大学生的主导价值观从政治型转变为实用性, 继而又转变为社会型, 证明其价值观的变迁与整个社会变化趋势基本同步。受到中外接触日益频繁和加强的影响, 社会转型期的青年学生价值观转变呈现单一模式向多样化过渡的趋势, 尤其反映在“新旧观念交织、中外观念交错”上。^⑫

但与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对于价值观变化的实证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相对的是: 在以人际交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 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于人际交往的影响应该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但事实上, 中国学界自 80 年代开始将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学科引入至今, 该领域仍存在实证研究过少^⑬、跨学科交叉成果不足等亟待拓展之处。作为一门以学科交叉为依托的新兴学科, 国际主流跨文化交际研究非常注重实证研究,

尤其是以定量为主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⑭。与此相对, 国内目前的大部分跨文化交际研究仍停留在对跨文化交际基本概念的引入和讨论上^⑮, 运用实证方法对交际行为的动态过程进行的研究亟须得到更多的重视。

二、研究设计及结果

基于上文提及的研究现状, 本文从国内社会学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出发, 将研究重点放在新生代行为和思维方式及其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趋势上。结合前文提出的问题, 针对跨文化交际的特点, 研究将目标群体设定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具有跨文化交际语言能力、参与跨文化交际的新生代中国大学生。由于新生代大学生普遍在计划生育制度实行后出生, 多为家中的独生子女, 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期, 普遍受到良好的教育, 拥有一门以上的外语知识, 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与父辈之间的差异有着直接的感受, 非常适合作为受试对一些有关中国人在交际中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观点(主要针对中国“文化标准”)进行时效性检验。

研究采取定量为主的问卷调查方法, 从 2006 年 8 月至 2011 年 8 月, 分阶段在柏林和北京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新生代大学生思想和行为方式新趋势及其对跨文化交际影响的调查。共有 262 名在中国大学就读的学生

⑪ 文萍等:《1987—2004 我国青少年价值观纵深研究及教育建议》, 载《社会科学家》, 2005 年, 第 2 期, 第 65—70 页。

⑫ 刘玉方:《转型期青年学生价值观念的新变化》, 载《思想·理论·教育》, 2002 年, 第 3 期, 第 25—28 页。

⑬ 彭世勇:《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现状与困境》, 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 第 4 期, 第 14—18 页。

⑭ 彭世勇:《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与实证方法》, 载《中国外语》, 2008 年, 第 9 期, 第 96—103 页。

⑮ 彭世勇:《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现状与困境》, 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年, 第 4 期, 第 14—18 页。

(简称A组受试,下同)和39名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就读的中国学生(简称B组受试,下同)有效参加了问卷调查。A组受试来自上海交通大学(122人)、浙江大学(60人)、北京外国语大学(55人)、北京理工大学(15人)和同济大学(10人)。B组受试来自国内不同的院校,绝大部分在接受调查时在柏林工业大学注册就读已超过1年,大部分受试在德时间超过3年。除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受试在北京填写问卷外,其余大学学生均在柏林交流期间接受问卷调查。262名A组受试中,207名学生有着在德国短期交流(为期1个月至1个学期)的经历。所有受试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德语知识,具备使用德语或/和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1/3的A组受试为国内高校德语本科专业的学生。1/5的B组受试在出国前学习德语本科专业。64%的A组受试、59%的B组受试年龄介于20—25岁,35%的A组受试年龄为20岁以下,39%的B组受试年龄为25岁以上。由于B组受试多数出国前在国内已完成本科学业,因此超过25岁的比例远超A组受试。所有受试均为改革开放后出生,绝大多数是80后新生代。从成长背景来看,两组受试的数据分布几乎完全一致,来自大城市(直辖市及省会城市)的受试约占43%,来自中小城市的受试约为50%,其余7%来自农村。

调查问卷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调查受试的背景、思维和交际行为方式;第二部分主要调查受试在进行跨文化交际后对自身思维和交际方式进行的反思。完整问卷共包括36个问题,其中30个问题为用于量性分析的封闭式问题,其余6个问题为用于质性分析的开放式问题。

三、调查结果及趋势分析

下文将从新生代大学生行为和思维方式

的趋势、这些趋势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对本次调查的主要结果进行介绍和阐释。

1. 新生代大学生行为和思维方式的趋势

首先,受试在对自身思维和行为模式的感知上表现出了明显的趋势。大部分受试认为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与父辈存在明显差别。认为“差别较大”的A组受试比例为59.3%,B组受试为61.5%;认为“差别不大”的A组受试和B组受试的比例只占33.5%和35.9%。在回答“主要差别在哪里?”这一补充性问题时,被受试提及最多的分歧为:对陌生/新鲜事物的看法和接受;价值观;父母的保守思维;自己对自我和自由的追求;开放程度;生活方式和消费态度。新生代大学生大部分认为自己与父辈的人际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一差异尤其体现在对自我价值和个人自由的追求上。尽管这只是受试的主观看法,不能直接代表其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行为,但仍然印证了此前其他价值观研究中关于青年学生价值观变化的结果。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大学生多认为自己对陌生事物更具包容力、价值观更多样、思维更开放、更重视自我和自由以及更灵活。

针对“文化标准”理论对于中国人的“面子意识”、“追求社会和谐”、“集体主义倾向”等三种所谓“典型文化思维和行为”的强调,调查中进行了相关的问题设置。以“文化标准”为代表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普遍将中国人的“面子”观念看作与中国人行为模式的核心影响因素。但调查结果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试认为自己注重面子。余下的受试中,完全否定面子对自己的重要性的占很少的比例,大部分对面子原则怀有一种灵活处理的态度。

表1 新生代大学生眼中自己的面子意识 (%)

	自己注重面子	自己不注重面子	介于二者之间
A组受试	45.8	6.9	47.3
B组受试	46.2	7.7	46.1

“文化标准”理论视“集体主义倾向”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取向，将之与广义上的“西方文化价值体系”^⑩中的“个人主义倾向”进行对立。调查结果却显示，只有 1/5 左右的受试认为“集体”比“自我”更重要。与之相对的是，超过半数的受试认为“集体”与

“自我”同样重要。这显示，青年学生在追求自我和个人自由的同时同样注重在群体利益和自我发展中寻找平衡，绝对化的“集体倾向”作为一种概括中国人行为的“文化标准”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已不具备普遍代表性。

表2 新生代大学生的集体与自我倾向 (%)

	“集体”更重要	“自我”更重要	二者一样重要
A组受试	20.8	26.5	52.7
B组受试	23.1	23.1	53.8

“礼貌”和“谦虚”同样常常被作为重要的“中国文化标准”来解释中国人在跨文化交往中的行为特点，并常以中国人在接受赞美、馈赠和给予时进行再三谦让作为典型例证。调查结果却表明，过半受试（61.5%的A组受试和51.3%的B组受试）在人际交往中只会略微谦让，只有极少数的受试会再三推让（3.7%和2.6%的A组和B组受试）。29.9%的A组受试和46.2%的B组受试则选择“欣然接受”。

不少跨文化交际论述在将中国人交际行

为中的一些文化特点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比时，将许多中国人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吃过（饭）了吗？”作为典型例子。当这样的问候方式被中国人运用在文化他者身上时，常常会导致交流对象的理解阻碍。但调查结果显示，在向他人（此处并未严格界定是否针对异文化的交际对象）打招呼时，只有很少部分受试（A组9.6%，B组15.4%）倾向使用“吃过了吗？”作为问候语。与此同时，受试在人际交往中，尤其在非正式场合对同龄人的问候语使用出现了简化、英文化的倾向。

^⑩ “西方”一词一般被理解为欧洲、北美洲和历史上曾被欧洲人殖民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和。应该注意到，“西方文化”本身曾经历从“欧洲文化”到“欧美文化”或“北大西洋文化”的转变。多数研究中用“西方文化”泛指“欧美文化”，这也适用于本研究中对“西方文化”的使用。

表3 新生代大学生(对同龄人)的问候语(%)

	“你好!”	“Hello/Hi”	“最近怎么样?”	“上哪儿去? / 干嘛去?”	其他
A组受试	17.8	51.3	8.9	15.3	6.8
B组受试	15.6	63.6	15.2	3.0	3.0

尽管新生代身上体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行为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但对于绝大多数受试而言,有意识地维护和追求交流的顺畅和谐仍然是人际交往的最重要目标之

一。在这一点上,“文化标准”理论所强调的中国人交际和中国人对于人际间和谐关系的追求在新生代大学生身上仍然具有时效性。

表4 新生代大学生的避免冲突倾向(%)

	会在交际中尽量避免与对方产生冲突	不会在交际中尽量避免与对方产生冲突	看情况
A组受试	77.8	1.5	20.7
B组受试	84.6	5.1	10.3

新生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对行为方式的选择出现了实用性、灵活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在非常注重人际和谐交往的同时,他们也注重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平衡,既希望自我得到重视和发展,也没有出现西方个人主义倾向意义上的对个体利益的极端重视。在对待儒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方面,新一代大学生也显示了较为突出的包容力和接受

度。过半受试认为传统儒家文化对自己人际交往方式的影响“非常大”和“较大”,认为这一影响“不大”和“几乎没有”的在A组和B组中均只占少数。新生代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和习俗普遍具有一定的了解,并在人际交往(对内或对外)中加以运用。同时在认为儒家文化对自己的影响较大的受试中,超过半数认为西方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也比较大。

表5 新生代大学生就儒家文化对自己人际交往方式影响的看法(%)

	非常大	较大	不大	几乎没有影响
A组受试	5.9	52.1	34.6	7.4
B组受试	7.7	56.4	23.1	12.8

表6 新生代大学生就西方文化对自己人际交往方式影响的看法(%)

	非常大	较大	不大	几乎没有影响
A组受试	2.1	46.3	48.4	3.2
B组受试	5.1	51.3	35.9	7.7

总的来说,以“文化标准”为代表的文化对比研究建立在对一个文化圈成员行为和思维方式的概括上,即使某些“文化标准”的确可以概括大部分文化成员的瞬时主流趋势,但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却无法保证这些“文化标准”将一直具有时效性。一些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标准”的行为方式,如极其注重面子、集体主义倾向和程式化的礼貌谦让等,在受试新生代大学生中已经失去广泛的代表性。在思维和行为方式地看待上,“非此即彼”的心态在年轻一代身上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兼容并济”的多元化态度。随着语言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日益频繁,年轻一代在语言交际方式上与父辈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们具有更多的选择,会根据交际情境来选择对应的交际方式,对外来文化影响也更具开放性和包容力。

2. 新生代大学生行为和思维方式趋势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随着新生代大学生逐渐成长为中外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展现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的趋势必定对中外跨文化交际的面貌和成果造成广泛的影响。可

以认为,在跨文化人际交往中,年轻一代中国人与其父辈相比,给跨文化交际对象留下的印象以及实际交流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研究对这一影响以中德跨文化交际为例进行了探讨。

在人际交往中,尤其是与西方人进行人际交往时,主动向对方的交际模式靠拢往往能减少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对象误会的几率。这一点对于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大学生已经成为跨文化交际的必要前期知识,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有意实践。大部分受试(A组的70.1%和B组的71.8%)称自己在中德跨文化交往中“会尽量向对方的思维或行为习惯靠拢”;同时接近半数的受试(A组的42.5%和B组的43.6%)认为自己在中德跨文化交往中“会比与中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得更直接”,超过了认为自己“不会比表现得更直接”的比例(A组的35.8%和B组的30.8%)。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清晰表明了新生代大学生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意对自己的行为模式进行调整并向对方靠拢,以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调查还表明,受试所参与的跨文化人际交往呈现了文化差异影响力弱化、语言影响强化的趋势。

表7 新生代大学生对自己所参与的中德人际交往效果的看法(%)

	非常顺畅,完全没有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	偶尔会出现文化或行为习惯差异带来的障碍	经常会感觉到文化或行为模式上的差异造成的障碍	由于文化或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完全无法沟通
A组受试	12.7	71.2	11.8	4.2
B组受试	10.3	66.7	23.1	0

表8 新生代大学生认为自己在中德交往中遇到的最大障碍(%)

	文化及行为习惯差异	语言障碍	个人兴趣爱好不同	宗教信仰与政治见解不同	其他
A组受试	23.3	61.0	5.2	8.1	2.4
B组受试	30.8	53.8	7.7	7.7	0

对于掌握起码一门外语知识、对西方文化和习俗有一定了解、成长过程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西方文化共同影响的新生代大学生，“文化的屏障”^①已经不是他们对外交往中最大的问题；大部分新生代大学生在跨文化人际交往中有意向对方的思维和行为习惯靠拢，这种“内外有别”在很多时候是有意为之的。显而易见，受试对于一些西方文化特定的行为方式如直接、不拐弯抹角并不陌生，并在交往中使自己适应对方的交际方式，以使交流更顺畅；文化差异导致的问题在中

德大学生跨文化交际中并不是最大的障碍，而由语言导致的沟通障碍则被大部分受试看作交流不顺畅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受试的新生代大学生在和跨文化交际之前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文化屏障有一定的前期了解，但在实际的交际中许多人发现这些差异没有出现或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这再次表明了文化差异在实际的新生代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力并不突出。

表9 新生代大学生对于中德思维和行为方式差异的看法 (%)

	差异比想象中大	差异与想象中一样	差异比想象中小	其他
A组受试	13.8	37.1	47.9	1.2
B组受试	30.8	33.3	30.8	5.1

四、展望与建议

受到样本数量和客观条件所限，本文的研究只能分析直接参与中德跨文化交际的新生代大学生对交际方式和交际过程的主观感受。尽管如此，研究在对文化标准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的一些新趋势仍清楚地印证了此前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对社会转型期中国新生代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转变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在新形势下促进中国新生代大学生参与的跨文化交际提出下列建议：

1. 正确对待文化内的群体差异

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和深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全球化趋势下的互动成为常态和必须。促进跨文化人际交往的效率和成功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动因和目

标。文化的流动特性决定了文化间互相作用和影响的可能性，以及文化群体成员作为文化的载体和创造者在价值观和行为方面不断变化的必然性。新形势下，中国新生代大学生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的新趋势必须得到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承认和重视。只有在对中外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不把“中国人”看作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群体，才能有意识地区别对待代际差异、地域差异、城乡差异、性别差异、职业差异等影响因素，促进文化内不同群体参与的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2. 与时俱进地培养新生代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培养青年学生的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已经成为中国高校教育普遍认可和实践的重要理念。实践证明，中国大学生对于西

^① 胡文仲：《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方文化和习俗的了解普遍强于西方大学生对于中国文化和习俗的了解。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内书籍、教育、媒体对于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文化碰撞的大量报道和分析。同时在外来影视文化、消费品和消费观念的冲击下,很多年轻人在潜移默化中对于西方文化已有一定的主观认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通过旅游、短期交流直接与文化他者打交道。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方法、目的和手段方面,应该更有针对性地结合学生的跨文化前期知识并进行适当引导。如在跨文化培训课程中,如果可以善用和引入学生在课堂外已获得的跨文化交际经历,并使之结合自己亲身体会进行反思,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其遇到的跨文化问题进行分析,以问题为导向对跨文化理论进行分析和运用,使跨文化和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需要注意在向学生传授跨文化知识和培养其跨文化敏感度的同时,不能对文化特点进行不恰当的放大,过分夸大文化差

异的作用。

3. 以动态的角度看待和分析文化特定交际行为

世界各地许多年轻人在近几十年来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渐渐形成一些具有共同特点的行为方式,如消费观念、“快餐文化”、互联网沟通方式和对通过电子手段进行沟通的偏爱等等。跨文化交际研究如果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一些(部分已经不再具有时效性的)“文化标准”或“文化特定行为模式”上,很容易导致跨文化学习过程被简化为对文化差异的静态罗列和对比,而忽视了文化的动态变迁特性。在针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中,应该在方法上更多地进行与国际主流研究接轨的实证性研究,对文化特定交际行为的特性和共性进行动态过程分析和跟踪调查,将价值观、思维方式、交际行为、文化差异、跨文化意识、跨文化能力等相关领域视为变量,提出更多以过程为导向的跨文化交际研究问题。

作者简介:刘悦,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

德国国家级才俊资助机构系统及其特点探析

彭 彧

【摘要】随着阿维森纳学业机构在2014年开始运作，德国第一个以穆斯林学生为主要资助对象的、也是第十三个国家级扶持的才俊资助机构得以成立。这十三个资助机构覆盖面广，基本能惠及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特别注重对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考察和培养及对奖学金获得者进行“思想资助”是这些国家级才俊资助机构在运作中的两大特色。

【关键词】才俊资助机构 社会责任心 思想资助

一、引言

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于2013年7月中旬宣布，从2014—2015年冬季学期开始，阿维森纳学业机构（das Avicenna-Studienwerk）将为德国高校中的穆斯林学子们提供各类奖学金以帮助他们减轻经济负担，使他们更顺利地完成学业。随着这一学业机构开始运作，德国有了第一个以穆斯林学生为主要资助对象的、也是第十三个国家级才俊资助机构（Begabtenförderungswerk）。借此新机构终获国家扶助准备开始运作之机，本文拟在对这十三个由BMBF提供资金支持的国家级资助机构进行简介，同时归纳和总结这些机构在设置上的特点、挑选候选人时关

注的重点以及德国政府对高校有为学子的资助重点。

二、德国国家级才俊资助机构简介

如前所述，加上新成立的阿维森纳学业机构，德国国内目前已有十三个国家财政支持的才俊资助机构，它们都是在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的项目框架内工作，为各个专业方向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机构。由于它们的资金大部分或完全是由BMBF提供的^①，因此奖学金数额的计算规则也由BMBF规定。这样计算下来，各个机构颁发的奖学金在最高数额上基本一致：

德国国内德国籍以及欧盟国家的学生，

^① 有些机构还受到其他基金会、企业或个人的资助，例如新的阿维森纳学业机构除了接受BMBF的财政支持外，还将在一个为期五年的时间段内受到麦卡托基金会（die Stiftung Mercator）总共一百万欧元的资助。

一般根据其进行普通的大学学习还是攻读博士学位可以向这些资助机构申请两种不同的奖学金。根据其自身的收入情况（而不考虑其父母的收入），学生在进行普通的大学学习时每月可获得最高奖学金数额是 597 欧元^②以及每月 150 欧元的购书款^③，外加一些保险费以及特定情况下可申请的育儿费。而攻读博士学位者每月可获得 1050 欧元的奖学金以及 100 欧元的研究款项，有些机构在一定的

条件下还可以提供家庭补贴和育儿费。此外，申请人去国外参加学术活动、开会等的花费原则上也可以由资助机构承担。虽然各个地区的物价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了这笔奖学金，高校学子一般都能衣食无忧地专心于自己的学业和机构所要求的一定的社会事务。

除了在奖学金数额上的这种共同点外，十三个才俊资助机构的基本情况列于下表^④：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和总部地址	派系或倾向	遴选候选人的条件或要求
1. 天主教库萨努斯学业机构	1956年，总部在波恩	天主教	(1) 出众的专业成绩 (2) 较强的反思能力 (3) 有好奇心和创造力，善于思考 (4) 乐于承担社会责任 (5) 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能用自己的信仰为他人做事，信仰天主教
2. 新教维利西斯特学业机构	1948年，总部在北威州的小镇施韦特 (Schwerte)	新教	(1) 参与社会性事务的证明 (2) 学习专业水平的证明 (3) 信仰上隶属新教 (4) 如无德国国籍须有较高的德语水平
3. 犹太教恩斯特·路德维希·艾利希学业机构	2008年，总部在柏林	犹太教	(1) 超过平均水平的学习成绩 (2) 在犹太教社区、在社会领域、在青少年工作方面以及在大学生组织中投入热情 (3) 定期与信任导师交流 (4) 资助结束后积极参与校友网络平台的建设 (5) 积极参加机构在思想方面的建设以及奖学金结构内部的事务
4. 阿维森纳学业机构	2012年，总部在奥斯纳布吕克	伊斯兰教	(1) 超过平均水平的学习成绩 (2) 有社会责任感，参与社会事务
5.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1925年成立，总部在波恩，在柏林有外事处	亲社会民主党 (SPD)	(1) 超过平均水平的成绩 (2) 感到自己与社会民主的价值相联系 (3) 社会政治方面的积极参与 (4) 特别考虑家人无高校经历以及有移民背景的申请

② 新的阿维森纳学业机构给进行普通的大学学习的学生每月提供的奖学金额度最高是670欧元。

③ 从2013年9月起增加到每月300欧元。

④ 此表根据各资助机构网站介绍整理所得。

(续表)

机构名称	成立时间和总部地址	派系或倾向	遴选候选人的条件或要求
6. 弗里德里希·瑙曼自由基金会	1958年建立, 总部在波茨坦	亲自由民主党 (FDP)	(1) 须对政治以及自由的、社会政治方面的事务感兴趣 (2) 每年至少参加两次基金会组织的研讨会 (3) 积极参与基金会的事务 (4) 同高校里的信任导师保持联系 (5) 在规定时间内以良好至优秀的成绩通过考试
7.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	1966年成立, 总部在慕尼黑	亲基督教社会联盟 (CSU)	(1) 超过平均水平的学习成绩 (2) 投身于社会政治方面的事务, 有责任意识
8.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	1996年, 总部在柏林	亲联盟90/绿党 (Bündnis 90/Die Grünen)	(1) 优秀的学习成绩 (2) 从事社会政治方面的事务 (3) 应当目标明确的推进学业 (4) 承担社会责任 (5) 对于机构的活动应积极参与并提出自己的构想 (6) 在受资助期间定期汇报自己的学业进展情况
9.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1955年成立, 总部在北威州城市圣奥古斯丁 (Sankt Augustin)	亲基督教民主联盟 (CDU)	(1) 成绩优秀, 接受过普通教育 (2) 对于本基金会所代表的价值观及政治内容感兴趣 (3) 准备好发展自己的观点, 对于持异见者持宽容的态度 (4) 对他人和社会承担义务性工作 (5) 有潜能, 有社交能力
10.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1990年成立, 总部在柏林	亲左翼党 (die Linke)	(1) 较高的专业成绩 (2) 突出的社会活动的证明
11. 汉斯·伯克勒基金会	1977年成立, 总部在杜塞尔多夫	亲工会	攻读博士学位者除了学术能力外, 其博士论文的主题应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 从事工会方面或社会政治上的事务。对一般的大学生要求乐意承担社会责任
12. 德国经济基金会及其下属的克劳斯·穆尔曼学业资助机构	1994年成立, 总部在柏林	亲企业主和雇主	(1) 参与社会性事务 (2) 目标坚定 (3) 社交能力 (4) 普通教育 (5) 联想式思维能力 (6) 交际能力 (7) 超平均水平的成绩
13. 德国人民学业基金会	1925年成立, 总部在波恩	不受政治、宗教和世界观的限制	(1) 智力方面的能力 (2) 创造出成绩的准备和动力 (3) 交际能力 (4) 社会技能 (5) 积极发展专业外的兴趣, 从事社会性事务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 从时间上看,德国国家层面的大学生资助体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完善起来的。历史最悠久的两个机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和德国人民学业基金会已有近90年的历史,而最年轻的机构—为穆斯林学生设立的阿维森纳学业机构尚在襁褓之中,还没正式开始惠及莘莘学子。从时间分布来看,几乎每个时期(十年)都有新的资助机构成立。
2. 从空间地域来看,十三家资助机构的总部大多在柏林—波茨坦地区以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由于联邦教育及研究部的总部设在北威州的重要城市波恩,在柏林设有第二办公室,因此接受该部领导和管辖的十三家资助机构大多落户在这两个地区更方便了各种事务的办理,能提高机构运作的效率。只有两个资助机构的总部在这两个地区之外: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在政治倾向上更亲基督教社会联盟(CSU),而该联盟是巴伐利亚州最大的政党,只在该州进行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因此该基金会总部设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无可厚非;新设立的阿维森纳学业机构其总部在下萨克森州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的伊斯兰教神学院,该院院长布伦特·乌卡尔是机构的理事。
3. 从派系和倾向上来看,这个体系的特点是结构合理,覆盖面广。

首先,从宗教信仰方面看(表格中

第1—4个机构),随着着力资助穆斯林学生的阿维森纳学业机构的成立和运作,在德国信仰几大重要宗教的学生都被照顾到了。德国虽然没有国教,但天主教和新教分庭抗礼,在德国,信仰这两大宗教的人数各超过总人口数的1/4^⑤。而由于历史和现当代移民的原因,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在德国也有不少信仰者:德国人中约有10万人信奉犹太教,而在德国生活的穆斯林有400万左右,德国250万大学生中大约有3%信奉伊斯兰教^⑥。从时间上看,天主教库萨努斯学业机构和新教维利西斯特学业机构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成立的,这一较为悠久的历史也从侧面反映了天主教和新教在德国宗教系统中的地位。而犹太教恩斯特·路德维希·艾利希学业机构和穆斯林的阿维森纳学业机构是近五年相继成立的,说明德国社会构成的多样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部长约翰娜·万卡(Johanna Wanka)对此的表述是“正是在我们社会的这种多样性中蕴藏着巨大的机遇”^⑦。德国内部近年来虽有一些新纳粹势力不时地作祟,但就国民整体而言,德国人对待外国移民和异文化的态度还是比较友好和宽容的,对于融合政策(Integrationspolitik)的执行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

其次,从政治党派分布来看(表格中第5—10个机构),德国联邦议院内

⑤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Bevoelkerung/Bevoelkerungsstand/Tabellen/AltersgruppenFamilienstand.html>, letzter Zugriff 02.08.2013.

⑥ <http://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3/07/2013-07-16-muslimisches-studienwerk-avicenna.html>, letzter Zugriff 02.08.2013.

⑦ <http://www.zeit.de/studium/hochschule/2013-07/begabtenfoerderung-stipendium-muslime>, letzter Zugriff 02.08.2013.

所有有议席的六个党派都有与之对应的才俊资助机构。这些资助机构在甄选奖学金候选人时往往会包含一个条件，即要求候选人认同本党派所秉持的价值观并对本党派的政治事务感兴趣。由此，各党派在资助学生的同时也是在为本党派培养接班人和争取拥护者。而拥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大学生可自由选择自己所拥戴的政党争取奖学金，在更为顺利地完成任务的同时通过奖学金所提供的各种“思想资助”（下文将提及）及自身社会实践的锻炼，为今后有可能踏上的政治仕途做好基本的准备，这也是这些资助机构设立者的初衷之一，从中不难看出德国对于青年学子在参政议政意识方面的苦心栽培，以及让青年人自己选择所支持的党派上的民主和宽容。

此外，汉斯·伯克勒基金会和德国经济基金会及其下属的克劳斯·穆尔曼学业资助机构分别代表工会及企业主和雇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申请人在意识形态方面认同它们所代表的观点和利益，使申请人在在校期间就能对分别代表劳方和资方利益的工会联合会以及雇主联合会的职能和运作有比较充分的认识。此外，完全不受政治、宗教和世界观限制的德国人民学业基金会保证了以上宗教信仰和政治党派所涉及的学生之外的少部分大学生，例如信仰佛教或是无党派的大学生，也有权享受德国政府对在校大学生学业方面的资助。

由此可见，德国国家级才俊资助机构系统是多角度、广范围的，基本能惠及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这十三个由国家支持的才俊资助机构，用它们在政治、宗教、雇主或者

科学定位等方面的倾向反映出了德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资助款项的一致确保了学生不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资助款而蜂拥申请某项奖学金而使其他低额奖学金无人问津，保证了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充分利用。

三、对候选人关注的重点及“思想资助”

除了以上体系本身的特点外，德国十三个由国家扶持的才俊资助机构在候选人考察和奖学金获得者的资助方面也有一定的特色，以下两个特点可谓独树一帜，应当引起国内教育工作者和奖学金管理机构人员的重视。

其一，特别注重对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意识的考察和培养。纵观上表各资助机构对申请人的要求，不难看出，除了要求申请人有超过平均水平的学习成绩外，所有的资助机构都要求申请人从事社会性事务，承担社会责任。几乎所有的德语原文中都出现了 *sichgesellschaftlichengagieren* 或其名词词组 *das gesellschaftliche Engagement*，它们的意思比较宽泛和抽象，究竟什么是社会性事务？以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为例，它对这方面的认识是“无论是在社会领域、在公开的或宗教方面的青少年工作中以及在大学生组织机构中的合作，还是在党派政治环境中的参与合作都被看作是这种参与社会性事务”^⑧。也就是说，大学生不应只专注于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是虽在经济上暂且只能“独善其身”，而在意识和理想上应有“兼济天下”之志并付诸实践。近在校园内部参加大学生各组织机构的事务运作，远到涉足社会、踏进教会或政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为该团体的组织运营尽一份力，为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做点实

⑧ <http://www.hss.de/stipendium.html>, letzter Zugriff 02.08.2013.

事，都是从事社会性事务。这对于学生交际能力和团队意识的培养、对于学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和感恩图报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一些资助机构的奖学金的申请条件就是要求学生提供参与社会性事务的证明，而更多的机构则并无书面证明的要求，而是希望候选人过去有参与社会性事务的经历，今后也能一直继续服务下去。像犹太教恩斯特·路德维希·艾利希学业机构还把这项要求同自己的宗教信仰结合起来，希望学生在犹太教社区里更多地从事社会性事务。从根本上看，这项考察重点同德国青年出于良心拒服兵役等原因时，不能通过缴纳钱款，而是必须通过从事为时更多、可能更为艰苦的民事服役来解决：即要求学生不但在学习成绩上名列前茅，还要在思想品质，特别是在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社会意识上也要有高度的觉悟。

其二，各才俊资助机构不仅只是在经济上资助奖学金获得者，更重要的是还进行“思想资助 (ideelle Förderung)”，从思想上帮助他们及早进行职业规划，使他们能更顺利地踏上工作岗位和融入社会。虽然获资助者的专业不同，但他们在受资助期间都有机构指派的相应的信任导师 (Vertrauensdozentin) 关心他们的学业进展情况和心理状态，更有各资助机构定期组织或提供的各种研讨会、学术交流会、对话论坛、语言课程、实习项目和培训等。这些活动内容丰富，一般都涉及普遍的和当前的实际论题以及一些专业前沿的问题。与德国其他一些小型基金会的奖学金或我国高校内大多数奖学金只有经济上

的资助相比，这种“思想资助”的好处显而易见，它们能使受资助的学生在学业上同专业前沿领域接触并有所了解的同时也关心身边的各种热点事件，形成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提高他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般各资助机构都要求其资助对象参与这一系列活动，并把它作为学生在受助期间表现的衡量标准之一。

四、结语

体系的建立非一日之功，德国国家级才俊资助机构的体系是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完善才日臻成熟的。到如今，该系统以其多维度、广范围的设置特征基本覆盖了德国高校中所有各种社会背景的学生，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奖学金帮助他们顺利地完成学业。2012年联邦政府通过十二个资助机构资助了25394名进行常规大学学习的学生和4242名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总共耗资约1.75亿欧元^⑨。各资助机构的选拔条件比较透明，在各机构的专门网站上，学生随时可翻查到受助条件、资助内容、申请步骤等内容，为学生尽早进行学业规划，及时申请到各项奖学金的资助，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不少便利。

由人度己，中国高校的学业资助系统也在不断完善中，国家已先后设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奖项资助高校学生完成学业。但如何能使资助项目的设置更合理一些，让受惠学生的面更广一些，如何使选拔的条件更透明一些，使学生在入学之初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可以申请哪些奖学金或是

^⑨ <http://www.wiwo.de/erfolg/campus-mba/avicenna-studienwerk-erstes-staatliches-stipendium-fuer-muslimische-studenten/8520710.html>, letzter Zugriff 02.08.2013.

明确努力方向（例如通过制作奖学金一览手册），如何避免受助学生“唯‘分’是图”、“高分低能”、“高智商低情商”，如何使他们在专注于专业学习之余也能热心社会性公益事务、传递正能量。如果借鉴德国的模式，又如何避免从事社会性服务流于形式或避免少数不诚信的学生造假蒙混过关，如何使受

助学生不仅只是拿钱了事，而是在思想上也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并培养他们的感恩反哺之心，这些都是国内教育工作者和高校资助机构从业人员所应当思考的问题。德国的模式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但要适应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还有较长的改革和发展之路要走。

作者简介：彭彧，上海电机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针对外国入学申请者的德国高校入学语言考试及其启示

胡春春

【摘要】德国高等教育针对外国留学生有着明确的入学语言水平要求和相应的语言考试。本文重点介绍和分析德国高校入学语言水平考试，以之对比观照新汉语水平考试和中国高校的预科教育实践，建议制定中国高校入学所需汉语语言水平框架规定，并建立中国高校入学汉语水平考试体系。

【关键词】德国高校入学语言考试 新汉语水平考试 预科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新汉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新 HSK）自 2009 年施行以来，已经成为国际汉语学习者和教育者衡量汉语学习和教育水平的客观标准之一。我国高校也以新 HSK 相应级别的成绩作为外国留学生入学须具备的语言条件以及预科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高等教育国

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学生国际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如何从比较教育学的视角审视新 HSK 所反映的语言水平？留学生预科教育应以达到何种语言水平为目标？本研究选择德国作为参照系，因为德国高校多属公立，相对而言便于总结共性^①，而且针对国外教育背景的入学申请人有相应的德语语言水平要求^②，并已发展出与之配套的考试和预科教育体系。

① 胡春春、李兰、萧蕴诗、金秀芳：《德国高校学校学位制度及学科专业设置——传统、现状和启示》，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8卷，第1期。

② 对于外国入学申请者应满足的条件，详见《关于拥有外国学历的高校入学申请者、预科学习和预科结业考试的框架规定》（Rahmenordn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 mit ausländischen Bildungsnachweisen, für die Ausbildung an den Studienkollegs und für die Feststellungsprüfung. Beschluss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vom 15.04.1994 i.d.F.vom 21.09.2006）。文件见德国预科官网：www.studienkollegs.de/imperia/md/content/studienkollegs/rahmenordnung.pdf，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

二、德国高校入学德语语言考试

高校入学语言水平考试在语言教学层面上涉及中学和大学两个阶段的语言教学工作及其衔接。鉴于德国的政体是联邦制，各个联邦州享有独立的教育主权，中学属于各州教育部、高校属于各州科学部管辖^③，高校并且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因此不难想象，德国针对来自外国的高校入学申请者可以有统一的入学语言水平要求，但是很难实施全国统一的语言考试。为此，“高校校长联席会议”（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简称 HRK）和“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简称 KMK）2004 年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德国高校就读所需德语语言考试的框架规定》^④（下文简称《框架规定》，最新的修订版本是2011年版），规定和协调了现有的语言考试和高校入学语言水平要求之间的关系。《框架规定》第一条“德国高校就读所需德语语言知识”和第二条“语言学习能力证明考试”就原则性问题做出了清晰的规定和解释：

§ 1. 德国高校就读所需德语语言知识

1) 入学申请人的入学资格如果在非德语的机构获得，必须具有符合在德国高校就读的德语知识即语言学习能力。

2) 按照联邦州法律规定，语言知识证明是获得高校录取或注册的前提条件。

3) 对于语言学习能力的要求可以根据入

学时的学习目标不同而不同。为此，《框架规定》下述 § 2 所列语言学习能力证明考试可以证明不同级别的语言学习能力。

4) 不同的入学语言要求由各高校根据所学专业、学制或结业学历做出规定，且以适当的方式作为入学申请所需信息公布。为了确定不同的入学语言要求，高校校长联席会议、“德语作为外语教学专业协会”（FaDaF）及德福考试院（TestDaF-Institut）共同做出建议。

5) 如果对于入学语言要求低于普遍水准，必须提出附加条件，即在学习期间必须参加语言提高课程学习且提交证明。

§ 2. 语言学习能力证明考试

上述 § 1 规定的所需语言知识除符合免试情况之外（……），可通过下列考试证明：

1) “高校入学德语语言考试”（简称 DSH），或

2) “德福考试”（简称 TestDaF），或

3) 高校预科“外国申请人在德国高校就读能力的认定考试”（简称 FSP）的“德语部分”，或

4) 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德语证书”第二级（简称 DSD II）。^⑤

上述四种语言考试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或主办单位负责命题和实施，最终目的也不尽一致。但是根据《框架规定》的说明，它们在符合高校入学要求的可比等级上是等值的，即德国高校入学普遍要求语言考试成绩

③ 各州根据实际情况，主管中小学的“教育部”和主管高校的“科学部”名称不同。

④ 《框架规定》德文全名为 Rahmenordnung über Deutsche Sprachprüfungen für das Studium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RO-DT). Beschluss der HRK vom 08.06.2004 und der KMK vom 25.06.2004 i. d. F. der HRK vom 03.05.2011 und der KMK vom 17.11.2011. 文件见德国预科官网：www.studienkollegs.de/imperia/md/content/studienkollegs/ro_dt_stk_daad.pdf，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

⑤ 实际上，德国一些高校也接受例如通过双边协议承认的德语语言证明，歌德学院的 KDS、GDS 和 ZOP 证书，慕尼黑语言和翻译学院的“德语语言考试二级”证书等作为入学语言学习能力证明。

为 DSH2, 或者德福考试全部 4 个部分至少都达到 4 级 (TDN4), 或者通过预科结业考试“德语部分”, 或者拥有 DSDII。从负责组织实施考试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须满足的条件、对考生的要求等具体内容比较来看:

首先, 符合直接申请德国高校入学条件的外国申请人可以参加 DSH。DSH 由高校或预科负责命题和组织实施, 但是当地必须颁布符合上述《框架规定》和《DSH 标准考试规定》^⑥的具体考试规定, 且在高校校长联席会议注册备案。DSH 考生可以视当地的规定参加重考。

其次, 德福考试由德福考试院经由获得许可的国内外考试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须符合《框架规定》和《德福考试规定》^⑦。除了德国高校外国申请人以外, 任何因前往德国高校从事科研工作而想知道自己语言水平的人、需要德语语言水平证明的大学生、

科学类工作的从业者等都可以参加德福考试^⑧。考生重考次数不限。

第三, 未达到直接申请德国高校入学条件的外国申请人必须参加由预科组织实施的“外国申请人在德国高校就读能力的认定考试”(德文简称 Feststellungsprüfung, 缩写为 FSP), 考试科目根据考生申请的专业类别而有不同。但是无论是语言和文科类、医学和生物学类、理工类还是经济和社会科学类专业^⑨, 德语为各类专业所共有科目, 即所有考生必须参加 FSP 的“德语部分”。由于考生在预科参加 FSP 之前, 一般需要参加预科的学

习^⑩, 所以 FSP 也是预科结业考试。此考试必须符合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有关预科的规定, “德语部分”结业考试在篇幅、形式和内容上依照 DSH。考生一般仅有一次重考的机会。

第四, DSD 是国外中学的德语科目考试, 须符合《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德语证书”考试规定》以及《各州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德语证书”考试实施规定》。

这种多样性的存在, 使得外国学生根据当地和个人情况拥有多种选择: 可以在本国上德语中学以获得 DSDII, 可以在本国或德国参加德福考试, 可以在德国预科参加结业考试即 FSP 或者 DSH, 也可以直接在德国高校参加 DSH。外国学生如果申请就读德国高校, 可以在由德福考试院具体负责的“语言证明网”(www.sprachnachweis.de) 查询德国不同的高校、专业、学制、结业学历对于入学申请所需语言水平证明做出的具体说明。

上述四种语言水平考试中, 存在着 DSH 和预科 FSP “德语部分”这两种从篇幅、形式到内容都几乎一致的语言考试, 看上去仿佛很不合理, 但这种情况首先是国外申请人的自身条件决定的: 如果申请人满足直接申请德国高校入学条件, 则申请人只需要参加 DSH 或者德福考试以证明自己具备德语语言学习能力; 不满足直接申请条件者, 则要在预科学习后按所申请专业类别参加多门科目考试即 FSP, 其中包括“德语部分”。例如: 自然科学类专业 FSP 包括德语、数学、物理

⑥ 《DSH 标准考试规定》是《框架规定》的附件1。

⑦ 《德福考试规定》是《框架规定》的附件2。

⑧ 见德福考试院官网对于对象群的解释, http://www.testdaf.de/teilnehmer/tn-info_ueberblick.php, 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

⑨ 这里仅以大学预科专业分类为例。应用科学大学(Fachhochschule)的预科分为五类专业, 与大学有所不同。

⑩ 统计数据表明, 外国入学申请人不参加相应的预科学习而直接通过 FSP 的比例很低。

或化学(选考一种)等部分,医学和生物学类专业 FSP 包括德语、数学或物理(选考一种)、化学或生物(选考一种)等部分,经济和社会科学类专业 FSP 包括德语、数学、经济知识等部分。这两种几乎相同的考试并存也是德国教育管理体制决定的。根据上述德国教育体制的特点,德国一般不存在全国统一考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各个联邦州的高校预科体制也不一样,有的预科隶属于某一所高校,有的预科独立,所以有的大学预科除了提供结业考试 FSP 之外,也直接可以组织实施 DSH,有的预科则不提供 DSH。在这样多样化的局面下,很难想象预科的教学节奏完全随高校节奏亦步亦趋,以后者组织实施的限次数的 DSH 作为自己的结业考试。而且,预科教学服务于使外国学生在有限时间内达到德国高校所申请的专业入学水平,德语语言是所有课程的基础,因而存在着结业考试“德语部分”的必要性。综上所述,预科 FSP “德语部分”和 DSH 虽然几乎相同,但是服务于各自的对象和目的,没有互相取代的必要。

三、德国高校入学德语语言考试和新 HSK 相应级别的比较

上述由德国高校及预科组织实施的 DSH 和 FSP “德语部分”能够给国内高校和预科提供何种启发?^①

中国教育部办公厅于 2010 年认定:“新

HSK 四级的及格线 180 分,暂时可视为对应 HSK 的初等水平证书 C 级,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中医药专业除外)、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专业的预科学生完成一学年预科教育后应达到的汉语言水平。”^②这就意味着新 HSK 兼有中国高校外国留学生入学汉语语言水平考试的功能。但从考试对象和指导思想来看,新 HSK 是一种“考虑了普通汉语学习者和专业汉语学习者、来华汉语学习者和非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差异,在吸收旧 HSK 优点,借鉴近年来国际语言测试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推出的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也就是说,新 HSK 是一种力图面向各类国际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能力考试,并非专门以来华留学生为考试对象、以测试考生是否具备在中国高校学习所需语言能力为目的。就所定义的考试对象而言,倒是旧版 HSK、而非新 HSK 更接近德国高校入学语言水平考试中的 DSH 和预科 FSP “德语部分”。设定的考试对象和测试目的的区别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因为这些区别直接影响了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以及考试所要求的词汇、语法、文体等知识基础。下面仅就此选择新 HSK 四级和 FSP “德语部分”考试大纲和样卷作一简要对比。考虑到不同的语言可能具有不同的语言本体特点,所以下面的比较仅限于考试材料的内容层面,而不涉及语言知识点、题型等考试技术层面。

新 HSK 四级在大纲中把自己的水平定义

① 德福考试与 DSH 和 FSP “德语部分”的区别主要在于题型,在对象群、考试目标定义和材料选择上相同,这也是研究了德福考试说明和样卷得出的结论,见 http://www.testdaf.de/teilnehmer/tn-info_ueberblick.php, http://www.testdaf.de/teilnehmer/tn-vorbereitung_modellsatz2.php, http://www.testdaf.de/teilnehmer/tn-vorbereitung_modellsatz3.php,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2 日。由于德福考试非由高校组织实施,在此不作为比较对象。

②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外国留学生可凭《新汉语水平考试(HSK)成绩报告》注册入学的通知,教外厅【2010】2号,2010年6月28日。

在“对应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四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F)》B2级。通过HSK(四级)的考生可以用汉语就较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谈论,比较流利地与汉语为母语者进行交流”^⑬。考试对象则从应该掌握的语言知识角度进行描述,即“主要面向按每周2—4课时进度学习汉语四个学期(两学年),掌握1200个常用词语的考生”^⑭。这一标准已经受到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FachverbandChinesische.V.)的质疑,认为新HSK的水平等级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对应等级相比,对语言知识即考试对象的要求偏低,“要想让汉语在语言能力上达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中所认定的标准,对知识量的要求就必须比新汉语水平考试所要求的更加广泛。”^⑮而“汉办官方资料认为,外国学生经过每周2到4个学时、两个学年的学习(在德国总学时约为160—320个学时),汉语水平即可达到B2(HSK4)水平,这甚至在欧洲语言范围内也是无法实现的”^⑯。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把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建议的水平对应等级普遍下调,例如认为新HSK四级只能对应《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的A2级,即把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建议的B2下调两级,而认为达到B2级别的

是新HSK六级^⑰。

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的不同意见虽然可能与对新HSK开发理念和标准的不同理解有关,但是仍旧可以被视作一种信号和警示,促进我们重新审视新HSK的水平等级定义,以及何种水平等级适合作为中国高校入学的汉语语言水平要求。以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公布的新HSK四级样卷为例,听力、阅读和书写试题涉及广泛的生活领域,但是篇幅很短,书写部分也仅限于看图造单句,没有涉及篇章层次,考试研制人员还有意将来取消书写部分^⑱。即使是最高级别的新HSK六级样卷^⑲,材料的选择也以文学性、日常实用性为导向:阅读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共7篇短文,分别是“曹冲称象”的故事、描写森林大火中狼群的智慧、坐车时选择座位的道理、职场新人的信心、“全聚德”的故事、以拟人手法介绍海底生物以及围绕提高注意力的话题;书写部分是缩写一篇父亲对儿子的励志故事。由于样卷的导向性不容小觑,我们应该重视这一样卷对于考生学习和对外汉语教师教学的指导性意义。以上样卷材料,令人难以判断新HSK四级、甚至六级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高校学习所需语言知识的特点。

当然,汉语在高校学习、科学研究类写

⑬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制):《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HSK 四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⑭ 同上。

⑮ 见“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对新汉语水平考试的几项说明”,2010年6月1日,文件见<http://www.fachverband-chinesisch.de/chinesischindeutschland/pruefungen/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3日。国家汉办/孔子学院对此已有答复,坚持了大纲的观点。

⑯ 见“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对新汉语水平考试的几项说明”,2010年6月1日。

⑰ 见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网页各种汉语语言测试与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对照表,<http://www.fachverband-chinesisch.de/chinesischindeutschland/pruefungen/index.html>,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3日。

⑱ 张晋军、李佩泽、李亚男、解妮妮、黄蕾:《对新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新思考》,载《中国考试》,2012年,第2期。

⑲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编制):《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 HSK 六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作等领域所涉及的词汇、语法、文体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别于日常用语,尚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如果以德国高校预科 FSP“德语部分”作为参照,则新 HSK 四级水平标准偏低、无明确的内容侧重等特点(或者缺点)就显露无遗。

德国各预科 FSP“德语部分”具体的考试规定都是在《DSH 标准考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各地具体要求制订的,在主要要求和内容上基本相同,区别多限于考试具体组成部分的顺序等微调。DSH 和预科 FSP“德语部分”都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分为三种题型(或组成部分),即理解一篇听力文章并回答问题、理解一篇阅读文章和科学语言结构并回答问题以及按要求作文。

对于听力文章的选择,《DSH 标准考试规定》:“应该使用符合高校讲座课和练习课交际情境的文章。文章对专业知识不作要求,或者只要求之前上过的某堂专业课内的专业知识。”对于阅读文章的选择规定为:“应该尽量选用与高校学习相关的、以科学为导向的原始文章,文章对专业知识不作要求,或者只要求之前上过的某堂专业课内的专业知识。文章可以附有图表。”针对所谓“科学语言结构”的试题说明为:“科学语言结构范围的试题包括认识、理解和运用与科学语言相关的结构。试题应该针对阅读文章的特点(如句法、词法、词汇、熟语、篇章等),可

以包括填充、理解复杂结构、变换说法(如解释、变换形态)等。”^⑩

以法兰克福大学预科 FSP“德语部分”公布的样卷为例^⑪, 阅读文章选自德国《议会》杂志 2006 年 1 月 16 日,有删改,题为《外国学生已经不是“外星人”》,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展开话题,介绍德国高校日益加深的学习和科研国际化以及存在的问题。文章长度按照规定在 4000—5500 字符之间。听力文章选自《南德意志报》2007 年 11 月 7 日,题为《通过二氧化碳排放交易实施现代化环境保护》,由坐飞机旅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入手,引出全球气候变化、二氧化碳减排、排放交易机制、普通人与此相关的环保消费观念以及不同观点。文章长度为 6626 字符,符合 5500—7000 字符的规定。这些例子无不围绕高等教育阶段所能涉及的、超出日常交际情境的内容。下萨克森州高校预科公布的 FSP“德语部分”样卷^⑫中,听力和阅读两篇文章的主题均为热带风暴,解释热带风暴形成的原因,重点介绍“卡特里娜”飓风对美国新奥尔良造成的损害,以及美国在灾后救灾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素以难度大而著称的柏林自由大学预科公布的多种样卷中,医学类专业 FSP 德语考试听力文章主题是“噪音”,涉及噪音作为环境污染、噪音作为社会现象、噪音对生理的种种危害等^⑬,阅读和写作部分的文章主题是作为生

⑩ 见《框架规定》的附件1《DSH 标准考试规定》。

⑪ 见“法兰克福大学国际学习中心预科部 FSP 德语考试信息和样卷”(FSP-Deutsch-Prüfung am Studienkolleg des Internationalen Studienzentrums der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Informationen und Prüfungsbeispiele), www2.uni-frankfurt.de/43739327/Musterpruefung_FSP_Deutsch.pdf,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2 日。

⑫ 样卷见 http://www.stk.uni-hannover.de/fileadmin/institut/pdf/STK_alle_kurse_deutsch.pdf,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2 日。

⑬ 样卷见 http://www.fu-berlin.de/sites/studienkolleg/pdf/daf_m-hv_auf.pdf?1307228276, 最后访问时间为 2013 年 10 月 12 日。

理和社会疾病的“疲劳”^{②4}；经济类专业 FSP 德语考试听力文章从社会性和政治意义上分析作为劳动市场新现象的“远程工作”^{②5}，阅读和写作部分的文章主题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市场”^{②6}；语言和文科类专业的阅读和写作部分的文章选自《法兰克福汇报》，介绍经科学研究证明的语言吸收外来词的规律，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用以抵御外来词、保护语言纯洁性的语言政策^{②7}。

四、对于我国高校留学生入学语言水平考试和预科教育的启示

一边是德国高校以上述水平和内容的文章以及针对这些文章的试题为基础，要求外国入学申请人具备相应的语言水平，一边是虽然强调语言运用能力、但缺乏明确针对性

的新 HSK 四级以及六级样卷：两者对比所暴露的差异不可不谓巨大！这一对比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国迄今为止针对外国本科留学生的预科教育实践^{②8}，以及普遍反映的矛盾，即“HSK 的通过率与真正达到专业院校的要求之间还相距甚远”^{②9}。我国高校预科教育也是“以语言教学为主，以专业知识教学为辅”^{③0}。语言教学由普通汉语和专业汉语组成，而各高校预科自定的语言教学大纲的目标远远超过新 HSK 四级考试的大纲^{③1}，由此产生预科结业的语言水平要求与对其他外国留学生入学的语言要求（新 HSK 四级）不一致的矛盾现象。当然，在进行中德共时横向比较的同时，除了考虑两种语言可能存在语言本体的学习规律差异之外（如汉语学习中独一无二的汉字学习），也必须考虑客观情况，即两国的预科教育所处发展阶段和外国入学申请

②4 样卷见 http://www.fu-berlin.de/sites/studienkolleg/pdf/daf_m-lv_auf.pdf?1307228278，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

②5 样卷见 http://www.fu-berlin.de/sites/studienkolleg/pdf/daf_w-hv_auf.pdf?1307228283，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

②6 样卷见 http://www.fu-berlin.de/sites/studienkolleg/pdf/daf_w-lv_auf.pdf?1307228284，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

②7 样卷见 http://www.fu-berlin.de/sites/studienkolleg/pdf/daf_sg-lv_auf.pdf?1307228281，最后访问时间为2013年10月12日。

②8 许涓：《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预科教育教学大纲研究》，载《同济·留学生预科教育研究论丛（第1辑）》（许涓、李海燕主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②9 曹慧：《在顺应与持守之间——关于预科课程设置的思考与实践》，载《同济·留学生预科教育研究论丛（第2辑）》（许涓、李海燕主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页，此处见第5页。

③0 教育部关于对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留学生开展预科教育的通知，教外来【2009】20号，2009年3月19日。

③1 周毕吉、李汛：《预科留学生汉语教学现状与思考》，载《同济·留学生预科教育研究论丛（第1辑）》（许涓、李海燕主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22页。此处见第17页。同时参考“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来华预科留学生考核体系研讨会”（2013年4月，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交流材料，如华中师范大学《预科基础汉语词汇大纲（草案）》、《预科基础汉语语法大纲（草案）》，南京师范大学《预科专业汉语课程大纲（经贸类）》、《预科专业汉语考试大纲（经贸类）》，天津大学《预科科技汉语课程大纲（理工类）》，山东大学《预科专业汉语课程大纲（医学类）》，北京语言大学《专业汉语课程大纲（文科类）》、《专业汉语考试大纲（文科类）》。

者本身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德国的留学生教育和预科制度经过战后五十余年的发展，在制度化建设和发展上已经相对成熟；我国面向外国留学生的预科教育起步不久，学生语言水平起点参差不齐，甚至大量预科学生为零起点^②，这意味着我国的预科教育在目前阶段要在与德国相同的限定时间即一学年内，完成更为繁重、更为复杂的教学任务。

因此，本比较研究期望借鉴德国成熟的体制经验，着眼于我国高校针对外国留学生和预科教育的未来发展，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启示，即我们应该在深入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上，制订类似于《关于在德国高校就读所需德语语言考试的框架规定》的中国高校入学

所需汉语语言水平框架规定。并在此框架规定的指导下，或者在现有的新 HSK 体系（包括词汇、语法、样卷、真题、教材等）内，对四级至六级考试进行针对高校入学语言水平的改进，也可以考虑增列“新 HSK 高校入学语言水平考试”的新品种；或者在预科阶段加强针对性的语言培训，并结合不同学校、专业、学制和结业学历，以相应的语言考试作为预科结业考试和高校入学语言水平考试；或者以来华留学生（含预科生）为特定对象群，全新开发专门针对高校入学所需汉语语言知识的考试。需要补充的是，以上三种方案中的部分元素已在我国预科教育的实践和探索中有所体现。

作者简介：胡春春，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博士

^② 例如，同济大学2009年和2010学年接收的预科新生中，入学时汉语水平零起点的占90%。见许涓：《同济大学预科结业生本科阶段学习情况跟踪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载《同济·留学生预科教育研究论丛（第2辑）》（许涓、李海燕主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18页。

- **科研环视**

科研新动态

李晓海

一、国内学术会议

2014年3月26日下午，欧洲议会议员安德烈亚斯·施瓦布（Andreas Schwab）博士应邀来到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访问，并就中德、中欧关系议题进行题为“中德、中欧关系的未来”的座谈。施瓦布博士在开场报告中就中欧、中德关系中迄今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顾，然后展望了中欧、中德关系未来发展的良好前景，他尤其对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前景持乐观态度。其后，与会者与施瓦布博士就5月底欧洲议会选举可能的结果及影响、德国外交政策新动向、国际危机与冲突管理机制等议题交换了意见。此次座谈会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与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上海办公室共同主办，来自同济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等的10多名德国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生参加了座谈会。

2014年11月6日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举办了“德意志福利国家——历史基础和当下问题”报告会。主讲人格哈特·阿尔伯特·李特尔自1947年起在图宾根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历史、政治、哲学和德语语言文学。195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获得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席、明斯特大学近代史

的教席。李特尔的研究重点为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的社会历史以及英国历史。他的著作包括：《社会福利国家——国际对比视野下的产生和发展》、《关于德国——德国历史上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统一的代价——德国统一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危机》等。

2014年3月31日下午，原欧盟驻华大使安高胜博士（Dr. Klaus Ebermann）应邀到同济大学做了题为“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及其德国的角色”的专题报告。

在报告中，安高胜博士首先梳理了欧盟对华政策的最新发展与变化，其后结合2013年底欧盟国家与政府首脑峰会有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决议分析了其未来发展前景，其中重点分析了德国新政府上台后宣示推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对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影响。在报告会的讨论环节，德国研究中心的师生与安高胜博士就中欧政治和经贸关系当前的走势、欧洲议会选举的前景及其对中欧关系可能的影响等议题交换了看法。

二、科研与获奖成果

1. 《认识变化中的欧洲》，周弘主编，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

《认识变化中的欧洲》由周弘主编，本书作者分别从欧洲的联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大国政策与欧洲的未来走向、欧盟的对外战略以及多边关系中的中国和欧洲等视角对变化中的欧洲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认识变化中的欧洲》集中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当代欧洲变化的深度思考。

2.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研究（1958—1963）》，叶晓东，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也是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对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德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危机发展，美国和联邦德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两国关系也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冷淡直至紧张的过程。但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关系并没有走向破裂，而是小心翼翼地予以修补和维持。本书主要考察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危机处理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与相互妥协，揭示在冷战背景下，两国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3.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著，王崇兴，张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

《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堪称一份研究第三帝国时期德国生活的微观社会人类学报告，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观念的图景：纳粹体制如何在普通德国人的层面以及德国社会内部发生作用。这些极具颠覆性的内容引人深思，关乎德国人，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自身。

4. 《中欧关系蓝皮书：中欧关系研究报告

（2014）》，周弘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

《中欧关系蓝皮书》是欧洲所周弘研究员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该书对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年来各方面关系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回顾和展望。既有对政治、经贸、文化三支柱的详细阐述，又将中欧关系放在全球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能源治理等）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在双边关系中，分析欧盟大国对华关系的不同侧重点，欧盟小国和小国集团对华关系的关切与政策。该书还对中欧、欧美关系进行了比较，重点探讨了中欧与欧美在政治关系、部门合作、双边条约、贸易投资关系和科技创新合作方面的异同。该书还通过分析“中国人的欧盟观”和“欧洲人的中国观”来考察中欧关系的民意认知。各篇作者均为欧洲所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对中欧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5. 《德国政治经济与外交》，肖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1月

《德国政治经济与外交》通过对德国历史与民族演变的剖析，探索德国政治的组成及体制特点、德国经济的发展与其国际优势。也分析了德国文化如电影、音乐、曲艺、文学等方面的独特之处，并从多角度解读德国外交政策，指出德国的民族性对其外交战略具有决定性作用。

6. 《危机时刻：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曹卫东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

本书为读者呈现的是1933年纳粹政权前后，德国思想界影响深远的思潮：保守主义革命。这股思潮继续德国青年运动的精神旨趣，以反对魏玛民主政治为发端，吁求强有力的“帝国”政治。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与纳粹政权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

拒绝与希特勒政权合作；另一方面却又为它在思想层面的合法化提供了智力支持。本书收录众多一手文献，选取多位保守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收入他们的纲领性言论，并配上经典评述，可为国内认知德国保守主义革命提供最原始资料。

7. 《人文与社会译丛：德国的历史观》，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彭刚，顾杭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年3月

《德国的历史观》围绕对19世纪到当代的德国历史观和德国民族史学思想传统的讨论，追溯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悲剧性历史，考察了使德国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特征得以合法化的历史观。当19世纪现代历史研究首先在德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时候，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与正在上升的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德国的历史研究绝非如德国历史学家们声称的那样科学和客观，而是受到了对德国民族性认同的深刻影响，其要旨在于拒斥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德国历史思想的最根本贡献，亦即对史料的批判性分析的强调，与一种试图将特定政治和社会现状合法化的、远非客观的“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历史主义”虽不能说直接导向了纳粹主义，但在很重要的方面为1933年德国彻底抛弃民主制度和确立权威主义的恐怖统治扫清了道路。

8. 《德国与中华民国》，（美）柯伟林著，刘东编，陈谦平，陈红民，武菁，申晓云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

1927年南京民国政府建立后，蒋介石在积极依靠美国、日本的同时，注意发展同德国的关系，寻求德国的军事、经济支持，稳定本身的政治、军事统治。作者利用了档案、回忆录等资料全面研究了这一时期的中德关系，对于我们研究民国历史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9. 《大挑战：德国的海洋之路》，白海军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

《大挑战：德国的海洋之路》是国内第一部全景式讲述海军、海权发展与大国崛起的系列丛书中的一册。《大挑战：德国的海洋之路》讲述德国沿着“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进路线。

10. 《柏林1961：肯尼迪、赫鲁晓夫和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弗雷德里克·肯普著，武凤君，汪小英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1月

本书基于大量文献和采访，如戏剧一般的写作手法，以三幕、各种角色之间切换的方式重绘了1961年冷战中那场扣人心弦的交锋。1961年的柏林危机在塑造冷战格局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美苏双方在柏林近距离地荷枪实弹、列阵对垒，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作者把交织其中的各种势力和角色的心理活动、政治考量完整地呈现出来，把这场在偶然与必然之间触发的柏林危机描绘得惊心动魄。

